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中共陕西历史

人物 传

第一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第二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吴崇信 梁星亮

副主编 许发宏

责任编辑 许发宏

责任校对 张春梅

审 稿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

编辑说明

一、随着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陕西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大多党的历史人物革命活动经历也基本清楚。为了真实系统地记述革命和建设时期陕西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领导人和有关重要人物的活动史实,弘扬他们为党、为国、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奋斗、忘我工作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我们编辑出版《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丛书。这既是党史研究领域内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本丛书收录的范围和标准,大体包括:(1)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党团组织的创建人和组织成员、群众团体组织的主要成员、其他知名人士和著名活动家。(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地区特(地)委以上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的创建人或主要领导人;其他重要独立武装的军政指挥者;有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烈士。(3)抗日战争时期省级和省级以上党、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著名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烈士;著名英雄劳模、爱国华侨

和国际友人。(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解放区、国统区和陕南解放区省级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负责人;著名战役、战斗或重大军事行动的最高军政指挥员;著名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和革命烈士。(5)全国解放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以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军区正副职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有重大突出贡献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和著名革命烈士。

三、传记内容,以传主在陕西的活动为主,以传主与党有联系的活动为主。

四、本丛书暂收入已经去世的人物传稿。丛书传稿的编排大体上以成稿先后排序,各卷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五、本丛书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共同编写,并以多卷本陆续编辑出版,公开发行。

目 录

刘志丹·····	(1)
谢子长·····	(34)
刘天章·····	(63)
武止戈·····	(89)
许权中·····	(103)
唐 澍·····	(126)
赵伯平·····	(144)
何挺颖·····	(159)
王尚德·····	(174)
宋绮云·····	(206)
李敷仁·····	(229)
张奚若·····	(245)
李鼎铭·····	(268)
孔从洲·····	(286)
阎红彦·····	(302)
张达志·····	(339)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吕佑乾	(369)
焦维炽	(382)
王兆卿	(389)
蒲克敏	(398)
巩德芳	(405)

刘志丹

(1903—1936)

刘志丹，字景桂。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初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秋毕业后随军北伐。后被派到西北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1928年5月与唐澍等领导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秋任中共陕北

特委军委书记，从事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总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等职。曾遭到“左”倾错误执行者的迫害。1935年10月后先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1936年4月14日在红军东征作战中牺牲。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祖父刘士杰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秉性刚直，喜欢打抱不平，颇受乡亲敬重。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刘志丹出生时，他在金汤小学教书，后转而经商，一度担任地方民团文职副官。刘志丹6岁后，随母回到金汤镇北30里的山村老家楼子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稍长，就读于永宁山本县县立高等小学堂。由于军阀官僚和豪绅地主的残酷统治，陕北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刘志丹自幼生活

在群众之中，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他和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关系很好，亲昵地称张为“干大”（对长辈的一种尊称），有空即随张一起上山劳动。张万银也很喜欢刘志丹，常向他讲说贪官豪绅的罪恶，加以陕北一带，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为民除害的故事又流传甚广，这些都孕育了少年刘志丹对旧势力仇恨的种子。刘志丹勤奋读书，立志改变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但究竟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却还是茫然的。小学毕业后，十八九岁的刘志丹，抱着朦胧的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于1922年徒步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的影响逐渐波及偏僻的陕北，刘志丹迅即跟上时代的潮流，从此开始了他艰苦奋斗的革命生涯。

在时代的激流中成长

榆林中学是当时陕北23县惟一的一所中学，在文化落后的陕北高原要算是最高学府了，但浓厚的封建教育仍然充斥着这个学校。校长杜斌丞是个爱国人士，为了振兴教育事业，他力主改革校政，设法延聘名师，刘志丹入学后，正是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进步教师陆续来校任教的时候。由于他们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榆林中学的面貌开始改观，逐渐变得活跃起来了。刘志丹因为和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经常接触，深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常常使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不久，榆中学生在魏野畴帮助下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1923年后，刘志丹当选为会长。在他的主持和进步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会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推销革命书刊，组织了社会科学研

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开办了平民小学，同陕北军阀井岳秀操纵的封建迷信组织同善社作斗争，并胜利地领导了榆中学生反对旧势力的一次罢课风潮。后来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发展到榆林，刘志丹立即成了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亲自带头演话剧和为刊物撰稿，并以学生会名义，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教堂进行文化侵略、搞间谍活动的罪恶，劝说学生中的教徒退教，表现十分活跃。1924年秋，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支部，刘志丹等成为榆中第一批团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①。从此，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为得力。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刘志丹立即组织榆中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宣传抵制日货，进行街头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潮，使闭塞的陕北高原顿时沸腾起来了。

刘志丹在陕北学生运动中，一开始就显示出他的组织才能。1925年7月，他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学生代表会议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因交通不便，旅途延误，到三原时学代会已经结束，只赶上参加共进社的会议，被选为该会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榆林地区共进社活动情况的发言，并满怀激情地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表现了高昂奔放的革命热情，充满了对未来前途的无限信心。

^① 刘志丹的入党时间有两说，一说1925年在榆林中学转为共产党员，一说1926年在黄埔军校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秋,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时,他中学尚未毕业,校方不准退学,家庭也希望他毕业后再去。但刘志丹的心早已奔向当时的革命中心,便说服家庭,冲破了校方的阻拦,断然离开榆中,绕道山西,经京津乘船南下,于是年冬到达广州。翌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帮助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创办的一所革命军事学校,充满着革命救国的热烈气氛。刘志丹到后,眼界为之一新,和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懋廷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等交往甚密。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热情学习,政治上也十分活跃。由于不服水土,一度曾患重病,医生让他休学,但他意志坚强,重病后仍坚持学习,不曾稍息。

1926年秋,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军东征。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我党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冬,刘志丹奉命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部多系回民,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和雇佣军事教育,一说要打仗,从上到下,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刘志丹到任后,耐心地向马鸿逵进行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的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又开展了新式练兵。回民战士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灌输革命思想后,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后来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战斗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功,这与刘志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被赶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豫西山区作乱,刘志丹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刘镇华阴险狡猾，不愿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尔后对己不利，便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要刘志丹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立场坚定，严词怒斥刘镇华的收买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接受改编。

时势造英雄。刘志丹这时虽只有23岁，但因为他一入党就完全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性格坚强，勇于进取，乐于迎着一次又一次的风浪前进，所以很快成长起来了。

渭华起义展红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也在军队实行“清党”。他借“集训”为名，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在该部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言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①，否则要“查明枪决”。刘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党员押送出境，原想借湖北反动派之手杀害之。刘志丹等20余人便被分别装进两辆闷子车，送出武胜关，甩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些共产党员机警地躲过了敌人的暗算，设法到武汉去找党。到武汉后，始知武汉政府亦已叛变，遂又辗转通过地下关系找到了党组织。按照党的指示，大部分同志被派往苏联，一部分参加南昌起义，刘志丹奉命回陕，担任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

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根据

^① 《马玉祥日记》，北平东方书社，1930年8月版。

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革命的紧要关头,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并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九项议案,强调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兵变,准备武装起义。

1928年1月上旬,陕西省委进行改组,撤销了犯有右倾错误的原省委书记耿炳光,改选潘自力为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接连发出党内通告,部署武装起义,并具体划分了陕西各地的暴动区域。通告强调武装部队的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指示建制上接受军阀李虎臣收编,实际上由我党控制的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积极准备起义。与此同时,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等,陆续被派往该旅加强领导工作。刘志丹等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许旅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培训革命武装骨干,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并公审和处决了几个恶霸地主,迅速扩大了革命影响。3月,渭华地区因“宣化事件”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陕西省委决定首先在这个地区发动起义,为了加强领导,正式成立陕东特派委员会,刘继曾为书记。4月6日,陕东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渭华暴动的《行动大纲》,具体制定了起义计划。与此同时,省委又转发了1927年冬中央致朱德的信,强调革命军队一定要脱离军阀部队,作农民暴动的“副力”;并指示许权中旅迅速扩大力量,以配合渭华农民起义。这时,李虎臣乘冯玉祥主力离陕参加军阀混乱之际,发动了反冯战争,企图独霸陕西。李除以大部兵力围攻西安外,并调驻商洛地区兵力进攻潼关。唐澍、刘志丹等在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和组织部长李子洲的支持下,5月10日夜率领部队撤离潼关,开赴华县高塘,和5月1日在渭南崇凝镇与

已经爆发的农民暴动相结合，宣布正式起义，后在高塘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刘志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原因，指出：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大会正式宣布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刘继曾任政治委员，许权中任军事顾问。革命军近千人，下分4个大队、1个赤卫队和1个骑兵分队。革命军所到之处，大力帮助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进一步推动了渭华起义的发展，很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安)潼(关)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被摧毁，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农民群众热情歌唱：“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党领导革命军民在这里发动起义，使敌人大为惊恐。因此，从6月上旬开始，敌军先后向这里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由于起义军民团结奋战，头两次进攻均被胜利粉碎。6月19日，敌人又调集了孙连仲等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分左、中、右3路向革命军发动第三次围攻。因敌进攻兵力过强，我军原计划转移陕北的路线已被切断，根据情况的变化，革命军决定向南山撤退，以保存力量。为了阻击敌人，刘志丹率部在高塘附近骆驼渠的半坡上，和宋哲元亲自指挥的中路敌军1个师作战。骆驼渠是革命军司令部的前沿阵地，敌人用重炮连续轰击，战斗十分激烈。面对数倍于己之敌，刘志丹镇定自若，一面指挥革命军英勇阻击，一面掩护司令部和伤员迅速撤退，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唐澍的指挥下，五六百手持长枪、锄头的农民，英勇地击退了自赤

水西川进攻的敌人。革命军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于22日相继撤退至洛南两岔河。但立足未稳，又遭李虎臣部5旅之众的进攻，唐澍壮烈牺牲，革命军被迫转移蓝田地区，只剩下不到200人。渭华起义失败了。7月初，根据省委指示，陕东特委在蓝田张家坪召开军事会议，刘志丹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了以下几点：1. 光杆斗争；2. 军事冒险；3. 脱离群众；4. 烧杀政策。严肃指出了这次起义中政策上一些“左”的错误。会后，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同志离开部队分散活动，部队由许权中率领，离陕开赴河南确山地区，途中在邓县失利，全军覆没。

渭华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它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后来在陕甘、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出生入死的兵运工作

1928年7、8月间，刘志丹等冒着被敌人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派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回陕北工作，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刘志丹在途经家乡保安时，曾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及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闹革命的曹力如一起，整顿地方党的组织。他们利用党员担任县教育局长的方便，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全县7所小学，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参加特委工作。特委负责人杨国栋惧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

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刘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9年春,刘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仰之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刘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士绅们,争取他们赞成改选民团,一面揭露路仰之欺压老百姓的罪行,鼓动广大群众到县长那里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县长迫于人民压力只好答应改选。党组织又通过社会关系提出刘志丹、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并巧妙地争取了多数选票,使刘志丹、曹力如当选为正副团总。选举胜利后,路仰之收买了一部分人,企图拒绝刘志丹上任。党组织又及时发动广大团丁进行抗争,结果把路煞费苦心安排的拒绝刘志丹上任的示威,变成了欢迎刘志丹上任的仪式,使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刘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改善生活,加强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把一个本来反动的民团,改造成为党掌握的武装力量。

1929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候补常委。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举行全体会议,刘志丹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8、9月间,省委任命吉国桢为陕北特委书记,刘志丹仍继续负责特委军委工作,在陕甘一带活动。那时候,陕甘交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此聚义,封建社团如哥老会、青红帮等也在这里占有地盘。刘志丹看清了这个特点,就号召党团员占山头闹革命。他常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

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在这里闹革命呢？从1929年到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利用亲友等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军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刘志丹先于1929年夏秋，打入陕北军阀张廷芝部队；1930年春，又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陕北特委同时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蛟、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相继进入苏部工作，并且在苏部秘密地建立了党的军委（张东蛟任书记），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军事干部的工作。随后，刘志丹、谢子长又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活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随谭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准备利用机会举行起义，不意突遭张廷芝的袭击而失败。

1930年8月中旬，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书记为赵伯平）第五次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这次会议正值立三“左”倾错误时期，按照立三“左”倾错误的要求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但是，由于立三“左”倾错误很快就被纠正，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贯彻执行。会议期间，特委曾提议由刘志丹继续担任军委书记，留机关工作，刘志丹以基层武装斗争更重要为理由，请求派他仍回陕甘边搞兵运，特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另由北方局派孔祥桢为军委书记。

9月，刘志丹回到保安，向党组织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研究了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这个月的下旬，刘志丹即和曹力如等一起在永宁山一带组织革命武装。他们先是借用和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到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击毙该镇民团总黄毓麟以下10余人，缴获枪支60余支，骡马几十匹。战斗胜

利后，刘志丹带着这支队伍，驰骋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使部队发展到 200 余人。人马发展了，刘志丹又抓紧机会在永宁山南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进行练兵。当时民谣曾有：“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等句。后因遭优势敌人“围剿”，转移途中失利。

1931 年春，刘志丹奉命继续和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暴露，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被捕，囚禁彬县，部队亦缴械改编。刘志丹“虽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无惧息”。旋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获释。

同年 4、5 月，刘志丹出狱后，根据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又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陈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刘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又想利用刘志丹反对当地其他军阀张廷芝、谭世霖，扩充自己实力。刘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此以陈的名义在桥山的南端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人枪 300 余，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这期间，陕西省委曾有一个策动甘军 5 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派高岗（时任省委交通）到平凉和刘志丹进行过联系。但是这些起义多系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且在路线上带有某种盲目性，因而都没有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因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刘志丹在危急情况下安排了党的工作，连夜出走，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起部分失散了的战士，沿着桥山山脉，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二三百人的革命队伍。

刘志丹在兵运工作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出生入死，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一向被当作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虽经多次挫折而从不气馁，并善于从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

经验,探索前进的道路。这种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发展革命武装的做法,当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但并不是根本办法。正像刘志丹后来所总结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公开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出去搞。”正反映了他思想认识上的日渐成熟。

从陕甘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2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杨重远、阎红彦、师祝杰等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合,到南梁一带休整。是年冬,转移至合水县柴桥子。根据当时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2月,根据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改编之始,刘志丹即离部队赴省委汇报情况,随后在渭北搞了一段农运工作,又返回陕甘边。此时,游击队已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率部在永寿、乾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这时,敌人部署重兵数旅“进剿”陕甘游击队,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刘志丹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分驻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之敌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团战斗力弱,且距榆林、西安均远,增援不易;这一带又系山区,游击队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利于作战;于是决定向该地区行动。5月15日

夜，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五一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 200 余支。17 日，一天之内又连歼凤凰山守敌五一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 500 余人，缴枪 400 余支。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队伍迅速发展至 1500 余人。20 日，继续向敌进攻，歼灭了白水县及中部县民团百余人。随后，部队在宜川英旺镇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营，缴枪 300 余支，弹药两万余发。至此，敌八十六师转入守势，中、宜、洛反动民团基本被歼。在此次反“围剿”中，刘志丹和他领导的游击队，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运用游击战术，半月之内，挺进数百里，经过 5 个月，大小 9 战，8 次获胜，并歼敌 1400 余人，缴枪 1200 余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6 月上旬，刘志丹率游击队自富县东移，在集义镇消灭民团一部，进至韩城的上官庄，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 50 余人的赤卫队。原计划在此开辟游击根据地，但因遭强敌袭击，伤亡较大，被迫退至甘肃正宁麻子掌，部队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争执，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被选为总指挥。这时，执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指示“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反对游击战争。7 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对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等进行批判，戴上“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等帽子加以打击。8 月，当部队打下正宁五顷原后，又错误地提出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消灭附近敌人的坚固据点，20 天分完土地等一套过“左”的计划。刘志丹坚决同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并耐心进行说服。但这些人根本不听，仍令进攻敌人设防坚固的城镇，结果连打败仗，使部队遭受极大挫折，被迫退至马栏附近。

8 月底，省委又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

指挥，率部南下耀县地区。此时，敌人分3路对游击队开始了新的“进剿”。敌第一路贺高侯部千余人，由旬邑土桥经安子洼向照金进发；第二路井岳秀部一个营配合民团200余人由宜君进占马栏，企图截断红军退路；第三路由胡三带领富平、耀县、铜川3县民团400余人，以素著恶名的耀县团总蔡子发为首，由耀县进攻照金，情况非常严重。但谢子长、刘志丹沉着应战，在摸清敌人部署后，当机立断，决定避敌主力，歼其薄弱环节，趁敌贺高侯部进展迟缓，当晚运用以退为进的战术，先佯装向宜君、铜川方向后撤，埋伏在照金以西20华里的地方，诱敌蔡部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杀了个“回马枪”。拂晓，当敌还在酣睡之中，即被我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近两小时，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照金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后，由于敌人又集结几个县的兵力联合反扑。为了避敌主力，部队只好撤离照金，北上保安。临离照金时，刘志丹留下他的特务队，交由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这个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习仲勋领导，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

9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10月，再战又失利，撤至合水县梢林地区的平正川，部队情绪低沉。谢子长、刘志丹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并寻机消灭小股敌人。会后，游击队分3路活动：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合水塔尔原；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三原武字区；杨重远、阎红彦带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依靠群众的掩护，带领30余人，留住平正川、豹子川的山林里，照看伤病员。经过一段工作筹得了一批粮款，取得了一些胜利，部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原、塔儿原地区会合，旋即南下淳化地区游击。此时，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省委指示

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省委书记杜衡为此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改编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同月22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开党团员大会，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刘志丹、杨重远虽因杜衡不懂军事，勉强被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只有这一个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军、团两级政委。为了便于控制部队，杜在改编中规定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由政委任命产生，原游击队排以上的干部全部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面对这种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他心地坦荡，顾全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并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协助拟定作战计划，争取打胜仗。由于他工作出色，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红二十六军成立半年多时间几乎被搞垮了。

本来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就决定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因为照金位于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5县之边，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岳连绵，便于红军活动。同时，这里曾是陕甘与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是外来灾户，有土地革命的迫切要求；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人数不多，居住分散，

其中庙湾民团又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加以习仲勋、李妙斋等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红二团成立后，又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组织均已建立，只要路线政策正确，在这里大有发展前途的。但杜衡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只知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当时白军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干部有秘密联系，送枪支弹药给红军，杜衡就骂红军干部勾结军阀。对和红军订有友好协定的庙湾夏玉山民团也要进攻，结果使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又烧了香山寺，惹得几百个和尚也成了革命的对头，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情况十分困难。

1933年5月下旬，杜衡召开党政军干部临时联席会议，在会上作形势报告时，故意夸大敌人进剿的严重性，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建新的根据地，说什么渭华形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又距西安甚近，可威胁敌人反动统治中心，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刘志丹坚持反对南下，指出：渭华暴动失败后，那里的群众受到极大的摧残，有失败情绪，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造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转的，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杜衡根本不听，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在杜衡的错误决定下，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被迫南下，5月30日，到达三原武字区，经高陵玉桥渡口过渭河后，杜衡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中途动摇，以向省委汇报为名，私自离开部队跑回西安。不久省委机关破坏，杜衡被捕叛变。杜衡离队后，政委由汪锋担任，刘志丹任参谋长，与追击的敌人边走边战，进到蓝田张家坪时，被5000多优势敌人包围。刘志丹等见势不利，立即召开队委会，决定丢掉辎重，分

3路轻装突围。刘志丹、曹士荣率一路，汪锋、杨琪率一路，王世泰、吴岱峰率一路，在终南山一带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

刘志丹带领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围困在深山老峪里，靠采集野果充饥。时值盛夏多雨，加之敌人重赏通缉刘志丹，经常派兵搜山，处境十分困难。革命的严重挫折，动摇不了刘志丹坚定的意志，他亲切地和战士们谈心，鼓舞士气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后来他动员大家突围，在通过封锁线时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大部分同志牺牲了。刘志丹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死里逃生，一个人冲了出来，隐蔽在一个深山里，昼伏夜出。一次，从一个险峻的高崖上滑了下去，摔成重伤，又遇着一场暴雨，几乎丧生。但他坚强地战胜种种困难，后来遇见红二十六军先锋队一个战士，才扶他下山，和失散的王世泰、曹士荣等会合。下山不远，又路遇叛徒险遭出卖，幸赖他们智斗敌顽，得以脱险。后在渭南党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游乡小贩，担着货郎担子，渡过渭河，绕道洛河川，爬山越岭，奔向根据地。一路非常危险，但刘志丹等仍坚持不丢掉武器，他们把货郎担子分做两层，上层放货物，下层放武器，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1933年10月4日，带着几支驳壳枪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奠基南梁和首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夏，全国革命形势又有一个新的发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察哈尔民众

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同时,中央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又创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日救亡运动和红军的胜利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在陕西省委领导下,7月21日,陕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通电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挫后,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张邦英、张仲良、陈学鼎)等部,先后转入照金,壮大了在艰苦斗争中坚持创业的照金根据地。同时,由于这时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边摆脱了“左”倾错误的直接统治,形势很好。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举行了党政军联席会议,批判了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革命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10月4日,刘志丹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部队甚为振奋。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左”倾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①

由于红军集中指挥,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很快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敌急调4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6县民团共6000余人,发起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人“进剿”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要粉碎其进攻,必须转移外线作战,深入敌后打击敌人。于是决定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红军北上。10月中下旬,刘志丹和王泰吉遂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率红军北上，配合游击队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接着在合水毛家沟门和杨家店子进行战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重挫了敌人锐气，大振了红军声威。此后，部队继续在合水、庆阳一带游击，又接连获得一些胜利。

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并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成立四十二师为主力，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全师人枪500余，并决定建立师党委。同时，会议鉴于红军暂时撤离照金根据地，部队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十分不利，为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东距延安、西距庆阳、北距保安均远。南临原照金根据地，四周地形复杂，敌人统治薄弱，便于开展游击战。会后，刘志丹和王泰吉为完成建立南梁中心根据地的计划，分兵两路积极扫荡反动民团。师部及第三团向东北行动，在洛川之葡萄沟门击退敌人一个营。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行动，全歼新堡民团，后在梨园堡、阎家洼子歼敌两个连，接着又歼赵沟门民团，然后会师二将川。此次行动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初步基础。随后，部队利用战斗空隙，分兵发动群众，以连为单位，分别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一带，打土豪分粮食。11月下旬，首先在合水小合沟四合台成立了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不久，南梁附近农村都相继建立起农会组织，并建立了约1000人的赤卫军。此时，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以南梁为中心，北至黑水坡，南至莲花寺，西至老华岭，东至平正川，幅员达百余华里。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如燎原烈火发展起来了。

红军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2月初,西安绥靖公署调集驻保安、合水、庆阳等县的正规军4个营及地方民团共约5000余人,分9股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刘志丹和王泰吉缜密部署,决定红四十二师南下作战,以二路游击队之一部打击来犯南梁根据地之敌。但此时正值福建事变发生,敌人未能立即发动进攻,红军遂乘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扩大武装。在此期间,刘志丹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

1934年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合水廉家砭。因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2月,敌人又重新发动进攻。红军配合地方游击队和敌人连打9仗,均获胜利,特别是4月西华池一仗,全歼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取得了重大成果。此后,刘志丹根据师党委决定,率红四十二师南下三原、淳化、耀县,帮助开展第三路游击战争。5月,敌人又跟踪追击调兵“围剿”。刘志丹遂率部回师南梁,随后又经过一两个月的战斗,第一次“围剿”即被粉碎。总计从1933年冬到1934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成百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14个游击支(中)队。同年秋,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贫农团、农会、赤卫军、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边区党政军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群众生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了培训干部还办了军政干校,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负责教学工作,分批

轮训各级干部和战斗骨干。各乡还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还发行了布制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日益繁荣和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1933年夏,以崔田夫、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决定划陕北为4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由中共中央北方代表任命为驻西北军特派员。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领导下,陕北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同年7月28日,谢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参加了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扩大会议,推谢子长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谢子长率领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打胜仗,粉碎了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不幸的是,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役中弹负伤。10月,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来陕北,指示统一陕北、陕甘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游击队问题,决定调刘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遵照北方代表的指示,12月,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改为八十一师,师长先后为杨琪、贺晋年,政委张达志)。12月底,刘志丹亲率红二团和陕甘五、六支队赴安定,并于1935年1月,到水晶沟、柳沟、灯盏湾等地,多次探望辗转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得十分融洽。2月5日,刘志丹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山金(今属子洲县)举行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统一了两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

委主要负责人^①。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提出的粉碎敌人新“围剿”的战略方案,为进一步推动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新的反“围剿”斗争开始后,刘志丹又兼任了前敌总指挥。

在第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

1935年2月,蒋介石由于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的极度不安,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4省军阀军队,总兵力约4万余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此时,根据地武装虽有迅速发展,但红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主力还只有4000人左右,游击队也不过3000多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当时红军和西北工委领导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种意见,主张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以与陕甘苏区打通;另一种意见主张攻打敌坚固据点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以与神府苏区打通。大多数同志同意刘志丹意见。刘志丹即据此和周家硷会议精神,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分析了敌我形势,命令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对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为了保证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动员令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实现严格的军事化,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反对散漫习气和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动员令下达后,根据地党政

^① 关于军委主席的说法有二:一说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高岗为副主席;一说刘志丹为主席,谢子长为副主席。

军民立即投入战斗，红军所到之处，群众紧密配合，赤卫军站岗放哨、带路送信，妇女补衣做鞋、看护伤员，整个根据地森严壁垒，众志成城。

反“围剿”战开始后，红二十七军先和敌人接触。红二十六军主力接着北上，4月22日，在横山寺儿畔首战告捷，歼灭井岳秀一个精锐连。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原县白岔胜利会师，当日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刘志丹和两支红军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场洋溢着兄弟部队亲密团结的气氛。会后又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士气更加旺盛。接着在刘志丹统一指挥和根据地群众武装协同作战的配合下，红军连战皆捷。先在吴家寨、马家坪歼敌高桂滋部两个营又一个连，迫使驻安定县瓦窑堡和延川县永坪镇的敌人撤离逃跑，10日安定解放。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解放的第一座县城。根据地军民乘胜再战，又在清涧无定河边，歼高部一个连。接着，再以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制造假象，扬言要打清涧和绥德县城，给敌人造成错觉，主力则兼程南下，隐蔽运动到延长城下。30日凌晨，刘志丹亲自指挥攻城，全歼守敌400余人，一举解放了延长县城，吓得附近甘谷驿民团自动投诚，延川守敌弃城而逃，延川遂告解放。延长和延川相继解放后，前总决定乘胜拔除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中间的敌人据点，以便打通两根据地的联系。为此，制定了先夺甘泉，孤立延安，然后再打安塞的作战计划。6月4日，红军昼夜兼程，南下奔袭甘泉。但因意图暴露，敌人戒备增强，未能得手，刘志丹遂改变原计划，在甘泉虚幌一枪，率主力沿洛河两岸西上，于6月中旬重重包围了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在政治争取无效后，红军挖地道爆破寨墙，强攻占领山寨，歼敌200余人，俘虏了安塞县新旧两任县长，解放了安塞县城，安塞县境的地主武装，反动民团亦被相继扫光，基本上打通了陕甘边与陕

北根据地的联系。6月下旬,刘志丹又率红军主力挥师北上,奔袭靖边县城——镇靖。该城西山寨是个制高点,火力足以控制全城,地形对我不利,敌人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由于主力红军与赤卫队紧密配合,经过反复强攻,终于全歼了守敌一个营,胜利攻下镇靖。靖边县城打开,保安随之孤立,“围剿”根据地的敌人大为震惊,保安守敌不战而逃,红军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保安城。接着,刘志丹又令贺晋年率红一团乘敌人外出抢劫之际,在老君殿高家塌全歼高桂滋部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打伤团长艾捷三。至此,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总计此次反“围剿”中,缴获长枪3000支,轻重机枪200余挺,俘敌约2000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形势一片大好。

第二次反“围剿”中连打了几个漂亮仗,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并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取得的结果;同时也集中体现了刘志丹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在指挥作战中,善于审时度势,捕捉战机,常常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劣势对优势而战胜敌人。在接连取胜的形势下,他仍十分注意总结经验,一再告诫部队戒骄戒躁,因而能够提挈全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取胜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于8月间又发动了对西北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块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惟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正因为这样,蒋

介石对这次“围剿”下的本钱更大。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且自兼总司令，除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阀军队外，还调集了驻陕西的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分，共10多万人，超过红军10余倍。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未就绪之时，先发制人。8月中下旬，在东线的绥德、吴堡一带，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正在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经陕甘边到达陕北。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瓦子川热情迎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会师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简称永坪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并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为统一红军指挥，确定3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徐海东、刘志丹即率部南下。10月2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全歼敌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劳山战役的胜利对敌人震动很大，瓦窑堡守敌八十四师所部连夜弃城逃往绥德，我军乘胜追击，拔除了瓦窑堡周围安定县敌人的全部据点。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这时中央红军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敌“西北剿总”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电令董英斌、王以哲、孙楚等部，立即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

受诬入狱和重见天日

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早在1934年初，陕北特委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被无端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又决定“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先是利用永坪联席会议决定的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的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插“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担任要职，接着即以肃反为名到处捕人。他们始则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继则干脆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严刑逼供，指名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一批干部。但许多忠于党和革命的干部，虽经多次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拒不承认他们的诬陷。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他们采取欺骗手段，以调往北线指挥作战为名，于10月初劳山战役之后将刘志丹骗离前线。刘志丹在途经安塞县真武洞时，恰好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了他。刘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他有极高的党性。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还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随即策马扬鞭，毫不犹豫地毅然直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不要逮捕前

线其他指挥员。但他一到即被投入监狱，连他的带着5岁幼女的妻子同桂荣，也被同时禁闭起来。“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刘志丹这种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胡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刘志丹蒙受不白之冤，在监狱受尽折磨。但他面对随时可能被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

陕北这次“左”的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造成了革命根据地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根据地一些地区发生了“反水”现象。同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了对根据地新的“围剿”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革命根据地，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局面。

正当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陷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剿”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喜讯传来，军民振奋。毛泽东等同志是在突破腊子口后，始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到达陕北后，了解到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已被关押，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于11月初将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刘志丹出狱后，陕北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刘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接着周恩来又领他去见毛泽东。他们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

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同志不但及时纠正了陕北的错误的“肃反”，并且亲自指挥红军打击敌人的进攻。接着，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配合，打了著名的直罗镇一仗，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声威大振，根据地空前发展。之后，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北与陕甘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委，并相应地建立了政府机构。同时，又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一管辖西北的革命武装，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编成红二十八军。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要职。在此前后，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自对王明及其“左”倾错误执行者的义愤，多次要求刘志丹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反映，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丹胸怀坦荡，一再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另一方面又一再劝慰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1936年初，他要习仲勋转告受过整的同志：“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

顾全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为党工作，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东征抗日 英勇献身

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形势迅速高涨。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眼前，揭露蒋介石围攻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要“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和万恶的敌人血战！”“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

193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17日发布《东征宣言》，并随即派主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汾河河谷击败阎锡山的堵截，逼近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蒋介石对毛泽东亲自率红军渡河东征怕得要死，慌忙下令从洛阳、徐州等国防要地，调遣10个师以上大军配合晋绥军拦截红军去路；同时，又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甘红军后方。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党中央命令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黄河，插入晋

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刘志丹率领部队向黄河挺进的行军中,沿途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听说刘志丹带着红军回来了,甚至专程几十里跑来看望,刘志丹的宿营地经常挤满了亲切慰问的群众。一次在神木县境,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也拄着拐棍,颠颠跛跛地赶来探望,众人笑着说:“大娘,你怎能看见老刘啊!”她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刘志丹立即站到老人家面前,拉着她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老人家把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热泪说:“好哇!……好哇,你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啊!”在场的好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充分反映了刘志丹和广大劳苦群众的血肉联系。

3月,红二十八军打下神木沙峁镇后,住在贺家川一带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刘志丹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经过昼夜不停的详细调查研究,最后选定在通往山西兴县的沙峁头渡河。3月底,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胜利渡过了黄河。渡河后立即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随即向兴县黑峪口、康宁镇横扫过去,沿途连获胜利。当部队进至山西临县白文镇时,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刘志丹率领部队立即由白文镇出发,经过激烈战斗,自离石按时到达三交镇附近。4月13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了消灭三交镇敌军的命令。三交镇是山西省中阳县一个重要渡口,河西就是陕北根据地绥德。该镇周围都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敌人防守。刘志丹为打好这一仗,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

地指挥战斗,由于过度疲劳,眼里充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不知怎么一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当他得知一团攻击不太顺利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军指挥所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来团指挥所,和指战员一起研究突破敌军碉堡的方案,指出:“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当日午后,正当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伤了心脏,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同志:“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

刘志丹牺牲时年仅 34 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劳动人民解放奋斗的一生。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党赤胆忠心,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威武不屈,任何艰难险阻、高官厚禄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虽遭多次失败,总是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在党内斗争中,他一向光明正大,襟怀坦白,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左”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虽受诬陷,不自矜功,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特别是他无限热爱人民群众,经常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和老乡们都一直亲切地以“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疾苦。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善于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地理环境等,对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

水、村庄道路都十分熟悉，人们称他为“活地图”。他指挥作战有方，爱护战士情同手足，行军中他的战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有时还亲自抬担架。他一生艰苦朴素，只知吃苦，不图享受，完全和普通战士一样，身穿千补百纳的粗布衣，脚蹬自己编织的麻草鞋，牺牲时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除了衣袋里几份党内文件和6支香烟外，其他一无所有。刘志丹啊，真不愧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不愧为“红军模范”、“共产党员的模范”。

刘志丹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对革命事业的杰出贡献，使他在红军和人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西北人民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顿时为之震动。4月24日，根据地首府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刘志丹，广大群众和红军指战员莫不为失去这位像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恸。“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正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情。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1年开始兴建陵园。1942年，刘志丹牺牲6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1943年5月，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李鼎铭先生等均对刘志丹陵题词，续范亭因病未能参加葬礼，也遥寄哀诗，中有：“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多痛未能亲执紼，西望云天吊将军”等句，深切地表达了广大老同志对刘志丹的真挚感情。

由于戎马倥偬，刘志丹虽然没有能够给我们留下多少文字上

的遗产,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却炳耀千古,传颂万世。流传至今的刘志丹的许多革命故事和民谣颂歌,不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的公正评价吗?正像周恩来同志的题词: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李振民 张守宪)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党务报告》(1927年9月26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 2.郑殿华:《渭华起义回忆》。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3.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刘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1945年7月17日)。
- 4.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生,纪念先烈以启后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周年》,载1980年4月1日《解放军报》。
- 5.刘志丹:《三边事变的经验与教育》,载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82期。
- 6.王子宜:《纪念伟大的革命战士——刘志丹同志》,原文存陕西省档案馆。
- 7.转引自裴周玉:《回忆和刘志丹同志最后在一起的时刻》,载1980年4月1日《陕西日报》。

谢子长

(1897—1935)

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参与领导清涧起义,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三大队大队长。1929年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冬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夏奉命到张家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做党的工作。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1934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兼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5年2月初被选为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人,2月21日病逝。

在大革命的年代里

谢子长,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谢标朋,以务农为业,兼开柴草店。谢子长从小随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在家劳动,是个放羊能手。由于陕北文化落后,谢子长14岁起才读冬学,17岁时转入县城小学。1915年安定县进步人士郭海宽反对袁世凯称帝,惨遭县官杀害,谢子长遂联合进步师生控告知县,颇受师友爱敬。

1919年，谢子长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谢子长在榆林中学上学一年，曾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1921年底，为反对帝国主义召开太平洋会议，在校长杜斌丞的支持下，榆中学生罢课三天，在校内外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径。当时，帝国主义在榆林等地利用办教堂作幌子，推行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人民。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在各地开办迷信团体同善社。学生会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开展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对同善社的宣传活动。经过斗争，部分学生退教。学生会还组织学生宣传妇女放足，不扎耳眼，不带耳环。为改善同学的伙食，谢子长亲自下厨办伙，受到大家的好评。

1922年春，谢子长在中学未及毕业，就回家乡创办小学。但在那时，办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费无着，困难极大，特别是由于军阀豪绅鱼肉乡里，穷人家没有几个孩子能上得起学。严酷的现实使谢子长心灰意冷，认识到仅靠办学是救不了劳苦大众的，他心中十分苦闷，常思救国之道，决心投笔从戎。同年秋，谢子长只身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但这种学兵团不过是旧军阀的讲武学堂，不仅不能满足革命的要求，而且对他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1924年，谢子长毅然离开学兵团，回到安定，办县民团，任团总。随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其时正值“五卅”运动爆发，全国范围掀起了蓬勃的反帝斗争高潮。在革命高涨的京津两地，谢子长经常接触陕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诚、白志强、李波涛、白志立等，并通过他们结交了中共北京地区党的负责人之一刘伯庄。在他们的影响下，谢子长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同年，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和北京地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底，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谢子长回到陕北与中共绥

德特别支部(次年春改为地委)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安定,继续办县民团,仍任团总。此时,谢子长的友人李象九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陕后利用同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谢、李二人便利用公开的身份,在安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上半年,石谦先后升任营长和团长。为了利用这个关系发展革命,谢子长受命首先帮助李象九招收一批进步学生和贫苦农民,在石谦营里建立了学兵连,李任连长。不久,谢子长把自己领导的县民团也编入石谦部四团三营十二连,自任连长。还通过中共绥德地委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蔡楠轩调来一批党员任班、排长和负责教育工作。李、谢连里每天除两个小时军事训练外,其余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谢子长经常对士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讲解马列主义常识,教士兵唱他编的歌,其中有“孙文在广东,列宁一声唤,双手迎接世界共产党”等语。他和李象九还多次邀请李子洲、杨明轩等共产党人到部队讲演,宣传革命道理。谢子长对士兵十分关怀,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改善士兵生活,深得士兵爱戴。随着革命思想在部队中的传播,谢子长、李象九等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李瑞阳担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等任支部委员,发展了阎红彦、雷恩均等一批新党员。连队还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学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演新戏,搞球赛,气氛十分活跃。同时,在官兵中提倡艰苦朴素,自己缝衣做鞋,禁抽鸦片和喝酒,使连队里很快建立起新的革命生活。

1926年夏秋,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正确领导下,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石谦升任十一旅旅长。中共绥德地委很重视这支受党

影响的部队，先后派李瑞阳、杜衡、冯景异、阎揆要等到石谦旅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工作，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1927年春，石谦旅中的党组织由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杜衡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等均为委员，几个营、连都建立了支部，一百多名官兵入了党。由于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在中共军支和谢子长等同志的努力下，促使石谦接受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的建议。谢子长等借此机会把许多进步书刊散发给官兵，并直接向石谦宣传革命道理，使石谦及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

1927年1月，谢子长率部由宜川返安定驻防，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士绅，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谢子长善于作统战工作，他向安定县知事张鸣盛建议“整理地方，召集全县民众共图改革计划”，以便作出“兴利除弊”^①的决议。张知事欣然接受，于2月21至23日召开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谢子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指出：“安定从前开会既无程序又无结果，此次大会应从新组织，并将议决案件须确实施行。”^②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及其“细则”和《农民协会章程》等三个文件，还作出了关于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及捐税等8个方面的决议案。《大纲》和决议案以“改进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痛苦为宗旨”^③，对改革教育、革新社会、兴利除弊的办法作了明确规定。《农民协会章程》根据外地农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农协的性质、任

^① ^{②③④}见《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1927年3月），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务、组织机构的权利,明确指出“本会以团结农民,互相维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宗旨。”^①以上几个文献当时统称为《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它体现了谢子长兴利除弊的革新务实精神。在这次会上谢子长当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

会议结束的当天,为贯彻执行会议精神,谢子长和十连连长李瑞成联名发布了《敬告安定父老昆弟》的布告;散发《敬告父老兄弟们》的传单。布告强调“我们既是民众的军队,自然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不但要将这次议案尽力帮助实行,而且对于你们将来兴革事宜,还要当努力。”最后号召“大家更要不分界限切实的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国民革命。”^②传单指出:军队“务必实是(事)求事(是)拿上最诚恳的心志,助我同胞起来自决痛苦,从此以后你们再不要受军队的无故欺负了,凡是路过的士兵,不能任意拉差;就是办公的军人,都已与他们发给旅费,不论吃了你们的饭,买了你们的货物,及其用了你们的草料等事,他们必要按实价给发,不准赊欠登帐,亏损可怜的老百姓。所以除出布告外,恐民众不能周知,又出此传单,以后若有不肖兵十违令搨民等事,望即速送来或报告我们,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③谢子长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带头不住民房,和士兵一起住在城隍庙大殿里。谢子长领导制定和通过的几个重要文件,对唤起民众和推动农民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为了贯彻执行这些决议,谢子长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冯景异任书记,康忠治、郭朗亭分任组织、宣传委员),加强对全县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还建立县级和

^① ^② ^③ 见《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1927年3月),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4个区的农民协会及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2月29日,谢子长又主持召开了安定县市民大会,通过了《各团体宣言》,号召各团体紧密团结,并提出了“铲除压迫我们的各种坏东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善我们民众的生活”^⑧等口号。

谢子长特别重视农民运动。为培养骨干,他协助党组织开办了安定县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给学员上课,在学员中发展党员,还抽出时间到农村调查研究,宣讲《农民协会章程》,揭露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谢子长亲自领导县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王伯阳,赶走了全县两个最大的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马子厚,当众烧毁文约、账簿,宣布欠债作废,撤换了混进农协中的地主豪绅。由于党组织和谢子长的积极领导,安定县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压迫农民的贪官污吏、恶霸兵丁和高利贷者以及公款杂税的浮摊滥收一时销声匿迹。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群众对谢子长的领导非常敬佩,亲切地称颂他为“谢青天”。

清涧、渭华举义旗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北方,4月28日,李大钊等惨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杀。谢子长得悉,义愤填膺,5月30日和6月1日,亲自和冯景异等共产党员领导安定县农民协会召开代表大会,追悼李大钊,声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血腥镇压革命的罪行,决定武装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8月间,白色恐怖笼罩陕西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大搞反共反人民的“清党”运动,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农会、工会和学生会

等革命团体被解散，陕北党组织活动的据点——省立延安第四中学和省立绥德第四师范被井岳秀下令封闭，中共延安、绥德地委负责人被驱逐出境。霎时，黑云压顶，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入狱，人民重陷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秘密来到清涧巡视工作，魏野畴讲了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指示谢子长、李象九等继续留在石谦部队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作好武装反抗陕北军阀的准备。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的力量，决定留唐澍、白乐亭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开展工作。

8月下旬，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暗杀，反动营长康子祥被任命为代理旅长。接着井岳秀部师长高双成令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准备将其改编为“骑兵团”；同时令谢子长连从安定县开往宜川接防，阴谋分而歼之，借机消灭这两支“赤化”了的部队。谢子长、李象九、唐澍、白乐亭等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将情况汇报省委。省委指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消灭我李、谢部队，我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不久，省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而召开的“九二六”会议文件传达到部队。其中《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的军事行动已经是迫不容缓了，……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①。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成立了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中共军支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等任委员，统一领导和指挥起义。军委成立后，在清涧县城召开了党员大会和排长以

^① 见《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第1期，1927年9月26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上干部会议。会上，唐澍、谢子长等传达了省委关于起义的指示，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决定驻清涧的4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的另一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3个连会师。同时派代表联合驻守神木之高子清旅，与高约定在神木起义，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消灭井岳秀的反革命武装。会后党员和广大战士非常兴奋，有的彻夜不眠，擦枪拭弹，严阵以待。10月14日晚^①，在一片“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声中，起义枪声在清涧县城打响。在城内到处贴标语，散传单，逮捕恶霸豪绅，扩大政治影响。还缴获了井岳秀部下高双成私贩鸦片数万两和驮骡40余匹，同时向大商人筹集现洋20余万元，使经费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起义部队按计划于次晨撤离清涧南下，谢子长率领十二连打先锋，途经延长县城时，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驻军两个连并一个营部，谢子长亲自处决了敌营长祁梅卿。驻宜川敌人闻讯后，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该县准备参加起义的3个连发起攻击。这3个连在党的领导下，当即迎战，激战一昼夜。20日，我清涧、延川起义的部队赶到宜川城下，敌代旅长康子祥率部逃跑。3支起义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附近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纷纷前来参军，至此，起义部队发展到1700多人，3000多支枪，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

对于起义部队的纪律教育，谢子长也十分重视。在清涧起义爆发的当天晚上，李象九营的一个卫兵乘机抢了老百姓的财物，谢子长发现后，立即找李象九研究处置办法，他说：我们做革命事，是替人民谋利益、解除剥削压迫的大事，并不是为当土匪来抢人做坏

^① 清涧起义的时间说法不一，还有说是10月10日或10月12日，因均系回忆，有待进一步查考。

事！我们是共产党员，应该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样抢人、刁人，对得起党吗？！说得李象九心悦诚服，下了这个卫兵的枪，卫兵不告而逃，谢子长即派兵尾追，将其处决，借此教育起义部队严守纪律，以儆效尤。他在向官兵说话时说：我们时刻不要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要给他们办好事。谁要是乱抢老百姓的东西，就要受到严重的处罚。从此，起义部队官兵中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大为减少。

宜川会师后，对起义胜利后的行动方针在领导人中发生了争论。唐澍、谢子长等虽然还不懂得与农民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理，但却主张立即打起革命军的红旗，整顿干部队伍，纯洁部队，提拔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人任连、排干部，主动进攻延安，相机消灭敌人，扩大革命力量。而李象九则持不同意见，提出仍沿用旅的旧番号，必要时可接受军阀收编，并反对整顿干部队伍。由于意见分歧，部队滞留宜川，唐澍去省委汇报。唐走后，李象九打出十一旅的旗号，自任旅长，委任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王有才、李瑞成一、二、三营营长。这时，敌二十二军驻延安之第二师师长高双成一面写信麻痹起义部队，一面又调集6个营的兵力，进逼宜川。在敌人未到之前，谢子长又提出交通不便，敌人难以同时到达，因而应集中力量主动出击，各个击破敌人。但李象九不接受这一正确建议，按兵不动，致使敌人用二十多天时间完成了包围部署。原定在神木起义的高子清旅看无能为力，没有动作。当敌人发起进攻时，防守宜川城外重要阵地风翅山、二郎山的部队擅自撤退，因而失掉制高点。李象九决定撤出宜川城。由于指挥不当，撤退时又遭敌军堵击，部队损失很大。只有谢子长带领的一营二三百人和其他少数官兵由南门突围冲出，退据宜川以西，不久转移到韩城西庄镇。李象九又不顾谢子长等反对，竟然接受了军阀王

保民的收编,改称独立旅。这时,陕西省委派唐澍、阎揆要、白志强等来到韩城,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了清涧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在韩城重组军委,准备发动第二次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军游击支队,以谢子长营的一百多人为基础,唐澍、谢子长任总、副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军委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和“劫富济贫”等斗争口号,并决定将部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唐澍、谢子长、阎揆要遂于1928年元旦率部北上,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途中由于轻信了宜川城内只有敌人一个连的传闻,贸然决定攻打宜川。部队连夜行军80华里,拂晓袭入宜川城。实际上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激战半天,我伤亡重大,即向西北撤退,行至延长交口时,又遭敌人袭击,加之沿途给养困难,连续行军,士兵非常疲乏,一部分逃跑失散。1月底到甘肃合水县的豹子川时,只剩下几十个人。清涧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1928年2月,谢子长、唐澍回到省委汇报了清涧起义失败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旋奉省委命去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工作,唐澍担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根据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旅积极准备在渭华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谢子长任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6月3日,谢子长率第三大队到赤水镇和当地农民一起,处决了散布谣言、破坏革命的商会会长赵登科和商号经理赵绍普及反动政府的两个敲诈勒索的收税委员,没收了“三兴合”、“祝寿昌”等大商号的财产,将大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其余作为革命经费之用。6月初的一个夜晚,我陕西赤卫队同敌渭南县保安团在该县的塔山脚下发生激战,谢子长闻讯,率部急往增援,两面夹攻,猛冲猛打,把伪民团打得落花流水,仓皇

溃逃。6月10日左右,敌骑兵师进攻高塘镇,在此之前,革命军第二大队被派往赤水公路一带进行游击活动,谢子长率领的第二大队受命袭击华县城。由于革命军对敌情侦察不够,防范疏忽,致使东面敌军一直冲到司令部东北3里多远的骆驼渠时,才被哨兵发觉。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总指挥唐澍先后派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和总部参谋长王泰吉指挥部队英勇还击。但因寡不敌众,仍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此时正值谢子长和高克林(时任总部参谋主任)执行袭击华县城的任务后率领部队归来,路经瓜坡时,发现敌我正在激战,立即投入战斗,从东西两面形成对敌夹攻之势,敌误以为中了我军埋伏,惊慌失措地丢下许多箱迫击炮弹,逃回华县城。6月19日,敌人又分兵3路发动大规模围剿。由于敌人兵力过大,军委决定不同敌人死拚硬打,撤进秦岭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尔后,宋哲元又指挥一师敌军,从赤水东西川向高塘进攻,使用重炮轰击革命军的前沿阵地。谢子长奉命率部防守,奋勇阻击,激战竟日,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由于兵力悬殊,谢子长在袭占高塘和魏家堋后,又被迫转移到洛南县境内的两岔河山区。渭华起义失败后,7月初,根据省委指示,谢子长、刘志丹离开部队,回省委接受新的任务。

艰苦的兵运工作

1928年8月,谢子长、刘志丹回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渭华起义的经过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全国重赏通缉刘志丹、谢子长等,由于形势险恶,在西安难以开展活动,随后省委派谢子长和刘志丹回陕北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军委委员。

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中共六大决议,并作出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会后,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翅山作争取改造梁占魁土匪部队的工作。是年春,谢子长利用原来与李象九等人的关系,建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为了大力争取陕北的地方实力,开展革命斗争,谢子长和陕北特委先后派党员赵洪枝、赵文蔚、马云泽、阎红彦、李维均等去杨庚武部(时驻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建立了党组织,准备在陕北创建农村根据地。但后来这支一千多人的部队由于受敌旅长高双成的欺骗,除一个营仍在我党领导下外,余均被高部收编,杨庚武和一大批干部被杀害。

1930年1月,根据陕北特委的兵运工作计划,为利用宁夏驻军苏雨生扩充势力之机发展革命,谢子长又受命西去宁夏打入苏雨生部队中活动。在苏部,谢子长曾取得旅长职务。在谢子长、刘志丹的指导下,成立了党的军委(张东蛟任书记),举办了学兵队,大力做争取群众、训练干部的工作。不久,谢子长、刘志丹离宁夏回陕北,打入地方军阀谭世霖部队,分任团长和营长,利用公开的职务收集了各地为逃避反革命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争取民团、哥老会部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活动。是年夏,谢子长、刘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训练部队。准备起义时,由于遭到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

1930年8月中旬,谢子长、刘志丹到绥德参加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第五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条件成熟时实行兵变,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谢子长、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正、副总指挥。

1931年春,根据省委指示,谢子长继续去甘肃平凉一带从事

兵运工作。

同年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①由于遭到敌人围攻,处境非常困难。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该部于9月8日西渡黄河。过河后在安定县枣树坪先后通过地下党员、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及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兼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陕北特委。在陕北特委的帮助下,游击队迅速发展 to 百余人。接着又于9月下旬先后联合了杨琪、师祝杰等陕北几股保运武装。10月20日,游击队在杨仲远、阎红彦等率领下,到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后到南梁地区进行休整。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派马云泽去平凉同负责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取得联系,商讨会合后的行动计划。谢子长得知,便去西安向省委报告。省委指示立即组织陕甘游击队,并派谢子长到南梁地区传达。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陕西省委根据刘志丹、杨仲远等领导的两支部队的具体情况,以及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这两支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对外通电表示坚决抗日。在内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有关游击战争的文件,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通过学习,使许多同志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红军的政治任务,开始纠正了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不良倾向,为建立和扩大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系1931年夏,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于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正式成立。骨干是高桂滋部地下党员和太原兵工厂的地下党员。先后由拓克宽、阎红彦任大队长,黄子文、杨仲远任政委,胡廷俊、白锡林、吴岱峰任副大队长和副政委。

转战陕甘

1932年2月12日,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兼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下辖一、二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队和一个警卫队,共360余人。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各大队成立党支部。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为后来陕甘红军的创立奠定了基础。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练兵运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和“列宁室”,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还决定以陕西的淳化、耀县、旬邑、宜君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为区域,开展对敌斗争。

2月13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消灭了旬邑职田镇民团,捣毁了敌区公所,逮捕了罪大恶极的豪绅,在该镇召开了群众大会,烧了区公所的账簿和地主豪绅的契约,组织了农民协会,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抗捐斗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使统治阶级恐慌不安,陕西军阀命令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长武三县的民团约千余人向职田镇扑来,妄图消灭红军。谢子长得悉敌人的进攻计划后,当即指挥游击队撤至职田镇以东20华里之阳坡头,占领有利地形待机歼敌。2月15日,敌于职田镇扑空后,次日晨继续向阳坡头前进。当敌先头部队进入阳坡头村边时,谢子长指挥两个步兵大队出击,猛打猛冲,将其击退,敌复以猛烈火力向我射击,形成对峙。这时,谢子长当机立断,令阎红彦带两个冲锋枪班,向敌迂回侧击,攻入敌阵,敌人顿时混乱,该敌三营七连连长、我地下党员李明轩乘机掉转马头,大喊:“红军来了,快跑!”士兵争相后逃。谢子长指挥游

击队趁势全线反击,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我军跟踪追杀,将敌警卫团三营和民团一部歼灭,毙敌 160 余名,俘敌 400 余名,缴枪 400 余支。战后,谢子长亲自向俘虏进行宣传,对愿意参加红军的数十人,开了欢迎会,其余发了路费,开会欢送,遣散回家,对伤俘进行救护,将敌尸运往彬县埋葬,揭穿了敌人“红军杀害俘虏”的欺骗宣传,从此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更大了。2月19日晚,游击队南下清水源、土桥塬,发动群众打土豪。这时,敌警卫团、特务团由淳化进至旬邑,准备再次“进剿”。谢子长率部避开敌人,转移至耀县照金。20日元宵节夜,趁敌不备,全歼该镇民团,缴枪 30 余支。21日,谢子长在香山主持召开了游击队队委会议,总结了作战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决定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铜川、宜君地区行动。24日,游击队进入宜君地区,5天之内,先后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及驻焦家坪敌十六师一个连,击溃一个营及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的两次进攻,歼敌 2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之后,又西跨桥山,进入黄陵上畛子地区,决定乘敌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暂编十三师于陇东混乱之机,出击陇东,袭击山河镇,开辟新的根据地。

山河镇是敌正宁县府所在地,城内驻暂编十三师百余人。3月19日夜,游击队从上畛子一带出发袭击山河,因走错路,耽误了时间,以致只得白天攻坚,战斗失利,伤亡较大。22日,谢子长率部进入山河以南四村塬、湫头塬,在这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4月13日,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农民千余人的配合下,再袭山河镇。驻西峰镇之敌一个营前来增援。谢子长指挥游击队集中力量打敌援兵,歼敌 200 余,战后撤回四村塬。这时,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向游击队报告,旬邑城内只有敌警卫团两个连及民团一

部驻防，警戒疏忽，防守不严。谢子长决定奔袭旬邑。4月20日，游击队从四村塬出发，星夜兼程，次日拂晓进抵城郊，立即发起攻击，除残敌数十人窜入魁星楼顽抗外，其余均被歼灭。

战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巡视工作，他对游击队成立以来的主要成绩不作全面评价，更没有对省委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平原地区的错误指导方针作任何检查，反而把由于作战经验不足，两次攻打山河失利的责任全部推到指挥员身上，采取了“左”的惩办政策，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诬蔑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强令谢子长离开游击队，去甘军警备三旅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谢子长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去王部后积极策划起义。5月5日，组织了靖远起义，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部队到水泉休整，由于未发动群众，加之思想麻痹轻敌，遭敌突然袭击，张东皎不幸牺牲，起义归于失败。7月1日，谢子长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派共产党员苏杰儒等到甘肃合水县西华池向新编警备十一旅一团一连连长、地下党员高鹏飞传达了相机起义的指示。高连建有党支部，可以掌握全连的行动。恰于此时，敌旅部命令该营开赴庆阳。党支部决定利用换防的机会举行起义，并派人与陕甘游击队联系。7月7日，得到陕甘游击队的回信：有把握即举行起义，红军在宁县盘客塬策应。7月8日，高鹏飞等率部利用出操的机会，缴了第二连的武装，消灭了敌人一个营部，取得起义成功，随即和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此后，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队员增至500人。但由于7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对游击队领导人阎红彦、刘志丹、杨仲远、吴岱峰等进行无情打击，使部队又一次遭到极大的损失。

在困难的日子里

由于杜衡等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致使陕甘游击队屡遭挫折。陕西省委鉴于情况严重，为了扭转困难局面，8月30日，又派谢子长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谢子长到任后，当即率部南下耀县地区，和广大指战员一起，精心组织战斗，使游击队转危为安。照金战斗的胜利，就是一例。

当时，敌人开始了新的“进剿”。以陇东警备九十七、九十八团从山河、旱胜等地自北向南进发；八十六师五一一团以铜川为中心，由东向西进攻；陕西警卫团与何升全支队在彬县、旬邑等地“搜剿”；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以照金地区为中心堵击，企图四面围攻游击队。9月11日，游击队进至照金以南之杨柳坪，从捕捉的敌探口中获悉情况非常严重，谢子长经与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等商议，当即决定避敌主力，打其弱点，游击队向西后退20华里，采取迷惑敌人，而后以奇袭手段消灭该敌。当日敌进至照金扑空，误以为游击队已经逃跑，异常骄傲。谢子长等指挥游击队当夜回戈直奔照金。12日拂晓，在照金以北坟滩、柿坪等地，当敌还在酣睡之中即被我四面包围，在大雾中激战不到两小时，歼敌400余人，缴枪300余支，击毙敌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照金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与群众的斗志。

1932年9月下旬，谢子长率部攻打保安失利，又重新部署进攻，但敌军大量增援保安，我军未及防备，再战失利。10月上旬，游击队转移到墩儿梁、八卦寺一带又遭敌人的追击，战斗三度失利。为摆脱敌人的进攻，游击队被迫撤至南梁附近人烟稀少的合

水白沙川一带，住在破窑洞里，没有粮吃，没有衣穿，部队情绪低落，但谢子长照样乐观坚定。针对当时困难的局面，谢子长、刘志丹召开队委会，决定游击队分散活动，筹集粮款，解决冬衣问题，寻机消灭小股敌人，恢复部队的战斗力。会后，游击队分为三路：一路由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 70 多人到甘肃合水塔尔原一带活动；一路由杨森、黄子文带领 60 多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一路由阎红彦、杨仲远、杨琪带领骑兵队到耀县照金一带活动，并与省委取得联系。谢子长带领吴岱峰等 30 余人，留住陕甘交界的白沙川、瓦子川一带，照看伤病员，一面与陕北特委联系，一面指挥游击队活动。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经受挫折与失败是难免的。谢子长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① 当时天气已渐寒冷，伤病员既无医药，又无粮食，全靠野果、野菜充饥，处境极为艰苦。谢子长知道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尽量不打扰群众。游击队买的粮食运不回来，他和留守人员一起去背。游击队筹得少量衣物，谢子长总是先发给伤病员，自己则在篝火旁铺一条毛口袋过夜，平时放哨、查哨、碾米、煮饭、抬伤病员、给伤病员洗伤换药，谢子长总是带头去干。他这种吃苦耐劳、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大家，游击队上下团结一致，士气高昂，战胜了重重困难。经过一两个月的艰苦奋斗，各路游击队不断取得胜利，不但恢复了部队的元气，而且得到巩固和发展。

1932 年 12 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会合后，接到省委的指示：根据党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

① 杨林：《纪念谢子长同志》，载 1946 年 2 月 22 日《解放日报》

军第二十六军，并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杨家店整编。12月中旬，杜衡以中央和省委书记身份来到游击队。当时陕西省委极其错误地认定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有反革命阴谋”，要杜衡将他们搞掉。杜衡到部队后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12月22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诬蔑谢子长、刘志丹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游击队领导人反革命阴谋”，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处分（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刘志丹、杨仲远虽被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该军仅有这一个团），杜衡兼军、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杨仲远虽被留在部队，但却降职使用。谢子长和一批老同志被迫离开陕甘。

在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主力红二团于1933年5月下旬南下渭华地区。6月上旬在蓝田张家坪遭强敌袭击而失败。同年5月底，被杜衡派到陕北任第一支队政委的杨仲远在安定县谭家峪遭敌袭击牺牲，一支队受到很大损失。杜衡在1933年夏天离部队回到西安被捕叛变，成为可耻的叛徒。刘志丹等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

1933年夏，谢子长、阎红彦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被派往北方工作。到天津后，又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工作。抗日同盟军是在我党影响和组织下，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中共党员）等爱国将领

领导的一支倾向革命的部队，谢子长在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同时协助许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先后在张北县和沽源县等地与日伪军激战，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多伦、独石口等地，把日、伪军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同盟军的行动，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全国人民掀起了大力援助同盟军的热潮，但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的围攻。在敌人的围攻下，同盟军将士大量伤亡。许权中和谢子长所在的十八师，驻在阵地前沿，在许权中、谢子长的指挥下，进行英勇的反击，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仍沉着地指挥冲杀，但敌人兵力过于强大，许权中、谢子长且战且走，历尽艰险，才退到河北顺义县。10月中旬，在数倍于我的敌人疯狂进攻下，十八师终因弹尽粮绝被打散。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回到北平。

恢复和发展陕北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谢子长等回陕领导游击战争，谢子长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当时陕北根据地正值困难时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谭家峪、枣树坪、延川战斗中伤亡较大，支队领导人未请示上级就决定压枪散伙，转入地下。1934年1月22日，谢子长由北平经太原渡黄河，回到安定。敌人听到谢子长回到安定的消息，寝食不安，立即对安定一带实行戒严，行人都要严加搜查，谢子长不能回村里居住，就和同志们一起住在山洞里。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大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没有吃的，还要躲避敌人的搜捕，经常转移。谢子长和同志们的手、脚都冻破了，鲜血直淌。但他仍然充满革命乐观情绪，经常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总结多次失败的教训，指出一支队压枪散伙的错误，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在这期间，谢

子长给红二十六军和刘志丹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南贵臣去联系刘志丹接信后，当即回信并送来银元200元，解决了经费困难。为鼓舞群众士气，谢子长派刘明山等处决了当地民众所痛恨的伪保长韩九成。经过一段工作，于3月8日在刘家屹崂，由谢子长主持会议，宣布第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谢绍安为正、副支队长，刘志清（后叛变）为政委。一支队恢复后，在谢子长的指导下，打土豪，筹经费，采取夜战奔袭等方式，打了几次胜仗，鼓舞了士气，壮大了斗争声势。6月，陕北特委派贺晋年任一支队政委，又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至6月底，部队扩充到70多人，枪。谢子长还协助地方党组织成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领导下，除已建立的二、三支队外，又先后成立了陕北游击队第四、五支队和安定县第八、十三支队、佳县第六支队。

1934年4月上旬，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再次决定普遍组织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扩充一师红军；成立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使各个游击区联成一片。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崂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7月17日，谢子长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在城内地下党员的策应下，指挥各支队和赤卫队600余人奇袭安定，占领了伪县府，歼敌数十人，缴获一批弹药物资，还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几十人。奇袭安定后，为了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攻，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一部北上，谢子长、郭洪涛率各支队和200余名赤卫军南下陕甘边，7月23日在南梁地区之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主席刘志丹兼师参谋长）

会合。28日,在阎家洼子召开连长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各支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检查总结了四十二师的工作,着重分析研究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为使两支红军更好地协同作战,扩大苏区,决定红四十二师步兵第三团(团长王世泰,参谋长杨琪)去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和群众粉碎井岳秀部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会议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谢子长和刘志丹领导的两支红军的会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

谢子长回到陕北短短的几个月,局面大为改观。他带领部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时,沿途的群众都争相欢迎,主动帮助红军站岗、放哨、煮饭,有的还杀猪宰羊,慰劳亲人。谢子长每到一地,他住的地方都被群众挤得满满的,一有空,他就和老乡谈心,拉家常,有时直到深夜。

裹革沙场 虽死犹生

1934年夏,正当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国民党西北军阀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7月,陕北军阀井岳秀乘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之际,派遣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扎据点、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在他们所到的地区实行残酷的烧杀抢掠,并强化保甲制度,强迫群众并村,妄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正当陕北根据地军民与敌作殊死斗争之际,在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帮助下,8月15日,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支队由南梁到达安定地区。17日起,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

谢子长指挥主力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在景吴家塌及绥德张家圪台连获胜利。

红军屡战屡胜，大大鼓舞了群众的士气。张家圪台战斗后，当地群众纷纷要求红军攻打河口。河口位于清涧县黄河岸边，地势险要，敌人的碉堡、工事林立，敌二十二军的一个连一百多人又在这里驻扎，易守难攻。8月下旬，谢子长等商量决定攻打河口，拔掉敌人的这颗钉子。8月26日深夜战斗打响，由于敌人凭借有利地形死守，红军连攻数次未克，直至天明，仍未攻下。这时，谢子长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重新组织力量，配备了火力强攻，予敌以重大杀伤，迫使敌人逃往清涧县城，保卫了清涧以东的革命根据地。就在这次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中弹，鲜血渗透了他穿着的紫褐色夹袄，他用衣襟掩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胜利。为了稳定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谢子长传出命令：对他负伤的事要保密，不许声张。战后，谢子长又带伤率领红军北上，攻打安定县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的进攻。至此，红军四战四捷，军威大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当时敌人报纸曾这样记载：“近日陕北驻防军多被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因匪出没无常，时而千百成群，时而三五分散，难以奏效。”^①9月15日，谢子长仍带伤指挥新编一、八支队、保卫队与驻守安定县民团内的地下党员白应奎等里应外合，攻入县城，击毙团总李丕成，将伪民团几十人、枪全部拉出。9月18日部队转至安定崔要沟，根据陕北特委神堂沟会议精神，以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为基础与八支队共200余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谢子长亲自授了军旗。

^① 榆林《上郡日报》1934年8月31日。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正确领导及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大力支援，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红色政权相继建立。1935年1月29日，陕西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村召开，决定成立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马明方、霍维德、崔田民为正、副主席。

1934年12月底，应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的邀请，刘志丹率红二团和陕甘边五、六支队亲赴安定。翌年1月中下旬，刘志丹多次到灯盏湾、水晶沟等地探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两人就当时的形势、党的政治策略、军事战略战术、两地区和两军统一领导、军委主席人选等问题交谈很久，意见十分融洽。只是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上推让未决。刘志丹让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谢子长对刘志丹说：“那就交给联席会议作决定吧！”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①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联席会议在赤源县周家峪召开，根据谢子长和刘志丹的建议，讨论统一两地区党政领导和反击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两个特委的工作，谢子长等为委员。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推选谢子长、刘志丹为主要负责人^②。谢子长因养伤未到职，实际工作由刘志丹负责。

谢子长在战斗中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关心他

① 叶滨：《谢子长负伤以后》，载1946年3月1日《解放日报》

② 刘、谢谁为军委主席以及军委、工委是否同时成立，说法不一，有待查考。

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河口战斗中,谢子长身负重伤后,虽经同志们再三劝说,仍坚持不离开战斗岗位。起初,他骑在马上指挥战斗,后来,马骑不成了,就坐在担架上继续工作。8月28日,谢子长还出席了中共陕北特委在市塬里召开的扩大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和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等决议。直到10月间,谢子长的身体实在难以支持,才到离家不远的杨道崾村去休养。敌人时刻侦探谢子长的行迹,图谋杀害。为了避开敌人追踪,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把他从杨道崾转移到周家崾,再转移到磁圪湾、水晶沟。后又转移到安塞县韩呼里村。狡猾的敌人又从水晶沟追来。看护他的外甥、保卫队中队长薛兰岗把消息告诉他,谢子长激愤地说:“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你们逃命,绝对不要让他们把我捉去!”^①他住在安定县灯盏湾时,整天看望谢子长的干部和群众络绎不绝,院子里、村子里、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群,警卫人员动员他们走,但是谁也不愿意离开,都想最后见一面“谢青天”。快过春节时,谢子长病情恶化,但他仍关心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生活。一天,薛兰岗去看望他,谢子长问战士们怎么过年?兰岗说:“已准备有肉和白面。”谢子长亲切地嘱咐说:“有这么多好东西,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些。可以做八大碗叫大家吃嘛!”临终之前,谢子长仍念念不忘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当他感到自己的伤无好转的希望时,他痛苦地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②谢子长心里只有人民,只有革命。农民周海旺去看望谢子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啊,老谢!病会好的。这几天咱们的红旗到处飘着呢!土豪劣绅到处挨打着呢!”^③谢子长又满意地笑了。

^① ^{②③}叶滨:《谢子长负伤以后》,载1946年3月1日《解放日报》。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由于病情恶化,不幸与世长辞,时年39岁。谢子长逝世后,为防止敌人乘危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暂不发讣告,不举行丧礼和追悼会,不戴黑纱;对下级和老百姓绝对保密,行文、布告仍签署谢浩如的职衔姓名。谢子长的家属毫无怨言,件件依允。直到5月上旬,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镇等地解放后,才逐渐解除保密。

谢子长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他一生驰骋疆场,英勇奋斗,胜不矜功,败不丧志,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不仅自己献身于革命,还教育全家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从1932年到1936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谢子长的亲属在战场上牺牲和刑场上就义的就有9人。为了纪念谢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谢子长的遗骨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先后两次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①,并亲笔为谢子长墓写了碑文。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谢子长在瓦窑堡修建了陵墓。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②朱德题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③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

① 原件存谢子长烈士陵园。

② 程秀山:《子长陵》,1946年2月28日《解放日报》。

③ 题词在1947年胡宗南匪军侵占瓦窑堡时所破坏。

今叫你青天。”^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贺龙、刘伯承也题了词。谢子长光辉的一生，受到党和人民高度的赞颂。

(张守宪 梁星亮)

附：

碑文原文为：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1925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运动讲习班，组织农协，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第二十六军之前身。1933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创造了陕甘宁边区。1934年于河口之役负伤，1935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了长县以志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1939年8月13日——引者注)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王世泰：《忆子长》，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1日。
2. 《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1日。
3. 阎红彦等：《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① 《瓦市二万人举行公祭，谢子长同志灵柩移葬》，见1946年2月27日《解放日报》。

^② 题词在1947年胡宗南匪军侵占瓦窑堡时所破坏。

4. 叶滨：《永恒地记在人们心里》，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7日。
5.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6. 董纯才：《陕甘宁边区简史》。
7. 贺晋年、吴岱峰：《陕北人民的领袖》，《解放军报》1980年2月3日。
8.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6月。
9. 史唯然：《谢子长的一个故事》，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3日。
10. 《瓦市二万人举行公祭、子长同志灵柩移葬》，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7日。
11. 程秀山：《子长陵》，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8日。
12. 杨林：《纪念谢子长同志》，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2日。
13.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 雷恩均：《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民政厅合编：《革命烈士谢子长同志事略》，存陕西省档案馆。
16. 《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1927年3月印，原件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7. 《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第1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8. 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墓和谢子长烈士陵园的题词（1939年、1946年），原件存谢子长烈士陵园。
19. 吴岱峰：《谢子长同志革命事略》，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2月22日。
20. 刘明山：《人民英雄，浩气长存——回忆谢子长同志》，《陕西日报》1980年7月18日。
21. 尤祥斋、谢绍明、薛兰斌、薛兰岗、刘明山、李维汉、马明方、习仲勋、刘澜涛、贾拓夫、马文瑞、阎揆要、汪锋、贺晋年、吴岱峰、郭洪涛、张达志、高朗亭、高克林、白超然、赵伯平、方仲如、王子宜、马云泽、张秀山、刘景范、李维钧、李锦峰、吴志渊、王超北、杨和亭、齐心、张光远、周益三、庞志杰、吴化之、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同桂荣、李建彤、马佩勋、冯又新、李瑞阳、王带南、张光、王英、李波涛、刘约三、呼延震西、张文华、陈天秩、刘依仁、崔田民、宋敏、谢文祥、王仪等同志的回忆材料和访问记录

刘 天 章

(1893—1931)

刘天章,又名刘望,字云汉。陕西高陵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担任北大学生会负责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发起组织陕西旅京学生进步团体——共进社。1925年任中共陕甘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委员。1927年任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兼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大革命失

败后,曾三次被捕入狱。1930年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山西特委组织部长,领导发动了平定起义,创建了红二十四军和晋西游击队。1931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底在太原就义。

刘天章,1893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高陵县高刘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刘伟堂终年勤耕苦种,仍不能养活全家,后到外地经商,光景稍有好转。刘天章14岁时,才到三原县城一所小学读书。

刘天章早年在家乡劳动期间,目睹清朝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的现实,就产生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思想。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为了显示皇帝和太后的所谓“勋业”与祭奠的隆重,清政府强令全国学校一律公祭7天。每逢学校举行

祭奠活动，刘天章总是不去，为此屡遭校方斥责，但是他不仅不屈服，而且还鼓动同学进行反抗。

1914年春，刘天章考入西安三秦公学留日预备科。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和帮助下，他除了学习各门功课外，还阅读了谭嗣同的哲学著作，康有为的《大同书》等作品。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陕西，刘天章义愤填膺，团结校内外的进步师生杨钟健、魏野畴、李子洲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上街讲演，声讨袁世凯及其爪牙陕西督军陆建章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祸害陕西人民的罪恶。

面对逆转的时局，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刘天章在三秦公学毕业后，与陕西许多求学的青年，一起奔赴北京。1918年夏，刘天章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化学系学习。1919年3月，南北军阀政府在上海召开“和会”，但陕西省内战事并未止息，在陕的各派军阀兵力逾20万，他们勾结土匪，横征暴敛，弄得地方不靖，人民备遭涂炭。刘天章和李子洲、杨钟健、杨明轩、魏野畴等串联北京各校旅京的陕西籍青年学生，组织起学生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并通电“和会”，要求停战和驱逐陕西军阀陈树藩。为了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迅速觉醒，他们还编印了《秦劫痛话》刊物，痛陈陕西人民的苦难，以图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年5月，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刘天章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和中坚骨干。在5月4日的游行中，刘天章和其他同学冲入赵家楼，痛殴国贼，火焚曹（汝霖）宅。他还负责主编北大学生会会刊，虽然身患疾病，仍坚持编好每一期刊物。在运动中，刘天章领导进步学生与罗家伦等人向军阀政府妥协的行为进

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多次组织同学上街讲演,宣传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和抵制日货,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此他曾遭警察逮捕,但不久即获释。

五四运动后,刘天章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为了更有利于斗争,必须广交师友,建立团体,开展宣传。1920年1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杂志,向陕西人民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秦钟》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和妇女解放;反对封建迷信、尊孔读经和早婚、缠足等旧习俗;向人民揭露反动军阀的祸陕罪恶。这一年的下半年,陕西省教育厅长郭希仁强令教育界人士在孔庙行跪拜祭,当时担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王授金,因坚决反对这种倒退行为,被郭希仁下令撤职。刘天章得悉这一消息,遂与陕西旅京的杨钟健、魏野畴等同学联名上书郭希仁,表示抗议,坚决支持王授金的正义行动。在陕西和旅京进步学生一致强烈的反对下,郭希仁被迫在1921年春下台。

1920年春,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刘天章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积极参加该会组织的读书会、讨论会和辩论会,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研究会里,刘天章与李大钊常有接触,向他请教疑难问题,共同探讨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年冬,刘天章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刘天章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秦钟》杂志出刊到第6期时,因反动军阀的压迫和旅京陕西

学生联合会内部分化而停刊。1921年10月,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商议,决定创办《共进》(半月刊)杂志,继续向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和深入探讨在陕西进行革命的问题。刘天章和杨钟健负责《共进》的编辑工作。他们在《共进》上刊出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介绍各国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李大钊、陈独秀、武止戈等人的文章。在编辑《共进》的同时,刘天章还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全国和陕西的实际,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特别是陕西的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改造社会、革新陕西政治和教育的主张,向旧世界宣战。1922年6月,刘天章在《去刘之后》一文中写道:直系军阀刘镇华统治陕西,“土匪一天一天的加多,军队一天一天的横行,人民一天一天的涂炭,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样惨无人道的情况了。”要解决陕西危局,驱逐刘镇华才是“惟一第一步的方法,此疮不去,我们的什么都是幻想,梦想,一无希望。”为了使苦难的陕西人民获得解放,刘天章大声疾呼:“磨快我们的钢刀,热沸我们的心血,去刘!去刘!”^①

在《共进》杂志创刊一周年时,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为了把更多的进步青年学生团结在《共进》的行列中来,刘天章和杨钟健、李子洲等在《共进》半月刊社的基础上,发起成立了陕西旅京学生的进步团体——共进社。共进社的宗旨由原来的“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改为“提倡文化,改造社会”。刘天章被选为共进社的常任主席兼《共进》杂志的编辑主任。在《共进》杂志周年特号上,刘天章以《培养时代的共进生活》为题,赞扬共进社“是我们自己的娇子”,是“为人类争自由而出世”,“为助人类达到完满的幸福

^① 《共进》第16号,1922年6月25日出版。

而出世”^①，同年10月，他在《复张树森君函》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好，非先打倒军阀不可。”^② 这年冬天，刘天章经杨钟健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参加的著名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当选为第四届执行部副主任兼会计，协助杨钟健编辑出版学会会员通讯录。

1923年2月，震撼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在党的领导下，刘天章积极联络进步学生上街游行，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斗”^③的口号，声援工人的正义斗争，并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一起顽强地向封建军阀进行斗争。“二七”惨案后，他深入实际，调查了惨案中工人伤亡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残酷的斗争，使刘天章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面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为共进社起草的《宣言》中，他明确提出“中国目前应解除的两大恶势力，是国际资本主义和军阀统治”，“而打倒军阀是对内谋政治清明的惟一的的第一步方法，而对于解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亦为釜底抽薪的办法。”^④

1924年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进社也吸收了大批新社员，但他们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活动缺乏了解，加之原来老社员中的骨干相继离京到外地工作，新任领导又缺乏工作经验，互不团结，造成共进社一时的组织涣散。面对这些问题，刘天章和魏野畴一起，对共进社进行了组织和思想整顿。他们同新任领导和新老社员谈心，交换意见，传授工作经验，增强社内团结。还为共进社起草了新的纲领，修改了社章。新的

① 《共进》第23号，1922年10月10日出版。

② 《共进》第24号，1922年10月25日出版。

③ 《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④ 《共进》第33号，1923年3月10日出版。

纲领和社章放弃了原来比较空泛的“提倡文化,改造社会”的宗旨,而把政治问题看做是“目前最急切的问题”,经济问题“是一切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认为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后,必须更彻底地实行经济的改造,“俾一切劳动的群众,群众的劳动,皆获得均衡的尽量的幸福与报酬”;主张以一致的努力,“反抗国内封建的旧势力及帝国主义的列强,终必使之解除武装而投降”^①。这些论述,对后来共进社在思想和组织建设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年4月,共进社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纲领和章程,改选了领导机构,使共进社和《共进》杂志更富有战斗力,成为我党得力的外围组织。尔后,共进社又设立了党支部,刘天章先后介绍李子洲、魏野畴、武止戈、邹均、屈武、耿炳光、王子休、方仲如、潘自力等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刘天章在编辑《共进》的同时,还翻印了《共产主义ABC》、《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澄清了一些人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刘天章敢于坚持原则,善于团结同志,能不断提出新的主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被大家誉为共进社的“元勋”。

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严酷的斗争现实,使刘天章初步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24年夏,他在给杨钟健的信中,曾明确提出了建立武装的主张:“在石头上下钉子,要为

^① 《共进社纲领及章程》,经1924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共进社代表大会上所通过,曾作为单行本印行。

中国前途辟新门庭”，“光说不算，要拿实力干，非入军队不可！”我理想的途径是：“如果得到了机会，入到军队之中，至少新成一营，军官尽为同志；专门从事培植。”“如果实力可用，便不客气起来，打起鲜明的旗帜。”^①

这一年6月，刘天章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做党的地下工作，担任过北京反帝大同盟的秘书。秋，刘天章通过李大钊和邹均、屈武等人的关系，结识了国民军副总司令兼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胡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倾向革命，在他率部入豫兼任河南省督办时，特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共同商讨创办学生军、聘请苏联顾问等事宜，借以发展军事，扩充势力。在刘天章和屈武的陪同下，李大钊亲往开封与胡景翼就上述问题进行磋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经党组织和胡景翼的同意，由刘天章在国民二军负责创办学生军，并担任陆军训练处学兵队大队长（又称营长）。

刘天章投笔从戎，在北京招收士兵时，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非议。党内有些同志觉得他是大学生，有学问，不同意他从军，有人甚至再三劝阻。刘天章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毅然带领新招收的士兵前往开封就任。学兵队在北方党团组织和胡景翼的支持下，先后招收士兵500多名，编成4个连。这些士兵多系出身贫苦的中学生。学兵队设在开封南关马二营。刘天章以黄埔军校为榜样，通过党组织和胡景翼、于右任从黄埔军校调来共产党员杨家乃、王泰吉和进步军官严云生、郭仰芬担任连、排长；聘请国民二军中的进步军官任教官。刘天章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常识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组织官兵阅读进步书刊，教唱革命歌曲，教育官兵要为工农大

^①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众服务。他还在学兵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并亲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党团员就发展到近百名,连、排、班长大都由党团员担任,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亦发展到近200人。就这样,学兵队在刘天章的言传身教下,经过短期的学习训练,大部分都分配到国民二军担任下级军官,成为二军的中坚骨干,也是开封地区一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

与此同时,刘天章还积极从事开封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他到开封不久,就同冯品毅等人先后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省立二中、中州大学和艺术学院的进步师生中发展党团员,建立了由他负责、同北方区委和团中央直接联系的团组织。到1925年夏,团员发展到近百人。刘天章又协助当地团组织成立了共青团开封地委^①,将一批优秀团员及时转为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后改为地委)。党团组织建立初期,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刘天章缩衣节食,拿出自己的薪金,作为活动费用;一些同志经济困难,他四处借债,设法帮助他们解决。这些曾受到党组织的表扬。1925年6月3日,河南省党组织负责人唐际盛在给中央的信中曾说:“目前在开封负责者如马文彦之生活,以及我或晨因等暂时来开封工作者,一切用费,均累刘天章(队长)私人,但他收入亦甚困难,负债颇多,长此靠他个人维持,殊非妥当办法,罗思危在此住闲,生活亦多赖天章。”^②

^① 共青团开封地委成立的时间是1925年7月8日,马文彦(书记)、冯品毅(宣传)、韩沅波(组织)、徐焕生、江常师为委员,刘明佛、刘国璋、李星美为候补委员。

^②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晨因即李震瀛,时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后任河南省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罗思危时由上海党中央派到河南,尚未分配具体工作。

1925年夏，中共豫陕区委成立(陆沉和王若飞先后任书记)，刘天章任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他同王若飞、彭泽湘(时任军委书记)等积极帮助国民二军继续办好陆军训练处军官队，通过李大钊聘请了苏联顾问担任教官，吸收了大批党团员来军官队工作和学习，并在国民二军和军官队里秘密发展党团员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散发传单和进步书刊，扩大党的影响。在王若飞、刘天章和豫陕区委的领导下，河南的工运、农运、学运、妇运和军运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1926年春，国民二军在同奉系、直系军阀作战中失利，被迫退出河南。刘天章亦因患病，回到家乡陕西高陵休养。

四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成立，耿炳光任书记，刘天章任区委候补委员，与魏野畴共同负责区委的宣传工作。不久，刘天章又兼任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该报是共产党人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创办的，总编辑杨慰祖、编辑白超然、童志道、冯润璋、袁禾生、谢幼石等都是共产党员。由于西安刚解围，城区物资缺乏，给办报带来了许多困难，纸张、经费缺乏，和外地的往来还未完全恢复，消息闭塞，通晓编印、采访工作的人员也很少。2月15日，刘天章来到报社，面对重重困难，与报社的工作人员齐心协力，迎难而上，经费缺乏，就用有光纸代替新闻纸，保证了每天报纸的出刊。

为了办好报纸，刘天章事事身体力行，处处作出表率。他的生活十分俭朴，还把伙食费节省一部分，用于改善大家的生活。他常常白天出外采访，晚上回来写稿、改稿、组织编印，直至深夜。当

时,有的同志初来报社,对办报的业务生疏,他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和指导,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新闻的采访、写作和编辑业务。为了扩大宣传,刘天章亲自组织报社人员去车站、街道、学校和公共场所销售发行《国民日报》,到工人、农民、学生中去宣传讲解,组织阅读,充分利用一切形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中去。

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对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各界人民联合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作了热情的宣传报道。1927年3月,北伐军将从武汉进发中原,冯玉祥正准备率国民军联军出师东征。刘天章在报纸上连续发表了题为《江南肃清后中国革命的局势》的文章,为新的北伐大造舆论,指出国民军联军誓师东出,“真算是‘兵以时动’,其奋斗的意义在谋中华全民族的解放,在拥护民族的利益”,其任务是“促进灰色军队的革命化”;“协同豫南和苏皖革命军三面夹攻,歼灭奉军”^①,同时,勉励国民联军官兵们要真正在行动上表现出“革命”,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己奋勉,自己训练,自己努力,努力争上革命的火线”,“在党的主义和政策下面,担负革命工作,切不要辜负了光荣的环境”^②。文章最后指出:豫皖大战“是我们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最后的一个战争,我们为主义所驱策,更应竭尽全力以参加以下最后之胜利”^③。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西安,引起了各界革命人士极大的义愤。从4月中旬起,《国民日报》每天都集中宣传报道陕西人民反蒋斗争的怒潮。为了揭露蒋介石新军阀的罪行,4月25日,刘天章为《国民日报》撰写了题

① ② ③ 1927年4月13—14日陕西《国民日报》。

为《护党运动与蒋介石背党》的社论。他以犀利的笔锋，辛辣的文词，揭露了蒋介石等新右派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来，任意“变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决议案”，“变更总理所留给全国同志的革命政策”，“独揽本党政权，包办外交，把持财政”，“任意破坏本党组织，戮杀本党同志”，“压迫上海工人，解除其武装”的罪恶事实。明确指出：我们革命的国民党应是“全体党员的党，是集权民主制的党”，“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专制制度的党”，“对于党内的，不幸的腐化现象，要是坐视不去纠正，便无异于我们卖了主义，向军阀和帝国主义者投降！”社论号召人民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站在党的纪律之下，努力护党，努力反对背叛党的蒋介石”，“消除党与革命的障碍”。最后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就是护党”的口号，号召人民坚持战斗。

4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革命先驱李大钊在北京惨遭反动军阀杀害。噩耗传来，刘天章悲愤交集，即夜挥泪疾书，撰文哀悼，怀念他在李大钊的谆谆教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历程；怀念他曾与李大钊朝夕相处的难忘岁月，控诉帝国主义及反动军阀惨无人道的兽性行径。文中写道：“你已为革命牺牲，今后割贼头，饮贼血惟有我们。”^①并以此作为《国民日报》社的挽联，送到西安各界人民追悼李大钊的大会上。为了悼念李大钊，《国民日报》连日辟专栏，出特刊，报道陕西人民追悼李大钊的情景，寄托哀思，启迪后人。

刘天章主办的《国民日报》，在革命高涨的时期成为陕西人民的喉舌，它团结、教育了人民，为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深受各界人民的欢迎，每日销售达2000余份，是陕西地区销售量最大的报

^① 《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

纸。正因为如此,《国民日报》也遭到新旧军阀和反动分子的恶毒攻击和诽谤,诬蔑它犯了“不会走就想跑”的过激“错误”,攻击刘天章、白超然等是“投机跨党分子”,限制和刁难报社的正常工作。这些刘天章都嗤之以鼻,全然不顾。他为了办好《国民日报》,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由于过度劳累,胃病复发,但仍然坚持工作,直到6月初,身体实在难以支持,经组织和同志们再三劝说,才回到原籍高陵休养。

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各地。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亦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在豫陕地区进行“清党”反共,同时强令《国民日报》改变宣传方针,不准宣传共产主义和反蒋言论,报社工作处境困难。为了指导社务,同敌人进行斗争,刘天章不畏艰险,抱病从高陵返回报社。当晚,即得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图谋逮捕在西安的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消息,报社又接到第一集团军总部要报社全体人员于7月8日晨去西安留守司令部接受“训话”的通知。刘天章觉察到政局恶化,立即请示陕甘区委,研究对策。区委指示报社继续坚持拥共反蒋的宣传方针,并决定由刘天章和白超然、童志道去西安留守司令部交涉。刘天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他抱定不怕流血牺牲的决心,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挺身而出,果然被拘禁起来。刘天章据理痛斥敌人的法西斯行径,严厉地说:“我是报社社长,我负报社一切责任,可叫他们回去!”迫使留守司令部释放了童志道。由于刘天章和白超然被扣,党组织更加认识了时局的恶化,很快决定改变工作方针,由公开转入地下,使党的力量免受更大损失。

刘天章和白超然被捕后,即被解赴河南洛阳。在洛阳狱中,他和战友们一起与敌人继续进行斗争,把囚室当做锤炼革命意志、陶冶革命思想的场所。在敌人监视十分严密的情况下,他们仍设法秘密联系,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和方针,总结分析西安半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巧妙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刘天章的身体不好,加之天气炎热、监牢中空气污浊,又有沉重镣铐的折磨摧残,体质越发变坏,但他革命意志却越来越坚强,每次出庭审讯时,总是坚定沉着地对付,敌人对他毫无办法。他经常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法庭上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同狱的难友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说:“在反动社会里,坐监牢是革命党人的平常事”^①,教育大家不要讲不利于党的话,不供出党的组织和同志,不做可耻叛徒,“绝不为敌人威武所屈服,也绝不被他们的利禄所诱”^②。鼓励大家“生为革命而生,死为革命而死”^③,同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同年11月,刘天章又被押解到郑州市内防处。

郑州市内防处是敌人关押共产党的“大政治犯”的监狱。在这里,敌人的看守更加严密,刑罚更加残酷,这就给刘天章他们在狱中斗争带来更大的困难。尽管如此,刘天章设法与狱中的30多名共产党员秘密联系,组织起监狱党支部,由刘天章任支部书记,侯宗骏、贾大庸分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为了提高狱中党员和非党难友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他们组织狱中同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刘天章亲自与外边党组织秘密联系,在1927年底向中共河南省委报送了《在狱同志调查表》^④,将狱中33名党员的编号、年龄、籍贯、被捕的时间、原因以及在狱中的现

① ②《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1辑。

③ 《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1辑。

④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状等作了详细汇报,还准备组织越狱。

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同志传阅总结文件时,由于麻痹大意,将文件丢失在地上,被守卫士兵拣去。敌人在文件上发现刘天章是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便大施淫威,给他在手铐之外,又加上两副7斤重的铁镣,不许放风,严加防范。每次审讯时,刘天章泰然自若,拒不承认。敌人施用酷刑没有达到目的,便派伪军法官进行劝降,同样遭到刘天章的严厉斥责。狱中党支部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绝食斗争,反抗敌人压迫,要求给刘天章和狱中难友一律下镣,改善伙食和延长放风时间。

当时,刘天章的身体虚弱。大家恐怕他参加绝食斗争会更加损害他的健康,劝他不要参加。但他的态度十分坚决,横下一条心,要和敌人斗争下去。敌人一次次送来的食物,他全都断然拒食。就这样,他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着饥饿和病痛同敌人进行斗争。绝食斗争到了第三天,敌人慌了手脚,被迫答应解除手铐,改善狱中伙食待遇。但是,刘天章身上的铐镣依然没有解除,仍受到严密看守。从此,他的身体更加瘦弱。经过狱中难友的精心照料和医治,随后又逐渐好转。不久,郑州监狱的所有“政治犯”又被押解到开封第一监狱。敌人的阴谋屡遭失败,认为刘天章不易对付,到开封后,便把他单独关押在一间小屋里,以隔绝他和外边的联系。在敌人每周一次向政治犯进行诱降宣传时,他总是乘机向难友远望点头,以示要坚持革命到底。1929年夏季,冯玉祥与蒋介石分裂,开封监狱的政治犯先后获释,刘天章才恢复了自由。

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和斗争,象熔炉一样,把刘天章锻炼得更加坚强。他出狱不久,便立即奔赴新的战斗岗位。党组织先派他在中共顺直省委做宣传工作,公开身份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报纸出刊数月,被迫停刊,刘天章又负责领导北方书店。这时,国民

党的密探时刻监视他的行动。环境险恶，党组织派他负责互济会的工作。刘天章埋头苦干，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巧妙地同河北、天津、北平等地监狱中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使狱中的难友得到了党的指示和物质上接济，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他还历尽艰辛，秘密地举办小型的短训班，提高互济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曾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表彰。这年秋天，刘天章代表北方各省市党组织出席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互济会代表大会，并介绍了经验。会后，他继续深入京、津地区的工厂和基层单位，开展救济死难烈士家属的工作。

1930年春，刘天章在天津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备受折磨和摧残，但坚不吐实，一直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党的组织机密。敌人抓不到证据，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6个月徒刑。后被转送到“自新院”，他仍坚贞不屈，继续同敌人斗争。是年9月，奉系军阀入关，晋军退出天津，“自新院”的政治犯乘机出狱，刘天章又一次重见天日。

六

1930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会后，中央又对山西地区的形势作了周密的分析，认为山西地区群众斗争的力量对发动武装暴动十分有利，把山西作为北方革命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北方局于10月在天津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新苏区；同时决定改山西特委为山西省委，派刘天章任省委书记。

在此之前，由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影响，太原仅有党

团员 20 余人,河东^① 有党团员 50 余人,党的组织涣散,群众工作基础薄弱。刘天章到任后,先以主要精力传达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北方局扩大会议精神,开展了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斗争,调整和恢复了省委、太原市委的领导机构。接着,他深入到太原兵工厂、纱厂、东山煤矿、商震的军官教导团和晋军李服膺的十七团进行调查研究,整顿加强党的组织。在他的领导下,省委派李志敏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驻平定的高桂滋部整顿地下党组织;另派党员到汾阳、运城、侯马、晋城等地驻军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对在太原狱中的党员,派互济会负责人高克亭到狱中转送物资,生活上给予救济,还批准成立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狱中党支部。刘天章亲自给郭洪涛写信,指示狱中支部教育党员既要坚持斗争,作好武装越狱的准备,也要注意修养,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那怕来日无柴烧”。

经过刘天章和省委其他同志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山西地方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到 1931 年 4 月,太原市党员发展到 105 人,团员 31 人。全省共有党员 268 人,建立了 5 个地方党部和 21 个支部;还设立了秘书处和“并州养蜂场”,作为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机关。

在白色恐怖的太原,环境险恶,党的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刘天章设法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筹得一点费用,均全部交组织统一使用,而他自己领取的生活费却很少。一次,一位同志因吃饭问题发愁,刘天章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送给了这位同志,而他却饿着肚子,一连十多天,每天只吃一顿饭。尽管生活这样困

^① 河东,指山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安邑、闻喜、夏县、解县、猗氏(今临猗)、绛州(即新绛)和绛县。

难,他仍坚持夜以继日地工作。驻平定的陕军高桂滋师长得知刘天章在太原生活境况很艰难,写信劝他去该部,并许以高官厚禄。刘天章当即回信谢绝,表示:“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部分领导人,成立了“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和王明等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张召开紧急会议,解决立三路线的问题。山西省委接待了“筹备处”所派的代表。为此,北方局派主要负责人来解决山西党组织反六届四中全会的问题,并将山西省委改特委,将刘天章的省委书记职务降为特委组织部长,强迫他承认反四中全会的错误。刘天章虽由书记改任组织部长,仍以党的事业为重,毫不计较个人职务的变动,对新任特委书记阴凯卿非常尊重,阴凯卿也处处信赖刘天章,两人亲密合作,团结战斗,为周围同志一致称道。

七

刘天章到山西后,一面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狠抓组织工农武装,发动武装暴动。到1931年夏季,驻晋军阀部队中党的地下组织都有了新的发展,党员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增加。驻平定的高桂滋部就有党员五六十人,许多营、连、排长都由党员担任;驻汾阳的冯玉祥部军官学校千余名学员,党员就有200多名。据此,刘天章和阴凯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认真分析了新的形势,共同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制定了兵变计划,决定拉出高桂滋部两个团组成

^① 《刘天章同志传略》(1946年编写),原件存中央组织部档案科。

红二十四军；策动高震部军官教导团和李服膺部十七团举行暴动，组成红二十五军；争取晋西的“武装土客”（即武装土匪），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在此之前，刘天章曾派共产党员阎红彦和白锡林打入晋西“武装土客”，作争取改造工作，但因其内部发生分裂，失去了争取的条件。刘天章和特委遂改变计划，从太原兵工厂和高桂滋部抽调了一批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由阎红彦、白锡林、吴岱峰、马佩勋领导，到晋西山区开展武装活动，筹建红军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1931年5月，在孝义县和中阳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拓克宽、阎红彦、吴岱峰任正副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这是华北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不久，驻汾阳永安镇敌军一个排全部起义，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的人员和武器装备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游击队成立后，刘天章和谷雄一经常以买蜂蜜为名，到“并州养蜂场”同游击队负责人秘密接头，向他们传达党的指示，布置任务，转送枪支弹药。刘天章指示游击队要实行官兵一致，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要以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为榜样，加强党和游击队的建设，同地方党组织搞好关系，爱护老百姓，并指示游击队若遭强敌围攻，可以西渡黄河向陕北转移，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公审土豪劣绅，开仓济贫，政治影响迅速扩大，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加，队员发展到200余人。从此，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根据地初步形成并日趋发展。

吕梁山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震惊了山西的反动统治者。晋西各县政府纷纷向省方告急。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派兵万余人前往“围剿”。游击队与敌激战数次，终因寡不敌众，向陕北转

移，于9月初西渡黄河，到达陕北清涧、安定（今子长县）一带，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接上了关系。后来，刘天章又与赵伯平联系，将晋西游击队及党的组织关系转交给陕北特委领导。10月，晋西游击队到达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合，成为刘志丹、谢子长领导创建的西北红军的一支骨干力量。

在此期间，为了开展冯玉祥旧部的兵运工作，特别是汾阳军校的工作，刘天章于1931年3月初，亲自秘密前往汾阳峪道河冯玉祥“隐居”的住处，与冯玉祥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刘天章就中共与冯玉祥合作的历史、目标、基础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刘天章坦率地谈了中共与冯玉祥之间的分歧所在，指出：第一，冯先生的作法是一切都必须以你的意志或者以你主持的政府的意志来办事情。而中共代表人民的利益，组织工农政府，处理土地及一切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与冯先生的“以我为中心”是大相径庭的。一是“以‘我’为主”，一是“以‘民’为主”，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分歧。第二，过去冯先生对于我们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是有看法的。但是，冯先生当政后，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贯彻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令人不解的。第三，对蒋介石的看法问题。刘天章指出：冯先生谈到自己未看清蒋介石的庐山真面目，这是实话。韩复榘、石友三跟你多年，他们的真面目你都未看清，难道徐州会议短短几天，你就能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问题的关键，是蒋介石的甜言蜜语使你上当受骗了。谈到这里，冯玉祥激动地说：先生说得太好了！太对了！我冯玉祥终生难忘。我知错必改，决不食言，让今后的行动来证实我今天说的

话吧！^①

刘天章还指出：冯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共同点还是主要的，我们殷切希望在这个友好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关系。并向冯玉祥提出两点希望：第一，冯先生身处华北，应当明察局势，挺身而出，高举抗日大旗。这是大得人心的，也是关键的一着，冯先生应不失时机。第二，建议冯先生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联络国民党高层中的爱国人士，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如此将大大有利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局势。冯先生重登政治舞台，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最后，刘天章以极诚恳的态度对冯玉祥说：在冯先生今天处于危难之际，急需朋友帮助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又来到冯先生的面前，如先生愿意的话，让我们重新恢复友好关系。^②说完，刘天章与冯玉祥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刘天章与冯玉祥的会谈，对冯玉祥的思想触动很大。他深感当自己处于艰难困苦之时，共产党又来给他雪中送炭，指明出路。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冯玉祥一扫中原大战失败后的苦闷，鼓起了与中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斗志。

1931年7月，在平定爆发了高桂滋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刘天章和特委的积极组织下进行的。高桂滋部原属国民二军，官兵多是陕西人，大革命时期驻守河南。刘天章在豫陕区委时与其旧部曾有过较多的接触，并在高部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高部被蒋介石强制参加中原大战，在山东战败，余部退往平定。到平定后，士兵生活困苦，反抗反动官长的情绪日益增长。

^① ^②丘权政编：《回忆冯玉祥将军》，北京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7—57页。

正当高部地下党按照特委的指示,积极准备发动起义的时候,在高部任排长的地下党员刘玉珊^①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高部地下党组织也有被破坏的危险。形势十分危急。地下党支部立即派人赶往太原,向刘天章请示。刘天章仔细分析了突变的复杂局势,决定提前举行起义。

起义前,刘天章昼夜奔忙,除组织平定、阳泉地区一些日常的经济斗争配合起义外,还亲手拟制起义的文告,部队的番号、旗帜和印章。按照上级军委指示,由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谷雄一(又名苏亦雄)携带准备好的旗帜、文告、印章和传单,从太原赶往平定,具体地组织起义。

7月4日午夜,在谷雄一、赫光(原名万锡绂,高部连长,中共党员)等人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平定武装起义爆发了。次日,宣告成立了华北地区最早的一支工农红军——红二十四军(赫光任军长,苏亦雄任政委,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稍加整顿,离开平定县境,转战到河北阜平县城。红二十四军在这里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还领导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

刘天章和特委的同志得悉红军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高兴,指示太原市委立即将这个胜利的喜讯传达到党员和群众中去。顿时,革命人民扬眉吐气,反动阶级惊恐不安。坐镇北平的张学良,急令军阀石友三旧部沈克配合高桂滋余部前往“进剿”。老奸巨猾的沈克,设下“假投降”之计,率部向红军“投降”。我军领导人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信以为真,仓促前去接受改编,结果被俘,遭敌杀害。敌

^① 刘玉珊,陕北人,当时在高部第一团任排长。1931年6月下旬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平定起义后,被高桂滋下令杀害。

军乘机分两路进攻阜平县城，我军被迫撤离，横跨过晋西山区 10 余县，击退追兵 10 余次，从保德县境渡过黄河，到达陕北府谷和榆林一带，后又遭军阀井岳秀所部包围，起义归于失败。

红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太原，刘天章和特委的同志心急如焚。刘天章受特委的重托，一面给陕北特委写信求助，一面派马明方去崞县，大同给党员李志敏、聂鲁质送信，要他们二人尽快前往陕北寻找红二十四军。他也亲自化装成贩牲畜的商人，日夜兼程，前往陕北，准备召拢部队，直接指挥。当他赶至黄河岸边时，得知红二十四军已经失败，又重返太原。这时，由于叛徒出卖，山西特委和太原市委已遭破坏，阴凯卿^①、任国桢^②等负责同志相继被捕。10 月下旬的一天，刘天章刚回到太原，也被敌人逮捕。

十

刘天章被捕后，敌人将他和阴凯卿、任国桢押解到太原警备司令部。在敌人的多次审讯中，他都严守党的机密，用化名王慎修，山西蒲州人，是个卖柿子的，来对付敌人。敌人无可奈何，便拉出

^① 阴凯卿(1904 年—1931 年)，山西夏县人，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长，1931 年春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同年 10 月 21 日被捕，不久壮烈牺牲。

^② 任国桢(1898 年—1931 年)，辽宁安东县人，历任中共奉天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1931 年 10 月初，河北省委派他到太原任山西特派员，拟任山西特委书记。10 月 21 日被捕，不久壮烈牺牲。

叛徒张绍武^①、陈伯英^②、孙斌^③、张凯^④等出庭作证，供出了刘天章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接着，敌人又派出山西省“清共”委员会委员兼审讯员刘冠儒，对刘天章进行诱降，遭到了失败。从此，敌人对刘天章加紧迫害，坐老虎凳、压杠子、抽皮鞭、灌辣椒水等种种惨无人道的刑罚都用尽了，但他总是以“不知道！”“没有！”“不明白！”回答敌人，或干脆拒绝回答。一次，敌人用烧红的铁链盘在刘天章的腰间逼讯，刘天章咬牙忍痛，面不改色，一言不发。敌人大为震惊地说：“烧烙铁还要发出响声，何况他是一个人，连口气也不出，共产党人是铁汉子啊！”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刘天章被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但他不屈不挠，使敌人一无所得，束手无策。

叛徒张绍武为了邀功讨好，无耻地向敌人献出由他出面同刘天章对证的苦肉计。敌人如获至宝，先将张绍武光着身子吊起来，假装受刑很重的模样，然后提审刘天章等人。张绍武一见刘天章，阴险狡诈，任国桢便大声呼喊，说：“我受毒刑，实在无法忍受，已经供出了特委的全部地下活动，你们也从实说了吧，如不说，也会和我们一样受各种苦刑。”敌人乘机阴阳怪气地对刘天章他们说：“张绍武已经如实招供，你们还有什么可抵赖的？”刘天章厉声怒斥敌人，

① 张绍武，原名丁楚源，被捕前任山西特委代理秘书长，被捕后叛变，致使山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捕壮烈牺牲。

② 陈伯英，被捕前系由河北省委派往山西整顿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被捕后叛变，充当国民党特务，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③ 孙斌，原名孙晓幽，又名孙光斗。被捕前任中共山西特委军委代理书记，被捕后叛变投敌。解放后改名薛向晨，窃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要职，1963年被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判刑劳改，1970年12月病死在狱中。

④ 张凯，曾任晋军驻太原李服膺十七团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后被捕叛变投敌。

说：“他说什么，是他的。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①“你调来全中国四万万人证明，我也不是刘天章！”^②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暂时收场，便从生活上对刘天章百般虐待，每天只供给少量发了霉的高粱馍和稀汤。刘天章原来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在非人的折磨下，他的病又复发了几次。

在狱中，刘天章和难友谈及那几个叛徒时，十分憎恨，总是气愤地说：“无耻”；对年青党员和进步青年则教育安抚，提高他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指出光明的前途；对自己，他总是爽朗地说：“死何惧之！”^③他绝不提家事和个人的私事，一心惦记着党和人民的事业。

敌太原警备司令部施用了种种酷刑和卑劣的手段都没有使刘天章等屈服，最后将他们移交给新成立的山西临时军法会审处继续审讯。会审处审判长、大刽子手韩甲三在阎锡山的指挥下，组织了5个审判官进行会审。刘天章把法庭当战场，对审判中提出的问题逐条据理驳斥，义正词严地质问敌人：共产党人救国救民，拯救民族危亡，何罪之有！敌人被驳得理屈词穷，便依仗反动权势，丧心病狂地判处刘天章和阴凯卿、任国桢等死刑，并报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批准后开庭宣判，立即执行。

出庭前，刘天章深知敌人对他们要最后下毒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便脱下自己身上的破毛衣送给狱中的党员，请转交给党组

^① 李志敏：《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活动和1931年的大破坏》，《山西文史资料》第22辑第26、27页，1982年5月出版。

^② 《刘天章同志传略》（1946年编写），原件存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科。

^③ 太原双塔寺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委员会：《记刘天章同志》，1979年5月11日《陕西日报》。

织,作为他最后交纳的党费。狱中党员睹此情景,无不潸然泪下。

11月13日^①,阴森的气氛笼罩着太原。全城交通断绝,布下了严密的岗哨。小东门外的刑场上布满了宪警和匪兵。审判庭杀气腾腾,刀枪林立。敌人对刘天章、阴凯卿、任国桢等要下毒手了。他们在法庭上仍骂不绝口,宣判还未结束,就齐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惊慌失措,急忙用棉花将他们的口塞住,在场的群众为他们的英雄气概所感动,连一些押解的卫兵也惊叹不已。下午,刘天章和阴凯卿、任国桢惨遭阎匪枪杀,壮烈牺牲。

刘天章虽然牺牲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将光照千秋,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里。他的战友们缅怀先烈,曾赋诗撰文歌颂他、纪念他:“太原闹革命,潜足亦潜行。义起平定县,血染阜平城。赫光死奋勇,天章受酷刑。火链盘腰烧,凛然贯长虹。洒遍烈士血,山河换光明。光华开昌运,足慰在天灵。”^②

全国解放后,山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找到了刘天章烈士的遗骸,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并在太原双塔寺修建了烈士墓,永志纪念。

(梁星亮 张守宪)

附记 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外,还参阅了《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924年),《北京晨报》(1924年),《新中州报》(1924年—1926年),北

^① 刘天章牺牲的日期,还有二说:一说为11月22日,一说为12月中旬,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② 此诗为赵鹏九所作。赵鹏九曾任中共绥远特委书记,建国后曾任西安市政协常务委员。

京《益世报》(1931年7—8月),《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山西文史资料》第20辑、第22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版),《平定武装起义专辑》第1辑(平定县志办公室1980年8月编印),李志敏、阎子祥、曹普:《血染太行播火种——纪念平定武装起义五十周年》(《山西日报》1981的7月10日第4版),《陕西文史资料》第6、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1年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杨钟健、潘自力、杨晓初、杨明轩、安子文、魏文伯、赵伯平、阎红彦、徐彬如、刘国璋、阎子祥、白超然、高克亭、马方庭、娄凝先、陈子毅、赵鹏九、郭洪涛、马文彦、屈武、师哲、田有莘写的回忆材料。编写过程中,还先后访问了方仲如、赵伯平、屈武、张仲实、徐彬如、赵鹏九、吴岱峰、郭洪涛、师哲、高克林、朱敏、吴化之、罗章龙、刘仁静、刘依仁、郑自毅、马文彦、张耀斗、刘尚达、张文华、王子休、曹志麟、杨慰祖、冯润璋、梁俊琪、陈云樵、关中哲、杜松寿、王圣域、韩志颖、呼震西、田有莘、严天明、王芾南、张秀逸以及刘天章烈士的遗属刘德生、刘雪琴、胡振家、刘佩茵等同志。

武 止 戈

(1902—1933)

武止戈，又名襄祖，化名胡之康。陕西渭南人（今渭南市临渭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7月去苏联，先后入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并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1932年回国后，被派往张家口地区帮助建立抗日同盟军，并负责中共张家口特委的工作。后任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

挥部参谋长、骑兵第五十六师参谋长，同盟军总部参谋主任。1933年10月在河北顺义县（今属北京市）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者

武止戈，1902年出生在陕西省渭南县（今渭南市临渭区）武赵村一个士绅家庭，后迁居西安。祖父曾任清朝兵部主事，父亲武树善当过清朝知府，辛亥革命后任国会议员，是一个倾向进步，赞助过革命的开明士绅。

武止戈从7岁开始在私塾读书，后入西安私立健本小学和外国教会办的中学——圣公会学校上学。他在进步教师蒲化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下，刻苦学习，成绩优良，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仅各门功课好，而且还阅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和

进步书刊，知识比较广泛。对于时局的发展，他尤为关心。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西安，他和其他进步同学在省学联的领导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他带头把家里用的日货拿出来当众烧毁，同校内同学在钟楼、鼓楼散发传单，登台讲演。宣传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他的爱国行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西安地区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五四运动后，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武止戈和好友屈武、邹均商定去外地求学。1920年，他和邹均等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进步教师和同学的指引与帮助下，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问题》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投身学生运动。为响应新文化运动，他决心不写文言文，和同学相约定白话文写文章，抨击旧文化、旧礼教。

随着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武止戈和许多进步青年，初步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必要。1921年12月，他和同在天津的屈武、邹均、张宝泉、刘尚达、崔孟博、韩志颖等10多个陕西同学，组织起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并以通信形式联络西安学生，愿同他们一起，“组织团体和出版刊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地介绍出来”，“同心协力去奋斗牺牲，破除黑暗的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①他们还致函陕西教育厅厅长沙明远，揭露其勾结复古顽固势力，“使陕西教育界非常黑暗”的罪行，警告沙明远“不得将神圣的教育事业为缺少常识者所把持”^②，力主革新陕西教育。翌年初，他们又创办了《贡献》(月刊)杂志。这个杂志虽只出了4期，但在倡导移风易俗、

① 《改造陕西教育的彻底办法》，原载《共进》第7期。

② 《给教育厅长沙明远先生一封信》，原载《共进》第7期。

改造社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誉为“宗旨正大,议论卓越”的革命刊物。武止戈在《贡献》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号召陕西青年奋起改造社会,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谋幸福、快乐、自由、平等。”^①

1922年6月,武止戈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前往北京,一面复习功课,准备应考大学,一面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北京,他结识了陕西旅京学生领袖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钟健等,与他们志同道合,交往甚密,彼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特别是在刘天章、李子洲的引荐下,他拜访了李大钊,聆听教诲,备受教益。

1923年,武止戈经刘天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参加了旅京陕西学生的进步组织——共进社的活动。为《共进》杂志撰写了10多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

在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时,武止戈十分重视联系实际,特别是探讨在陕西地区进行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他在《陕西人应该怎样要求解放》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领导陕人武装起来,建立革命政府,打倒军阀,赶走流氓政客”^②的主张。

1923年夏,武止戈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③,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积极发展壮大团的组织。仅半年时间,团员就由原来的不足100人发展到180多人,成立了20多个支部。他还组织团员深入工厂,帮助举办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

① 《贡献》第四期(1922年6月出版)。

② 《共进》第33期,(1923年7月10日出版)。

③ 据张秀逸和彭建华同志1983年12月20日回忆。另据乐天宇同志的回忆,武止戈担任的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因缺乏历史文献佐证,有待进一步查考。

学文化,了解时局发展趋向,通过和广大产业工人的广泛接触,使他和许多青年逐渐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感情,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决心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由于他领导的北京团地委的工作成绩出色,曾受到团中央的表彰。团的二大决议中赞扬“北京地方团,对于政治宣传,尤其是学生运动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①。

1924年初,党组织选送武止戈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这里,他就教于著名共产党员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社会主义科学知识,并和何尚志、邹均等共产党员,利用课余和星期天深入到工人中去,调查了解工人的情况,到工人夜校任教。不久,他接到团中央的指示,要他赴苏联学习,并在赴苏前利用回陕探亲的机会,帮助陕西建立团组织。他欣然从命,即刻动身返陕。

1924年5月30日,武止戈先到渭南赤水,找到在赤水职业学校任教的早期团员王尚德,转达团中央的指示。在他的督促下赤水团支部很快建立起来^②。不久又扩大为特支,吸收了渭南、华县、三原等地的进步师生加入了团组织。6月上旬,他又来西安,与正在省立第三中学执教的共产党员(一说团员)魏野畴取得了联系。他同魏野畴、崔孟博(中共党员,天津团地委委员,时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因放假回西安)举办了暑期讲习班,并召开青年座谈会,讲解团的性质、任务和入团条件,并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的形势,鼓励青年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火热斗争中去。不久,他们先后接收了张秉仁、康少韩等一批青年入团。建立了由团中央直接

^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1923年8月25日),存中央档案馆。

^② 王尚德1924年给团中央的报告,存中央档案馆。

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①

旅居苏联的艰难岁月

1924年7月,武止戈从西安来到天津,同张宝泉等一行数人,启程赴苏进入东方大学。他在这里刻苦学习了马列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学校开设了国际共运史、工运史、联共(布)党史和俄语等课程。在这些课程上,他的学习成绩都很好。特别是俄语学得尤为出色,被大家亲切地誉为“活字典”。^②1925年夏,他被派往西伯利亚和黑海地区作工人运动,他同工人打成一片,同吃同住,一起挖煤,一起捕鱼。他的皮肤晒黑了,手上磨出了厚茧,意志也锻炼得更坚强了。在长期艰苦而愉快的劳动生活中,他与一位苏联女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结了婚。^③

武止戈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年中,经受了种种考验。由于战争的破坏,苏联当时的生活条件艰苦,房子少,许多人住在一起;粮食缺,有时吃不饱肚子,武止戈从不叫苦,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精神,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团结教育其他同学和工人。在东方大学时,一些人不但轻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反而装腔作势,对有钻研精神、敢于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的武止戈等同学指责为所谓“学院派”,^④错误的进行批判,并在组织上进行排斥和打击。武止戈坚持真理,

^① 《陕西省通讯》1927年第1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张秉仁、李子健、高克林、刘依仁、米哲沅、杨博如等人的回忆。

^② 张仲实、方仲如、严信民等人的回忆(1979年)

^③ 顾红梅、张秀逸、武少文、张仲实等人的回忆(1979年)

^④ 所谓“学院派”,是指理论脱离实际的书呆子。

同这些人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一方面继续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加强实际工作的锻炼。在后来的反托派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托洛茨基及其门徒所散布的种种反马列主义的谬论。但当讨论对犯错误人的处理时,他却主张对一个人应该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反对过火斗争和一棍子把人打死的错误方针^①。他的这种坚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精神,为大家一致称赞。

1927年春,武止戈回到莫斯科,转入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同时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②。在任期内,他经常与中共中央及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听取中央的指示,并汲取前任书记刘伯坚等同志的工作经验,不断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严格组织生活。除此而外,旅莫支部还要负责管理中国籍学生的工作,有时也承担旅苏华侨的事务。尽管学习任务十分繁重,他仍任劳任怨,把各项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人们亲切地称旅莫支部是“党内驻苏大使馆”^③。

武止戈远在苏联学习,但他时刻关心祖国政局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经常翻阅报刊,了解国内时局发展动态。当他得知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日益发展的情况后,多次向党组织申请,要求学习军事,以便回国后投入火热的武装斗争。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送他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不久又到苏联红军中进行实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他心急

① 张仲实、屈武、方仲如、师哲等人的回忆(1979年)

②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47页。

③ 转引自《中共历史人物传》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如焚,请求回国直接参加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当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后,他立刻动身,于1932年2月回到离别8年的祖国。不料途经哈尔滨时,被军阀逮捕,在沈阳、大连羁押数月,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使他身染重病,生命垂危,但他始终严守党的机密,说自己是旅苏华侨回国探亲的。党组织和他的老师蒲化人对他进行多方营救。他获释后,由大连转赴上海,住在弟弟武思茂家养病。他一面坚持学习,一面教育弟弟和弟媳顾红梅,希望他们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做个不负时代的好青年^①。他的病情稍有好转,便请求党组织分配工作。党中央认为他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组织才能,又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对北方的情况比较熟悉,决定派他去北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欣然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离开上海,踏上新的征程。

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战斗的日日夜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1932年夏,中共北方特科^②根据周恩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同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商定,以察哈尔张家口为根据地,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③。

武止戈到天津和北平后,同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肖铭

^① 武少文、顾红梅等人1979年12月的回忆。

^②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指派吴成方创建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即北方特科,又称中共华北特委。

^③ 吴成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和失败的经过》,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82年第1期。

(即肖明)取得联系。接着,他和吴化之、张金印、张存实、许权中等共产党员被派往张家口,同冯玉祥将军一起筹组抗日同盟军。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成立了由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领导的中共张家口特别委员会,他和张金印、吴化之都参加了特委的领导工作^①。他们认真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的形势,根据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和冯玉祥将军初步商定的原则,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决定放弃打倒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的口号;对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对待,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并决定党组织和党员在即将成立的抗日同盟军中均不公开。根据上述决定,特委起草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纲领和宣言。同时,根据冯玉祥的建议,特委派出一些共产党员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分别到冯的旧部方振武、吉鸿昌、孙殿英、佟麟阁部和退往察哈尔、绥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作联络争取工作。结果,他们都表示愿意率部参加即将成立的抗日同盟军,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冯玉祥将军联合抗日的主张。

为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抗日同盟军的工作,发展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春,武止戈同吴化之等与在张家口的中共内蒙古特委书记陈镜湖协商,由陈负责发起组织蒙汉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尔后再由特委组织各界群众成立察哈尔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在此期间,张家口特委还创办了《抗日前线》报,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在筹组抗日同盟军的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武止戈受特委和冯玉祥将军的重托,穿越内蒙古大草原,日夜兼程,前往库伦(今乌兰

^① 吴化之 1979年9月23日的回忆和吴成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和失败的经过》。

巴托),作争取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国际援助即将成立的抗日同盟军的联络工作。但因苏联驻蒙大使鉴于苏联政府已同日本、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能单独和抗日同盟军发生关系,致使联络工作未能奏效,他只好返回张家口,同党组织和冯玉祥将军另商决策。

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错误地指责武止戈、吴化之等领导的张家口特委“右倾”,认为特委不能保证他们那条“左”倾路线的贯彻执行,于是又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①,取代了张家口特委。武止戈、吴化之等特委成员均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前委之外。这时,他虽受到排挤,但仍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分配,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5月26日,在中共的帮助和推动下,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下简称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任察哈尔省警备司令兼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武止戈任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②。抗日同盟军成立后,通电全国,主张联合全国各党派各军队“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敌,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③

但是,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抗日的强烈呼声,同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日寇乘机大举进犯华北,先后侵占了

^① 吴成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和失败的经过》;吴化之1979年10月15日的回忆。

^② 宋聿修:《冯玉祥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和抗日同盟会》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6—147页。

^③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1934年出版。

滦东和平北 19 县,察东沽源、康保、宝昌、多伦等重镇,亦沦于日伪军之手,平津地区风云突变,局势日益紧张。

在此大敌当前之时,吉鸿昌受冯玉祥将军之命,出任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武止戈被任命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①6月下旬,他奉命协助吉鸿昌率部由张北出发,英勇进击,连战皆捷,10多天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数县。7月上旬,他们又兵分三路,乘胜追击多伦之敌。多伦是察东重镇,日军在这里驻有茂木骑兵旅团和炮兵固守,伪军李守信、崔新五部担任外围防御进行顽抗,又有日机 10 多架在空中掩护。武止戈冒着敌人的炮火,到第一线协助吉鸿昌指挥作战。10 日夜,他和吉鸿昌率敢死队匍匐前进,三次攻城,不克。次日拂晓,发起总攻,日机不时轮番轰炸,同盟军将士以大刀与敌人血肉相搏,伤亡甚重。12 日凌晨 1 时,又命令所属部队趁黑夜敌机敛迹之机,发起全线猛攻。他们袒臂冲锋,身先士卒,与事先打入城内的 40 名壮士里应外合,由城区的西、北、南三门攻入,经 3 小时短兵相接的巷战,日军不支,由东门仓皇溃逃。至此,失陷 70 多天的多伦城,经抗日同盟军 5 昼夜鏖战,宣告光复。^②

战后,吉鸿昌、武止戈又奉命率部驻守沽源,防御日寇反攻南犯。

驰骋疆场 为国捐躯

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也使日伪闻

^① 王霖(芑南)1981年5月14日的回忆。

^②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4辑。

风丧胆,大为震慑。但是,日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一面派重兵反攻多伦、沽源,一面加紧勾结何应钦,共同围攻抗日同盟军。蒋介石也在这里调兵遣将,向察哈尔省步步进逼。

冯玉祥将军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政治压迫之下,于8月上旬宣布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下野去山东泰山。蒋介石急令宋哲元主持察政,收编抗日同盟军。武止戈和宣侠父、许权中、刘少文、张存实等共产党员坚决反对宋哲元收编抗日军队,坚持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在前委的领导下,经过一番积极准备之后,他们联合方振武、吉鸿昌将军在张北重建抗日同盟军总部,推举方振武为代总司令,吉鸿昌任总指挥。对我党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第二师、第五师、第十八师等,也进行了充实整顿,党的力量和军事力量大大加强。

8月中旬,武止戈被前委和吉鸿昌将军派往驻守在张北县公会附近的骑兵第五十六师任参谋长。这个师原由东北义勇军改编,仅有几名共产党员,党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师长早已和宋哲元暗中勾结,图谋叛离抗日同盟军。武止戈到任后,和师政治部主任刘少文、师参谋主任周益三等共产党员对五十六师进行了整顿,“发起组织士兵抗日会,在抗日会之下组织读书班、讲演会,宣传充实了士兵抗日会的生活,加强了政治处的群众工作,同时也开辟了一部分农村工作。……经过10天,党与群众组织均有发展。”^①但由于宋哲元从中多方收买,师长率领部队投降了宋哲元。武止戈、刘少文、周益三曾发动士兵反对投降^②,因我党掌握的兵力较少,恐被瓦解,未能阻止五十六师的叛离。武止戈亦于8月底被迫

① ②《刘少文的报告——察哈尔事变经过情形》(1933年12月3日),存中央档案馆。

离开该师，回到吉鸿昌部任参谋主任，继续协助吉鸿昌将军指挥作战。

9月初，前委和吉鸿昌等在商都附近的四台坊开会，讨论抗日同盟军的进军方向问题，前委不顾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坚持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既定的向直隶省（今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地区进军，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吉鸿昌等主张东进到独石口，和方振武部会师，而后向南发展。武止戈、张金印、许权中等则认为南下和东进途中都会遇到强敌的围追堵截，给我军造成伤亡，建议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又有回旋余地的陕北去，同刘志丹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汇合，扩大革命根据地。加之西进途中的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便于我们通过。武止戈等人的正确建议，被前委否定了。最后，前委决定与吉鸿昌部一起东进独石口，同方振武部汇合，尔后再南下到直隶中部和南部地区，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但当抗日同盟军东进到独石口时，前委某些人和方振武等人又提出放弃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打出讨贼联军旗帜的主张，并提出了在农历8月15日进攻北平的计划。对于易帜和攻打北平，武止戈等许多共产党员认为不合时宜，提出反对的意见。在此情况下，前委为谋去直隶中部和南部地区，或与冀东农民革命武装汇合，作出了两种旗帜并存的决定^①。9月下旬，武止戈协助吉鸿昌与方振武部汇合。接着，两支部队共三四千人，由独石口出发，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拦，先后克复怀柔、密云、昌平等县城。10月初，又发动了大小汤山的战斗。

^① 《刘少文的报告——察哈尔事变经过情形》（1933年12月3日），存中央档案馆。

当时,抗日同盟军遭到日本飞机和大炮的袭击,国民党中央军十几个师也从三面进行围攻,从兵力到装备,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但是,武止戈和抗日同盟军的将士们毫无惧色,斗志昂扬。当冲锋号起,全军挥起大刀和步枪,冒着枪林弹雨,反复驰突,奋勇厮杀,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攻占了大小汤山,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汤山之战,抗日同盟军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部队伤亡较大。武止戈和许多党员主张尽快离开汤山,以免敌人对同盟军更大的包围。这时,前委动员方振武、吉鸿昌把部队开往平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为时已晚,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大量增兵设防,堵截了同盟军东进的道路,蒋介石、何应钦也调来关麟征和万福麟部合击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形势非常危急,东进不成,无奈被迫西撤,当行至白河时,被河东的日军阻拦了去路,部队又向南行进,到达顺义县西的杜林庄、三家店、许南园村一带,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而来,我军予敌以迎头痛击。10月31日中午,日本飞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抗日同盟军驻地许南园村进行狂轰滥炸。在硝烟弥漫之中,武止戈临危不惧,骑着战马,沉着指挥抗日同盟军转移隐蔽,不幸被日机炸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2岁。

(张守宪 董建中 梁星亮)

本文参考资料:

1. 吴化之 1925年10月给团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致前线委员会的秘密指示信》(1933年6月2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1933年10月1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 《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1934年2月8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5.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6. 石英：《吉鸿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0 月出版。

7. 乐天宇：《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载《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 11 辑，北京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8. 《武止戈烈士事略》（中共西安市委 1951 年编写），原件存西安市档案馆。

9. 董宝玉：《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未刊稿）。

10. 访问屈武、张仲实、吴化之、高克林、方仲如、师哲、乐天宇、严信民、彭建华、吴成方、陈天秩、罗章龙、刘仁静、周益三、王带南、庞志杰、米哲沉、张秀逸、王圣域、刘依仁、郑自毅、张乃华、张文华、李锦峰、马文彦、刘尚达、李伯恂、王超北、韩志颖、关中哲、党伯弧、冯润璋、王友直、王子休、罗乐水等同志和武止戈的亲属武少文、顾红梅、劳荣笃、武子俊同志的记录以及给作者的信函。

许 权 中

(1895—1943)

许权中，陕西临潼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国民军任旅长、代理师长。曾赴苏联参观学习。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委员兼卫队师旅长、代理师长，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西北军暂编第三旅旅长。1928年参加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后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红军大学学习。

1933年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军军常委、副军长兼第十八师师长。1935年到中共河北省军委工作。1936年回陕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二旅副旅长。抗日战争时期率部挺进河北参加对日作战，任第一一七师参谋长。1938年回家乡从事地下工作。1943年秋任第四集团军中将参议。同年12月9日在眉县槐芽镇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许权中，1895年10月8日生于陕西省临潼县交口镇辛理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原籍山东省临淄县许家终村，1889年山东百日大旱，许权中父亲许文会拖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逃难流落陕西临潼县。6年后，许权中在这里诞生。在许权中出生的时候，家境更加贫寒。

1904年，权中9岁，进入本县高等小学，一边当工友，一边读书，成绩优异。正当他见识初开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武汉

三镇响起了革命的枪声。许权中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带头剪去辮子，投笔从戎，参加了当地同盟会会员曹印侯组织的敢死军，杀死知县，光复了临潼县城。不久，敢死军失败，曹印侯被杀。

1912年许权中高小毕业，因家贫不能继续升学，便在本县万仙屯小学教书。1914年考入不交食宿费的西安单级师范，1916年末及毕业即转入三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1918年1月，三原陕军营长张义安为了反对督军陈树藩，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设军政府，自称靖国军，推举曹世英、胡景翼为总、副司令。2月，于右任奉孙中山命回陕，靖国军推于为总司令。靖国军按新式办法练兵。在这种情况下，许权中参加了陕西靖国军。先后任班长、中队长，总司令部副官、三等参谋和绘图科长。1920年冬，许权中被该军保送到韶关云南讲武分校炮科学习。次年冬毕业回陕，任靖国军第三路中尉排长，在淳化县通润镇训练新兵。他同战士一起，每日清早冒严寒跑20多里路，到沟底河中作破冰沐浴。由于军队成绩卓著，很快升任连长。

1922年，许权中随曹世英、胡景翼入河南。曹、胡所部被吴佩孚（属直系）改编为中央陆军第三师，许权中任连长，参加了直军对河南督军赵倜的作战。1924年10月间，直奉战争爆发，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倒戈反直，占领北京各要地，并和胡景翼、孙岳、米振鏞联合，囚禁了直系军阀头子曹錕，打败了吴佩孚。吴率残部退到天津，后沿海南下逃往武汉。在这次兵变中，许权中作战英勇，得到胡景翼的器重。是年冬，国民军成立，冯、胡、孙分任总副司令兼一、二、三军军长，许权中在二军胡景翼部第三独立团任营副。国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拥护国共合作，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事。1925年春，许权中任国民二军第二师营长，参加讨伐豫西直系军阀刘镇华部憨玉琨的战斗，憨战败自杀，刘只身逃往山

西。是年许权中升任团长，经旅长史可轩的介绍，赴北京见到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李大钊热心地培养教育他，促使他提高了觉悟，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接受了许权中的要求。北京之行，使许权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6年春，国民二军遭到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联合攻击而失败，后移防河南新乡，许权中兼任新乡留守警备司令。一次，许权中率四个连兵力与吴佩孚支持建立的土匪武装两个师作战于获嘉县。当侦察到该匪军在新乡以西一个大寺院里集中时，他立即派王立安带了不到两个连的兵力在天亮前包围了寺院，经迅猛攻击，歼灭了全部匪军，并俘虏了正在叩头念符的两个师长。在返回新乡途中，将匪师长枪决，为当地人民除了两害，深受民众称赞。同年4月，国民二军退至河北磁县，旅长史可轩准备去苏联参观，由陈冠三代理旅长。5月中旬，陈冠三暗中接受了军阀吴佩孚的改编，被任命为三十九旅旅长。6月，该旅驻防北京附近的涿州、良乡、上苇店、门头沟一带。此时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张宗昌密谋联合进攻国民军，攻打多伦和南口。许权中为了恢复国民二军，联合国民一军，粉碎敌人的阴谋，准备率部起义。他先后派共产党员张汉泉、任警斋、马文彦去北京和张家口，向中共北方区委及国民军总部报告情况及起义计划。许权中的计划得到北方区委和国民军总部的支持。李大钊指示许部：要策应北伐军进攻汀泗桥，相机而动。国民军代总司令兼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派许骥云部前往接应起义。这些活动被陈冠三发觉，准备镇压。许权中当机立断，命令部下立即动手，于7月中旬的一天，抢先击毙了反动旅长陈冠三的几个亲信，陈只身逃跑。部队在门头沟宣布起义。在党的影响下，经过许权中的说服和争取，陈旅的另外两个团长贾玉斋、马子和（克哉）也响应了起义，起义部队达2000余人。起义

成功后，吴佩孚非常恐惧，除下令通缉许权中和扣押在京的400多名陕西人外，还派田维勤师进攻许部。许权中沉着应战，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指挥部队且战且退，奋勇杀敌，转弱为强。战至妙峰山时，亲率一营兵力激战三昼夜，死敌千余人，敌军大败而退。为此事，京津报纸以特大字报道，以少御众。“此举使吴佩孚不能及时南下布置督战于汀泗桥。北伐军战事得以胜利进行。”^①后由于多伦失守，敌人抄了后路，张之江下令撤退，许权中才率部随国民军第一军到绥远包头，驻守南海子。部队经过整编，许权中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第二师团长、旅长、代理师长。

1926年9月，冯玉祥、于右任从苏联参观回国，此时正值北伐。在我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响应北伐，于是在绥远的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决定分兵南下陕、甘、宁，攻打军阀刘镇华，解西安之围。当时西安被号称镇嵩军的军阀刘镇华围困了几个月，饿殍满街，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许权中任援陕第三路司令，率领部队由包头过黄河，经河套入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10月初经榆林到延安。在延安党组织召开的双十节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上，许权中发表演说，表示要迅速南下与军阀刘镇华决一死战，誓解西安、三原之围，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会后又率部日夜兼程，战胜缺衣少食的困难，于10月下旬胜利到达泾阳、三原、高陵一带，与正在围攻三原的刘镇华军作战。许权中为摧毁敌军阵地，亲自打炮，经过激战，赶走了刘军，解了三原之围。在三原，许权中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兼渭北清乡司令。

1926年11月28日，在党的领导和国民联军的援助下，西安

^① 许权中1942年8月为母亲逝世写的《行状》，原件存许权中女儿许建民家中。

城解围，刘镇华军被赶出陕西。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邓宝珊任总副司令，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长兼警卫师（又称政治保卫队）师长，许权中任政治保卫部委员兼警卫师旅长、代师长。党组织非常重视这支军队，特派中共陕甘区委军委负责人陈家珍任政治处长，还派马明方、武培谟、白诚哉、罗伯福、邓重庆、马子敬等大批共产党员作政治工作。同年2月，为了培养军事干部，党组织派许权中协助史可轩、李林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李林任正副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高克林任党的总支书记，许权中任总队长。军校招收学员500余人，其中党员150多人，各级干部和政工人员几乎全是共产党员。许权中负责军事训练和讲授军事理论，他常引用《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教育学员苦练军事本领和注意调查研究。他还亲自带队操练，深受学员的爱戴。该校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干部，建立了一支在我们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在当时有“西北黄埔”之称。

1927年6月下旬，冯玉祥开始追随蒋介石反共，政治形势急转直下。7月下旬，他急令史可轩、许权中率领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事学校的师生一千多人立即离开西安，开往河南前线，妄图乘机消灭这支革命军队。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曾设想两个方案：第一，部队开出潼关受冯玉祥节制，史可轩下野，部队由许权中统帅。因为许权中与冯部将领过去有过一些旧的关系，现在还可以利用，以此为党保存革命实力。第二，抗冯，或者转移陕北山区独立发展。最后决定走北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按照省委的指示，史可轩和许权中打算表面上执行冯的命令，由西安开拔向河南方向走，但过渭河后即很快穿过蒲城、澄城、韩城等地到陕北的宜川，与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石谦旅李象九营会合，驱逐军阀井岳秀，占据陕北，作为发展革命的根据地。

7月25日，史可轩、许权中率部从西安出发北移，到草滩乘船至临潼交口镇，然后步行北上至康桥镇。再往北前进至富平，就要通过陕军田生春的防地，史可轩早年和田交往甚密。于是，7月27日，史可轩先去富平县美原镇找田生春要求接济一些粮秣。但由于田已为冯玉祥所收买，当史可轩到美原后，即为田所杀害。史可轩的不幸遇难，革命同志无不万分悲痛，大家立誓为史可轩报仇，遂推举许权中为军队总指挥。当时，部队处境极为危难，四周遭到陕军田生春、冯子明、甄寿珊等部的包围，去陕北已不可能，又失去和省委的联系。许权中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向，他说：老师长的牺牲，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对敌人都不能有丝毫的幻想，我们一定要保住这支革命武装。为了不被敌人所消灭，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找主求生”。既要使部队合法存在，又不被敌人所控制，这就是会议定下的原则。但是，要在军阀混战割据的夹缝中保存住这支军队，落在许权中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啊！投靠谁呢？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暂时“投奔”冯子明。许权中在康桥与冯子明进行严肃的谈判，提出的条件是：（一）部队由许权中直接指挥；（二）部队驻防关山镇；（三）任何时候为史可轩报仇不得干涉。冯子明一一答应。部队被冯部编为独立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进驻临潼关山镇。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成立了旅党委，高克林任书记，许权中、杨晓初、张汉泉、高志凯等为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入伍。一方面保护了革命同志，另一方面又壮大了部队的力量和改善了革命军队的成份。

这时,由于党中央曾指示许旅要参加鄂豫陕边的起义,所以部队逐步向南转移。在关山驻两月后,移驻高陵县。冯子明对许旅始终心怀鬼胎,图谋借机吃掉这支革命武装,便派赵杰三及惠介如监视许旅的行动。但赵杰三是许权中过去的好朋友,遂向许权中透露了冯子明的阴谋,引起许权中和旅党委的高度警惕。10月间,部队又转移到蓝田县许家庙一带。11月5日,冯子明命令许旅开赴河南。11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旅设法留陕,准备相机起义。在此情况下,许权中婉言拒绝执行冯子明的命令。于是冯即指使在许旅担任参谋主任、同蒋介石有勾结的惠介如,策动徐裴威和杨锡民两个连长举行暴乱。在此危急时刻,杨锡民(共产党员)即刻向许权中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当晚,许权中召集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并把惠介如押到会场。许权中说:“兄弟们,我为了给老师长报仇才守住这个摊子,为了给老百姓做些好事才搞工农革命,这也正是革命军的本分。”“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摊子搞垮。……”^①

“我们愿听旅长的命令,决不被人利用。”^②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惠介如被处决了。但是他的同谋韩威西跑到冯子明那里报了信,冯撕破了假面具,第二天,即密令赵汉章旅围击许旅。同时还派来一支部队,日夜兼程直奔黑龙口,企图占领通往秦岭以南的要道,把许旅从四面围困起来,加以消灭。

“干,接受史可轩同志牺牲的血的教训,是采取主动的时候了。”^③许权中果断地作了决定。他抽出两个排的兵力,一个排摆

^① ^②^③杨晓初:《渭华起义片断》《星火燎原》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11—912页。

在蓝田县东,阻击敌人的进攻,打破敌人由网峪经牧护关抢占黑龙口的计划;另一个排夜渡灞河支流,偷袭敌人前卫司令部。就在敌人甜睡着的时候,开了火。敌前卫司令部遭到突然袭击便向回逃,所有的部队也跟着司令部撤回18里之外。许权中率部趁机连夜急行抢占了黑龙口,粉碎了敌人全歼许旅的诡计。

度过这一危机后,旅党委在黑龙口召集紧急会议,根据许权中的建议,决定把部队拉到洛南,利用李虎臣和冯子明的矛盾,先“投奔”李虎臣,站住脚再去省委请示。12月底部队从黑龙口开到洛南三要司。李虎臣见许旅从冯子明部拉出来,正合他的心愿,也没有细追究什么,就把许部编为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许权中率部在困境中苦斗,经过几次改编,多次移防,终于为党保存住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1928年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精神,和1928年1月2日中央对陕工作的指示^①,召开了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布置全省暴动问题,并决定调许旅去配合陕西东部的农民起义。为了加强对许旅的领导,省委先后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吴浩然、廉益民(卢绍亭)、周益三、李大德等到许旅担负重要工作,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旅参谋主任,谢子长、周益三任营特派员。同时省委还从地方上抽调许多党团员到许旅工作。1928年3月省委书记潘自力转来中共中央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及军中全体同志的信,强调要“发动群众以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中央的信中还提出“由军中挑选得力的同志派入乡村……”,“必须很技术的有计划的布置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需条

^① 《中央公函陕字第九号》(1928年1月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件”，“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①3月底，省委又成立了陕东特派委员会，以刘继曾为书记，负责具体领导渭（南）华（县）地区农民起义。陕东特委根据省委关于渭华暴动的《行动大纲》，具体制定了起义计划。刘继曾到许旅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渭华暴动的决定，要求许旅扩大武装，准备起义。

根据党的指示，许权中对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肃清内部的坏分子，撤掉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一些优秀的党团员提拔到基层领导岗位。同时，部队加强了军政训练，办起了小型兵工厂，自修自造武器。许权中常给干部讲课和领着队伍操练，还深入兵工厂，挥动大铁锤制造武器。旅党委加强了政治工作，并派出干部去附近农村协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开展反霸斗争，把粮食分给农民度春荒。还公审和处决了大恶霸地主阮化生和何豹子，扩大了革命影响。为了适应起义的需要，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在3月底也选派共产党员孙敬堂、王化民、薛自爽等28人到许旅学习军事，许权中和旅党委配备专门干部对他们进行训练。这些同志在部队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军事训练后，在许旅委派的李大德（中共党员、营级干部）的率领下，每人配备1支枪，4颗手榴弹及一些子弹返回渭华，打土豪，破坏敌人的电线和交通。他们的革命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渭华人民的斗争意志。在斗争中，这支地方武装壮大了力量，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有一百多人，五六十支枪的队伍。根据斗争的需要，这支武装改编为陕东赤卫队，李大德、薛自爽任正副大队长。

1928年4月底，盘踞商洛的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出陕参加蒋

^① 《德兄并转军中全体同志》（1927年12月21日）；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

介石、李宗仁、阎锡山与奉系军阀混战之际，发动反冯战争。他一方面率领四旅兵力（包括许旅）赴潼关，阻击冯部宋哲元部回陕；一方面派丁增华部于5月10日包围了西安。军阀混战为渭华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陕东特委抓住时机决定立即举行渭华起义。于是在渭南县和华县南靠秦岭山脉，北临西（安）潼（关）公路，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的南北30余里、东西10余里，面积约200平方公里、人口约9万左右的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有农民群众与革命武装部队相结合的起义。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发动渭华地区农民起义的同时，即指示许旅不要参加李虎臣攻打潼关的战争，迅速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狡猾的李虎臣把许旅加在中间，企图一箭双雕，一方面让许旅替他“火中取栗”，削弱革命势力，一方面阻击冯玉祥主力入陕。战争打了几天，敌军不断增援，许旅伤亡甚大。在此情况下，唐澍、刘志丹、高克林等率领部队撤出战斗，开赴潼关南塬宣布起义，举起了红旗，经石头峪向高塘镇挺进。5月6日起义部队到达高塘镇。

5月8日，在高塘镇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这一天恰好逢集，陕东赤卫队、各村赤卫队、农民协会会员及各阶层群众和起义部队一万多人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欢聚在会场。许权中和唐澍、刘志丹、刘继曾等负责同志参加了大会。大会正式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刘志丹、前敌总指挥唐澍、政治委员刘继曾、顾问许权中、秘书长许尚志、参谋长王泰吉、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参谋主任高克林、经济委员会主任杨晓初、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全军共编为4个大队（赵亚生、武培谟、谢子长、雷天祥分任队长）和赤卫队（队长张汉泉）及骑兵分队

(队长由许权中兼任)。

工农革命军成立后,立即张贴布告,公布政纲,号召劳动人民起来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自己当家作主人,建立苏维埃政权。布告指出:“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以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要账手提桃桃子,打人不论亲弟兄。于今穷人要睁眼,大家团结来求生。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大家同心一齐干,铲除土豪和财东。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作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①从此,渭华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渭华塬上,许权中指挥第四大队,骑兵分队在崇凝镇一带同陕东赤卫队和农民协会相配合,在摧毁地方反动政权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村苏维埃政权。掀起了打土豪的高潮,烧毁地契文约,没收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的农民。渭华起义的军民,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形成了渭华塬上的红军政权割据局面。渭华塬上的广大农民第一次扬眉吐气,受苦农民高唱:“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农民苦,农民难,打的粮食叫地主都收完。共产党,领导咱,打土豪,除劣绅,为咱农民来伸冤。”

渭华起义沉重打击了敌人在陕西的反动统治。当起义刚爆发时,军阀们正为争夺地盘而混战,无暇顾及。5月中旬,陕西军阀混战暂告结束,李虎臣部被战败,冯玉祥部取胜。从6月上旬开始,冯玉祥部宋哲元率几个师的兵力向渭华地区猛扑,进行“围剿”,妄图扑灭革命烈火。革命军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英勇抗击,粉碎了敌人两次大的进攻。战斗结束后,工农革命军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的情况,讨论了革命

^① 原件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军向何处发展的战略问题。许权中和一些同志认为我军枪弹物资来源缺乏，敌强我弱，渭华地区是豫陕两省的咽喉，地处交通要道又距中心城市西安较近，是敌人必争之地，无回旋余地，革命军在该地区如继续坚持同敌人硬拚，对革命十分不利。他建议向山区转移，进行游击战。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把部队撤往陕北，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当即派刘继曾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派许尚志去渭北购买弹药和勘察地形，为部队向北转移作好准备。

6月19日，敌人又发动新的“围剿”。宋哲元派3个师的兵力分东、西、中三路向我军事政治中心高塘及塔山据点进攻，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民。由于敌人进攻的兵力过大，革命军转移陕北的道路被切断。军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不能再同敌人在渭华地区死拚硬打，准备将部队先撤进南山，以保存革命力量。

西路敌人的一个师，由地主薛良臣、史明鉴带路打前锋，从渭南出发，经崇凝镇闪击塔山前沿阵地。”许权中和雷天祥指挥陕东赤卫队的一个中队，与数十倍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歼敌甚众。但由于我军没有重型武器作掩护，致使指挥所前沿阵地被敌炸平，所有营房工事被摧毁。许权中率部转移阵地。根据军委的命令，工农革命军和农民武装向涧峪口、箭峪口一带撤退。许权中指挥西线革命军及赤卫队，在崇凝、箭峪口一带与敌激战一夜，给敌人以重人杀伤，但终因敌众我寡，不得不退向南山。第二天拂晓，西路敌军又向塔山附近的清明山、凤凰山进攻，中路和东路敌军又向退至箭峪口、牛峪口、涧峪口的工农革命军发动猛烈攻击。这天，西线的战斗十分激烈。当许权中指挥革命军及陕东赤卫队从箭峪口将要进山时，由大地主薛良臣带路的一团敌人妄图封锁箭峪口，切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在此关键时刻，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带领剩下的10余名赤卫队员，迅速占领箭峪口前面的侯家岩，

利用有利地形,英勇抗击敌人。中午,敌我双方又为争夺箭峪口西侧的铁家岭高地,展开了肉搏战。许权中和已多处负伤的薛自爽指挥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员共30多人,坚持战斗4小时,击退了敌人三四次猛烈的冲锋,掩护了西线工农革命军主力部队和陕东赤卫队的安全退却。薛自爽壮烈牺牲。晚上,许权中和杨晓初指挥所余部队由箭峪口进入牛峪,翻过山到黄沟峪顶露宿一夜,第二天撤退到蓝田县许家庙。东线部队在唐澍、刘志丹率领下于6月22日也相继撤退到洛南县的两岔河。部队只剩下三四百人。后又遭李虎臣五旅之众的进攻,部队伤亡很大,唐澍等壮烈牺牲。至此,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6月下旬,刘志丹、刘继曾与撤退到蓝田县的许权中取得联系,决定全军在张家坪集中。7月初,在张家坪由刘志丹、刘继曾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按照省委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第一,将红旗暂时收起来,不开展苏维埃运动;第二,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公开的离开部队,转移到各地进行地下工作,身份未公开的,仍留部队工作;第三,把部队交由许权中指挥,通过许权中的个人关系,开展统一战线,设法保存党领导下的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会后,许权中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通过中共蓝田特支负责人赵伯平吸收当地一部分农民武装扩大了部队。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许权中派人去龙驹寨(今陕西丹凤县)与陕军师长刘文伯(许权中的旧友)联系并取得同意,即率部迅速进驻商县黑龙口。两三天后,蓝田县民团团团长尹耕辛(中共党员)带领三四百人,枪加入了革命军。7月15日,工农革命军在黑龙口改编为刘文伯师的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旅所属仅1个团。部队在黑龙口加紧训练,准备重整旗鼓。这时,冯玉祥企图消灭陕军,刘文伯力不能敌,打算撤到湖北襄阳一带投靠岳西峰。许权中率领的九旅也准备退到党

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河南省确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于是，许权中率部经商县到龙驹寨与刘文伯部一起出荆紫关，经河南淅川、镇平向邓县进发。沿途消灭不少小股敌人。8月23日，刘文伯师进驻邓县时，该县地主豪绅假意表示欢迎。进城后，立即遭到地主豪绅控制的红枪会武装的包围和袭击。24日清晨，刘文伯师由城内整队出发，地主豪绅又假意护送，但等他们一离开，即陷入红枪会武装的包围。面对数万受蒙蔽的农民群众，枪开不得，武器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当日下午在鸡滩街全师被迫缴械，许权中率领的九旅也由此失散。渭华起义失败后，辛辛苦苦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力量就这样失掉了，许权中痛心疾首。

邓县失败后，党中央通知许权中由武汉去上海转赴苏联学习。1928年秋，许权中去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军大学学习。他努力钻研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和个人经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常与叶剑英、张仲实、方仲如等交流学习心得体会，讨论问题。他对同志诚恳、忠厚。当时，他还结识了苏联一些红军将领，布琼尼元帅曾赠送给许权中一支象牙手把的左轮手枪。

1930年夏，许权中学习结束，从苏联回到上海，党中央派他去北方局军委工作。到天津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许权中在狱中坚持对敌斗争，虽屡遭严刑拷打，但坚守党的机密，只回答：“我叫徐广斌，山东人，皮货商。”每次受刑下来鲜血直流，血肉模糊，当他回到牢房，难友们关切地问他：“要紧吧？”许权中总是神情泰然地回答：“不要紧，不疼！”^①许权中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傲骨高风。1931年冬天，有一次看守监狱的卫兵给许

① 冯润璋：《忆许权中》，1949年12月10日《群众日报》。

权中买来一包咸菜，包菜的破报纸上登有江西瑞金召开全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的消息，许权中看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并把这张报纸送给其他党员看。许权中在狱中为对付敌人的摧残，坚持锻炼身体，常对难友说：“不怕死而才不死。”1932年夏，经党组织的营救和友人刘文伯、米暂沉出钱保释，才获得自由。

许权中出狱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长城各口及察哈尔进犯。在这民族危亡时刻，蒋介石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号召，愿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切军队签订共同抗日协定。1933年春，党派吉鸿昌到察北组织抗日队伍。在党的推动和领导下，5月26日以吉鸿昌和抗日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为首，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前敌总指挥，宣布对日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许权中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张家口任同盟军军委常委兼副军长和十八师师长，他很快召集旧部，并在杨虎城将军的大力支持下，补充了大批人员和武器，十八师成为抗日同盟军的主力师。他曾向党组织讲：冯玉祥还是让蒋介石给教训过来了！许权中还和宣侠父、刘镇远、武止戈、吴化之、周益三、王琳等同志一起协助吉鸿昌拟定作战计划，分兵三路向北出击，在张北县和沽源等地与日军激战。吉鸿昌、许权中出兵神速，又猛又勇，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独石口等地，把旧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全国民气为之一振。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和日寇相勾结，张开了共同围攻同盟军的大网，同盟军将士大量伤亡。许权中所部位在前沿，他沉着的指挥进行反击，炮弹在他身旁不断地爆炸，警卫员李果几次拉他都拉不下去。由于众寡悬殊，十八师面临全部牺牲的危险，许权中临危不惧，率部突围，且战且退，辗转苦战，历

尽艰险，终于把部队带到河北省顺义县。后又遭国民党军队围攻，部队被打散。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许权中秘密地化装到了天津找到党组织，从事地下斗争。1934年秋，根据党的指示回到陕西韩城，化名杨鉴，以教小学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去天津，在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1936年春因病请假回到家乡临潼辛理村。在养病期间，他创办民生小学，聘请进步教师，为革命培养人才，并以学校为阵地，进行革命活动。许权中在家乡常参加劳动，推土车、种地、样样都能干，还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当农民议论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无法生活时，许权中因势利导地说：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这样的世道，不久就会被推翻的。1936年夏，许权中派党员黄子文去陕北向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请示，要求派他到杨虎城部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他的请求，同年经中共中央联络部长李克农介绍，汪锋、谈国帆把许权中的组织关系由河北转到陕西。

1936年西安事变前，爱国将领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派许建安给许权中送信，大意是：许权中弟！救亡图存，在此一举，速来西安，共商大计。许权中急速赶到西安，被杨虎城任命为警备二旅副旅长。12日清晨，按照张、杨二将军的部署，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活捉蒋介石；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所有军政大员，解除西安城内蒋系部队武装，扣留西郊飞机场停留的几十架新式轰炸机和监视北门火车站蒋系过路的部队。十七路军方面部署由警备二旅担任城内动作的任务。许权中指挥总部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包围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扣留了国民党军政大员陈调元、万耀煌、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诚等十余人。与此同时，警备二旅旅长孔从洲指挥所部，迅速解决了国民党宪兵第二团和保安

团的武装。但省会公安局包围了几个小时还未攻下。这时候，东北军已在临潼华清宫外将蒋介石捉到。杨虎城急欲恢复西安城内秩序，又命令许权中指挥他的卫士队去攻打公安局。在许权中的指挥下，不到半小时，即攻下这所公安局，从而解除了城内蒋系势力的全部武装。

西安事变后，应张、杨二将军的邀请，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率领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杨将军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任命许权中为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指挥阎揆要（党员）和韩子芳两个团。该旅成立后，周恩来派汪锋去作党的工作，还多次找许权中谈话，指示工作。许权中在西安事变开始时，也和西北军、东北军的多数将领一样，认为必须杀蒋，但是经过周恩来的开导和教育，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向党组织表示，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还向周围的人员积极宣传解释党的主张。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党一方面积极促进谈判成功，另一方面也作好抵抗南京何应钦派部队向陕西进攻的准备。许权中奉命率部做好战斗准备，布防渭南一带。为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邀请方仲如到旅部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还亲赴渭北云阳镇和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研究作战计划。许旅驻防蓝田时，许权中送给当地党组织二百多支枪，帮助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处决了一批当地的反动分子，派副官刘光智去商县给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送电台。他还亲自坐着许建安开的大卡车，深夜去龙驹寨给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送弹药，往返几百里，天明前又赶回驻地蓝田。西安事变期间，国民党特务多方造谣破坏，许权中在田一民的帮助下，处决了企图拉走民运会武装纠察队的特务分子。许权中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在西安广仁医院治疗期间，叶剑英亲自探望。1937年3月，许权中所部驻防耀县，根据

周恩来的指示，解除了当地危害革命的恶霸雷天一的反动武装，利用请雷吃饭的机会派王英、王建业将其处决，为民众除了一大害，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内外联系拔了一个钉子，缴获的武器分给了地方党组织，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在驻防耀县期间，许权中选派旅参谋长韩钟麟和许多进步青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派许建德给驻在旬邑县马栏镇的红军送收音机、钢盔、防毒面具等物资。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路过耀县时，许权中热情接待，请求指示工作。同年春，许权中所部改编为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民族危亡日益严重，许权中深为祖国前途担忧，请缨前方杀敌。他是西北军中第一个率部出征的抗日将领。8月下旬，许权中率部从三原誓师出发，东渡黄河，去华北参加抗战，9月在易县紫荆关进行游击战，掩护主力部队的安全撤退。还在唐县与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联合阻击日寇，获得许多胜利。10月初守备曲阳东西口、南青观一带，将西犯之敌击退。因晋北忻口战况紧急，10月12日奉令兼程驰援，19日晚赶到忻口，没有休息，即到第一线战壕，布置了1500公尺长的防线。许权中亲率两个团，协同友军，同日寇激战14昼夜，坚守阵地，使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是役歼敌1000多人，使日寇坂垣师团大为震惊。因许权中平时对部队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官兵作战非常英勇。每次作战，许权中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带头冲杀，身先士卒。10月26日，日寇的一颗炮弹在许权中身旁爆炸，他立即昏了过去。醒来后，拣了一块一尺多长的炮弹壳，题字于上：“落于吾右，而未使吾成仁，岂其有意留吾以救国耶？”

抗战将四月，失地犹未还，吾知勉之。”^①许权中率部 3000 余人参加抗战，官兵不怕牺牲，顽强作战，虽然伤亡过重，最后只剩下 30 余人，却没有一个逃跑。连国民党的一些将领，也盛赞许旅的英勇顽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就曾对记者说：“自许旅增加上来以后，形势已转危为安。”^②

1937 年秋末，许权中被调任一七七师参谋长，11 月曾任晋东南自卫军指挥官，一个月后仍任一七七师参谋长。12 月中旬，因公从山西前线回到西安，应第二中学校长江隆基的邀请，给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前线归来》的报告，讲述了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中央军溃败给华北人民带来的灾难，热情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总结了战斗的经验教训，强调要用革命思想武装军民。特别提出：“我们应该组织游击队”，“要向群众宣传，提高民族意识，动员起来，军民打成一片，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③1938 年，许权中所部驻防陕西合阳，他胃病复发，正在休息，但他应合阳中学的邀请，日夜编写游击战讲义，并抱病去学校作报告，他根据红军游击战和自己的战斗经验，通俗而又生动地讲述了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和常识，深受师生的欢迎。

1938 年 5 月初，日军大举进攻晋东南，一七七师师长和九十六军军长逃到西安。许权中挺身而出，率一七七师一部挺进山西永济县张营镇，与日军激战 4 昼夜，官兵前仆后继，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因敌众我寡撤至吴王渡，又遭强敌包围。许权中临危不惧，率部与日军血战二日，亲自指挥特务连坚守吴王渡南门，连续 9 次击退日军的进攻，保卫了军、师司令部。接着该军又收复晋南

^① ^{②③}许权中：《前线归来》，原载西安《二中校刊》第 10 期（1937 年 12 月 18 日出版）。

10余县,给日寇以重大杀伤,阻止了日寇的西进。一七七师之战斗力这样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许权中重视军民关系,老百姓积极支援战争。该师每到一地,许权中即协同政治部门组织青少年歌咏队,对群众进行抗战教育和军事训练,他还采用各种形式揭露日寇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向军民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九十六军在大王庄召开军事会议时,许多进步的军官都赞扬许权中临危从容镇静,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高尚品德。许权中有功不居,谦虚地说:“这次吴王激战,保卫了革命,保卫了吴王,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应归功于各位官兵的奋勇杀敌的爱国精神,我本人也很感激。”^①

许权中在山西抗战有功,却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他们不以功论赏,反而拿功臣来问罪,撤去许权中一七七师参谋长职务,被任命为毫无实权的该师少将参议。长期的戎马生涯严重地损害了许权中的健康,1938年冬,许权中胃溃疡病发作,被迫离开前线回到家乡养病。

1939年至1943年秋,许权中奉党的指示,以养病为名,利用一七七师参议兼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议的合法身份,进行地下斗争。他积极鼓励和支持张性初及同情革命的刘文伯先生主办《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促进了西北地区的民主运动。1941年春,打入国民党胡宗南战干团内部的共产党员王智德向许权中汇报工作,反映敌人活动猖狂,地下党在战干团工作危险的情况,请求解决办法。许权中指示说:“怕什么!共产党员头上又没有刻字!”“我来掩护你,给你的上司写信。”1942年,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许权中派人护送王智德去延安工作。许权中通过各种关系,介

^① 赵国珍:《忆许权中烈士革命事迹》,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绍和护送王俗明、韩毅、张光、任明等去陕北参加革命。在临潼，许权中还积极支持地下党员谈国帆、王志温等坚持地下武装，处决了反动镇长。当时临潼交口地区革命形势比较好，工作发展的很活跃，经常主动出击敌人。有一度敌人根本不敢到这里来，交口地区当时被人们称为关中的“小边区”。这一切也是与许权中的努力分不开的。

国民党顽固派对许权中的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迫害，要尽反革命两面手法。他们一方面派匪特暗中监视，利用地主恶霸进行武力威胁；另一方面，胡宗南出马“请”许权中谈话，劝说只要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高官厚禄。许权中断然回绝了这种无耻的诱降，愤怒地说：“你们今天要求我骂共产党，那么我明天也要骂国民党，如今你们要怎样处理就怎样来处理好了。这是人格问题，至死不能做这样违心的勾当。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1943年，许权中的家乡交口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住地西安灞桥读书村又遭特务的日夜监视，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同志们考虑到他的安全，劝他及早离开。他泰然自若地说：“一个革命的志士应具有牺牲的精神。革命不能畏死，怕死就不能革命。”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许权中和几个同志商量，决定先去河南洛阳九十六军军部，而后通过关系，经四川去延安。他到洛阳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任命为中将参议兼该集团军眉县万家岭垦区主任，去四川的计划未能实现。许权中将计就计，毅然回到陕西眉县，利用公开职务，以搞生产为名，组织了两个连的革命武装，准备在千阳、眉县一带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12月上旬，许权中带领任耕三（三十八军垦区主任）赴千阳一带察看地形并召集干部部署工作，9日路经凤翔和李子萼先生（许权中的老师）会面交谈后即返垦区，骑马行至眉县槐芽洪水沟时，被胡宗南、徐经济（伪陕西省

保安处长)、崔镇山(伪保安队大队长)指使的特务所暗杀,时年49岁。同时遇难的有任耕三和刘兴坤(中共党员,许权中的警卫员)。许权中遇难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席极为悲痛,曾询问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早把许权中同志接回延安?

全国解放后,为了悼念许权中同志,1949年12月9日,中共西安市委、陕西省军区分别在临潼和西安举行许权中烈士遇难六周年追悼大会,西北军区送的挽联上写着“革命先驱,人民功臣!”^①西安各界人士送的悼诗是:“一生为党为国家,誉满天下众人夸。武装起义闹革命,鲜血灌成胜利花。”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许权中的深切怀念。

(张守宪 董建中 李艳玉)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 1.《北京晨报》(1926年)。
- 2.许权中:《前线归来》,原载西安二中校刊第10期(1937年12月18日出版)。
- 3.许权中1942年8月为母亲逝世时写的《行状》,原件存许权中亲属家中。
- 4.许权中给周益三的信(1943年),原件存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 5.《中央公函陕字第九号》(1928年1月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6.《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1928年初出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7.《陕西省委通讯》1927年第1期,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 8.冯润璋:《忆许权中》,1949年12月10日《群众日报》。
- 9.赵国珍:《忆许权中烈士革命事迹》,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① 张光:《西安临潼各界追悼许权中》,1949年12月25日《群众日报》。

10. 杨晓初:《渭华起义片断》,原载《星火燎原》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1.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7月。

12. 张光:《西安临潼各界追悼许权中》,1949年12月25日《群众日报》。

13.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民政厅1959年编写的《许权中同志史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6. 张雅君、许建安、许建芳、许共和、许黎英、许建民、张建成、徐定伯、徐岳、潘自力、刘继曾、方仲如、高克林、张仲实、阎揆要、汪锋、赵伯平、孔从洲、徐彬如、屈武、王炳南、吴化之、李果、谈国帆、米暂沉、庞志杰、尤祥斋、王超北、周益三、赵鹏九、马文彦、王立安、李慕愚、李建彤、刘威诚、田一民、王智德、孟浩、王英、张光、王芾南、陈天秩、彭淑贞、侯镜如、李锦峰等同志的回忆材料或访问记录。

唐 澍

(1903—1928)

唐澍，字东园，河北易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参加两次东征。1927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六旅参谋长，为秘密的中共党团书记，从事兵运工作。参与领导第六旅举行清涧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

队，任总指挥。1928年2月到陕军新编第三旅任参谋长。同年4月与刘志丹等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前敌总指挥。7月于陕南洛南山区战斗中牺牲。

唐澍，1903年生于河北省易县南贾庄（现属徐水县瀑河乡）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唐衡三上过私塾，当过学徒，后在一家商店当记账先生。因家中人口多，收入少，又将房子卖掉，全家住在本族的唐家祠庙中。唐澍兄弟3人，哥哥唐浩、弟弟唐治（思源），唐澍排行第二。还有一个姐姐，十几岁时病死。母亲是农村妇女，早年去世。

唐澍少年时代跟父亲读私塾，后到东邵村读高小，他学习刻苦，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学到深夜，考试成绩名列前茅。高小毕业后，学校留他任小学教师。不久又回乡担任朝阳初级小学教师。这所学校有四五十名学生，分四个年级，所有的课程全部由他一人

担任。他教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国文课中,常选些古代爱国者或有正义感的侠客的故事教育学生。如讲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在易水河畔燕太子丹为荆轲饯行的情景,他绘声绘色地朗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诗句,讲得生动形象,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

1922年夏,唐澍考进了设立在保定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通称保定二师)。该校离北京很近,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较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党组织,曾派人到该校进行过革命活动,师生思想比较活跃,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也较多。唐澍勤奋学习,阅读各种书报杂志,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他艰苦朴素,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热心为集体办事,受到师生的赞扬。他结识了进步老师张湛明等,在他们的引导下,阅读了李大钊主编的《史学概论》、《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共产主义A·B·C》等。他开始懂得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道理,懂得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于是,他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在反对该校反动校长刘绪增迫害学生的罢课斗争中,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到天津向直隶督军王丞斌请愿,揭露刘绪增的种种丑事。王丞斌慑于广大学生的义愤和社会舆论,被迫撤了刘绪增的校长职务。斗争胜利了,但校方担心再发生学潮,便将唐澍等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开除出校。

保定二师的进步师生,对唐澍深表同情,大家集体资助了二三十元钱,东邵学校校长吴伯卿先生也给予资助。1924年初,唐澍经保定二师张湛明老师的介绍,绕道陕西前往上海,准备入上海大学学习。他到上海后,得悉广州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又决定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1924年初夏,唐澍考入黄埔军校,为该校第一期步兵科学员。

在校期间,他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了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3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留校工作。同时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届,负责人为阮啸仙)的军事教官,指导学员进行军事训练。

1925年2月和10月,唐澍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一起,两次参加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的战斗。他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东江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他和几个战士冲入敌人阵地,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人们误以为他已经牺牲,后来他带着杀敌的喜悦凯旋归队,受到周恩来和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

1925年秋末,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调唐澍从事工人运动,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后又兼任模范大队大队长。在苏兆征、邓中夏等的领导下,他和徐成章将工人纠察队按军队编制组成:总队、大队、支队、小队、班等五级领导序列,共2000余人的武装力量,由徐成章(纠察队常务委员兼总教练)、唐澍负责总队的训练教育任务。唐澍、徐成章仿效黄埔军校的训练方法,在纠察队中既进行军事操练,讲授军事常识和基本战术要领,又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学形式灵活多样,经常组织队员参加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据1925年12月13日的《工人之路特号》报导:“纠察委员会各队自改编后,对于训练上特别注意,委员会为谋各队员精神奋发起见,特发起纠察队全体(徒步)旅行,并致祭黄花岗烈士之举”。在致祭活动的会上,纠察队总教练徐成章、唐澍等相继讲话。指出,七十二烈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牺牲,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总理坚持革命,“改组国民党,联合我们工农阶级,认定革命事业向前奋斗,

誓达到民族解放而后已”^①。他们勉励全体纠察队员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作坚决斗争,以取得省港大罢工之胜利。1926年2月7日,广州各界10万余人举行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3周年,唐澍担任大会指挥。他和纠察队其他负责人员一起,率领工人纠察队参加了大会,聆听了林伯渠、邓中夏、何香凝、挥代英等人的讲话。使纠察队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会后游行,“由总领队徐成章及唐澍指挥各团,次第鱼贯出门,先学界次工界,又次为军政界,各团体均派人沿途散发传单,并高呼口号”^②。他还经常组织或参加工人纠察队的集体活动,如参加纠察队青年工人大会发表演说;组织模范大队、特别大队和宣传队举行元旦联欢大会,利用这些机会加强对工人的教育。

唐澍重视教育纠察队员坚守工作岗位,严格履行《纠察队组织法》的规定^③。从1925年秋天起,纠察队的水陆侦察队,在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的协助下,截获大批粮食和仇货。据报导:“铁甲车队出驻深圳各地,帮助纠察(队)截留粮食,数日来著卓成效。”^④在纠察队封锁港、澳的过程中,多次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武装发生战斗,每遇紧急情况发生,唐澍总是亲临前线处理,并及时向罢工委员会报告。省港罢工委员会在1925年11月5日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纠察队总教练唐澍电称”:深圳纠察队及“铁甲车队六十余人,被匪四百人包围猛击”。

① 《工人之路特号》第170期。

② 《工人之路特号》第226期,1926年2月8日。

③ 《纠察队组织法》规定了纠察队的任务是:“甲,维持秩序;乙,截留粮食;丙,严拿走狗;丁,拘捕工贼;戊,查缉仇货;己,封锁香港澳门沙面交通。”见《工人之路特号》第147期,1925年11月20日。

④ 《工人之路特号》第135期,1925年11月8日。

“队员十余名殉难，被虏去二十余名”，纠察队“第十支队队长蔡林蒸身中三枪，现已殒命”，敌众我寡，我军不支，“恳请急速示以进退方略，否则火速派队来此”^①。在这枪林弹雨的战斗中，唐澍表现了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没有命令绝不撤退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唐澍不仅是一位在战场上驰骋杀敌，赫赫威武的青年指挥员，同时在政治理论上也有相当造诣，能写文章，尤善于宣传鼓动，是青年军官中能文能武的佼佼者。

1926年5月，唐澍根据复杂的斗争形势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的真实基础——工农商学大联合》一文^②，文章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目前呻吟在双重压迫之下，而要求解放的中国人，不只工人农民，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一般穷苦的读书人”，“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只是为一个阶级谋利益，而是为工农商学等共同的幸福。同时这个国民革命，不是那一个阶级单独可以成功的，却是需要一个革命民众——工农商学——的团结。”^③并且明确指出：“广东是中国革命的根基，广州国民政府是革命的柱梁，欲求国民革命成功，须使整个柱梁稳固。而这个柱梁稳固与否，要看他是否放在磐石上面；什么是国民政府的磐石？这就是统一的民众势力。”^④他主张我们党在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要重视对工农群众的领导，以壮大可靠的革命力量，从而巩固与扩大革命的统一战线。

① 《工人之路特号》第136期，1925年11月9日。

② 《工人之路特号》第333期，1926年5月28日。

③ 《工人之路特号》第333期，1926年5月28日。

④ 《工人之路特号》第333期，1926年5月28日。

唐澍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警惕着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破坏革命的罪恶阴谋。他说：现在“国民政府的基础”，“终不算十分稳固，里面存在着很多危险性”，“反革命派受了帝国主义者指使”，制造谣言，挑拨离间，使革命内部“互相猜忌”，“自己分裂”，因此需要“工农商学联合起来”，回击反革命企图破坏革命的罪恶行径。他实际上已暗示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是分裂活动和阴谋夺权的勾当。

唐澍充分利用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和模范大队大队长职务的有利条件，把阶级斗争的观点灌输到工人中去，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这批两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员，在1926年，除少数留下外，一部分随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大部分作为运输队员于同年7月随北伐军一起出征。

唐澍为了教育自己的哥哥（唐浩）和弟弟（唐治）参加革命，多次去信和寄进步书刊，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要弟弟唐治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他那穷乡僻壤、消息闭塞的家乡，唐浩兄弟经常看到唐澍寄来的《向导》、《新青年》、《资本论入门》和《人类进化史》等进步书刊，眼界为之一新。

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两湖地区。此时，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集旧部组成了国民联军，在绥远省的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并要求我党派军政人员到该部工作。唐澍同志当时刚结婚，当组织通知他去冯部工作不能带眷属时，唐澍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在北上途中，顺便回到家乡看望了重病卧床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并动员哥哥唐浩一起到张家口参加了革命。

唐澍到张家口以后，在冯部军官学校任教官兼队长，不久调到政治部工作。1926年冬，军官学校随国民联军经绥远、宁夏、甘肃到达陕西西安。1927年3月，国民联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联军军

事政治学校(5月初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续培模(即续范亭)任校长,王文彬为副校长,唐澍任政治部主任兼教官。他以讲授军事课为主,同时也兼任政治课,讲授《资本论浅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他讲课条理清晰,富有感情,深受学员欢迎。学生幽默地称他为“托拉斯”、“辛迪加”、“唐贯贯”老师。“唐贯贯”的由来,是因为他讲课引用了孔子的话“吾道一以贯之”,说明革命的道理要贯彻始终,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能动摇对革命胜利的信念。为了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扩大革命宣传工作,学校成立了红色剧团,唐澍是剧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亲自带领剧团在西安有名的剧社——易俗社进行宣传演出,演出的节目,大部是自编的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节目,收到良好效果。

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西安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浪潮。5月5日,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唐澍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特别支部负责人的身分,主持召开了全校国民党员大会。他首先报告了开会的意义,指出:“蒋介石背叛革命阻挡不了向前发展的革命潮流。”号召革命的同志“要不屈不挠地奋起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①大会发表的宣言和通电,表示坚决拥护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蒋介石党籍”和下令通缉归案等决定^②。不久,冯玉祥率部出潼关进军河南参加北伐,唐澍随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移至洛阳、开封等地。

6月中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所部及豫陕等省进行“清党”,唐澍被“礼送”出境。7月中旬,他由河南开封几经辗转到了

① 黎民党同志的回忆(1983年7月18日)。

② 1927年5月6日陕西《国民日报》。

西安,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7月下旬,受省委派遣和省军委书记魏野畴、军委成员白乐亭一起前往陕北巡视工作。了解大革命失败前后各地党组织的状况,向党团干部讲解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要求党团组织迅速改变活动方法,转入地下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经延安时,与当地党团组织负责人一起开会,研究了时局的变化和新的斗争策略。然后到清涧的石谦旅,召集了该旅党组织会议,部署了斗争的任务和策略。根据省委决定,将唐澍留在石谦旅工作。不久被任命为旅党团委员会书记,除负责制定、实施石谦旅的军事行动计划外,还受省委委托,负责领导整个陕北的兵运工作,准备武装反抗军阀井岳秀。唐澍在石谦旅李象九(中共党员)营,先后以李象九的朋友、营部军事教官公开身份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他熟悉操典,运用自如,指挥有术,训练得法,深得官兵钦佩,而且善于讲话,富有鼓动性,遇事沉着,处理问题有魄力,被誉为“组织和军事才能俱佳”^①的好指挥员。

8月下旬,同情革命的石谦旅长在榆林被井岳秀派刺客杀害,井又任命反动营长康子祥为代旅长。此时部队人心浮动,石谦的旧部下对井岳秀的谋杀行为表示愤慨,要为石旅长报仇。接着,井部师长高双成令李象九营开赴延安,准备将其改编;同时,令谢子长连从安定(今子长县)开往宜川“换防”。阴谋消灭这两支所谓“赤化”了的部队。在此紧要时刻,省委指示:敌人妄图借整编、换防之名,吃掉我李、谢部队。我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②。在起义的具体步骤上,省委要求在起义之后,先将

^① 呼延震西:《清涧起义漫忆》,载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第30页。

^② 雷恩钧:《回忆清涧起义》,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全旅部队集中到宜川,使之形成一股力量,与井岳秀对抗。如在宜川不能立足,可南下渭北,相机与我党掌握的许权中旅会合。

按照省委“立即举行起义”的指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讨论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时,李象九等主张借运送石旅长灵柩回白水路经延安的机会,先派遣领款人员和护灵人员暗藏器械,埋伏城内,然后大军轻装袭取延安,主动进攻,克敌制胜。届时可以延安为依据,联络陕北高志清旅,联合攻打榆林。唐澍主张坚决执行省委指示,把分散在清涧、延川、延长、宜川等地的部队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与井岳秀对抗。唐澍的这一主张为石旅党团员所接受。为了争取起义的准备时间,部队故意拖延对石谦旅长的发丧时间,待起义准备工作就绪后,利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和借去宜川“换防”的名义举行起义。起义前,唐澍、李象九主持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和排以上干部会议,向党员和干部传达了省委对起义的指示和部队党组织关于清涧起义的各项规定,要求党员和各级领导作好准备工作,确保起义的胜利。起义行动的步骤是:驻清涧的4个连首先起义,然后会合延川县的另一连南下宜川,与宜川的3个连会师。同时,派代表联络驻神木县的高志清旅,与高约定在神木起义,共同夺取绥德、米脂,夹攻榆林,消灭井岳秀的反动武装。当即派党员吴锡昌先行出发,通知在宜川的3个连,要他们作好内应。起义前,还派出警戒部队,割断电话线,不准城内人员外出,查封了大商号的银柜,打开大商号的烟土(鸦片)库,没收了全部烟土。又将伪县长和大绅士召集到起义指挥部,由李象九对他们讲话,说明借用他们的钱物,对人不加伤害。

10月12日,预定起义的时间到了,唐澍等领导人先给陕北各地党组织派来参加起义的人员分发弹药,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

傍晚,召集全体官兵集合,唐澍、李象九相继讲话,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介绍了南昌起义的情况,号召全体官兵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石谦旅长报仇。广大官兵义愤填膺,严阵以待,听候起义号令。接着,唐澍宣布部队起义和南下命令,要求全体官兵为民除害,勇敢作战,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规定参加起义者每人臂上缠一红布袖条为标记,还把准备好的标语四处张贴。

10月13日黎明,起义指挥部和4个连以及200驮辐重,浩浩荡荡开出清涧城,开跋南下。当天下午到达延川县城,会合了共产党员王有才领导的一个起义连队。夜晚,乘胜向延长前进,中途截获了高双成部正在驮运的烟土40驮。部队到达延长,出敌不意一举歼灭了敌军两个连和一个营部,处决了反动营长祁梅卿。此时,驻宜川的敌代理旅长康子祥先发制人,向该县城准备起义的3个连发起围攻。这3个连的官兵在党的领导下,勇敢还击,激战一昼夜,10月15日唐澍、李象九率起义部队赶到宜川城下,康子祥率部仓皇逃跑,3支起义部队遂在宜川城胜利会师。附近许多农民赶来慰问起义部队,纷纷要求参军。至此,起义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长短枪千余支,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革命武装力量。

宜川会师后,起义的领导人在部队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分歧意见:唐澍等主张立即打起革命红旗,整顿干部队伍,清洗不可靠的旧军官,由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然后率部主动进攻,相机消灭高双成部,扩大革命力量。李象九等则认为打红旗的条件尚不成熟,暂时延用旧番号比较妥当,对非党员的旧军官不能清洗,应逐步改造,以免引起大的波动。在部队整编时,李象九任旅长,任命原旅部参谋孟激斋为参谋长,唐澍为参谋,将所属部队改编为3个营,任命谢子长、李瑞成、韩子丰为营长,基层干部变动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滞留宜川,由唐澍带着为党组织筹备的1500块银元的经费,秘密到西安,向省委请示汇报。

10月下旬,唐澍到西安,向省委军委书记李子洲汇报了起义情况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意见。李子洲听取了唐澍的汇报后,对起义部队中党的工作及军事行动方向等均作了具体指示。根据唐澍的汇报和李子洲的指示,省委军委作出《陕北军事行动与决议案》,决议具体分析了陕北的政治形势、井岳秀所辖部队的军事实力和他们之间的矛盾。要求起义部队联合与井岳秀矛盾最深的高志清部,从军事上打垮井岳秀,建立党在陕北的军事基础。为了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决议指出:“旅中一切皆须受党的指挥,由党团及支部分别决定,一切同志皆须改正个人意志、个人处决的恶劣倾向。”在人事安排上,指定唐澍在行政上担任旅参谋长,其他重要干部的任免,由党团讨论决定。同时还要求起义部队与渭北的许权中(中共党员)旅取得联系,协商军事行动,互相策应。若许旅不能在关中立足时,可退往陕北,与李旅合编为陕西革命军。省委还要求唐澍去三原,与阎揆要、白志强等军事干部一起到宜川整顿起义部队,举办军事教导队培养军政干部,加强部队实力。

唐澍、阎揆要、白志强一行在去宜川的途中获悉起义部队由于遭到高双成部的攻击,损失严重,已被迫转移到韩城西庄镇。他们日夜兼程赶到部队。此时,部队已被韩城驻军王保民改编为独立旅,李象九任旅长。唐澍、阎揆要等在党内传达了省委指示,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在部队成立了教导队(阎揆要任队长),培养基层干部;并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每日黎明即起,操练士兵。”^①

^① 李象九1959年写的回忆清涧起义的材料,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同年12月中旬,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改组了军委(唐澍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白志强等任委员),决定在韩城发动起义。遂以谢子长营的100多人为基础,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总指挥、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军委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还决定把新编的游击支队带到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元月初,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率部离开韩城北上,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途中由于轻信了“宜川城内只有敌军一个连”的传闻,贸然攻打宜川(宜川守敌有一营多人,且占据有利地形),我军攻击半日不克,伤亡严重,只好撤出战斗向西北退去。行至延川与延长交界的交口时,又遭到敌人袭击。经奋战击退敌人后,部队进至瓦窑堡附近,准备去洛河川的深山休整,不料驻瓦窑堡之敌崇保清骑兵团跟踪追来,部队未能进山休整,又向西北方向行进,经安塞、保安,到达陕甘交界的豹子川(属甘肃合水县)。这时,起义部队仅剩数十人,且处于粮尽弹绝、强敌追赶的险恶环境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唐澍、谢子长等同志决定部队暂时分散隐蔽起来,待机再起。清涧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清涧起义是我党领导西北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是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前奏。它削弱了陕北军阀的力量,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得到了锻炼,为以后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

1928年2月,唐澍历尽了艰难,辗转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清涧起义失败的经过和教训,请求省委分配新的任务。在西安期间,他住在省委秘密机关涝巷顺义店,头上缚白羊肚子毛巾,穿着没有挂面子的老羊皮袄,完全是陕北青年农民的打扮。不久,省委决定

派唐澍去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任参谋长，党内参加旅党委的领导工作，并派党员周益三（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与唐澍同往。他们步行3天，经渭南、华县（高塘），翻过秦岭，又经保安镇，最后到达许旅旅部所在地——三要司，见到了旅长许权中、旅党委书记高克林和早先到这里的刘志丹、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等旅党委成员。2月中旬，许旅在三要司和寺坡之间的一片坡地上，召开了军人大会，许权中在会上讲了话，并宣布唐澍任旅参谋长职务。唐澍在讲话中，要求全旅官兵严守纪律，服从命令，刻苦进行军事训练。并表示自己一定要忠于职守，严格要求，与大家齐心共进。

当时许旅属陕军李虎臣部新编第三旅，有官兵1290人，枪1020支，机关枪3挺，迫击炮4门，装备较好。部队中党的力量很大，在全旅起主导作用，再加许权中等军事指挥员久经战火，经验丰富，部队训练有素，是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部队。唐澍到职后，协同许权中、高克林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政训练，就地建立起了一个修械所，制造炮弹、手榴弹，修理枪炮，准备起义。许旅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军队内部整顿了干部队伍，清洗反动分子，提拔优秀党团员担任基层领导，强调官兵一致，提高指战员的自觉革命精神。唐澍还经常强调要搞好军民关系，执行群众纪律。同时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粮食，不断扩大革命影响。有一次，许权中和唐澍深入群众与老农谈心，征求他们对部队的意见。一位农民指着麦田里的一条小路告诉他们说：麦子已经返青了，请给战士们讲一下不要再从地里走了。这句话引起了唐澍的高度重视。第二天，命令几个战士把麦田小路上的石子、瓦片都拣出来，把小路两端用刺稍堵住。从此，战士们再不走麦田的小路了。部队这一爱民行动，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1928年3月，省委书记潘自力由上海带回党中央给许权中及

许旅党委的指示信。提出许旅的出路有3条：“第一，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发展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鄂北，预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哪条路，要看动作时的实际环境来决定——由陕西省委决定。”^①3月底，省委成立了以刘继曾为书记的陕东特派委员会，负责领导渭（南）、华（县）地区的农民起义。

1928年4月底，盘踞在洛南的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出陕赴豫同奉系军阀混战之际，发动反冯战争，令许旅开赴潼关，阻挡冯部的宋哲元部回陕。旅党委讨论这一问题时，唐澍等认为省委指示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主张脱离李虎臣，直接将部队拉到渭华地区参加农民暴动。许权中同志则认为军阀混战的时机对我们有利，如果与李虎臣一起打下潼关，不但可以扩大部队，增强实力，也可以创造条件，扩大暴动区域，于革命有利。在起义地址的选择上，许权中认为渭华地区地处渭河、秦岭之间，地区狭小，不利于我军的活动。主张向渭北一带发展。最后决定由教导营副营长雷天祥（共产党员）带近百人先去渭华参加农民暴动，大部队集中灵口，出蒿叉峪，开至潼关前线。不料冯玉祥部此时在豫西战事缓和，抽调重兵增援潼关，因而许旅久攻不克，部队伤亡很重。唐澍、刘志丹、高克林等在战地研究，认为决不能在潼关死拚硬打，为军阀火中取栗。果断地带部队撤离了战场。部队急行军一夜，从潼关沿山一带到达华县瓜坡镇，唐澍、刘志丹、高克林等负责人经过研究和准备，在这里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布许旅武装起义，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席、唐澍任总

^①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司令、王泰吉任参谋长、高克林任参谋主任、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任顾问、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全军指战员群情激昂，摘掉国民党军队的帽徽，踩在脚下，拿起红旗，激动地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工农革命军下设4个大队，一个警卫队（又称赤卫队），一个骑兵分队。经过整顿，全军上下斗志昂扬，直奔渭华参加暴动。

5月中旬，中共陕西特委和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在高塘镇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欢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唐澍、刘志丹、刘继曾等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唐澍操着河北口音讲了话。他说：镰刀、斧头是我们的武器，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就一定能把革命搞成功。随后，赤卫队员处决了几个土豪劣绅和制造谣言、阻拦群众参加联欢大会的坏蛋。会后群众情绪高昂，举行了游行示威。夜晚又要龙灯，踩高跷，一直欢腾至深夜。

渭华起义后，工农革命军张贴布告^①，公布政纲，号召人民群众打倒土豪劣绅，摧毁地方反动政权。在渭南崇凝镇和华县高塘镇一带，建立了数十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建立和扩大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使南起秦岭，北至渭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形成了红色

① 由刘志丹、唐澍、刘继增署名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内容如下：

土豪劣绅和财东	剥削穷人真个凶
加一放账驴打滚	卖儿卖女还不清
要账手提桃梳子	打人不分老和幼
如今穷人要翻身	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	他是咱的子弟兵
大家同心一齐干	铲除土豪和财东
贪官污吏都打倒	我们要作主人翁
建立苏维埃政权	才能过上好光景

政权割据局面。

渭华起义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西的反动统治。6月上旬，敌宋哲元率重兵向渭华地区发动“围剿”。起义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连续击退了敌军两次进攻。革命军领导机关在总结战斗经验时，许权中提出渭华地区是豫陕两省的交通要道，距离中心城市西安较近，是敌人必争之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不能在此久留与敌人硬拼，应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又有回旋余地的渭北山区建立根据地。这个意见为唐澍、刘志丹等所接受，立即派人到渭北侦察地形，筹集弹药，为部队向北转移作好准备。后因北上道路强敌密布，各渡口、要隘均被敌军占据，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6月19日，宋哲元亲率两个师的兵力，在各地反动团队的配合下，分三路向起义军民发动新的“围剿”。唐澍亲临魏家塬前沿阵地指挥革命军一个中队和一部分赤卫队员，英勇地与十倍于我的敌人展开血战，打退了敌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的多次冲锋。敌人从正面进攻受挫后，把一个营的兵力换上便衣，悄悄地从魏家塬两侧向革命军背后迂回。富有作战经验的唐澍立即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命令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动员附近的农民群众参战。薛自爽飞奔到三教堂村敲响报警，立即有五六百农民扛着土枪，锄头赶来，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把这股企图迂回到我军阵地背后的敌人压了回去。

经过半天苦战，我军虽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但我军伤亡也很大。为了保存实力，唐澍指挥革命军和赤卫队撤退到涧峪、牛峪、箭峪一线。司令部和总部人员大部分退到牛峪。夜晚，唐澍又组织几个中队，趁敌人立足未稳，在夜深人静之时，奇袭了敌人设在高塘的司令部和魏家塬的阵地，杀伤了敌人的

有生力量后，仍退回牛峪。第二天拂晓，敌人从沿山阵地全面向我军发起进攻。唐澍令周益三带一个中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向洛南县两岔河撤退。进山三四十里到一个叫泽涛的村子，唐澍整顿了部队，并派人和由西路入山的许权中等负责人联络。6月25日，革命军陆续撤到两岔河。司令部设在洛原，即派赵雅生带领第一大队进驻离两岔河三四十里的保安镇。此时，两岔河群众不明真相逃躲一空，唐澍积极动员群众回家照常生产，同时调查洛原周围的地形、道路和敌情。在端午节前后，唐澍还同王泰吉、王尚德等一起，慰问了革命军的伤病员，参加了军民联欢大会。

7月1日，驻洛南的李虎臣部七八百人，在当地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向驻守在保安镇的革命军一大队百余人发动进攻。唐澍亲率革命军近百人前去增援，黎明，唐澍率领的部队赶到保安，在镇外环山一带被敌人包围。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我军虽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终因敌众我寡，子弹殆尽，被敌军冲散，少数人突破重围，其余大部牺牲，有的被俘。唐澍仅带6名战士夺路冲到附近的碾子沟，不料又被当地地主武装陈彦策的民团挡住去路，后面又有敌军跟踪追击，情况万分危急。唐澍临危不惧，率警卫员与敌人展开英勇战斗，在激战中唐澍腹部多次中弹，仍然坚持战斗。最后在一个小水池旁边壮烈牺牲，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25岁。

(董建中 张守宪 王少民)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唐澍：《国民革命的真实基础——工农商学大联合》，载《工人之路特

号》第333期。

2.《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同学录》。

3.《工人之路特号》第136—333期。

4.《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关于陕北军事行动与决议案》(1927年11月),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5.阎红彦等:《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6.《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7.雷恩钧:《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8.呼延震西:《清涧起义漫忆》,载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主办的《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

9.《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10.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7月)。

1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杨晓初:《渭华起义片断》,原载《星火燎原》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3.潘自力、刘继增、李象九、冯文江等写的回忆材料。

14.访问唐思源、唐沛然、唐玺玉、唐润、唐瑞桐、阎揆要、高克林、马云泽、黎民觉、周益三、方仲如、刘贯一、王曙、李果、胡震、呼延震西、马文彦、曹志麟、张归仁、王云、王蒂南、李瑞阳、许天杰、赵和民、李波涛、易厚庵、李豫章、梁俊祺、郑殿华、贺智章等的记录。

赵伯平

(1902—1993)

赵伯平，原名呈瑞，字麟徽。1902年7月1日出生于陕西蓝田县康禾村。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1933年秋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后获释。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第二书记，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陕西省

委第二书记、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5月7日在北京病逝。

赵伯平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陕西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为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赵伯平自幼聪颖，敏而好学。7岁入私塾，后经初高级小学而中学，十年寒窗，苦读不辍。尤以诗文兼优，深得塾师器重。1916

年5月,当他得知驻防渭北的陕军把袁世凯的爪牙陆建章赶出潼关后,立即写了“鱼鳖推‘鼃’登皇位,熊罴逐‘鹿’出关中”的诗句,嬉笑怒骂,入木三分。1918年他在灞桥新寺堡国学鸿儒程松亭先生的私塾攻读“泰西诸子”,写了一篇赞颂泰西文人抵制和反对封建制度的论文“万古冥冥,长夜漫漫,忽焉霹雳一声,灵光四射,此事也何事也?马丁·路德改良宗教之事也。”程先生认为这篇论文不仅文字流利生动,见解亦有独到之处。先生惊其才华,连声赞叹“呈瑞年纪小,文章出息何太早!”后来伯平又以刘邦、项羽争夺封建统治的史实写了一篇《楚汉论》的文章,抑项褒刘。程先生认为“不公”,遂讲了一篇唐朝著名诗人罗隐的《英雄之言》,说明“取国家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刘邦、项羽在看到秦始皇豪华生活和壮丽宫廷之后,都情不自禁的发出羡慕之情。西刘曰“居宜如是!”楚籍曰“可取而代之!”这些“英雄”们实质上都是在“救彼涂炭”的招牌下涂炭人民。罗隐的文章对伯平触动很深,教育很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程先生反封建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反封建的自觉性。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开始在各地传播。赵伯平在进步老师的指导下,读了许多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爱国诗文,深深地激发了他心忧天下的情感。一次,他听了老师讲授春秋时卫国人宁戚“短布单衣适至骻,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的《饭牛歌》,对劳苦人民饥寒交迫,不甘黑暗统治,追求光明的愿望,深表同情,立即写下了“我愿跟老师反封建”的誓言。

1920年赵伯平在陕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更多地接受了民主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教育,多次参加了西安市各学校联合举行的爱国反帝活动,和同学们一起高举着“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铲除!”的大旗,唤醒民众,“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

亚洲田。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这种爱国反帝的坚定信念，为他后来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参加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4年秋，中学毕业的赵伯平，在内忧外患的国难形势下，本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实现他“跨马持枪雪国耻，不枉男儿生世来”的夙愿。但因“耕读传家”的旧观念束缚，家庭不同意，遂在蓝田县巩村高级小学教书，担任国文教员。他不仅给学生讲授富有爱国情操的古典诗文，而且把《独秀文存》和《新青年》杂志作为教材，同进步师生一起，探求依靠工农民众拯救国家的真理。1926年初，经友人介绍，他与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会面，切磋有关社会问题。并学习研究了《共产主义ABC》和《社会进化史》等书籍，开始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理解。是年秋，他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员侯德普等人到巩村小学同他商讨在蓝田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10月，又同侯德普等一起，组织数十名青年，发动农民捣毁了军阀刘镇华设在长安狄寨的军粮台，并把抄收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吹响了长安农民运动的号角。年底，他们又利用鸡毛传帖，动员进步青年，在蓝田孟村女校聚会，发出倡议，号召农民联合起来，同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作斗争。1927年1月，赵伯平参加蓝田县农民代表大会后，到许庙地区的山王村创建了蓝田县最早的村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己的武装——自卫队。2月，经侯德普、亢维格介绍，赵伯平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担任中共长安县引驾回支部书记、农民协会主任、农民自卫队长时，带领200多名自卫队员参加了西安市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大会，公开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拥护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7月，西安的革命形势急剧逆转，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险恶形势下，有的党员悲观失望，消极动摇，有的自动脱党，甚至叛党

投敌。而赵伯平逆境弥坚，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毫不动摇，继续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赵伯平回蓝田整顿党的组织，组建了中共蓝田特别区委，并任书记。1928年3月改区委为县委，仍任书记。从此，蓝田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有一次，国民党蓝田县政府为了镇压西原一带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农民运动，调集了30多名武装民团，明兵暗匪，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赵伯平请示省委同意后，组织农民联合地方进步武装力量，采取“诱敌吃请”的办法，捣毁了敌民团，击毙了敌团长，收缴了敌枪支，为农民除了大害，保护了地下党组织，推动了农民运动深入开展。

二

1930年7月，赵伯平参加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并被委以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的重任。10月初，赵伯平在绥德县合龙山古庙里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为贯彻立三路线，配合全陕组织暴动，根据省委决定，将特委党团组织合并，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陕北暴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这次会议后，除个别地方贴过一些“左”的标语外，并没有搞暴动。到12月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即停止执行立三路线，撤销陕北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陕北特委，赵伯平仍任书记。这时陕北特委已划归中共河北省领导。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内部出现了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党的分裂活动。河北省委内也出现了支持分裂的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当时河北省委内支持分裂和反对分裂的两方都

派代表到陕北特委游说,宣传各自的观点。赵伯平和特委常委经过反复研究,明确表示反对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并警告他们的代表不准在陕北地区再传播分裂的观点。正在这时,又传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指示,说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应当继续反右。为弄清真相,赵伯平率特委代表团赴北平、天津向原北方局负责人汇报请示后,澄清了立三路线仍然是“左”而不是右的问题,坚持了正确路线。随后,陕西特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经特委批准,在赵伯平的单线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在农村进行秘密串联,组建游击队。到1932年3月13日终于成立了由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18日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由于游击队初创,刘善忠遇害,高朗亭受伤,一度处于混乱状态。赵伯平得知,立即派人帮助整顿,并同马明方、高朗亭一起共同研究,于10月1日以中共陕北特委名义作出决定,改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简称红九支队)。后来这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一起,成为创建陕北、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

1931年8月,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领导的晋西游击队,由于遭到敌人的重兵“围剿”,无法立足。刘天章与赵伯平联系商定,将这支游击队和党的关系转交给陕北特委领导。当游击队于9月初到达陕北后,赵伯平热情接待,大力支持。并在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帮助下,动员当地3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充实了游击队。10月,这支游击队奉陕北特委指示,到达陕甘边的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于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为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游击队。

1933年5月,赵伯平调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参与领导了王泰吉骑兵团起义,恢复了三原心字区和武字区革命根据地。当时王泰吉领导的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驻防三原,主动派人与赵伯平等联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王泰吉的侄子王振民是共产党员,在骑兵团一连四排任代理排长,也多次与赵伯平和团县委书记习仲勋等秘密来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四排起义的准备工作。赵伯平和习仲勋指示他在政治上对士兵晓以抗日大义,启发阶级觉悟,使其自觉地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整顿,支援渭北游击队。在党组织的教育启发下,骑兵团官兵的抗日情绪逐渐高涨,自觉捐募枪支弹药,支援红军抗日救国。这时,王泰吉又受任“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剿共”总指挥,移驻耀县。但他不愿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在“剿共”期间,他跟在红军部队后边,追而不击,虚张声势,假报战果,使敌人的“围剿”计划破产,红军不战自胜。同时他又急于率部起义,一面托人转告省委,说他要发动起义;一面又亲自找到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周芝轩汇报了他的起义计划。赵伯平将王泰吉的起义计划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立即派余海丰等到耀县和王泰吉一起研究起义的具体安排。接着又派杜衡到三原传达省委支持王泰吉起义的指示。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城起义成功,并将起义部队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到三原县武字区陵前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赵伯平代表三原中心县委和人民在会上讲话,祝贺王泰吉起义成功,并给起义部队送了慰劳品。王泰吉也给三原中心县委赠送了一部分枪支弹药,感谢地方党组织和人民对起义部队的支持。后来义勇军在返回耀县途中,在辘轳把村与敌军遭遇,激战失利,遂于8月上旬回到照金苏区根据地,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成为陕

甘边红军游击队的一支骨干力量。

1933年6月,当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背着省委强令红二团孤军深入敌人统治严密的渭华地区,进行冒险的军事行动。省委得知后,立即由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和赵伯平等一起,在县民教馆开会,批判和纠正杜衡的错误,并由三原中心县委派人急追红二团返回。但因为时已晚,红二团已渡过渭河到达蓝洛地区。后在敌人重兵“追剿”之下,惨遭失败。赵伯平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一面派人寻找二团失散人员,一面又动员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积极协助渭华党组织把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安全护送到照金苏区。当时红二团的一位负责人杨琪途经三原见到赵伯平时失声痛哭,埋怨“刘志丹招致了这次南下失败”。赵伯平当即向他说明南下失败完全是杜衡一意孤行造成的,如果听了刘志丹的话,就不会犯这次错误。并将省委在三原民教馆开会批判杜衡错误的真相告诉杨琪,劝他“不要错怪志丹同志”。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为了重振军威,鼓舞士气,赵伯平向省委建议,红二团南下虽然失败,但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更加强大,可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继续高举红军战旗,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省委立即同意赵伯平的建议,于1933年7月24日在三原焦村堡宣布省委决定,改渭北游击总指挥部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7月26日在三原武字小道口村举行授旗典礼,赵伯平代表三原中心县委对红四团的成立表示祝贺。7月30日,红四团在富平淡村老户沟全歼张德润民团,一举出名,敌人惊恐,遂集中6个团的兵力进行“围剿”。红四团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撤回照金苏区。后来这支部队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8月,因叛徒出卖,赵伯平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后无

条件获释。在3年多的铁窗生活中,赵伯平同共产党员吕剑人、韩学理等一起,团结狱中难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敌人又多次刑讯,赵伯平始终守口如瓶。敌人见他“坚不吐实”,又玩弄新的伎俩,以判死刑恐吓。赵伯平镇定自若,既不屈服,亦不乞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最后敌人判他有期徒刑10年,他一笑置之,蔑视地说:“判我10年,看你们岂能统治10年?!”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赵伯平主管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工作,卓有成效。他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干荫蔽”的政策,总结推广了许多好的经验。他提出要使党的组织精干荫蔽得好,关键在于保证党员质量。党支部不在于庞大,而在于有战斗力;领导机关不在于人多,而在于有才干;党员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质量好,“量的多少不能离开质的好坏”。他认为影响党员质量的主要是三种人,即思想上动摇的“怕死鬼”,行动上乱闯的“冒失鬼”,粗心大意、不守纪律的“马虎鬼”,必须从组织上、思想上认真整顿。他还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反对一切、盲目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了“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狭小、很普遍”的社会活动三原则,要求地下党员“要机动灵活,不要奸猾狡诈;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谨防鬼捣鬼。”在党的组织形式上,为严防敌人破坏,赵伯平提出要采取“辣椒式”的“单线联系”,即一个地方的党员只发生垂直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一个地方有两个以上党组织的也不发生横的关系,即使这个组织破坏了,那个组织还可以继续坚持斗争。对在国民党机关内部

工作的党员,赵伯平提出要善于“阳奉阴违”,保护自己。在活动方法上,一是“鸭子浮水”,表面不动底下动;二是“外圆内方”,既要善于应付,又要坚持原则;三是“假巴多拉”,既要善于假意巴结上司,又要多方团结中间分子。这样“借庙修道”,“同僚合群”,即可达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使地下党扎根于群众之中,粉碎国民党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陕西地下党打成“红旗党——假共产党”,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赵伯平顶住压力,挺身而出,上书党中央,用大量对敌斗争的确凿事实,戳穿制造“红旗党”的谎言,为陕西地下党正名。后经党中央甄别平反,证明陕西党组织是纯洁的、可靠的,许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还壮烈牺牲。陕西地下党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解放战争期间,赵伯平主持中共陕西工委和关中地委工作,对恢复和发展陕西国统区党的组织,发展和壮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关中和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10月,中共中央急电赵伯平,要求“以十二分的把握”把中原突围的李先念等同志护送回延安。当时敌人贴出布告“拿住李先念,赏洋五百万!”在这种严峻情势下,如何保证顺利通过400多华里的关中敌占区,赵伯平日夜操劳,同沿途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同志一起,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精心安排,终于在人民群众和各界统战朋友的掩护下,闯过重重关卡,保护李先念等安全回到马栏转延安。30年后的1980年9月,李先念在回忆这段传奇般的惊险历程时,对赵伯平说:“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工作做得很出色。当年我走的那条路,表面上是白区,实际上很安全,简直是一条红色地下通道。”这是李先念对赵伯平等领导的陕西地下党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人们不能忘记,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中,赵伯平单线领导在隐蔽战线进行斗争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打进敌人心脏,搜集大量军事情报,为我军制定针锋相对的战略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打入敌国防部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司令部的共产党员杨荫东,精心绘制的敌《兵力配置补给情况一览表》,将西北地区敌人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军官姓名、驻地、军械装备、补给情况等都一一按战斗序列填入表内,使用时一看便知。这个“一览表”,一份放在敌军司令部的作战室,一份经赵伯平转交给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此后胡宗南军用地图上23万兵力标签的每一移动,在彭德怀的军用地图上也同时移动。1948年2月,胡宗南的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两个整编师向宜川推进,妄图阻击我军南下。彭德怀急电赵伯平,要求在3日内将刘戡的军事行动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当此燃眉之时,地下交通员就把杨荫东的一份详细军事情报送到赵伯平手里。赵伯平一分钟也没有停,就急电彭总。当刘戡率部于2月28日到达宜川西南的瓦子街时,即陷入我军早已布好的埋伏圈内,激战两天,全歼敌军,称为“宜瓦大捷”。彭德怀对赵伯平说,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可靠,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并向赵伯平颁发了一枚功勋奖章,幽默地称赞:“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的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比胡宗南强的多!”

四

新中国成立后,赵伯平先后主政西安和陕西工作,对医治战争创伤,开创西安工作新局面,恢复和发展陕西经济,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西安工作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镇反政策,采取领导、专案人员与群众共同判案的方法,稳准狠地

打击敌人,成效显著,多次受到西北局和党中央的表彰。在陕期间,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反复强调农村稳则大局稳,农民安则人心安,对农业和农民问题十分关心。他对关中和陕南、陕北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对群众生产、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利益关怀备至。早在1948年春,关中老区进行土地改革时,一些地方发生了乱划阶级成份,侵犯中农利益。赵伯平发现后,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他指出,土改中右是不对的,应该划而漏划了地富成份是错误的;但把本来不是地富而乱划错划为地富,这种“左”比右更坏。宁“左”勿右,以“左”为正,看似可爱,实则可悲可憎。它扩大了打击面,破坏了党的政策,脱离了广大群众。他提醒地县干部纠正“左”,既要谨慎,更要坚决。对于错划了地富成份的,即使一户一人,也要坚决纠正过来。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左”的影响,包产到户问题,在陕西争论时间长,范围广,纠了搞,搞了纠,上纠下不纠,明纠暗不纠,几经反复,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生产上不去。赵伯平体察民情,敢讲真话。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包产到户提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是过分的,不妥当的。”1962年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他曾提出“包产到户不是旧事物的复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他反复强调,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要坚持的,但在做法上不能单一化,要多种多样。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划小核算单位等等,都有因地制宜的适应性,符合农民的意愿。他还坚决反对取缔和关闭城乡自由市场,主张放开搞活,活跃集市贸易。他说“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把近市变成远市,明市变成黑市,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他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创见,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反而受了错误的批判。这是一出有案可稽的悲剧。

五

赵伯平是个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也是个卓有建树的戏曲活动家。从30年代到60年代，他一直参与和领导了陕西戏曲文艺界的许多重大活动。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创作了《新考试》、《大上当》、《抓壮丁》、《祁半仙》、《特种学校》等秦腔现代剧本，从不同角度有力地宣传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1942年，为配合延安整风，赵伯平先后改编了《三滴血》、《石达开》、《民族魂》等大型剧本，剔除了封建宿命迷信的庸俗情节，增强了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在延安公演后，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称赞这三个剧本改编得好，把反对教条主义、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同党的整风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针对性很强，有普遍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五六十年代，赵伯平身负党政重任，仍然在工作之余，与其他同志合作创作和改编了《取桂阳》、《破宁国》、《辕门斩子》等历史剧，被推为传统剧改编的精品。《游西湖》和《赵氏孤儿》两个剧本，也是在赵伯平的主持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使这两个传统剧的人物塑造、感情抒发、意境烘托以及唱词道白等都达到了美的境界，历演不衰。1956年春天，赵伯平主持召开了全省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戏曲改革座谈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全省戏曲特别是对秦腔的继承和改革作了精辟的阐述。在表演艺术上，他针对一段时期粗制滥造和抛弃历史遗产的现象，要求演员在“唱、白、做、打”等方面苦练基本功，做到有棱有角，有板有眼，有韵有味，有声

有色,把十八般武艺学到手。他的这个讲话,对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陕西戏曲起到了鼓舞、激励和推动的作用。特别在抢救弦板、阿宫和同州梆子等传统优秀剧种上,赵伯平有特殊贡献。同州梆子戏被人们称为各种梆子戏的鼻祖,销声匿迹近40年,濒临夭折的境地。赵伯平心急如焚,亲自组织班子,抢救老艺人,改编旧剧本,招收新演员,排练新剧目,终于创建了一所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戏校,使这个古老剧种获得新生,博得了“老树红花,别具一格”的赞誉。

保护西安明城古迹,赵伯平功不可没。1958年有些人借口“大跃进”,把西安城墙视为封建遗迹,主张拆除。他力排众议,上书国务院,请求保留。在习仲勋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经全面整修,墙、河、林、楼、路综合治理,面目一新,现已成为全国惟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旅游景点。

六

赵伯平为人,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的突出特点是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早在1929年,曾因一个叛徒背着赵伯平私自代他登报声明脱党,被组织上做了“一时的政治动摇”的结论,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时隔数十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9月经过复查,才真相大白。正像复查报告中讲的:该“脱党声明”纯系叛徒所为,赵伯平没有责任,撤销原结论,还了他的清白。50年代后期,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左”倾思潮,他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既不随波逐流,也不人云亦云,敢于实事求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他不

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保护了戏曲文艺界一批作家和艺术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根据康生捏造的罪名，错误地指责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赵伯平不为临祸而改节，坚持“石可破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赤”，始终不揭不批，保持沉默。别人多次劝他发言表态，他严肃地说“不表态就是表态。仲勋是个好同志！”他认为迎合某些领导人的需要，就会丢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灵魂，丢掉共产党员的党性。他说：“一个革命者的骨气和节操是很重要的。死有什么可怕！我们的死不一定重于泰山，但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墙头草，随风倒，落井下石，诬陷好人，那就太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了。”十年浩劫中，赵伯平被监禁达7年之久，刑讯逼供，备受折磨。在“监护”中，监管人员多次要他揭发别人的所谓问题，他宁可自己蒙冤受辱，也不投其所好，写违心材料，被称为“一字不屈”的倔老头。

赵伯平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至耄耋之年，仍然孜孜不息，埋头书案，笔耕不辍，撰写了10多万字的回忆录和党史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艰苦朴素，两袖清风，衣食生活从不讲究。他的日常饮食就是“一日三餐家常饭，包谷糝子米儿面，芥末稀饭干馍片，红白萝卜辣子蒜。”他的衣服，特别是衬衣，多半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极端鄙弃奢侈浪费。1968年4月，在“文革”的艰难时期，他还写信嘱咐老伴教育孩子们珍惜现在，毋忘过去，不要福中不知福。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怀，从不整人。用他的话说，是“包公脸，婆婆心”。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受了他的批评甚至训斥之后，不仅不存芥蒂，反而更加亲近，视他为严师诤友。

赵伯平一生是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有鞠躬尽

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党性;他有一身正气,勇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他有豁达大度,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坦荡胸怀;他有探赜索隐,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他忠诚党的戏曲文艺事业,终生爱戏写戏,呕心沥血地创办戏曲院校,精心培育了大批优秀的戏曲艺术人才,被誉为“丹心育奇葩,好雨润百花”的艺苑公仆,剧坛知音。赵伯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感人至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刘云岳 王一士)

何 挺 颖

(1905—1929)

何挺颖，字策庸。陕西南郑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党代表、一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委书记、红四军十一师党代表兼第三十一团党代表、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1929年1月在战斗中负重伤，2月2

日牺牲。

何挺颖出生在陕西省南郑县何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何根山是清末的秀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11年是同盟会汉中地区的领导人之一。

1913年，何挺颖开始上私塾。他无过人的智力，但却有一股韧劲。他每天晚上总是先帮助弟弟背熟了书，等到弟弟睡觉之后，自己才复习功课，夜深入眠，第二天一早又去上学。1915年，何挺颖进入南郑县高等小学，1920年考入汉中联立中学。他仍坚持“我不及别人聪明，我必须比别人多下点苦功夫”的精神，勤奋学习，所以每次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1921年，他的表哥王钧石从北京给他寄来几份《努力周报》、一本《改造》杂志等进步刊物，他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地阅读着、琢磨着，并向别人请教。他的视野扩大了，思想开始活跃起来。1922年暑假，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

个暑假留校读书的活动，参加者约 20 余人。他们把自己所能收集到、借到的新书都集中起来，办了一个阅览室，彼此交换阅读。1922 年下半年，何挺颖和几个同学学习外地举行革命活动的方法，在汉中发动和组织了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入侵、抵制日货的运动，带领同学到街头进行宣传，举行示威游行，汉中人民破天荒的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对市民及附近的农民震动很大。

1924 年夏，何挺颖在联立中学毕业后，就到上海去考大学。由于汉中的教学质量较低，他们同去报考大学的同学都未被录取。于是，他就到浦东中学去补习数理化课程，准备来年再考。这时他同共产党员刘平衡（陕西城固人，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交了朋友。1925 年，何挺颖考入大同大学数学系，距离刘平衡更近了，交往也就更频繁。虽然他看了一些革命的小册子，阅读了《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初步接触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但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数学上面，星期天或假期也留在学校补习功课。由于他刻苦用功，半年以后，不仅能跟上基础较好的同学，而且还有独立见解，多次获得系主任的好评。朋友们一度称他为“老夫子”，一直到五卅惨案发生，他才如梦初醒，认识到靠科学救国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埋头书本中的何挺颖得知帝国主义者屠杀上海的爱国工人和学生的消息后，思想极为震动，爱国激情奋起，加之刘平衡的教育和影响，他便积极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5 月 30 日午，他参加了大同大学的队伍上街宣传，游行示威。他亲眼看到愤怒的市民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游行队伍里边，工人、学生、市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振臂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释放被捕学生！”他也看到了英国巡捕头子下令对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南京路上血肉横飞、伤亡无数的惨景。何挺颖无心再去专门研究数学了，觉得中国这

时最急需的是革命战士，而不是候补博士。

五卅运动后不久，何挺颖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然而这种转折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25年暑假，系主任劝何挺颖“不要辜负自己的数学天才”，并以不须到毕业就可以留校当助教的许诺，劝他走学者的道路；家庭也以经济来要挟他这样做。在刘平衡的启发教育下，何挺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不顾朋友的惋惜，老师的劝导和家庭的要挟，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为了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他下半年转到革命思想较活跃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何挺颖入上海大学后，深感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薄弱，便勤奋地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有关革命理论的书籍和杂志。他还嫌校内的书刊不够，又经常自购一些书。据他的同学说，当时何挺颖几乎把钱全买了书，常常弄得没有车费。夜间学习时间长了，以至房东要他多出五角钱的电灯费。从他留在上海的那一大箱书信中可以看到，他每天都要读100页以上的书，并在有的书上写到：“为什么我这么笨，越读越不懂？”“基础知识不够，不要好高骛远”，“现在读懂了”等语，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学习是非常刻苦认真的。通过学习，何挺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在给朋友廖左明的诗中有如下几句：“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虎狼……”“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略仇恨深，去休学者博士梦，愿做革命一新兵。”

为了向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他同刘平衡、谢佐民、尚莘友等人创办了《汉钟》杂志（后改为《新汉》杂志），内容与形式均仿效《中国

青年》。何挺颖积极为刊物撰稿，他在所写的《中俄交涉经过梗概》^①一文中，历数帝俄侵略我国的罪恶历史；热情讴歌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政府对华友好、愿“抛弃帝俄时以条约取得中国之利益与特权”的外交政策；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阻碍俄中缔结协定和重订新约的误国政策。还呼吁汉中地区的父老兄弟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汉钟》与《新汉》杂志主要寄往汉中地区，向青年进行新文化和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及时事政治教育，颇受汉中革命青年的欢迎。

1926年初，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党派何挺颖在一个工人夜校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使他的世界观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里，他广泛地接触了产业工人，逐步了解到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况，真正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决心向工人阶级学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这在他的《赠陆阿毛》的诗里可以得到证明，诗中写道：

我不过仅仅教你认识了几个字，
你却教我懂得了不少的事。
我照着书本给你讲“阶级斗争”，
你的行动却讲得多么有色有声。
在过去无产阶级对于我只是一个概念，
今天啊！我才认识了你们这一伙英雄好汉。
你们是天生的革命战士，
我多荣幸做了你们的同志。

^① 原载《汉钟》第7期(1924年11月10日出版)，第8期(1925年1月10日出版)。

在革命实践的火热斗争中,何挺颖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时他在给廖左明的一首诗中写道:

四万万人发吼声,
火山爆发世界惊。
中国有了共产党,
散沙结成水门汀。

1926年夏,由于北伐战争的需要,何挺颖和许多党员同志一道被党派去学习军事。经过短期训练后,被派到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李品仙师担任团指导员。这个师的孙文主义学会有个小头目叫马行空,是何挺颖的同班同学。此人看出何挺颖的革命倾向,多次对何挺颖进行打击陷害,只是由于何挺颖在工作中能吃苦耐劳,踏实稳重,得到许多国民党进步军官和广大士兵的佩服,马行空的阴谋才未能得逞。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那些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阴谋把这一支部队拉出去投靠蒋介石,何挺颖为了革命利益,曾同一些进步军官逮捕了这批反动分子,后来这批人又被骑墙派放走了。

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何挺颖被迫离开北伐军,我党立即又派他到原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干部连工作。先后任班长、排长。这时国民党的特务曾企图逮捕他,由于何挺颖警惕性高,才没有遭到迫害。不久,何挺颖在汉口接到我党分配给他的一个新任务,要他带领一批西北籍的同志回到陕西工作。当时他正准备同一位上海女友结婚,但他以革命利益为重,接到通知后就毅然决定单身返回陕西。而他的未婚妻不体谅他,坚决要求他婚后到上海去。何挺颖身负重任,置个人幸福于脑后,断然拒绝

了未婚妻的要求。结果两人闹翻了。对方回到上海，他却毅然离开汉口到郑州，准备和其他同志会合后回陕。7月下旬的一天，他忽然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要他马上到南昌去，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于是他当天就动身南下，匆匆赶到武汉警卫团所在地，在团长卢德铭率领下，由武汉开赴江西，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不料途中闻讯起义部队已经南下，随即又跟着警卫团折向赣西，在修水一带休整待命。

党中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到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组织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革命武装，准备在湘赣一带发动秋收起义。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何挺颖所在的警卫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他任该团一个连的党代表，并于1927年9月9日参加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一团由江西修水出发，向湖南的长寿街进军，在金坪遭到叛徒邱国轩的第四团的伏击，被迫向浏阳方向转移，并于9月15日到达浏阳的文家市。在这里，何挺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和转向罗霄山脉中段游击的讲话。之后，起义部队随即由浏阳南下向井冈山进军。当时，由于起义部队中途作战失利，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击和生活条件的困难，因而部队思想波动很大，有些人中途逃跑了。何挺颖不但毫不动摇，而且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沿途不断地做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和教育革命战士继续前进。

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的三湾，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编，把原起义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一师一团，何挺颖被任命为三营的党代表，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1927年9月底，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从此以后，何挺颖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

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0月上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带领二、三连往湘东酃县、安仁、茶陵一带活动。何挺颖、张子清、伍中豪率三营同一营一连和特务连一起,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沿湘赣边界南下,途经宁冈的耒市、酃县的十都、水口等地,张贴革命标语、布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群众起来闹革命。行军途中,何挺颖找干部、战士谈话,积极指导连队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10月23日,途经遂川县大汾镇时,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肖家壁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三营与团部失去联系。何挺颖和张子清、伍中豪将部队带到桂东县鹅形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并与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的余部取得了联络,得到一些物质帮助和弹药补充。12月下旬,转赴茶陵,回归原建制。毛泽东带领团部和一营一连、特务连收集了失散人员,转移到井冈山荆竹山下。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一营攻下了湖南茶陵县城,11月下旬,成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选为政府主席。

1927年12月中旬,湘桂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从混战的前线调回湘敌吴尚的第八军独立团,加上地主武装,共22个连的兵力,扑向茶陵,企图一举消灭驻在城里的工农革命军。当时这里的工农革命军只有4个连,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英勇反击,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眼看子弹快打完了,处境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何挺颖和张子清率领三营突然从城外赶来增援,和守城部队团结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围攻,解除了守城部队的困境。原来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在何挺颖、张子清的率领下,在桂东一带打完游击正要撤回井冈山时,在路上听到茶陵县城的枪声,知道敌我交战,就立即率部奔来援助。由于敌人不断增兵,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谭震林和何挺颖、张子清、宛希先等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撤出战斗，把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暂时搬到农村，部队撤回井冈山。但是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团长陈浩、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以出城打游击为名，企图把部队带到湘南去投靠蒋系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正在危急时刻，毛泽东根据何挺颖、宛希先等的报告，迅速从宁冈出发，赶到茶陵县的湖口，才把这支部队带回井冈山，从而粉碎了陈浩等人叛变投敌的阴谋，挽救了工农革命军。毛泽东把部队带回宁冈的耒市后，对陈浩等叛徒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经前委决定当即予以处决，并任命何挺颖为团党代表，张子清为团长，朱云卿为团参谋长。

1928年1月4日，何挺颖、张子清等率领一营和三营的一个连，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了肖家壁的靖卫团。县城的敌人闻讯，弃城逃跑。1月5日，工农革命军乘胜占领了遂川县城，以班排为单位，打着“宣传队”红旗，开展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并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在县城及四郊群众发动起来以后，1月24日，成立了遂川县工农民主政府。

2月中旬，何挺颖、张子清和袁文才等率领工农革命军一、二两团，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由遂川到茅坪攻打宁冈新城，经过短时间激战，将敌人全部消灭，打死敌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伪县长张开阳，俘敌400多人，缴枪400多支，解放了新城，使宁冈全县成为红色区域。2月21日，在宁冈耒市召开了万人大会，处决了伪县长张开阳，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

3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毛泽东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委书记，张子清任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的，并随即被湘南特委调往湘南。4月，部队在湖南资兴县一带活动。4月20日左右，肖克同志带领的湘南起义农军独立营由湘南的宜

章、郴州来到资兴县的龙溪洞地区，同毛泽东等率领的部队会师。何挺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会见了肖克等。4月下旬，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又率部队回到酃县，在城郊接龙桥一带阻击敌人，杀伤敌军数百人，掩护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4月28日，毛泽东、何挺颖率领部队回到根据地的中心宁冈县的砦市，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革命武装胜利会师。5月4日，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在砦市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两军会师大会，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3个师8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何挺颖任十一师党代表兼三十一团党代表，张子清任十一师师长（因负伤未愈未到职，由毛泽东代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两军会师和红四军的诞生，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对于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28年7月，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和何挺颖、宛希先等在永新一带活动。这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乘毛泽东远在永新之机，强令红军大队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开往湘南。7月中旬，赣敌王均、金汉鼎、胡文斗部共11个团，乘红军大队远离井冈山根据地之际，进攻永新县。此时红军虽只有三十一团在永新，但毛泽东在何挺颖、宛希先等的协助下，指挥红三十一团，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敌11个团的兵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达25天之久。只是由于红军大队被强令调到湘南以后在郴县受挫，敌人才有机会再次发动猛攻，迫使红三十一团不得不退出永新。8月中旬，三十一团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永新、莲花、茶陵的边界集结。红三十一团到达集结地永新县九坡村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

总结永新的作战经验,并讨论今后的行动问题,说明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提高大家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的决心。会后得知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亲自率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接大队,命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次晨,毛泽东即率三营开赴桂东。团党代表何挺颖和团长朱云卿布置了第一营的工作后,就带领着团部和直属部队到井冈山部署防务去了。

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以来,根据地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已全部为敌所占。8月底,湘敌吴尚的第八军又以一个师的兵力抢赣敌之先,从酃县直赴黄洋界,进犯茨坪,企图趁红军主力未回之际,攻占井冈山根据地。当时毛委员和朱军长都不在山上,红军大队没有回来,红三十一团一营远在永新、莲花一带打游击,红三十二团一营又驻守在山下的宁冈,守山的只有红三十二团的二营,敌人却有4个团,武器又好,敌我力量悬殊。所以,有人主张撤退,去遂川打游击,等毛委员、朱军长带领红军大队回来后再上山。但广大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暴动队员则主张坚决地打,表示“人在,根据地在,誓与根据地共存亡!”在此关键时刻,何挺颖、朱云卿身背斗笠,脚穿草鞋于8月29日率部赶到小井。何挺颖回到团部后,立即主持召开了有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他说:井冈山根据地在毛委员、朱军长领导下,早已在黄洋界修好了坚固的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建立了红军医院;井冈山人民已经觉悟起来了,发动起来了,成立了自己的红色政权,组织了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给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这是什么妖魔鬼怪也冲不破的。更重要的是,毛委员、朱军长亲自给红军和地方建立了党组织,这是我们的事业必胜的根本保证。总之,毛委员、朱军长已经为我们

坚守井冈山创造了一切条件,作好了一切准备。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坚守井冈山呢?接着,他又传达了毛委员在永新县九坡村会议上关于坚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五百五十里井冈山的地势好,有红米南瓜吃,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党恢复了,群众起来了,这是很好的割据地区。我们在这里有了依托,可以进退自如地打仗,扩大割据地区,敌人对我们是无可奈何的。若失掉了井冈山,我们将会是‘虎落平原被犬欺’了。”对此,到会代表认真进行了讨论,并具体研究了对付白狗子窜犯的办法。最后,何挺颖说:坚守井冈山是一定不能动摇的。保卫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守着井冈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表现,是我们革命发展的需要,是我们胜利的希望。我们要坚决反对逃跑主义,继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守井冈山是完全办得到的。何挺颖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使到会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鼓舞,异口同声地表示:保证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去办,坚守井冈山,让边界的红旗永远不倒!

会议结束后,根据地的军民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战斗动员。红三十一团团部命令上山的部队火速投入备战行动。远在永新的红三十一团一营发现敌人的企图后,已主动决定:留二连就地牵制敌人,营部和一、三连连夜上山。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和防务委员会(主任王佐)发出号召:全山人员立即动员起来,削竹钉、运弹药、修固工事、送水送饭、抢救伤员……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整个井冈山都沸腾了。医院里的伤病员坚决要求上战场;妇女组织起支前队,送饭送水,看护伤员;男的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少先队和儿童团抢着站岗放哨。不到一夜功夫,各村就超额完成了每人削200支竹钉的任务,并源源不断地向黄洋界哨口运去。黄洋界上,军民们在通往大陇方向的草丛里,插了3华里的竹钉;在

通往茅坪方向的草丛里，插了4华里的竹钉。在哨口前沿，围了一道竹篱笆，作为第二道障碍；第三道是堆好的插木滚石；第四道是宽四五尺的壕沟，沟壁、沟底都安置了竹钉和草刺；最后一道是坚固的掩护体，全用坚硬的大石块垒成。与此同时，各区乡赤卫队、暴动队也都上山助战。真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8月29日下午，何挺颖在召开紧急会议时，正好红三十一团一营营部和一、三两个连的官兵在营长陈毅安的率领下跑步赶回山上。何挺颖高兴地握着他们的手，说道：来的正是时候！他立即进行战斗动员，对大家说：目前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只剩下井冈山这一小块红色政权，现在湘赣两省敌人全面向我进攻，企图趁我主力不在之际拿下井冈山。我们必须以生死与共的决心坚守井冈山。只要根据地保存下来，红旗不倒，就向全国人民证明，反动统治阶级永远消灭不了革命！接着团长朱云卿作了战斗布置：红三十一团一营一、三两个连和地方武装共同保卫黄洋界哨口，红三十二团两个营的兵力和宁冈地方武装在山下牵制敌人和驻守朱砂冲、桐木岭、双马石、八面山等哨口。会后，何挺颖和朱云卿等共同讨论了在战争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并指示各连干部加强战斗鼓动工作。

8月30日早晨，湘敌吴尚的两个团先行到达源头村，使用机枪向黄洋界盲目扫射，进行火力侦察。半天不见山上动静，就沿着小路往上爬。山高坡陡，好不容易才爬到半山腰，又遇到了竹篱笆障碍，用了很长时间，才勉强拔掉一部分，又跌跌撞撞往上爬。待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后，营长陈毅安一声令下，守卫在山上的军民弹无虚发，立时杀伤一大批白狗子。接着又砍断悬吊插木的棕绳，只听得一片轰隆巨响，无数插木滚石飞腾而下，早已吓得胆破腿软的敌人，“挨着的伤，碰着的亡，跟在后面的敌人只恨两腿不够长，连

滚带爬逃命忙,却想不到纷纷踩在竹钉上”,山坡上死伤无数,哀号连天。但是敌军仗着人多武器好,经过一番喘息之后,又接连发起攻击,而且兵力一次比一次多,炮火也一次比一次猛烈。战斗更激烈了。红军战士虽然只有不足一个营,子弹又不足;赤卫队员和暴动队员的武器更差,都是些长矛、大刀、梭镖之类。但是他们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凭险抵抗,以少胜多,硬是击退了敌人的多次猛攻。当天下午何挺颖、朱云卿等来到阵地上,向红军指战员、赤卫队员和暴动队员们亲切问候,表扬他们打得好;并指示要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摆出毛委员和朱军长率领红军大队回来了的架势,迷惑敌人;还命令把刚刚在茨坪修好的惟一的一门迫击炮架在哨口右侧的发射阵地上。这座炮仅有3发炮弹。下午4点多钟,白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又向黄洋界发起疯狂进攻,兵力比红军多十几倍。黄洋界上硝烟滚滚,遮天蔽日。黑压压一群敌人顺着山坡往上爬。红军指挥员命令迫击炮射击。但是,第一、二发炮弹因放置时间太长而失效。炮手们拿起最后一发,擦了又擦,检查了又检查,听到“放”的命令后,才小心翼翼地把它装进炮筒,只听“轰隆”一声,炮弹准确的落在源头村,在敌人的指挥所附近爆炸了。这时,山上的枪声密集,杀声响亮。隐蔽在哨口工事两侧的赤卫队和暴动队员们手执红旗、梭镖飞奔而出。只见东西两边山山坳坳都是挥舞着兵器的战士,峰峰岭岭都有红旗展,嘹亮的号声,“冲啊,“杀呀!”“毛委员朱军长回来啰!”的喊声,震撼山谷。吃够了苦头的白军官兵,吓得昏头胀脑,顿时乱了阵脚,扔掉枪,连爬带滚地往回跑,趁着云雾弥漫的夜色,就逃了个干净。吴尚军队惨败的消息传到赣敌王均耳朵里,他也赶快夹着尾巴溜走了。至此,湘赣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以一败涂地而告终。对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的黄洋界保卫战大捷,毛泽东得讯后非常高兴,回师井冈山,即挥笔

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词，高度评价了黄洋界保卫战的光辉战绩。此后，毛泽东同志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对于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和重要意义，再次作了肯定。

1928年底，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为了加强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的战斗力，调何挺颖同志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兼团党委书记。何挺颖在陈毅同志的陪同下到了二十八团。他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建军路线，积极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教育，亲自给全团的党支部委员（包括许多军事干部）和各连、营党代表及政工人员上课，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大家的欢迎。由于他重视做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该团的政治气氛焕然一新。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更为密切。何挺颖刚到二十八团时，团长林彪适在养病，由于他的军阀主义倾向，后来回到部队对何挺颖冷眼相待，阴阳怪气，极力排斥。他事先不同何挺颖商量，突然私自召开全团军官会议，并且不让何挺颖同全团干部见面和讲话，妄图在全团干部面前扫落何挺颖的威信。但是何挺颖有很高的政治风度和修养，能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同干部们一起坐在草地上，听林彪在会上的啧啧“训话”。何挺颖的这一作为，更为干部们所钦佩，获得了更高的威望。

1929年1月14日，何挺颖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1月24日在大余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斗前，何挺颖一面擦着枪，一面对团党委的同志说：马上就要打仗了，对今天的敌人要切实地揍他一下，团党委的同志可随军部行动。讲完后他立即奔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身负重伤。毛泽东得知何挺颖负伤的消息后，极为关切，当即指示陈毅转告林彪，

要好好照顾他,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区。陈毅并对林彪说:何挺颖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否则会影响两团关系。林彪当时满口答应,事后却根本不理睬。在大余战斗后,林彪只顾自己仓促突围,置毛泽东、朱德和军部的安危于不顾,置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于不顾,在行军中让何挺颖独自骑马走,无人看护。1929年1月下旬,部队由大余向东转移,夜行军中,在吉潭遭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从马上摔下来不幸牺牲。毛泽东、朱德、陈毅和广大干部战士得知何挺颖牺牲的消息后,都深表哀痛。

何挺颖同志虽然过早的牺牲了,然而,他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高尚的政治风度、宽阔的无产阶级胸怀和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将永远教育和激励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勇往直前。

(张守宪 胡民新 黄朝章)

本文主要参考材料

- 1.《汉钟》、《星火燎原》、《红旗飘飘》、《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集、《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井冈山斗争史稿》、《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井冈山的武装割据》、《毛委员在井冈山》。
- 2.熊寿祺:《何挺颖同志事迹片断回忆》,何挺杰:《何挺颖烈士传略》。
- 3.肖克同志修改过的《何挺颖烈士简介》和他给何挺文的信。
- 4.张继华、王心原、王伯协等同志写的回忆材料。
- 5.访问何长工、张宗逊、邹文楷、谢梅香、马文彦、艾志清、张宇六、曹志麟、王超北、党伯弘等同志记录。
- 6.访问何挺颖烈士的亲属何挺毅、何挺警、何挺文同志的记录及给作者的信。
- 7.还得到宋俊生、匡一悠、欧阳崇伦、薛凤飞、唐明生等同志的帮助。

王 尚 德

(1891 - 1946)

王尚德,又名璋峰。陕西渭南人(今渭南市临渭区),1918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9年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7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回陕西从事建团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赤水特支书记。1927年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1928年5月参加领导渭华起义。同年7月任中共豫西南特

委委员,后长期以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公开身份进行革命工作,于1930年和1941年两次被捕。1946年8月13日在渭南赤水镇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王尚德出生于1891年9月1日,少年时代在本村私塾读书。1908年前后,考入渭南县城象峰学堂。这期间,陕东著名的同盟会员曹印侯等多次来渭讲学,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王尚德受其影响,积极参加了反对县署克扣学生官费津贴的学潮。后转学到西安健本高小,继而考入西安法政专门学校。在西安求学期间,他接触到了宣传新文化的书刊,开阔了政治视野,经常与好友田涵荣等谈论时事,抨击弊政,为国家的命运、前途忧虑。1918

年秋，他怀着追求新知识，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满腔热忱，奔赴辛亥革命发祥地——武昌，考入武昌中华大学。

当时，武昌学生界思想混乱，纪律涣散，不少学生沉醉于极端个人主义，鄙视劳动，考试作弊等屡有发生，但恽代英建立的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却鹤立鸡群，每天定时开会，讨论社会问题，探索革命真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写日记，一方面加强自我修养，一方面帮助朋友们进步，以培养公有制观念，锻炼共同生活的习惯，实现献身于社会的理想。王尚德被互助社的活动所吸引，加入了这个进步青年团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积极投入了恽代英、林育南领导的武汉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0年春，王尚德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创办的进步青年社团——利群书社。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等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结识了肖楚女、李求实、施洋、林育英（张浩）等进步青年，与他们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的新知识，经常围绕着如何改造中国这个中心问题，进行激烈争论，对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思潮进行分析比较，从实践经验中逐步认识到单靠“共同生活”，试图避免采用革命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而只有通过“阶级争斗”、“劳农政治”，才能“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从而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921年初，在董必武、陈潭秋领导下，武汉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武汉中学建立，团组织负责人张培鑫等在中华大学的进步学生中进行活动，开始与王尚德取得联系，王尚德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王尚德参加恽代英、林育南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共存社，担任该社的营业委员，与张浩共同负责利群毛巾

厂的工作。1922年7月,王尚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王尚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积极投入了武汉地区的革命斗争。他同林育南、张金保(女)一起在武昌第一纱厂附近开办了一所工人文化夜校,通过学文化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工会,发动工潮,声援了粤汉铁路工人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

二

1922年7月,王尚德从中华大学毕业。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中共武汉党组织及董必武决定派遣一批党、团员去外地创建党、团组织,开辟革命工作。王尚德、李求实、沈震(女)被分配到陕西。临行前,李、沈二人另有任务,未能成行。

王尚德回到家乡,在华县咸林中学执教的魏野畴正要动身赴北京。魏在咸中执教期间(1921年夏——1922年夏),在学生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当时,王尚德因事返乡,与魏相识。两人志同道合,多次相聚长谈,计议在陕东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良策。王尚德返武汉后,两人又书信来往,互相鼓励,结下了革命的情谊。这时,魏野畴因遭封建顽固势力排挤即将离开咸中,王尚德在自己家中为他饯行,期望日后在陕西地区的斗争中能携手奋斗。

经过一番酝酿准备,这年8月间,王尚德同张浩如、刘建侯三人在家乡赤水镇积极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王尚德任书记。团组织建立后,亟待建立一个“工作根据地”。王尚德认为最理想的“工作根据地”是在赤水镇建立一所革命学校,这样不仅可以直接培养革命人才,而且由于赤水镇地处渭

南、华县两县交界，有利于在两县范围内发动革命斗争，同时也便于隐蔽。在家乡创建一所革命学校，是王尚德长期以来的想法。早在1920年春，他已着手筹办。那时，他的好友张浩如由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打算在军界服务。王尚德对张浩如说：“现在，在陕西的军界，几乎全是军阀势力，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当工具呢？”劝他留在家乡筹建赤水职业学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劳苦大众。张浩如被他的热忱所感动，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一面在渭南县城的女子小学教书，一面在县劝学所（县教育行政机关，后改称教育局）办理学校立案手续。由于县教育局长王述德的阻挠，历时一年有余，立案仍未获准。王尚德便毅然决定自己动手，艰苦创业，建立一所私立学校。他联络好友田涵荣、张浩如、薛英伯等建立起乡村教育研究社，筹集资金，利用赤水镇南边的法济寺旧址为校址，于同年9月建立起私立赤水职业学校（简称赤职）。

赤水团的组织创建不久，王尚德通过恽代英、李汉俊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后，团中央即将党、团中央的文件及其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陆续寄到赤职。

王尚德深知，在思想闭塞的陕东，要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开创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局面，必须从思想发动入手，采取多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艰苦的革命启蒙工作。

在赤职，王尚德把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作为课堂教学及课外读书活动的重要内容。他在国文课教学中，选用《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浅说》、《阶级争斗》（恽代英译）、《今》（李大钊著）、《秀才造反论》（恽代英著）等作为教材讲授，并将当时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武汉中学月刊》、《共进》、《平民之友》、《上海国民日报》（有副刊《觉悟》）等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他还组织学生办墙报，定期开读书

会、讲演会、辩论会,通过这些形式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探讨。1925年,在学生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常识后,他便鼓励、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地阶级斗争的现实,给《向导》、《中国青年》、《西安评论》等刊物投稿。当时,这些刊物刊登的赤职学生稿件有刘映胜的《革命的目的》和《渭南的农民和青年一年来斗争的成绩》、武维化的《平民教育服务团》、张宗逊的《高塘九里人民反抗军阀实况》等。

从1922年下半年起,王尚德便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逐步扩大到华县、三原、西安等地,其主要方式是建立青年进步团体。他同王复生(华县咸林中学教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赤职召开了有潘自力、吉国桢、杜松寿、张秉仁、陈述善、李维屏、雷光显、关中哲等十多位咸林中学进步学生参加的会议,建立起青年进步团体青年励志社;1924年春,他通过在三原上学的渭南赤水籍学生姚志哲、薛应选、杨纯德三人,在三原渭北中学、第三师范建立起青年进步团体青年自进团;又通过由咸林中学转学到西安成德中学的张秉仁,在该校建立青年进步团体青年文学社。同年夏,他同陈述善一起在华县高塘的谷堆小学建立起进步青年团体高九青年同志会。王尚德将《向导》、《中国青年》、《平民之友》等革命书刊陆续分发给这些团体,指导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

三

1923年8月,共青团二大召开后,恽代英、林育南根据新的团章规定,指示王尚德成立赤水团的正式支部。1924年5月,团中央代表武止戈到赤水,传达团中央关于在赤水尽快建立团支部的指示。是年6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正式建立,王

尚德任书记，刘建侯任组织委员，张浩如任宣传委员。王尚德开始在赤职及上述各地青年团体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在赤职最早发展的团员有姚志哲、薛应选、程养谦、武维化、何思平、张宗逊、姚明学、郭士斌等。1925年2月1日，王尚德主持召开赤水、西安团组织及华县、三原进步青年团体联席会议，决议成立华县、三原两地团的支部。同年暑假，他同魏野畴、耿炳光、李子健、关中哲、赵葆华等在三原县城举办了暑期讲学会，参加讲学会的有西安、三原等地百余名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他担任宣讲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农民运动课程。通过这次讲学会，培养了革命人才，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团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壮大。9月，他同陈述善一起建立起团华县谷堆支部，直属团赤水支部领导。上述地区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共党组织的创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25年9月下旬，团中央代表吴化之来赤水，对团组织进行了整顿。12月二次来赤水，将王尚德等七八名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赤水特别支部，王尚德任书记。为了占领渭南县的教育阵地，王尚德领导了渭南县教育界驱逐反动教育局长王述道的斗争。年末，王述道下台，由中共党员同进步人士组成教育行政委员会，执掌了全县教育的领导权。

王尚德极为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同时，即着手进行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人，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东农民运动的奠基人。

1923年冬，王尚德审时度势，面对陕东人民深受封建压迫，生活极端困苦的实际状况，与华县进步人士郑云章等密议采用鸡毛传帖的方式，策动渭、华两县农民进行交农运动。这年11月19

日,1924年1月5日、6日、18日,先后爆发了渭南县固市、东西两原和华县高塘十余万农民的交农运动。在渭南两原交农时,愤怒的农民群众打死了恶绅田德全,县知事孙秉文惶惧万状,慌忙出示告示,宣布“各项派款一律豁免”。这次交农斗争震动了陕西,《中国青年》杂志及上海许多报刊均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为此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评论,指出“农民自救,只有‘聚众反抗’这一条路”。

从1924年下半年起,王尚德便在赤职建立进步青年团体,于1925年1月成立了平民教育服务团,在赤水镇附近农村创办平民夜校,着手对农民进行思想上的发动。1925年1月,中共四大作出了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之后,由于王尚德和团赤水支部的努力,在赤水周围十华里内的农村办起了平民夜校14处,由赤职学生充当“小先生”,一边教农民学文化,一边用生动的方式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使农民认识到自己穷苦的社会根源,懂得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求得自身翻身解放的道理。

1925年春,在陕西国民军驱逐刘镇华的斗争中,王尚德同高塘团组织的负责人陈述善一起,发动渭、华一带农民,组建民团、红枪会等农民武装,并建立陕东驱刘指挥部,他任总指挥。这些农民武装在华县高塘及渭南崇凝一带击毙刘镇华军数十人。

这年10月,王尚德派张宗适(团赤水特支书记)、雷光显在渭南东张村创建农民协会,11月22日,陕西地区最早的农民协会——东张村乡农民协会诞生。在王尚德领导下,赤水附近的淹头村、青正堡等四个村庄也相继建立了农协会。

在此期间,华县高塘地区发生了反动民团因逼交烟款打死东阳小学学生雷易生事件,民愤沸然。大恶霸、民团总团长孙景福长期盘踞高塘一带,投靠军阀势力,对人民横征暴敛,奸淫掳掠,无

恶不作。王尚德同陈述善、赵锡琰(赵和民)一起因势利导,领导了高塘地区农民反抗孙景福的斗争。他们以农民为主力,联合当地进步士绅,建立起高久公民会,结成统一战线,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孙景福,瓦解了反动武装,严厉打击了军阀势力和当地的土豪劣绅。

四

1925年2月,王尚德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在赤水倡议,召开了陕东国民会议促成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拥护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欢迎国民三军军长孙岳督陕。他还组织赤职和渭华一带中小学师生及各界群众,召开了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及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这年5月,西安爆发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学生运动。王尚德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按照党、团中央的指示,他同魏野畴等共同发起,召开了全陕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起陕西省学生联合总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后援活动。在渭南,他通过渭南学联及陕东学联,在渭华一带成立了五卅后援会,开展广泛的社会宣传活动,声讨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动员社会各界捐款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在这次活动中,赤职学生宣传队伍的足迹遍及渭南县的两原上下,渭河南北。王尚德还在《西安评论》上发表了《沪案秘密解决与关税问题》一文,指出“帝国主义之英日,自五卅后直接枪杀我无辜同胞,几遍全国各大商埠!这种惨无人道的野蛮行为,其责任犹须中国政府自负!”“果如此解决沪案,则已死同胞之冤,永沉地下。”文章还提出解决沪案的要求,是工商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办法,并收回海关自主权,废除一切

不平等条约,实现国民外交。

1925年9月,杨明轩、魏野畴、刘含初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设立或改组各地国民党党部,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王尚德受省临时党部的委派,在渭南、华县建立起国民党区、县党部。许多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成了这些地区国民党组织的中坚。此后,渭、华一带党、团组织便以国民党区、县党部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王尚德等数年努力,至1925年末,陕东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为了发展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好形势,在王尚德、方仲如、张宗适、陈述善、郑云章等共同努力下,1926年元旦,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议又一次在赤水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临潼、澄城、富平、渭南、华县等60余个团体,代表200余人。会议连续进行三天,对发展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议,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发展国民党的工作、发展农民运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作出了一系列决议。此次会议是陕东革命力量的一次空前盛会,对陕东国民革命运动及农民运动的胜利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东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里程碑。

1926年春,刘镇华纠合约十万军队窜进潼关,包围西安,对陕西革命军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在渭华一带通缉王尚德、陈述善、赵锡琰等共产党人,王尚德同陈、赵被迫离开家乡,去上海寻找恽代英。途经南京时,他们联络在南京的陕西知名人士杨叔吉、刘梦耕等建立陕西同乡会,揭露刘镇华祸陕的罪行。一周之后,他们抵达上海,方知恽代英已在广州黄埔军校充任政治部总教官,便急去信广州联系,很快得到恽代英电召。赵锡琰留在上海大学,王尚德同陈述善同赴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搞宣传工作。这年初,王尚德还将赤职共青团员张宗逊、姚俊明送入黄埔军校学习。

9月，冯玉祥于五原誓师，经宁夏、甘肃入陕解西安之围。五原誓师前，黄埔军校党组织派王尚德、刘志丹、唐澍等十多名优秀共产党员北上，到冯部任职，以加强党对冯部的工作。王尚德担任国民军联军（后改为第二集团军）第五路军政治处（处长方仲如）宣传科科长。

1927年1月21日，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陕西省执行委员会成立，陕西地区的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这时王尚德随军抵达西安，被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候补执委，后递补为农民部长。不久又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印刷局局长。在他领导下，出版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报刊，对创办陕西《国民日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新国民军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办）作出了重要贡献。3月27日，陕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成立，王尚德任负责人之一。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绞杀了共产党员李大钊。5月16日，西安各界5000余人举行追悼李大钊，声讨奉系军阀大会，王尚德在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北洋军阀的野蛮罪行，号召人民支援北伐战争，消灭封建军阀的反动势力。为了支援北伐战争，中共陕甘区委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名义，组织西安各界慰劳宣传团，前往河南前线慰问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6月7日，召开了欢送慰劳宣传团大会，王尚德在会上致词，号召宣传团的同志们“行动要积极”、“要纪律化”，“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至这年5月底，全省建有农民协会的县达到50个，会员总数41.4万余人，农民自卫武装达10万人以上，是全国农运发达地区之一。6月1日，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王尚德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五

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在陕西进行“清党”,白色恐怖笼罩西安古城。王尚德按照党的指示,返回家乡,以教师的身份,在赤水和高塘一带发动农民恢复农民协会,发展党团组织。同年冬,在王尚德策动和影响下,赤水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行动起来,杀了恶绅王思俊、刘孔华。土豪劣绅惊慌万状,纷纷潜逃。1928年春,宋哲元查封了赤水职业学校、渭南中学等校,踏了高塘民团,赤职师生及民团的战士投入了农民暴动。敌人到处搜捕王尚德,他不得不离开家乡潜赴洛南县黄村,在党领导下的许权中部队工作。4月下旬,他返回渭华地区,参与崇凝区及高塘地区一些村苏维埃的筹建工作。5月1日,崇凝区苏维埃建立后,他又赴洛南,向许权中部队介绍渭华一带农民斗争的情况,迎接部队出山,参加渭华起义。5月6日,他带领该部教导营经石头峪进入高塘。5月16日,许旅主力抵达高塘,成立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王尚德在政治部负责民运和宣传工作,并出席了在高塘镇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人民在革命军支持下用武器埋葬旧世界,打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下。他还在会前表演口技助兴,表演完毕,又给大家讲解这个节目的意义。他说:“军阀混战,反动派天天叫喊反共,就像狗咬仗、驴叫唤一样,只会大叫,别无他技,没有什么可怕的,迟早他们要完蛋的。”场上军民为他的技艺倾倒,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继而为他形象生动的解说所折服,纷纷点头称是,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斗志。那些天,他不顾眼睛高度近视,日夜在高塘、崇凝两原及赤水之间跋涉,发动、指导农民进行武装暴动。

6月中旬,在农民武装暴动的高潮中,王尚德在华县圣山村,坐镇指挥高塘、圣山一带的农民进行武装示威,捕捉土豪劣绅。

6月20日,宋哲元部向革命军进行武装进犯,王尚德英勇地投入了战斗,在箭峪山口的阵地上用手榴弹和石块阻击敌人,激战竟日,夜间在草丛中露宿。在争夺箭峪西侧铁甲山阵地时,战斗异常激烈。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身受重伤不下火线,顽强阻击敌人。薛是王尚德在高塘地区发展的农民党员,有胆有识,对革命无限忠诚。战斗结束后,王尚德得知薛伤势严重,心急如焚,同杨晓初(工农革命军财经委员),王云(团华县县委书记)在箭峪一带山地寻找。当他们发现薛自爽时,薛已经牺牲。他们掩埋了战友的尸体,追赶部队。王尚德随司令部撤入商洛,在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端午节,部队进驻洛南县的两岔河,他同司令员唐澍等一起慰问伤病员,鼓舞士气。其后,由于强敌包围,唐澍、李大德等牺牲,工农革命军转至蓝田县张家坪休整改编,开赴鄂豫边界一带。王尚德随军长途跋涉,向豫西南一带进发。

1928年8月间,部队进驻河南省邓县县城,不料被当地豪绅地主操纵的红枪会武装包围。夜间,王尚德潜出县城,设法通过黄埔军校的故旧,寻找当地党的地下组织以营救部队。他几经曲折,找到中共南阳特委书记郝久亭。郝即派特委交通员姚丹村速赴邓县。姚到达时,工农革命军余部已被红枪会诱骗到急滩河,面对无数不明真相的红枪会员和群众,只得交械,分散隐蔽斗争。王尚德、郝久亭听了姚的汇报,嗟叹不已,万分痛惜。

此后,王尚德化名汪琴声,在郝久亭的安排下,在唐河农村以教私塾为职业,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即被选为中共豫西南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1928年11月26日,王尚德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转押至开封、南阳等地,经党组织营救,于1929年春获释。中

共邓县地下组织负责人郭绍义安排他在县立第一小学任教。他从进步学生中培养、吸收党团员,同吴寿青、李一平(当时都在该校任教)等在短期内建立起了邓县一小的党、团组织。1929年秋,策动了邓县人民驱逐反动县长边万选的斗争。

1929年5月,豫西南党组织得到恢复,建立起中共唐河健全委员会。9月,改建为中共南阳中心县委,王尚德被选为委员。这时,杨虎城新编十七师驻防南阳。由于杨部中许多中共党员是王尚德的战友和学生,为了使地方党与杨部中的党组织更好地配合,这年冬,中共南阳中心县委决定调王尚德到南阳开展工作。他开始在南阳中学任教,不久,党组织决定在杨部办《宛南日报》,遂调他任该报编辑。他利用《宛南日报》这块阵地,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新军阀的黑暗统治,指导和声援当地人民的革命斗争。1930年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宛南中学发生了驱逐反动校长王言的学潮。嗣后,共产党完全控制了宛中的局势。为了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又调王尚德到宛中工作,调宛中教员宋绮云接替他编辑《宛南日报》。

王尚德一到宛中,便积极鼓励和组织学生运动。由于他的努力,不久,以宛中为中心的南阳学生联合会建立了,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一支极为活跃的力量,宛中也成为当地革命斗争的中心。他组织学生深入农村,配合农村党的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粮食,抗粮、抗捐,并声援赊镇学生反对国民党区长李砚修的斗争。五一节前夕,他组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一举捣毁了国民党南阳县党部。

这年暑假,王尚德按照党的指示,同陈振南、马骥远等在宛中举行暑期补习班。这个补习班,名义上是对学生补习文化知识,实际上是专门传授马列主义理论,用革命理论武装青年学生,发展

党、团组织，为革命培养骨干人才。

1930年夏，杨虎城部队的地下党组织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搞军事暴动，从杨部拉出了几个连的兵力。后暴动失败，组织遭到破坏。这件事引起了杨部反动分子的警觉。不久，杨部军法处长李连成和南阳县长杜保田带领百余名武装，突然包围了宛中，逮捕了王尚德。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名学生（其中九名是共产党员）。

王尚德被关押在南阳监狱。杨虎城部队中的许多地下党员和当地学生到狱中探望他。他对来探望的青年同志总是热情鼓励。他说：“我年纪大了，又被他们锁住了手脚，但我看到我的许多学生参加了革命，心里很高兴。革命力量壮大了，我即使死了也心安。你们年轻，要好好干革命，中国的前途靠你们呀。”他极为关心被押在县看守所的学生，托来看望他的同志为这些学生购买革命书籍，并秘密写信给他们，教育他们要提高警惕，识破反动当局的伎俩，保持革命气节；鼓励他们要看到光明，通过合法斗争争取出狱。这些学生在他的关怀教育下，对反动当局进行了巧妙的斗争。反动当局审问他们：“你们什么时候加入CP？”大家佯装懵懵懂懂，异口同声地回答：“听不懂你的话！”反动当局只好问：“你们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大家早已经统一了口径，都说“我们没有人参加共产党”，弄得审讯者束手无策。这些被捕的学生，经党组织营救，很快出了狱。

1930年10月，南阳和鄂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合并，建立中共鄂豫边区特别委员会，并相应建立鄂豫边区革命委员会，创建了鄂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此时王尚德还在狱中，仍被选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这年11月，杨虎城部队离豫入陕，释放政治犯，王尚德于年末

获释。出狱后,他依依辞别了豫西南的战友和学生,返回陕西。

六

1931年春,王尚德更名王璋峰,返陕到达西安,即与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良取得了组织联系。不久,受省委派遣,他暂住凤翔杨虎城部十七师军声报社,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史唯然等一起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作。5月,王尚德被党组织调回西安,同宋绮云一起办《西北文化日报》,宋任该报编辑部主任,他任营业部主任。这期间,赵和民等在华县高塘一带同以恶绅王佐为首的清乡团作斗争。王尚德全力支持这场斗争,在《西北文化日报》上揭露清乡团的罪行,呼吁社会公正舆论声援渭华一带的革命人民。他同宋绮云一起,通过南汉宸(中共党员,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给渭、华两县委派了进步人士任县长,关押了恶绅王佐、郭毓坤、郭瑞周、史子衡等,迫使他们给受害的革命群众赔偿了损失,严重打击了清乡团的嚣张气焰。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王尚德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思考着拯救祖国的良策。他密切注视着中日双方的言论和行动,注视着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的态度。12月5日,他发表了《日本出兵东省的面面观》一文,详尽地论证了日本侵犯我国东北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根源及其野心,愤怒地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提出了去日本考察、设立日本研究会,进而确立抗日教育等抗日主张。此后,他一方面同宋绮云一起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刊发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文章,一方面在家乡经办赤水职业学校,安排共产党员姚明学任赤职校长。选聘共产党员

杨纯德、李澄民、王侠先、王允端(王尚德的儿子)等任教员,除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外,还动员当地农民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赤水一带农村恢复平民夜校,教唱救亡歌曲,上集镇作抗日宣传,号召群众抵制日货。

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被捕叛党,省委和关中地区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此时,王尚德的公开社会职业是西安高中事务主任,他一时找不到党的组织,且随时亦有被捕的危险,不得不离开西安,于1933年冬返回家乡。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准备莫过于为革命培养干部。于是他决定在家乡创办赤水农业职业中学(简称“赤农”)。创建、发展一所新型的、以培养革命人才为目标的完全中学,是王尚德多年的夙愿。初创赤职时,他就经常对朋友和学生讲:要创办一所革命的学校,这所学校不仅要区别于一般学校,而且要比一般的学校办得更好。他还说:我们这个学校要由高小到初中,再到高中,逐步发展。只是由于1925年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传播马列主义,建设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上面。同时,也因扩建学校的经费一时无力解决,故当时再没有按原计划招收中学班。渭华起义失败之后,他远离家乡,赤职备受摧残,这一宏愿无法实现。现在他又回到家乡。其时他已42岁,立志实现自己的夙愿,并以此作掩护为党工作。

然而,在30年代贫穷的陕东农村,创建一所私立的完全中学是极为困难的。欲沥先蓄,未雨绸缪。王尚德决定先在当地创办一批实业,一方面服务于当地群众,一方面为建校积累财资。他利用滚雪球的办法,在渭南县城和赤水一带先后办起秦峰木厂、赤水棉花运销合作社(内设有轧花机、打包机,购买了发电机作动力)、信用合作社、皮裘厂、砖瓦厂,修筑了慈惠渠,并利用水力开设了农丰面粉厂。在采取这些自力更生手段积累资金的同时,王尚德向

省政府申请必要的补助,并向地方军政各界广泛筹资。1935年,他通过于右任的关系,从省主席邵力子处得到一定数额的资助。并得到十七路军将领赵寿山等一定数额的资助。他还动员丰原西伍村一个孤寡老妇,临终前将20余亩土地捐给学校,以地租收入做经费。为了表示对这位慷慨仗义的老人的敬意,在每年清明节,他都组织学生为其扫墓。

1935年末,王尚德得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心情极为振奋,他加快了创建赤农的步伐。在积累、筹集了一定的资金之后,1936年秋,赤农正式开学。王尚德任校长兼语文教员,赵葆华被王尚德的创业精神所感动,辞去上海力达学院教师之职,欣然来赤农任教导主任,还选聘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教员。学校除开设文化课外,还设有“园艺”、“农作物”等课程,实行教学与实验相结合,在校舍西侧开辟了面积约20余亩的农场,作各种农林科技试验。由于经费来源渠道多,有保证,教职员工思想稳定,努力工作,贫苦的学生也能得到免费上学,深受群众欢迎。唯独王尚德自己只知日夜辛劳,仍不取一文薪金,每日三餐在家。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正在形成,共产党利用这种有利时机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这年3月,在赤水已建立中共渭华工委,刘玉堂任书记,王尚德过去的学生王杰、姚明辉、袁健任委员。刘玉堂来看望他,二人分析了渭华一带的形势,研究了发展组织、建立抗日团体、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等问题。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王尚德决心把赤农建成陕北抗日群众斗争的中心。他虽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组织上的关系,但仍热诚地关心、帮助赤农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他将在赤水棉花运销合作社工作的共产党单德敏调到赤农当工友,经他介绍,使其与姚明辉接上党的关系,并帮助他们在赤农进步学生中培养、发展

党员。这年8月15日,姚、单二人在赤农接收了姚碧池、肖金、左福太、樊保书四名进步学生入党,建立起赤农党的支部。赤农这所革命学校,如同20年代的赤职一样,又成为党在陕东一个重要的据点。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郭严夫(郭绍义)、刘庚、沈志民(宋仁远)、黑先生(赵希愚)等任陕东特派员来渭华一带工作。这些同志都被省委直接介绍给王尚德,然后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在赤农立足,开展活动。王尚德通过多种巧妙的方式掩护他们,并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张浩、张达志及外地一些同志在来往延安和西安时,也曾来赤农秘密停留,多以赤农和集成小学教员的身份暂住。

王尚德受党中央在延安创建抗日军政大学的启示,决定效仿抗大,对赤农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决心把赤农办成抗大式学校。那时,他常深情而风趣地说:陕北办了红大(抗大的前身红军大学),我们在这里办赤大。

他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在课堂上,把社会科学作为语文课教学内容,以延安发行的《解放》周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统一战线教程》、《什么是列宁主义》、《历史唯物论》等书刊作为教材进行讲授。1938年上半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之后,这篇著作便成了语文课的主要教材。除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及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的教育外,他还组织师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政治学习、研究活动。王尚德常说:“有胆识的革命人才,用传统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是培养不出来的。”他一贯主张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汲取知识,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思考探索、解决问题。他一再提倡让学生对几种相反的观点进行辩论,在争论中根据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独立思考,独立分析问题,从而判断、鉴别其正确与谬误。他组织学生办墙

报,开读书会、讲演会、辩论会,通过这些方式对抗日战争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为什么要坚持持久战?”“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什么是错误的”等,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

他让学生走出校门,去做社会工作,在火热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此间,赤农师生中已建立起抗敌后援会、抗日工作团等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他们以这些团体的名义上集镇、下农村,对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抗日动员,宣传民众,唤起民众。抗日工作团带着歌咏队和射日剧团,向群众演出了大量的抗日歌曲和剧目,他们在赤水镇周围的各个村庄都建立起农民夜校,向农民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们还进行广泛的抗日募捐活动,足迹远涉到秦岭深处的青岗坪及华阴一带农村。

1938年初,日寇侵占风陵渡,逼近潼关。为了在家乡一带创建抗日游击武装,王尚德率先在赤农开设军事课程,对师生进行军事训练。他将学校改为军事编制,全校统编为一个抗日大队,他任大队长,聘请党员军事干部赵全璧任副大队长兼军事教官,宋蔚青、高云峰等为军事教官。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长由各班级任教教师担任;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多由党员学生担任。他利用统战关系从县政府和地方上搞到了一批枪支弹药(每人一支枪),在县城郊挖掘战壕,进行实弹演习。

王尚德主持下的赤农,在1937、1938年间,成了陕东一面鲜红的抗日旗帜。校园里充满了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象。在王尚德关怀下,赤农党的地下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1938年6月,已吸收新党员40余人,建立起了中共赤水特别区委,党的抗日干部迅速成长了起来。这时,党领导下的渭南抗日群众运动正向纵深发展,王尚德积极配合中共渭南县委书记沈志民,从赤农抽调了袁健、蔺奉璧、权秉华、张克彬、左福太、王运来、姚碧

池、姚江森、肖金、安子修、张希祯、郭天赦、郭景贤、刘健(女)、孙开田、袁景俊等一大批党员学生到县抗日义壮队、县民众教育馆及崇凝一带许多小学去工作。这些同志在不同的岗位上对推动当地的抗日群众运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输送人才。对延安,王尚德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那里聚集着他的许多革命战友和学生。西安事变之后,他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女王允端、王允翕(王铁)全都送到延安。临行时,他写信给董必武和张浩说:“我把孩子交给党,托您们关照、教育他们”。董老对王尚德经常怀念,直到全国解放之后,还多次向高克林、金广印等打听王尚德的情况,深情地讲述1922年在武汉派王尚德返陕建立团组织的一段经历。1937年秋,河南省邓县的革命青年孟兆莲(女)、李克林(女)、李蒙岩等(他们都是王尚德在邓县一小的学生)来赤水,王尚德通过宋绮云,将他们送往陕北。1938年下半年后,他同中共渭南工委书记王杰多次商议,又将一大批赤农进步青年(多系共产党员)送往延安。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党在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

1939年至1940年夏,赤农的二八级、二九级学生陆续毕业。这两级学生各60余人,其中均有4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余的全部都参加了党领导的群众救亡团体西北青年救国会。他们绝大多数都被党组织陆续调出学校投入抗日斗争的烽火之中。

王尚德在家乡创办赤农的同时,除对学生及当地群众进行抗日教育外,还密切地关注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1936年6月,出席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西北代表返回西安之后,秘密发展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联合会组织。通过宋绮云的介绍,他与赵葆华等即加入了该爱国团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震惊

世界的爱国壮举,使王尚德大为震动,他同赵葆华急赴西安,要为解决这一关系祖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贡献力量。他被任命为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委员,在西安同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开展统战工作。此时,他同党中央社会部的吴德锋及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等有来往。这年末,党中央派张德生、贾拓夫、汪锋、欧阳钦等来西安重建陕西省委,贾拓夫见到了王尚德,与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12月29日,党领导下的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成立,王尚德被党组织调该会工作。这期间,张宗逊由延安到西安治病,通过红军驻西安联络处与王尚德、张浩如、田涵荣亲切会见,叶剑英出席作陪。1937年1月初,他受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王炳南的派遣,赴乾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任乾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迅速建立起该县各界的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抗日报纸《人民日报》,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培养抗日宣传骨干,推动了乾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1937年4月,根据党的指示,王尚德返回赤农工作,在渭华一带广泛联系爱国进步人士,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活动。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之后,他在当地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9月18日,经他倡议,在东赤水的红庙召开了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大会,渭华一带参加大会的计有20余个抗日爱国团体,群众达万余人。他在会上发表演说,阐述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大会发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开放党禁,以利全民抗战总动员。10月,他在赤农倡议召开了渭南各界抗日救国座谈会,与会者有各界知名人士60余人。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论述了停止内战、积极抗日的必要性、迫切性及发动抗日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深受与会者赞许。

七

王尚德在兴办赤农的同时，还同中共党员贺修之在渭南县城与当地进步人士何明珊、俞祇天、朱立哉、宋蔚青、梁俊琪、雷五斋、刘建侯等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贯彻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涉问县政，以“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废除苛捐杂税……赈济灾荒”，减轻人民负担，发展抗日群众运动的大好形势。他们热诚拥护、支持抗日县长崔孟博（1938年任渭南县长）的工作。与反动县长强云程、向心堂、刘兴沛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强云程在30年代初期第一次任渭南县长时，曾做出了一些好的政绩，受到人民好评。1936年初，经王尚德出面活动，他第二次出任渭南县县长的职务。不料他这次一上台，却以“颇孚众望”自恃，面目大改，肆意榨取民财。1937年秋，他不顾王尚德多次告诫，强令对每亩农田增加一元二角附加税。王尚德义愤填膺，利用《渭南报》发动了驱逐强云程的斗争。强采取镇压手段，查封了《渭南报》，拘禁了该报社社长刘建侯。参加“驱强”的士绅有的惧于暴政，有的被强所收买，纷纷退出斗争行列。王尚德、何明珊等坚持斗争，迅速组织起经济清算委员会，查出该强20万元的重大贪污赃证，在全县布告揭露，将他逐出了渭南县。

向心堂1939年初出任渭南县长，一上台，就倒行逆施，对全县的群众抗日运动进行镇压。这年冬，一架被击伤的日机坠落在县城西北角的车雷村，他不组织武装围歼，听任另一架日本飞机将驾驶员连同武器全部救脱。事后，向心堂竟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谎报战功，佯称该机系他率部击落，以骗功受奖。这个事件激起了渭

南人民的强烈不满。王尚德又一次联合何明珊等进步人士开展驱逐向心堂的斗争。一天,向心堂刚由乡间返城,王尚德便采用断然措施,通知县义壮队队长宋蔚青率部解除了县府政警的武装,软禁了向心堂。向玩弄惯用手段,忙令县府官膏局给有关士绅送礼50块大洋,妄想以此通融,了结怨愤。王尚德通知各士绅将礼全部收受,然后他们把一袋袋白花花的银元摆到向心堂面前,王尚德指着这些赃物讥讽道:“请问抗日英雄向县长,这一壮举莫非也向省政府报功请赏?”向心堂弄巧不成,灰溜溜地溜出了渭南县城。

王尚德的革命活动引起了陕西国民党顽固派和敌特组织的严密注意。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之后,胡宗南便将王尚德及赤农作为监视、防范、迫害的重点。王尚德按照党的指示,与国民党顽固派和敌特组织进行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年春,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邓仰之多次来赤农短住,劝王尚德、赵葆华加入国民党。开始,王、赵婉言推辞说:“加入党派乃政治大事,待慎重考虑后再议”。后来,邓责问王、赵说:“你们既不是共产党,又不是国民党,给谁服务呢?”王尚德听了哈哈大笑说:“我们办教育的人只知道服务于社会,别无他求。我国历史上不是有个大禹吗,他治理黄河,曾三过家门而不入,请问他加入过何政党,他给谁服务呢?”邓仰之哑然,只得“待后再议”。

这年春的一个下午,陕西省教育厅一个姓芦的督学(系国民党特务)来赤农“视察”,要翻阅学生的作文、日记。赤农学生的作文,几乎篇篇都体现着共产党的抗日言论和主张,是绝不能给敌特看的。王尚德看出了这个家伙的用心,巧妙地回绝说:“芦先生忘记了,咱们这所学校是农业中学,农业中学学生的成绩不在作业本

上,而在农场,请芦先生早点儿休息,明早就带你参观学校的农场和水利设施。”第二天早上,他令工友提前两个小时打起床铃,将芦唤起随师生上操;操后带芦察看农场和校外坡原上的慈惠渠,颠颠簸簸一直溯到七八里外慈惠渠的源头。将芦折腾得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王尚德将芦领到自己家里,专以玉米糕、汤“款待”。芦吡牙咧嘴,勉强应付几口,佯称吃饱先返校,企图在校用餐。他刚踏进学校饭厅门,王尚德便后脚赶到,对赵葆华说:“芦先生已在我家用过饭了,不必招呼了,芦先生请到房子用茶吧。”芦受不了如此“盛情款待”,只得另寻借口,提前离开赤农。

从1939年夏起,王尚德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政策,将一批共产党员陆续打入国民党各种基层组织。这年暑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史开明、庞鸿二人窜入赤农,令赤农当即建立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简称抗先,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领导的青年团体),派代表赴西安参加这个组织的省代表会议。王尚德答应由自己负责建立该组织,瞒过了史、庞二人。当时赤农党支部的负责同志对党在新形势下策略上的变化不理解,对参加国民党的组织一时在思想上转不过弯子。王尚德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他打比方说:猎人上山打虎,总要披张虎皮做伪装,他们很聪明,不伪装就会被老虎识破,难以捕获。我们若不参加这个组织,人家就会把他们的人派来,那就麻烦了。再说,我们参加了,也好摸清他们的阴谋,这些同志思想通了,他们在党支部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按照王尚德的意见,派党支部书记吉志发和党员姚碧池二人参加了陕西省抗先团代表会议。此后,国民党、三青团省、县党部、团部先后在赤农建立党、团区分(队)部。这些组织全部被赤农党支部所控制,领导人全由共产党员充任,表面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进行的全是共产党的活动。

1941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强令王尚德安插一名姓冯的特务做赤农教师,这个家伙到校不久,就被赤农党支部以“才能过低”掀起学潮赶跑了。为了保护赤农党支部,王尚德做出一个假姿态:宣布开除这次学潮的“首要分子”张思孝(党支部书记)、吕志贤、刘济民等四人(均系中共党员)的学籍。他暗地里对这四人说:“开除是假,保护是真。你们没有经验,我怕上边逮捕你们,快离开学校躲避躲避。待我打听没有危险时,就叫你们回校上学。”过了一个月,这四人又安全回到了赤农读书。

胡宗南不仅通过特务系统对王尚德及赤农党的组织进行监视,而且派他的心腹部队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正先)驻防渭南。自1938年秋起,该师师部长期扎在赤农,他们占住校舍,乱拉桌椅床凳,把农场做靶场,肆意干扰、破坏学校的正常秩序。王尚德多次与该部发生争执,痛斥他们的军阀作风。一次,该部换防,一个姓高的副官在保长带领下,又要占住赤农校舍。王尚德答应可挤出十间,但号房子时,他们得寸进尺,几乎要将全部房子占用,引起了师生的强烈义愤,与高发生争吵。王尚德闻讯赶到断然回绝说:“这是学校,不是兵营,不准驻兵!”高副官说:“王先生不是答应我们十间吗,那就十间吧。”王尚德答道:“不守信义的是你们!”高副官说:“王先生别生气,部队到地方,地方总得给方便么。委员长不是训令我们,国难当头,军事第一呀”。王尚德不屑一顾,反诘道:“‘军事第一’,不等于军队第一!”高理屈词穷,这次终未在赤农驻扎。王尚德的正义斗争迫使师长李正先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1940年春节,李正先为了缓和和王尚德的关系,特在赤水河东的水城堡设宴招待王尚德及地方知名人士。王尚德见了请帖,说:“军队风气太坏,我不愿见他们。”宴前,李正先派员迎接他,他避而不见,终不赴宴。李正先由此更加痛恨他。

王尚德就是这样采取多种方式与国民党顽固派和敌特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敌人数年刺探不出赤农的中共地下组织。

八

1940年冬，狡猾的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组织使出了新招，国民党渭南县党部调统室以请吃饭、找工作为诱饵，收买了赤农抗先团负责人牛含珍。这个叛徒供出了赤农党员张思孝、刘德兴、王秉钧、李高见等，为了表示效忠，竟无根据地王尚德、赵葆华也以“共党分子”出卖给特务组织。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5月29日，他们把魔爪伸向了赤农，胡宗南第一师逮捕了王尚德、赵葆华及党员学生刘德兴、贾增东和非党学生康均周等五人。同时以“奸党要犯”遭敌逮捕的还有华县的进步青年杨兆荣、高醒天、程云蒸等。显然，这是特务组织蓄谋已久的行动，其罪恶目的是妄图从他们身上开刀，将渭华一带的党组织一网打尽。起初，他们被押在华县东城外西寨堡（胡宗南第一军第一师特务营驻地）。当夜，第一师政治部秘书主任王涤欧、科长李培升审讯王尚德，要他供出渭华一带共产党的组织。王尚德回答说：“我过去是共产党员，陕西的共产党起根发苗，就是我从上海引进的。可是现在没有组织，啥也不知道！”他进而责问敌人：“这些年，我在赤水办学校，办公益事业，这难道也叫犯罪？犯的是哪条罪？”王涤欧、李培升进而威逼他，他怒斥敌人道：“枪在你们手里，要杀就杀，何必猖狂！”王、李被他的凛然正气所压倒，自知啃不动这根硬骨头，只好罢审。不久，敌人就暗暗把王尚德转押到西安太阳庙门街的军统局西北特种拘留所。这个所谓特拘所，实际上是国民党陕西省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狱，直接受胡宗南指挥。这是一所惨无人

道，暗无天日的真正活地狱，专门拘禁、残害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王尚德一被投进这所魔窟，就被砸上了沉重的镣铐，他肉体受着折磨，心中燃烧着怒火。

特务组织把这件案子看得很重。所以，一到特拘所，就对王尚德进行审讯。这次，敌人使出诈的一手，说：“今春，你跟赵和民、高醒天、杨兆荣、师国康在高塘开的是啥会？”他听了冷笑道：“嘿嘿，罗织罪名，枉费心机！没事！”敌人点出叛供的几个党员姓名，要他招认。他断然否认：“几个书生，他知道共产党是干啥的！”特务说：“你那赤水农校红成那个样子，能没有共产党？”他责问到：“‘红’咋个讲？是指抗日宣传？还是指组织抗日游击队？莫非抗日有罪，卖国残杀同胞有功！岂有此理！”特务问：“你既不是共产党，为什么把女儿送到陕北去了？”王尚德听了淡然一笑，答道：“人常说‘子大不由父’么，这有啥奇怪的呢？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不是也到苏俄学习过吗？请问这该作何解释？”特务和打手们恼羞成怒，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他毫无惧色，忍着疼痛斥骂特务。每次提审他，他都满腔义愤，揭露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的罪恶阴谋，戳穿皖南事变的真象，指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消灭共产党的一场血腥大屠杀。审讯室成了他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讲坛。每次提审，都以毫无结果而告终。

皮鞭、老虎凳等酷刑失去了作用，特务又换了一套“软”的办法。一次，由胡宗南亲自出马劝降。因王尚德早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候补执委兼农民部长，胡宗南这次出面，就以陕政后继者的身份，装出一副尊重老前辈的面孔。王尚德一进门，胡宗南客客气气地让座，敬烟。王尚德显得很豁达，让座就坐，敬烟就抽。胡宗南假意寒暄几句，就滔滔不绝地大谈大革命时期，以

示亲近,并恭维地说:“在陕西,你老先生威望极高。”王尚德只用一个“哼”字回敬他。胡诱惑说:“老先生还是自首的好。年岁高了,给你个应得的荣誉地位,颐养天年嘛。”王尚德淡淡一笑,不再理胡。胡宗南没有捞到什么,只好“送客”。

顽固派和特务黔驴技穷,企图用长期的囚禁来软化王尚德的斗志。敌人送他报纸读,要他写日记,王尚德看了敌人的报纸后说:“全是一些鬼话。”兴趣来了,他也写写日记,但不会投合敌人胃口的,有时不免明枪暗箭地刺敌人几下。敌所长看了他的日记,眉头紧锁,恶狠狠地下批语道:“坚不吐实,自掘坟墓!”那笔尖将纸都戳破了。王尚德看了这些批语,仰天付之一笑。

为了坚持斗争和照顾难友的需要,在封锁得象铁桶一样严密的魔窟里,王尚德以他的才智,在狱中勤杂人员中观察、筛选、争取同情者,以达利用他们为我服务之目的,当时,狱中有一个15岁的小公役员,名叫郭新民,咸阳市周陵人,家庭贫穷,无法生活,才谋事于此。王尚德主动亲近他,给他教识字,讲古文,讲中国革命的前途,启发他的阶级觉悟。郭新民亲眼看到王尚德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也打心眼里敬佩这位老人。他知道王尚德有早起喝水的习惯,就每天清早设法给他弄来壶开水。王尚德与这位贫苦少年渐渐建立了感情,就利用他为革命传递信息,为难友排忧解难。难友受刑或患病,就托他在街上购买或在狱中医疗室暗拿一些依比膏、药棉、纱布和其它药物。有的难友缺衣少被,托他设法弄来旧衣旧被。难友和外界联系的信件,托他送到邮局。王尚德和赤农及家庭的联系,几次都是通过他经田涵荣先生处接头的。王尚德出狱后,郭新民毅然逃离了这个魔窟,追随王尚德到赤农当工读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尚德被押期间,乌云笼罩着整个赤农。是年冬,赤农教员王

清源也被捕了；教育部两次通令陕西教育厅查封赤农，赤农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教员打算辞职离校，学校陷入步履维艰的境地。继任校长狄毓林多次派职员贺星垣赴西安，经田涵荣先生几经周折，方得和王尚德面晤。

王尚德得知赤农面临危境，心中极为不安，写信给狄毓林，向赤农师生问好，恳请他们忍辱负重，克服重重困难，把赤农维持下去。他鼓励师生们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

日月荏苒，但获释杳杳无期。王尚德心急如火，在狱中常自叹息：“遨游路远兮，何日还乡？”狄毓林和赤农的师生们没有辜负王尚德的嘱托和希望，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历尽艰辛，取得了社会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援助，把赤农这个革命阵地保全了下来。1943年夏，李高见等四名共产党员从河南省汝阳园艺学校毕业，回母校赤农工作，使赤农增添了一批生力军。1945年春，李高见担任了赤农教务主任。他们和狄毓林积极配合，艰苦奋斗，使赤农在逆境中得到了发展。1944年秋，赤农附设了初中班和五年制农业中专班；1945年夏，开始招收高农班学生。

王尚德被捕后，党的地下组织多次设法营救，也曾通过于右任保释，但胡宗南认定王尚德是中共在陕东的显要人物，控制极严，终因渠道难通而未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通过西北文化日报社具保，王尚德才获得释放。他身陷囹圄长达四年之久，在狱中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

九

王尚德返回了赤水，赤农的师生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迎接他们

的老校长,家乡的男女老少也欢喜得奔走相告。“王校长回来了!”“璋峰回来了!”一时成了赤水乃至渭华一带的特大喜讯,人们兴奋地把日本投降和王先生回来这两件事看做双喜临门。这时,赤农新增设的高农班新生刚刚入学,王尚德看到自己日夜为之牵挂的赤农在疾风暴雨中得到了发展,心中有说不尽的喜悦。他吟诵曹操的《龟虽寿》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自励,决心为赤农的更大发展大干一场。他和狄毓林、李高见等对赤农的发展作了一番扩建的规划,描绘出一幅更为壮丽的蓝图。为了扩建赤农,他又四方奔走,筹集资金。对于建房木材,他们决定利用当地资源,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解决,王尚德联络地方知名人士和地方保甲,建立起渭华两河造林公司,自任总经理,李高见等任总工程师,这年冬及次年春发动当地群众,自带干粮,沿赤水河两岸,植树造林数万株。

此时,王尚德仍与敌特进行着斗争。他刚返赤水时,发现集成小学(由赤职改名)的校长刘寅岑在政治上靠近国民党,排挤走了共产党员教师姚碧池、黄有馥,极为愤慨。即上县城要求县教育科将刘调走。县教育科科长推辞说“小学校长乃县府委任,得县长批准。”王尚德说:“集成小学是我办的,是私立的,关门都由我!”回校后,他立即策动驱逐刘寅岑出校,经党内同志劝阻,他改变了与敌公开对抗的方式,对刘约法三章,要刘必须安排姚、黄为教员,选聘教员由姚决定,不得干预。这实际上是将刘架空,让他做个挂名校长。

为了保护王尚德,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汪锋、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杨克分别指示王杰和中共渭南县委书记权秉华通知王尚德进陕北边区。王尚德对党的关怀极为感激,但他一方面觉得自己不同于一般同志,目标过犬(他有眼睛高度近视的特征,且认识他的

人又多),不易通过敌封锁线,还会给随行的同志带来危险;另一方面,赤农因他的回校,正历黄金时代,充满着勃勃生机,新的一座教学楼正在筹建之中,他放不下自己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离不开和他血肉相连、朝夕与共的战友与学生,所以恳切地向组织讲述自己的意见,终于未能成行。1946年春,王尚德着老伴去中共陕西省委工委所在地马栏,工委书记汪锋电告他的女儿王铁,母女在马栏相见。王铁要母亲回家后,千方百计说服父亲来延安,她对母亲说:“父亲年龄大了,我和哥哥都在那里,我们也好照顾他呀。”王尚德听了老伴的转告,复信给女儿说:“我何尝不想来延安呢,只是学校正要扩建,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我的事业呀。”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对国统区加强法西斯统治,暗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陕西,胡宗南也蠢蠢欲动,打算对王尚德下毒手。这年7月,陕西省国民党特务指挥机关专门召开会议,西安特科驻渭调查组组长宋翔生、国民党渭南县党部书记长师仙洲、渭南县三青团干事长宋雪天、渭南县长刘衡等反动骨干分子共同策划,决定暗杀王尚德。8月,他们利用赤农放暑假之机,先派遣特务化装成摊贩,在赤水一带走乡串巷,日夜监视王尚德。这时李高见在西安得知敌特杀害王尚德的阴谋,火急转告王尚德转移隐蔽,狄毓林亦督促王尚德从速离开赤水。王尚德说:敌人要杀我,在监狱早动手了,何必要等到今天。何况胡宗南在劝说我时,还假意恭维我威望极高。因此,估计敌人刻下还不至于下毒手。可以等两天再看。

这时,党中央获悉王尚德的处境十分危险,即电示关中地委设法从速营救脱险。汪锋与王杰等即按中央指示,积极采取行动。但当营救工作即将进行时,阴险狡猾的敌人抢在了前头。8月13日清晨,特务段振武、董文宏、尹克贵闯入赤水,其中一人走进王尚

德的住室,佯称:“王先生,校外有人要见你。”王尚德随之走出校门,另二特务一齐尾随他,要他向学校西侧走去。王尚德警觉到了敌人的阴谋,满腔怒火,厉声痛骂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行至水渠边时,他拒绝前行,敌特胁迫他,他奋力抽打敌特耳光,喝令他们“要杀就杀!”敌特段振武怕在此地久拖引起变故,便仓皇举起了手枪,罪恶的子弹射入王尚德的头部。王尚德壮烈地倒在水渠之中。

王尚德一生对陕西地区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农民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以学校为阵地,为革命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有的人才。他的崇高的革命品质,主要表现在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在革命事业上的公而忘私。他一生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中,采用多种方式保护了党的组织,保护了战友和学生,但却不注意对自己的隐蔽,在对敌斗争时常采取公开对抗的方式。这也许是他的疾恶如仇的刚烈性格所致。王尚德英勇地牺牲了,他的革命事迹一直在家乡人民中间广泛地传颂着。王尚德不愧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应当永远学习他、纪念他。

(原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张平 王奉信 执笔)

宋 绮 云

(1904—1949)

宋绮云，原名元培，字复真。江苏邳县人。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1929年冬经中共党组织批准，投往杨虎城部。1931年任第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35年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1936年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任中共陕西临时

省委委员。1939年任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政治教官。1941年7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9月在重庆遇害。

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宋绮云，1904年生于江苏邳县杲堂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宋家祖祖辈辈给当地豪绅杲氏当长工，终年劳累仍不得温饱。勤劳善良的父母及兄长盼望改变贫境，把希望寄托在小绮云身上，一家人含辛茹苦，积攒一点点钱，供他上学读书。

1917年宋绮云就读于离家十多里的土山峰阳小学，因家贫无力缴纳膳费，只得隔几天回家拿些粗粮饼、山芋、咸菜等，带到学校食用。因为贫穷，经常受到富家子弟的耻笑凌辱。他沉默寡言，奋

发苦读，加上天资聪颖，学业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①。

1920年，宋绮云高小毕业后，步行300余里，考进清江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当时江淮地区为军阀马玉仁所盘踞，人民生灵涂炭，加上水灾连年，颗粒无收，民不聊生。六师校长徐慕杜，思想守旧，治校专横，学生在其威严统治下，敢怒而不敢言，背地里称他为“小皇帝”。一次周会上，他又借训话之机，吹捧马玉仁的所谓“德政”。宋绮云非常愤慨，毅然登上讲台，列举军阀罪恶，据理驳斥了他的谬论，受到了全校同学的赞扬。一个星期六的晚间，宋绮云又约集同学数人，在清江西关普应寺古庙中集会，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21年暑假期间，宋绮云和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进步学生郭子化、丁毅忱、李觉民、吴钟英等，在郭子化家中聚会，研讨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绮云说：“当前我们的国家，内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则列强覬覦，肆意欺凌。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家危亡，迫在眉睫，若不急起推翻军阀，与民更始，举国团结，外御其侮，则前途不堪设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舍此别无他途。”^②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六师全校师生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宋绮云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了极大的悲恸，并对临时执政、封建军阀段祺瑞误国殃民行为作了义正词严的指责。

1925年6月，宋绮云于六师毕业，返回邳县，任县立土山高小国文、历史教员。在课堂上，他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启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在课余，他经常组织学生阅读报纸，讨论时事，给学生教唱和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介绍秋瑾等辛亥革命

① 参考宋绮云之二兄宋曜坤的回忆材料。

② 参考丁毅忱、李觉民的回忆材料。

命烈士的斗争事迹，教他们朗诵爱国诗词。

1926年初冬，宋绮云接郭子化自武汉来信，得悉北伐军已于10月上旬胜利攻克武汉。这一喜讯使他深受鼓舞，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奔赴武汉，经郭子化引荐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1927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和军校同学一起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回师武汉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军官教导团。7月，武汉政府叛变后，他们准备参加南昌起义。8月3日部队到达九江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指示一批党员返回原籍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宋绮云和石玉如、张凤石等被组织派遣到南京，与南京地下党员康靖人、郭清洁、曹冷泉等秘密成立了南京党的临时组织——清凉山小组。后，党中央派孙津川来南京整顿党的组织，在浦口南面芦苇滩里，召开了中共南京市委扩大会议，出席人员有孙津川、宋日昌、宋绮云、康靖人、姚佐唐、曹冷泉、傅金凯、贺瑞林等20余人。会议主要研究了党在当时形势下的工作，并提出了“不遗余力地打入敌人内部，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的行动方针。宋绮云由组织安排在南京伪警察局任警察大队长，以便掌握敌情，掩护斗争。1928年春，南京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决定逮捕宋日昌的密令恰好落到宋绮云之手。他连夜赶到宋日昌的秘密住所通知转移，使敌人逮捕计划落空。组织鉴于宋绮云也有暴露身份的危险，于是调他离开南京到邳县工作^①。

1928年4月宋绮云回到邳县后，参加以李超时为首的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的领导工作。李超时调东海县后，由他主持特支工作。同年秋，建立中共邳县县委，宋绮云担任县委书记。他通过关系打

① 参考曹冷泉等的回忆材料。

入伪邳县警备大队，任警备大队第二中队长。在这期间，他同大队副徐怀云、第一中队长宋学珍及姜景义等人，组成4人军事小组，以极大的精力做团结士兵的工作，并在警备大队中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他还利用这个合法身份深入各区，了解民情，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全县党员发展到200多人。当时邳县各中、小学校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县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多是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县党部也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左派控制，革命力量迅速增强^①。1928年10月，宋绮云与他的战友，邳县县委委员、妇女会长徐林侠结婚。

邳县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震惊。1929年1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监察委员段木楨到邳县坐镇，指挥镇压革命力量。段指使徐州“剿总”刘峙驻扎运河的梁华胜团，星夜行动，拂晓包围了县城，逮捕了教育局总务主任李培南、县立中学校长佟虚吾、教导主任张继超、训育主任李广深、土山小学教师许又新、许运涵姊妹等6人。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宋绮云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步行150余里，赶到铜山县，在贺村佟虚吾家中商讨营救办法，后又赶到东海县，向中心县委书记李超时汇报。不久，宋绮云带着党的指示，返回邳县。

宋绮云回到邳县后，首先在土山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部署斗争策略，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转移。这时，敌人反共活动异常猖獗，7月底，邳县党组织又遭第二次大破坏，县委委员徐林侠、县教育局局长戴蔚侠等11人被捕。宋绮云外出活动归来，刚进入县境，即被敌人发觉，武装军警跟踪而至。他昼伏夜出，机智地应付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为了保存力量，宋绮云

① 丁毅忱、李觉民的回忆材料。

接到上级关于“所有暴露身份的同志都要离开家乡”的指示，召集尚留在县境内的党员李觉民、宋学珍等会面，布置安排了转移工作。

战斗在党的新闻战线上

1929年秋，宋绮云在敌人严密搜捕下，离开家乡潜赴北平，等待组织重新分配工作。在此期间，他一面向《大公报》投稿借以维持生计，一面到北大文学系听课，并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1929年冬，经党组织批准，投往河南南阳杨虎城部队。1930年初，经郭乐三、陈子坚等引荐，担任了《宛南日报》总编辑。1930年11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冯系军阀宋哲元、刘郁芬由陕西败退山西，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率师返陕，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绮云亦随军前往西安，主编《西安日报》。蒋介石对杨虎城早存戒心，他为控制大西北，派兵驻陕西华阴、华县一带，在潼关设立行营，任命亲信顾祝同为行营主任。顾祝同为制造反革命舆论，在西安办了《西北文化日报》。1931年夏，由于安徽、江西、湖北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顾部被调离陕西前往“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北文化日报》为杨虎城所接收，改为第十七路军的机关报^①，任命陈子坚为社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由于陈子坚是十七路军办公厅主任，社长仅是挂名，报社的一切工作均由宋绮云负责。从此宋绮云就以《西北文化日报》为舆论阵地，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直到1937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他才被逼离开西北文化日报社。

^① 米哲沅：《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顾祝同在西北文化日报社安插了不少特务和亲信。该报被十七路军接管以后,这些人采用辞职、怠工、造谣等卑劣手段,企图把它搞垮。面对这种情况,宋绮云除安排一批地下党员参加报社工作外,还吸收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进来,乘机把反动分子清除出报社。从此,《西北文化日报》逐步以崭新的版面和进步的内容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张报纸每日出版对开两张,发行五六千份,畅销全国各省,并远销到南洋等地。另外,报社还办有《边闻通讯》、《西北画报》、《地下新闻》等刊物。《边闻通讯》于1933年创刊,在银川、兰州、天水、西宁等地都聘有特约通讯记者,并派旅行记者经常到西北各地采访,每日发稿一份,供全国各大报采用。《西北画报》创刊于1934年,刊载西北各地文物古迹照片,深受各阶层人士欢迎。不少历史学家、古文物收藏家纷纷提供珍贵文物资料,对宣传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起了很大作用^①。

西安事变以前,陕西虽然在杨虎城的控制下,但它与其它国民党统治区一样,反动势力仍极猖獗。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这个阵地,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他经常采用或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揭露敌人的反革命阴谋,反映红军的胜利,把党的声音传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1932年夏初,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1933年元旦全国各大报纸在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控制下,在其“新年献词”中都大肆吹嘘南京政府的所谓“胜利”,惟独《西北文化日报》发表宋绮云亲自署名的元旦社论:《危机

① 郭子刚、曹冷泉等的回忆材料。

严重之新年》。这篇社论剖析了蒋介石连年内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特别指出了由于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致使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他尖锐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其将何以克服未来之危运?!”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西北文化日报》的《边闻通讯》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这一伟大胜利的消息。

1936年10月,蒋介石为“围剿”我陕北主力红军,专程赶来西安视察军事部署。那一天,西安各大报纸都按反动当局的规定,在头版头条以特大标题报道了“中央社”的消息;而《西北文化日报》却按宋绮云的指示把它安排在第二条位置上,并将蒋字去掉了草头,标题成了《蒋委员长飞抵西安》。当天的《西北文化日报》很快销售一空,人们争相传阅。一时,“蒋委员长丢掉脑袋”,成为全城争相传说的笑料^①。为此,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立即召见宋绮云,对其大加训斥。宋绮云沉着应付,以校对马虎难免出错为由,予以搪塞。由于省府害怕承担责任,也就未敢大肆声张与追究。

日寇入侵华北以后,蒋介石借口“攘外必先安内”,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先后秘密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阴谋,激起人民抗日情绪,宋绮云连夜带领进步工人翻印“何梅协定”原文,并提笔撰写了编者按语,邮寄散发给西北各地学校及各界知名人士,促进了西北地区对国民党妥协卖国罪行的揭露和声讨,使反动派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消息

^① 曹冷泉、郭子刚的回忆材料。

传到南京,蒋介石、何应钦之流气急败坏,限令陕西特务机关定期破案,但他们既想抓到揭发他们卖国丑闻的革命者,又不敢大声嚷嚷。

宋绮云就是这样,以笔作刀枪,以报纸作阵地,在古城西安,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为、投降政策和欺骗人民的伎俩,进行着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他撰写的《纪念坚守西安胜利八周年》、《今年国庆所感》、《何处是中国的出路》、《辟“安内攘外”之谬论》、《辟蒋介石之准备论》、《彻底肃清汉奸,拿办法西斯蒂》、《九一八五周年》、《敬悼鲁迅先生》、《募捐援绥运动》、《纪念总理与解救国难》、《危机严重之新年》等文章,对提高群众觉悟,激发西北地区革命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文化日报》在宋绮云的领导下,以更加鲜明的旗帜,出现在读者的面前。1936年12月11日晚,绮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回报社后精神无比振奋,连夜赶印出两期号外和传单。12日上午9时蒋介石被抓回西安后,西安军民就及时了解了张、杨兵谏的经过和实质,以及八项政治主张的内容。13日,《西北文化日报》又发表了《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全面论述了西安事变的起因,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社论指出:“自上月暴日驱使匪伪汉奸侵入绥远以来,举国愤慨,万众齐起,前方将士,既浴血而战,后方民众,更毁家而纾难,如此阵线,实为救亡图存的惟一办法。”“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可忍发为义举,举行兵谏,号召全陕全国同胞迅起响应。”这一天,《西北文化日报》还发表了宋绮云署名的《呼声》诗一首:

千万重的压迫,

千万重的毒怨！
民情沸腾了，
民情喷涌了。
火山上谁能施着压力！
四万万同胞，
兴起！兴起！
我们去饮敌人的血！
四万万同胞！
兴起！兴起！
我们去食敌人的肉！
只要我们铁似的意志，
山可倒，海可倾！
时候到了，
渡过这血潮，
那即是倭奴授首的时候了

13日以后，《西北文化日报》又根据事变需要，连续发表社论和专文，有《双十二兵谏的伟大意义》、《双十二革命行动之前因后果》、《一片民众解放声》、《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南京飞机政策的错误》、《还想挑动内战吗？》、《从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到自力抗战》等等。他在《剿共之停止、抗日联军之成立》为题的社论中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之天下也！谁领导我们抗日，收复失地，我们就拥护谁。”明确提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是造成日寇入侵、国困民穷的根源，只有联合抗日才是救国于危

亡，拯民于水火的惟一途径^①。

当时在南京的反动文人罗家伦之流，配合亲日派的所谓“讨逆”，炮制告张、杨的传单，用飞机在西安大量散发，公然为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辩护，对张、杨二将军的义举进行恶毒攻击。《西北文化日报》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专门发表了《汉奸理论之贫乏》的社论，指出：“罗家伦之流所以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过是为了将来日本军阀来了还可以做个名流学者、幕僚政客……，其利害关系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结合在一起而已，罗家伦自以为代表民意，丑颜抛向光亮洁明之西北天空，谁不知道他是早已被人强奸过了的！”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等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西安，向张、杨极其将领宣传党的“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使他们接受了我党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和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宋子文以及蒋本人进行了责以大义的谈判和坚决的斗争，迫使蒋接受了停止内战和联共抗日的条件。但西安有一部分军民认为放蒋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宋绮云根据周恩来关于只要我们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只要我们抗日救国的方针不动摇，我们就不怕蒋介石翻脸的指示精神，及时发表了《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等社论，反复论述依靠团结、依靠群众、依靠斗争、依靠武装逼蒋抗日的方针，明确指出：“目前我们惟一的任务是在于继续发动斗争、开展斗争、坚持斗争！而斗争之力量在于民众，民众为一切力量之源泉，民众为一切力量之动力。……惟有武装，更能增加民众斗争的力量，更能增加抗日斗争的力量。”这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鼓舞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① 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宋绮云领导的《西北文化日报》，不仅是战斗的舆论阵地，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的一个秘密据点。他先后安排很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在报社工作，如邵幼和、丁毅忱、周西林、曹绶祉、曹冷泉、陈翰伯、边西巩、张从仁、张熙嘏、刘渺森等。这些有较高革命觉悟和斗争精神的同志，以宋绮云为核心，组成了《西北文化日报》的基本队伍，战斗在革命的新闻战线上。

《西北文化日报》利用一切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中去，能在报纸上公开登的文章就公开登出去，不便刊登的文章就秘密印成传单或小册子广为散发，有时还直接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口头宣传。报社除经常编印《地下新闻》外，还先后秘密印发了瞿秋白著的《中国政府向何处去？》、云峰著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宋绮云撰写的《辩证唯物论》、《辩证法初解》等书籍，这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西北文化日报》经常遭到敌人的捣乱破坏。报社不少同志遭受逮捕监禁，严刑拷打。特务机关的新闻机构常借新闻检查名义，不让发表一些带有革命词句的文章。宋绮云领导大家作了巧妙而坚决的斗争，或者用“开天窗”来抗议，或用锤子将字迹敲打模糊，使有心的读者从模糊的字迹中仍可看出文章的内容和观点。敌人气急败坏，使出了特务的看家本领，偷偷纵火焚烧报社。宋绮云亲自带领编辑人员和工人抢救、整理，保证了报社业务照常进行，使报纸发行一天也没有停止。

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宋绮云在西安的战斗岁月中，除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新闻事业外，还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开展学运和兵运工作，从多方

面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冬,鄂豫皖苏区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列进陕南、四川,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慌忙命令四川军阀刘湘、驻甘肃的亲信胡宗南和驻陕西的十七路军,从四面包围川陕根据地,妄图一举歼灭红四方面军。在此形势下,争取和团结十七路军,就成为这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条件。中央指示西北地下党努力做好杨虎城的工作,积极配合苏区红军的行动。宋绮云和进步人士杜斌丞一起,说通了杨虎城,并派武志平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促成十七路军孙蔚如部与红四方面军的谈判,于1933年6月24日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①。宋绮云还通过武志平给红四方面军送去了川、陕、甘、宁、青军用地图和情报资料,以及蒋军的口令、信号和密码本等。当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接到这些材料时,激动地说:“感谢西北地下党的同志,你们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给予我们这么巨大的支援,真是雪中送炭,这对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最大的支援。”根据红四方面军的要求,宋绮云还通过在汉中的武志平,建立了一条西安经汉中到川陕的红色交通线,全国各地报刊、通讯器材、医药用品等就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到被敌人封锁的红四方面军中,直到1935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为止^②。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杨虎城的欢迎。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负责人陈赓派谢华、徐彬如等到西安,和在西安坚持工作的宋绮云一起,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为特支书

① 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② 以上根据武志平的回忆材料。

记,徐彬如、李木庵、金闽生、宋绮云、童陆生为特支委员。西北特支开始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领导,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派张文彬来西安负责特支工作,并明确特支工作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积极贯彻党的“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积极开展西安地区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支援中央红军。

1935年“一二九”以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为组织西北军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西北特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杨虎城的积极支持下,按照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组织章程,组成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西北特支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西救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宋绮云任西救会宣传部副部长并负责总务和联络工作。他选派《西北文化日报》的得力编辑人员,创办了西救会的会刊《救亡周刊》,并由《西北文化日报》社代为印刷和发行。不久,张学良指派由东北来陕的高崇民、车向忱、宋黎等,在西安发起成立了东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救会)。

在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在西救会、东救会的共同组织下,1936年,西安地区群众革命风潮连接不断^①。10月19日,鲁迅逝世,西安文化界准备开会悼念,反动当局极力设法破坏。宋绮云按照西北特支的决定,巧妙地骗过敌人,以文化教育界的名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宋绮云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他说:“鲁迅先生是坚定的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的,因而他强烈地同情于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的革命政党。”“他强烈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因而他也强烈地痛恨向日寇屈膝投降的汉奸卖国贼。”“鲁迅从来反对空喊

^① 以上根据徐彬如的回忆材料。

革命的空头革命家,他近年以来,以病危之身,垂暮之年,犹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要求我国同胞,无条件地接受革命政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呼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于国家民族无限忠诚的表现。”“我们必须化悲痛为救国的力量,无负于鲁迅先生对于我们的希望。”

1936年,日本侵华军侵占察哈尔、热河和绥远的大部分地区。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绥远驻军在傅作义领导下,奋起抗敌,重创日寇。全国人民纷纷发起援绥抗战运动。宋绮云连续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号召援绥抗战的社论和文章,还亲自组织为绥东将士的募捐活动。7月18日以各救国会和各校师生为主体进行援绥抗战示威游行,参加者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争勇气。

12月4日,蒋介石带领陈诚等南京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策划“围剿”陕北根据地。这时,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西北特支成员,利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机会,组织各救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向蒋介石的住地临潼华清池进军。张学良害怕群众遭到镇压,赶到十里铺阻拦,并答应一周内一定给予满意的答复。西安革命群众的这次爱国示威游行,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决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北特别支部立即给党中央发了急电,报告事变的经过和情况,请求中央指示。在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北特支通过西救会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将省党部的牌子换上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牌子;宋绮云负责接管了中央社陕西分社、广播电台、《西京日报》、《秦风日报》等宣传舆论工具;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员有董英斌、吴家象、高崇民、郭维

城、宋绮云等,这是三位一体的指挥机构^①;他们营救了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的政治犯出狱,宋绮云除组织募捐购置180多件棉大衣给难友外,还派出记者采访他们,并以《女政治犯访问记》、《奔腾在大海里——政治犯速写》为题,在《西北文化日报》上报道了特务机关迫害政治犯的真象。同时,他还以救国会的名义,组织进步学生到工厂、机关、街道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宋绮云亲自编写了《抗日救亡宣传大纲》等在报纸上发表。特支还派人到工厂、学校、机关,协助基层成立了起卸夫业救国会、木泥业救国会、公务员救国会、运粮业救国会、小学教员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他还出面联合西安各报业同人,发起组织了西安新闻记者救国会,制定了救国会章程,发表了《新闻界救国会宣言》,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16日,特支以救国会的名义召开规模庞大的庆祝大会,支持张、杨兵谏,声讨蒋介石不抵抗罪行。张学良、杨虎城亲临讲话。西北特支成员与杜斌丞等商讨,将西安到陕北根据地的重要县份,如长安、三原、耀县、洛川、渭南、延安等县的县长,调整安排由爱国分子、救国会成员或地下党员担任。特支还组织慰问支援张、杨兵谏而进驻西安附近的红军主力部队。12月16日到渭南慰问,受到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的接见。12月20日,宋绮云和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等,受杨虎城的委托,到咸阳慰问红军第十五军团,并同徐海东夫妇合影留念。周恩来来西安后,对西北特支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接见特支成员时说:“西安事变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动起来的,张、杨受到群众的推动,加上你们把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贯彻得好。”“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是‘西安事变’的母亲。”西安事变后,根据中央

^① 1937年1月5日,西安《解放日报》

指示，在西北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宋琦云为临时省委委员^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蒋介石一下飞机，就违背了他对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当即软禁了张学良，随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压迫、收买、分化瓦解。1937年春，撤了杨虎城的职，令其出国“考察”。这时宋琦云的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在十七路军中留下去了。他到上海送杨虎城出国后，本来打算接受杨虎城的劝告和馈赠出国留学，但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在这国家存亡的关头，他不愿离开苦难的祖国和人民，不愿离开火热的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又毅然回到西安。

1938年初，宋琦云被陕西省委派往鹿钟麟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主任兼组织科长，负责和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这期间，他在晋东南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并汇报了工作。朱德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对他在十七路军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指示他如有条件应继续去那里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到隶属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难民服务团任总干事。他利用这个机会广泛向难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后因受到特务的威胁限制，无法开展活动，遂于1939年撤回西安。同年底，经党组织批准，他又回到杨虎城旧部第四集团军，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部训班政治教官。他利用这个讲坛，向学员灌输抗日救国思想，痛陈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他讲的《抗日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使学员受到很大的激励，纷纷要求上前方，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正如他对朋友们说的：“我所以出来任教官，就是希望由我教出来的军官，都能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① 以上根据徐彬如、米哲沉的回忆材料。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宋绮云的革命行动，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极度仇视。1941年7月的一天，宋绮云在第四集团军军部突然接到一份“家中有急事，请速回”的电报。他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特务机关施展的诱捕奸计。当他匆匆赶回已搬至陕西长安县蒲阳村的家中时，即被埋伏的特务逮捕。后来特务机关又诱捕了他的爱人徐林侠和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宋振中^①。

宋绮云被捕以后，敌人软硬兼施，妄图动摇其革命立场。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出面设宴款待，许以高官厚禄，要宋绮云为蒋介石反动政权服务。宋绮云庄严宣布：“本人抗日无罪，除非无条件释放，别无可言。”敌人恼羞成怒，报请处决。蒋介石不忘宋绮云在西安事变中的揭底之恨，又不肯轻易丢掉共产党的这一重要人犯，结果批复“和杨虎城一并处理”。他们先后将宋绮云夫妇和幼子，关押于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和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

宋绮云在被监禁的8年中，三易重庆监牢，二次被押赴贵州。在长期囚禁生活中，他完全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始终心情开朗，精神充沛，并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仍然尽量吃饱肚子，睡好觉，每天坚持学习和锻炼身体，并教会了不少难友打太极拳。他经常从狱中的国民党报纸上，找到人民革命胜利的喜讯，来鼓舞大家。难友梅含章回忆宋绮云这段历史情况时说：“他像一团烈火一样的激励着我们去顽强地斗争。”宋绮云经常

^① 烈士生前警卫员王迁升的回忆材料。

对难友说：“一个人活着得有骨气，有志气。”他经常受到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但从不叫苦，更不屈服。他受酷刑后吟诗明志：“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白上九霄。”“漫天风雪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我无罪，必须无条件释放我出狱，他们休想在我身上捞到什么东西。”

宋绮云在狱中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拿出已经少得可怜的衣物，援助其他难友。狱中临时党支部决定让韩子栋越狱，宋绮云即叫体弱多病的爱人徐林侠赶缝衣服和布口袋，通过“小萝卜头”（即宋绮云的幼子振中）送到韩子栋的手中，作为越狱途中之用。狱中临时党支部书记罗世文，由于狱中营养不足，不幸染上瘰疬病，病情不断恶化，威胁着生命，同志们忧心如焚。在狱中有“峨眉山人”之称的宋绮云沉思了几天，终于想起了早已忘记的治疗瘰疬病的配方，经难友们拍卖衣物买来了药品，但狱中没有捣碎工具仍制不成药膏，需设法到狱外去制作。当时适逢“小萝卜头”头上长了一个大疖，宋绮云有意叫妻子把“小萝卜头”的疖子尖挑破并用生水洗。结果疖子大肿，“小萝卜头”哭喊不止，取得狱外治疗的借口，并乘机在狱外制成了治疗瘰疬病药膏，因而治愈了罗世文的病。有些难友曾一度悲观动摇，宋绮云得悉后，即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帮助，使他们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有一个同志因一时受刑不过，给特务写了悔过书，表示出狱后要“戴罪立功”。后来经宋绮云的教育，这个同志认识了错误，并坚决收回了悔过书^①。

宋绮云对杨虎城将军夫妇也十分关心。1943年宋绮云一家三人转入贵州息烽监狱不久，得悉杨虎城也囚禁在息烽一个山洞

① 韩子栋的回忆材料

里时，曾要求去拜访，但未获准。杨虎城得知后，心情十分激动，向看守所所长周养浩假说宋绮云是他的“秘书”，要求宋绮云同他住在一起，但因戴笠不同意，终未如愿以偿。1946年他们转到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监狱后，杨虎城仍然提出要求同他的“秘书”宋绮云同住，但特务们仍然不予答应。宋绮云虽然无法与杨虎城面晤，但却时刻关心着他，曾托也被监禁的黄显声给他带去诗、信，鼓励他们夫妇坚持斗争。

1944年到1947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监狱曾因禁着国民党青年将校团的六名发起人员。他们是王凤起、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和胡翔。这些国民党少壮派军官，不满蒋介石的腐朽无能，崇拜法西斯主义，欲仿效日本少壮军人的“二二六”事件，秘密组织青年将校团，以陈诚为靠山，准备推翻蒋介石以取而代之。后因事泄，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当时监狱临时党支部认为，青年将校团虽不倾向革命，但同蒋介石有矛盾，只要善于引导和教育，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决定让宋绮云去做他们的统战工作。

这些青年军官被捕入狱后，深感个人的“光辉前途”不能达到，因此神志颓丧，萎靡不振。宋绮云利用同他们是黄埔军校先后期老同学的关系，经常同他们接触，谈古论今，启发教育他们。由于宋绮云的博学健谈，和蔼可亲，很快获得他们的尊敬，被称为宋大哥。彼此感情融洽后，宋绮云即根据他们当时的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开导教育他们。宋绮云首先帮助他们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他们年纪轻、热情高，但缺乏冷静的思考。他对他们说：“热情高非常好，热情像熊熊的火焰一样，是一切的动力，有了高度的热情，才会有伟大的革命行动。但如果缺乏智谋，就会迷失方向，变成盲目的行动。只有热情与智谋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为此，他希望他们多读鲁迅的书。为鼓励他们继续奋斗的精神，他

还经常对他们说：“蒙难本身就是光荣，战胜困难就能推动事业前进。”这些青年军官由于长期受到蒋介石关于“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的影响，认为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内部，没有一个统一巩固的地方，是不能一致对外的。宋绮云耐心细致地开导他们说：“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军队，他们来自人民大众，又为劳苦大众服务，蒋介石镇压与屠杀的是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这个‘内’是永远也‘安’不完的。”他又以九一八以后蒋介石的不抵抗致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以及后来的察哈尔、绥远、华北大片土地沦陷等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他们，使他们终于深刻地认识到蒋介石欺骗人民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

1946年戴笠死后，这些青年军官经多方活动，终于有释放出狱的希望，宋绮云得悉后非常高兴，进一步鼓励他们，希望他们出狱后要为全中国劳动大众的解放事业而工作，不要忘记几年铁窗之苦，要参加打倒蒋家王朝的斗争。他真挚地对他们说：“有恩不报非君子，而有仇不报定是无能之辈，决不能忘记坐牢时受的折磨和侮辱，要坚决与彼斗争到底，不决雌雄，不显男儿本色。”当知道王凤起有出狱后出国经商的消极想法时，宋绮云即对王说：“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你为什么不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假如你能在打倒蒋介石的正义战争中做出贡献，其价值比随波逐流花天酒地不知要好多少倍！”王凤起深受感动，表示一定要按他的指导行动。他们获释出狱后，宋绮云满怀深情以诗相赠，鼓励他们为国为民坚持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给王凤起的诗曰：“羨君壮志凤凌云，运筹帷幄实惊人。英雄当为正义战，阅墙幸勿助波尘。”给梅含章赠了一首激动人心的长诗——《送含章同学赴金陵》，表达了他自己一生信仰马列主义，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坚信共产主义必胜，蒋介石国民党必败的信念，并希望他们出狱后为了真理，为

了人民的解放，而投向人民。他在长诗的“序”中写道：“社会进化，自有其伟大之动律，一二人之喜怒，何与于奔腾澎湃之潮流乎？！一人之利害得失，从自我立场观之，固不为不大，如从整个历史进程观之，直如沧海之一粟，诚渺乎小哉！昔司马公所谓之‘天’，即今之所谓社会也。从整体言之，人类之残害倾轧，无不足以促进社会之进化，是个人之利害得失，有助于人类社会也不亦大乎？！西谚有言‘最后笑者，乃善笑之人’，至哉言也！含章之行也，余既为诗以留纪念，复为文以壮行色，固不禁抚髀雀跃，更为之歌曰：

青山葱葱，
绿水泱泱，
今日之别，
敢云忧伤？
日之升矣，
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

寥寥数语，道出了宋绮云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时，这些青年军官为了报答宋绮云的真情厚意，表示出狱后要尽力活动搭救他出狱，宋绮云笑着说：“我是不能出狱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我恨之人骨，他是一个心毒手狠的家伙，对他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要人民的解放事业得以胜利，我就会高兴的。”王凤起等对宋绮云怀着深深地感激和惜别之情，回赠诗一首：

牢里相处亲又亲，
共话肺腑期有成。
临别千里铭座右，

誓将热血报知音。

出狱以后，他们利用其特殊身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王凤起和夫人富平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1948年5月在沈阳成功地策动了新一军新五十三师和沈阳第二守备总队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梅含章于1949年4月协助策动江阴要塞起义，打破了匪首汤恩伯吹嘘的所谓攻不破的长江防线，迎接百万雄师横渡天险，解放南京。宋绮云虽身在狱中，但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梅含章在解放后缅怀宋绮云烈士时曾说过：“我其所以能够转变立场，投向人民，在解放战争中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一些贡献，完全是绮云烈士对我启发教育的结果。他是我走向革命的指路人，是我的启蒙之师，我走向革命，完全是他长期地耐心细致地循循善诱对我进行教育的结果。”^①

1949年9月，胜利的曙光已经映红了天际，但是，雾都重庆仍处在黎明前的极端黑暗之中。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垂死挣扎，终于对杨虎城将军，对革命志士下毒手了；1949年9月6日，宋绮云同杨虎城和其他难友一起惨遭杀害。

同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第二天，即查找他们的遗体。重庆军管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大殓仪式和追悼会，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邓小平、刘伯承、张际春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共1000余人参加追悼，表示了对烈士的深切悼念。

（江 山 胡民新 黄朝章）

① 以上根据王凤起、梅含章回忆材料。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了米哲沉、曹冷泉、武志平、匡厚生、蒋听松、童陆生、徐彬如等的文章和回忆材料；郭子刚、丁毅忱、李觉民、王迁升、王凤起、梅含章、韩子栋等的回忆材料；烈士的部分遗文；烈士亲属宋振平、宋振西、宋振镛、宋振苏、宋振华、宋振亚等的回忆文章；还参阅了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室、西北大学历史系、西安地质学院党史教研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所提供的资料。

李 敷 仁

(1899—1958)

李敷仁，小名蒲咸，学名文汇，字敷仁，笔名老百姓、咸员、护人、村长等。陕西咸阳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老百姓》报，宣传团结抗日。1944年创办《农村周报》，任主编。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编《民众导报》。1946年5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幸免于难。7月，转赴延安，任延安大学校长。建国后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北人民

革命大学校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2月在西安病逝。

李敷仁，1899年4月29日(农历3月20日)生于陕西咸阳县北杜镇一户贫苦家庭。兄弟三人敷仁为长。6岁上私塾读书，1913年入咸阳高等小学。1917年，李敷仁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考入模范营骑科，学习军事。1918年夏，李敷仁奉命随军剿匪时，接家中来信，说母染重病。李敷仁辞军职回到家中侍奉母病。其间，在当地坐馆教书、办团练，并当了3个月的团练副团总。

1920年秋，李敷仁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靠给学校刻蜡版，半工半读。当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李敷仁等被举为三中学生会的代表，率领爱国学生在文庙集会，并上街游行，到省长衙门示威。一路上，他带头呼口号，撒传单，宣传反帝爱国。后来，由于受《北京评论》、《胡适文存》等书刊的影响，加之反动当局的分化、瓦

解，三中学生分为两派。他为“保持学籍和免交学费所束缚，不愿和学校反脸”^①。因此，后来学潮闹到驱吴（驱逐督军吴新田）运动时，李敷仁脱离了学生会，对革命一度消沉。

1925年，李敷仁中学毕业，被陕西军队何经纬部以月饷银13两的薪俸，委任为教导队分队长。李敷仁在教导队既教历史、地理、数学等文化课，也讲战术、操典、野外等军事课。有一天，何经纬派他去南操一带催粮，他结识了国民革命军驻陕总部邓宝珊的副官崔某。崔某把国共合作，打倒军阀，农民运动等小册子给李看，李敷仁迅速觉悟，决心离开何经纬部，另谋出路。

1926年11月，李敷仁向何经纬写信，请辞军职，回乡教书。何经纬复信允许李敷仁回家办学教书。李敷仁遂到咸阳县立高级小学当国文教员。他把自己学到的革命理论结合实际进行讲解，同时又根据农村的需要，教一些写地契、文约、书信、请帖等应用文，使学生学有兴趣，家长也很高兴。

半年以后，李敷仁升任校长。他尽量选聘德才兼备的教员，注意搞好县上各方面的关系，使学校越办越好。

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革命的气氛也卷入咸阳农村。经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赵宝华（共产党员）介绍，李敷仁加入了国民党。他串连了几个积极分子，和乡里的总乡约（乡长）接头，在关帝庙前召开大会，成立了北杜镇农民协会。李敷仁负责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识字、读书。接着，又组织调解组，帮助农民排难解纷，颇受农民欢迎。

有一天，冯玉祥的一部分军队到村里搜粮，还把乡约和甲长用

^① 李敷仁著：《虎口余生记》，载《李敷仁诗文选》第3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绳子绑了一大串，拉在车后。农民无奈，都来找李敷仁想办法。李敷仁知道冯玉祥的军队最怕“总司令”。于是，率领农民群众拉着那帮搜粮的军队，声称“一同进省去见总司令！”那帮军队的副官听了，连连回话，表示认错，放走了绳拴的众人，又退了一些粮食。

1928年秋，李敷仁经同乡魏西岩介绍，到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担任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和书报邮件检查工作。后来，他当了科长，升任省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总编辑。他曾在《中山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帝国主义进了潼关》一文，把陕西人民受到日货、借款及教会剥削压迫的痛苦，从根到梢儿说了一遍，引起当局不满。接着，他又在《觉悟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地皮将透的咸阳》，揭露军阀、土豪、贪官、污吏狠刮地皮，鱼肉人民的罪行，气得军阀、贪官暴跳如雷。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笔批字，要“枪决”李敷仁。

李敷仁闻风逃走，后经宣传部解释，被撤掉总编辑职务，仍回宣传部工作，负责主办“暑期党务训练班”。他聘请共产党员何寓础、雷五斋等几位专家名流，前去讲课。李敷仁主讲社会进化史。他自编讲义，结合实际教学，学员们很受教益。李敷仁还利用周会作时事报告，在号召学生谨守校规的同时，抨击时弊，宣传革命，深受师生欢迎。不久，他受聘担任了省立一中、二中、西安市中学等校的公民课教师，被进步师生誉为“公民专家”，同时也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指为著名的“左混”（左倾混蛋分子）。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军入陕，赶走了冯玉祥部刘郁芬的势力，占领西安，当了陕西省政府主席。次年，李敷仁由杨虎城资助到日本留学。他经上海、横滨到东京，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毕业后，继续上东亚高等班，学日本历史。他学习刻苦，不仅按时学完学校规定的课程，而且经常阅读共生阁和白杨社出版的

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并到校外的街道、工厂、贫民窟去参观调查,采用中日对比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在这里,他从小学生上学背砂包,中学生日日打野操,人民天天上晨操,满载士兵的火车用帆布蒙着向中国运送,感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形势日益严重;同时,他从服装店中美丽的少女站在玻璃橱中当“望子”,从新宿、月岛通的家妓院和舞厅,更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钱,把人治成活死人”^①、把人不当人的本质。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李敷仁住在猿乐町青木家中。他买了一张《朝日新闻》,见刊有皇军进入沈阳的大字标题,他坐不住了,跑到中国留学生的中心——神田青年会。经过磋商,留学生组织了个抗日的组织“革命学生会”。李敷仁被选为监察委员。中国留学生召开大会,并排队到公使馆,要求公使“断绝国交,下旗回国”。后来,革命学生会派李敷仁负责西北宣传工作,李敷仁即放弃了上明治大学的计划,乘船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奋发努力,干上前去,在可能范围内,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尽我最大限度的力量。”^②回到北平后,李敷仁一面在北京大学听课,一面翻译日文经济著作,后因经费匮乏,生活无着,又回到陕西。

当时,有人推荐李敷仁去当国民党的官,他说:“我志在教书,不在做官。”于是,从1932年9月开始,李敷仁先后在凤翔二中、汉中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固市中学、兴国中学等学校担任过训育主任、教务主任,教公民课、国文课或社会进化史课,一直到1945年。

李敷仁在教育工作中,从事革命活动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① ②李敷仁:《虎口余生记》、《日记》,载《李敷仁诗文选》第58、91页

第一,认真备课,用真理武装青年。李敷仁讲课,不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搜集各种著作、资料,研究分析,溶为一体,编成讲义,然后用生动的语言向学生讲授。例如讲社会进化论,他把日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田茂林的《普罗列塔利亚世界史》、郭沫若的《古代社会》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书,融会贯通,编写成通俗讲义,结合生活,进行讲授。学生听了感到新鲜、深刻、系统、好记。

国民党的公民课,许多是歪曲真理,进行封建法西斯教育的。李敷仁讲公民课则是完全撇开教育部规定的公民课本,自编讲义。如在讲三民主义时,他说:“三民主义不能挂着羊头卖狗肉,光用来骗人。我们讲三民主义,一定要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讲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就是说,我们要讲新三民主义。在现阶段,民族主义就是讲反帝,中心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生主义就是讲土地问题,讲‘耕者有其田’;民权主义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有人民当了家,作了主,国家才能富强,对外才有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第二,评讲时事,宣传抗日救国。

李敷仁于双十二事变后,参加了由杨明轩、何寓础等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并和张寒晖、姚一激等进步教师,组织生活教育社团结广大教职员工,实行抗战教育。他利用“训育主任”这个合法身份,宣传革命,宣传抗日救国。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著作,结合现实斗争,溶汇于教材之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在五卅惨案十三周年纪念日,他结合五卅惨案经过,痛斥帝国主义罪行,激励起许多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还积极支持学生组成农村工作团,假期工作团,流动宣传

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战，教群众防空、防毒，动员群众捐献抗日物资。

第三，介绍进步书刊，指导学生从事革命实践。

李敷仁认为“进步书刊是青年走向革命的桥梁”。所以他到每个学校，都帮助图书馆购进大量的进步书刊，并指导学生阅读。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思想控制以后，他仍然秘密给学生介绍《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新哲学大纲》等马列著作和《大众哲学》、《群众》、《解放》、《西北》等革命书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在这期间，李敷仁在党的领导下，宣传抗日救国，自觉地为革命培养、保护和输送人材。

1936年秋的一天晚上，共产党员、女学生余小珊，因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被反动军警追捕，李敷仁忙叫进步师生喊醒正在熟睡的余小珊，让她藏在后花园的灌木丛中；然后他和进步师生设法将反动军警引开，又带着余小珊翻过后墙，潜入杨虎城将军家中。后来，余小珊辗转到了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10月，李敷仁在西安师范经何寓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事事处处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团结进步教师，设法保护学生，千方百计地把一批批进步学生送到延安去。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1942年10月国民党派他到重庆伪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给他蒋的半身照片一张、短剑一把。但是，李敷仁毫不动心，悄悄地请王炳南带他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见了周恩来副主席，同时他还去拜访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等著名人士，和他们商谈讨论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等重大问题。

李敷仁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千百万群众“和敌人作战”。于1937年11月12日创办了《老百姓》报。他在

刊头语中明确写道：《老百姓》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扬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老在姓》报是周报，7日1期。开始两版，后扩大为4版。栏目内容丰富，有社论、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文体形式多样，有政论、杂文、快板、数来宝、劝善调、秦腔唱词等。它从创刊到1940年4月被迫停刊，共出版了113期；订户曾突破1万份，共发行了100多万份；行销13个省区，远销美、英、苏、加、匈、法、瑞等国。成为抗战时期在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很受群众欢迎的通俗报纸之一。它的主要特点，正如著名记者穆欣1939年10月，在祝贺《老百姓》报创刊两周年时所指出的：

第一，它用老百姓最能了解的话，帮助教给老百姓抗战工作及上前线打日本的法子。使每个多少识几个字的老百姓都能看懂，不识字也能听得懂，不像其他的报纸，说些老百姓们都不能懂的话（文话、洋话或是古话）。

第二，《老百姓》报真配称得起“民众喉舌”四字，它代表着千百个老百姓的利益，表达了他们心中的苦痛，提出乡村中许多欺压老百姓的事情。也正因为这样，《老百姓》报的读者，才能遍于西北各省，为老百姓所拥护、所爱戴，并且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第三，《老百姓》报有着丰富的内容，有文有词，有诗有话，有的谈抗战，有的说怎样做庄稼，有的替老百姓呼冤，有的解答老百姓的问题。而且这些都合乎老百姓的口味，使他们更注意改良生产，应征兵役，解决妇女小孩等问题，因此连小孩和妇女们，也都把《老百姓》报当成自己的朋友。

第四，《老百姓》报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地方，便是报社同仁刻苦耐劳的作风。编辑先生要编稿子，要写稿子，又要校对，打关系，办外交，就是买纸的事也得自己办。这种“穷日月”，正和乡下老百

姓过的生活一样。因此，老百姓们都乐于拿出自己的钱，去帮助《老百姓》报^①。群众亲切地称李敷仁为“老百姓”。

李敷仁过去当过编辑、记者、主编，因为替老百姓说话，写文章，几乎被枪决，深知要办《老百姓》报，要讲实话，必然要和统治者进行严酷的斗争，甚至可能牺牲。所以，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筹办这张报纸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如果把《老百姓》‘失塌’（查封）了，咱办《小百姓》；把《小百姓》再失塌了，再办一个《百姓报》。就像邹韬奋《生活》查封了出《永生》，《永生》查封了出《新生》，咱们就是这样子”^②。

在《老百姓》报出刊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顽固派对它有过三次大收买，两次大分化。编辑部先后有常奋等三位青年被逮捕，为报坐牢，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

作为报纸的主编，面对这些明枪暗箭，李敷仁毫不慌乱。他以他那通俗、幽默、辛辣、犀利的笔锋，继续在屠刀丛中战斗！如在《老百姓办公处》专栏中，解释词义时，他写道：“军阀，就是把军队当做自己的势力，牺牲当兵的性命，给他们自己挣房子，挣地亩，办老婆，发大财。”又如根据读者来信写的评论《一味存心搜刮，并不关心国难》一文，揭发勉县县长不顾国难，大刮地皮的丑行，在结尾时写道：

“我们想，在这贼兵深入、国难严重的今日，身为县长，不设法改善人民生活，组织民众帮助抗战，我们希望舆论界对于这样洋钱熏心的县长予以严厉制裁！”

1940年4月，《老百姓》报被国民党顽固派封闭了，李敷仁悲

^① 穆欣：《可贵的探索》，载《革命英烈》1984年第1期第21页。

^② 李敷仁：《老百姓》，载《李敷仁诗文集》，第147页。

愤地说：

“我的‘儿子’被掐死了！”^①

但是，他并不灰心，不屈服，而是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投入了西北地区的民主救亡运动。1944年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创办了《农村周报》。人们见了，奔走相告，齐声欢呼：“《老百姓》又复活了！”

然而，《农村周报》只出了6期，又被国民顽固派绞杀了。

李数仁不屈不挠，设法再干！1945年5月，他又走进官办的陕西省民众教育馆，受聘主编《民众导报》，巧妙地运用合法斗争的方式，使《老百姓》报的革命精神，在这张官办的报纸上复活了。不久，《民众导报》发行到2000份、4000份，以至于出万份纪念专号。为了以合法的形式宣传革命，李数仁不仅非常注意斗争艺术，而且每篇重要的稿子都配备有“预备军”，以便抽掉一篇，即把另一篇编入见报。例如有一篇报导东北解放区实况的稿件，接连3次没有登上，报纸几乎开天窗。他设法改头换面才见了报。

为了替老百姓说话、办事，发展抗日民主运动，李数仁往往把办报和组织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内外夹攻。1945年春天，他把咸阳的灾情、县长刘发钰贪污害民和咸阳人民的要求，写成稿子，发表在《民众导报》和《秦风·工商日报》上；同时印出传单，要求全县人民举代表进城告状，呼吁免粮。

受苦的人民一呼百应，全县踊跃。伪县长刘发钰到处送礼说情，并且请了一位名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上刊登启事，把李数仁的文章逐条批驳。斗争激化了。李数仁走出编辑部，去到农村，深入调查，把刘发钰1943年勒征灾区免征粮麦4000余石，盗卖壮

^① 穆欣：《可贵的探索》。

丁,打死人命等10多条恶迹,了解清楚,并组织群众,推举代表,成立了控诉委员会,草拟诉状及反驳启事,连夜派人进城控诉。

李敷仁宣传、鼓动、组织群众,组成了反贪官的统一战线。咸阳学生成立了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市民、工商业者召开了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了声援议案。《民众导报》及时报导、宣传,小学教员、开明士绅、青年学生纷纷参加。后来,咸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驱刘大会,11个乡的10个乡长也来参加,甚至连咸阳的三青团头头、国民党骨干、县政府秘书等也来参加。李敷仁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驱刘大会上,问得刘发钰面红耳赤,一句话都答不出来。面对铁的事实和广大群众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将刘发钰撤职,并令他退还贪污的赃款和赃粮。

1945年秋,杨明轩、杜斌丞介绍李敷仁加入民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任。

1946年春天,中共关中工委韩夏存在西安莲湖公园约见李敷仁。韩夏存原是李敷仁的学生,李只知韩参加了革命,却不知他已是关中工委的负责人之一。当韩夏存问他是否知道“李扶云”时,李敷仁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记得李扶云是他在加入地下党时用的名字,只有党组织知道;如今韩夏存问李扶云,不就是代表党组织正和自己接头吗。他严肃回答并认真汇报了自己8年来的工作情况。韩夏存肯定了他的工作,并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放手发展民主运动,只是不要搞得太红了……”此后,李敷仁深入学校,团结教师,帮助和支持青年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主活动。在西北大学学生驱逐特务校长的斗争中,在西安进步学生反对反动派组织“反苏游行”的斗争中,李敷仁奔走呼号,宣传党的主张,起了重要作用。他还以《民众导报》社论的名义,写了一篇《为陕西人民请命》的文章,矛头直指陕西反动当局。

李敷仁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派的极大仇恨。1946年5月1日，继《秦风·工商日报》被反动派捣毁之后，李敷仁在去民众教育馆的路上，突然遭到国民党CC特务的绑架。

原来，4月30日这一天，蒋介石到了西安，召见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CC特务给蒋介石当面报告了两件事情：一件是《秦风·工商日报》赤化，造谣生事，《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把西安的激进青年完全抓过去了；一件就是共产党准备5月4日在西安暴动……

这样，李敷仁被几个戴着黑色眼镜的CC特务绑架进了一辆黑色大卧车，双眼被一条染有血迹的毛巾捆扎着，几个小时以后，他被几个特务拖出汽车，左右架起，往一条荒芜的战壕边跑去！

一个特务手提匣子枪，跟在后边，走了一截儿，端起枪来，瞄准李敷仁的脑袋，“叭”地打了一枪。

李敷仁顽强地站着，不肯倒下，只是本能地把头偏了一下。特务又端起枪来，瞄准他的后心窝，打了一枪。

他眼前一黑，倒在了血泊里。

匪特们驾车走了。

一位农民发现倒在血泊里的人没有死，忙把他唤醒，又回村叫来许多人来搭救。有的想往家里抬，有的主张向县上送，各执己见。这时，大路上来了一辆牛车，车上坐着一个人，跳下车来一看，立刻大喊：

“哎呀！这不是我伙计嘛？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人们都围过来，注视着他。

赶车人对众人说：“这人就是北杜村那位李敷仁，我的老同学。就是他，给咱们办的《老百姓》报，办的《民众导报》呀！”

几句话勾起了人们对《老百姓》报和李敷仁的怀念。大家立刻

行动,找来一副担架,天快黑的时候,把他抬到了北杜村。北杜村的人为了他的安全,自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把他多处转移;老人们为他求神问卦;小伙子为他东奔西跑;妇女们为他准备吃喝;连那些小孩子们也都立誓:“不乱说爹叔(对李的尊称)的动静!”

李敷仁没有死。老百姓救活了他,保护了他。党组织派人护送他到解放区马栏。

党中央派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专程从延安到马栏,给李敷仁开刀取出了敌人的子弹,治疗枪伤。李敷仁在医院对前去访问的记者挥笔疾书:

知尔杀人数不清,
焉知民力大无穷,
一滴鲜血一杯土,
杜鹃血染麦浪红。^①

1946年7月,李敷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7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习仲勋、谢觉哉等千余人,听了赵伯平报告李敷仁被难脱险经过,又请李敷仁讲话。他说:

“……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一颗子弹,并没有打死我,但他们自己等于吞了一颗慢性炸弹,将来有一天要炸毁他们自己!(全场热烈鼓掌)”^②

7月31日,李敷仁致函民盟,揭露国民党西安当局暗杀罪行,

^① 《李敷仁先生访问记》,载1946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② 《延安各界集会欢迎李敷仁先生脱险抵延》,载1946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要求审判正凶。

1946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李敷仁,对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惜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精神给予肯定;并勉励他养好身体,为革命继续奋斗。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曾先后接见他,表示慰问。

李敷仁感动地说:“党是我的再生父母! 谚语说,‘有钱难买回头望!’现在想起来,我的血是没有白流的! 今后民盟将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946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虽然他伤病初愈,身体不好,但却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办好延大,为党培养干部。他不仅领导学校改革教学方法,而且亲自给新闻班讲课,带学生实习,和教师、学生谈话,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

1947年3月,蒋介石、胡宗南调集了20多万兵力进犯延安。李敷仁率领延大师生坚壁清野,把粮食和重要物资向后方转送,把桌凳书籍埋藏起来,准备撤退。延大撤离延安后,他虽然身体虚弱,却不愿骑马、吃小灶,坚持和同志们一起爬山涉水,喝菜糊糊。到了住地,他尽量多找群众谈话,了解情况,并带领学生帮助群众打柴、挑水,打扫院落、收割、锄草,发扬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严酷的战争中,李敷仁还组织延大师生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经常给全校师生作时局分析报告。撤离延安初期,有些同学对自卫反击战的前景担心,李敷仁通过讲春秋战国时期齐鲁长勺之战,分析边区自卫反击战的各种条件,说我们一定会胜利! 他还常拿出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的那颗子弹,向大家讲:“敌人这颗子弹没

有杀死我，却要杀死他们自己，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①

在最艰苦、最危险的关头，李敷仁先人后己，关心全局，指挥若定。1947年8月16日，延大驻在黄河岸边的木头峪，大批敌人从三面扑来，上级令延大向东转移。但这时木头峪渡口边，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渡船很少。敌军逼近，枪声已闻。师生情绪紧张，都争着抢渡船。李敷仁毫不慌张，让高中部和教育班先上船渡过河，然后又组织其他师生住宿。有人关切地让他上船，他说：

“我要最后过河！我要看着把每个同学送过河去，我才上船！”

第二天，李敷仁奉命带领其余师生，沿河北上，到谭家坪，乘船渡过黄河。众师生在黄河滩上，长长地舒了口气。李敷仁尤为高兴。他用手杖在沙滩上写了八个大字：

“延大渡河，纪律严明”

1947年秋，延大在晋绥边区临县吴家湾和隰县川口镇一带，进行轰轰烈烈的查成份、查工作、查思想的三查运动。由于受当地土改中“左”的影响，有人在学生中组织贫雇农小组，捆人、打人。李敷仁对此坚决反对。一次开大会，有些学生一哄而上，要捆那个被斗的同学。李敷仁走上前去，夺来绳子，压在自己屁股底下，大声地说：

“不准捆！也不能打！这是党的政策！”

延大在三查运动中没有发生更大的过火行为，李敷仁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表扬。

西安解放后，1949年6月25日，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入西安。李敷仁先任副校长，后任校长。由于他能关

^① 刘端荣：《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原载《革命英烈》1984年第1期第25、26页

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能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解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问题，因而西北民大学生学得好，进步快，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

1949年他任西安军管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主任委员。

1951年至1958年的7年时间里，李敷仁主要从事社会活动和国际活动，宣传、动员各界人民，抗美援朝，建设祖国，发展中苏友好，加强军民团结，为繁荣祖国的思想文化，为发展国内、国际的反帝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1951年冬，李敷仁参加了第一届赴朝慰问团，任西北分团团团长。他不辞劳苦，不怕牺牲，迎着美帝国主义的炸弹，奔上前线，亲切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士。回国后，他又写文章，又作报告，宣传中朝友谊和子弟兵的英雄业绩。他先后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市民中，作大型报告50多场，每场听众少则几千，多到上万人。

1951年，李敷仁任西北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中苏友协总会赴苏参观团团长，回国后编写出版了《苏联集体农庄》一书。1954年任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西北分团副团长，慰问了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司令部以及青海军区所辖各部队。

1954年，李敷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1955年，李敷仁被选为西安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陕西省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陕西省中苏友协会会长、全国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全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

1958年2月初，李敷仁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民盟

中央全会,并在两个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但是,由于长年过分劳累,回到西安后,于2月19日,因“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

(刘杰诚)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李敷仁生前所记日记,原件存其女儿李荷丽处
2. 李敷仁参与编辑的《老百姓》报、《民众导报》、《农村周报》
3. 陕西省革命烈士编纂委员会编《革命英烈》1984年第1期
4. 作者在咸阳、西安、北京等地访问了汪锋、刘端棻、武伯纶、杜松寿、田克恭、郭仪、吕夷、李荷丽等同志并参阅了访问以上同志的笔记。

张 奚 若

(1889—1973)

张奚若，原名张耘，又名侠云、亦农，字熙若，后改张奚若。陕西朝邑（今陕西大荔）人。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参政会聘为参政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73年7月在北京病逝。

参加辛亥革命

张奚若，1889年10月16日生于陕西省朝邑县（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大荔县）仓西村一个中医家庭。他的祖父在县城开了一个中药铺。父亲张绅初继承父业，并在铺内坐堂门诊，治病救人，深受群众爱戴，家境也由是小康。张绅初对儿子教育极为重视，经常告诫说：“为人要走正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对张奚若的一生影响很大。张奚若11岁随母亲去县城居住，开始在家念书。适值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张奚若在18岁那年考进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又名宏道书院）。这是当时陕西新办的近代学堂，有许多海外归来的留日学生、国内知名学者和外籍教师在校执教。在这里，张奚若学习到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期间，他还阅读了中国同

盟会在日本创办的机关报《民报》和陕西留日学生创办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夏声》等进步刊物,使他眼界大开,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当时,学堂有一位日籍英语教师谢华(日本名佐藤晋三),不仅教学极不称职,而且无理殴打工友,引起学生对他愤恨不满。张奚若同学生自治会杨鹤庆等人串联起来,组织学生,进行斗争,赶走了这个日籍教师。后来,张奚若、杨鹤庆却因此事被学堂勒令退学。

1908年,张奚若20岁时,第一次离开故乡,与杨鹤庆结伴出潼关去上海。经人介绍进上海理化专修学堂念书,不久又转入中国公学。在上海中国公学学习期间,张奚若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结识在上海的陕西同乡于右任、杨西堂(杨铭源)、井勿幕等革命志士和同盟会骨干陈其美等。

1911年春,同盟会陕西支部井勿幕酝酿在陕西起义,为了筹措军火,派张奚若从井家拿了许多古董字画变卖成现金去日本购买手枪、炸药等。张奚若赴日本购买武器后,先从东京返回上海,侦悉清政府在上海海关检查甚严,经与陈其美研究,想出拆开沙发,将手枪隐匿在沙发弹簧中间然后将沙发缝合的办法,终于将武器顺利运回国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派张奚若回陕西策动起义。10月13日张奚若从上海匆匆回陕,当他乘火车到达洛阳西面小站铁门(当时陇海铁路只通车到铁门),正准备换乘毛驴西行时,潼关起义已经爆发,他乃绕道山西渡黄河回陕。这时陕西起义已经胜利,成立了军政府,由张凤翔任都督。张奚若回到西安后,在军政府任参议。陕西军政府大部分实权掌握在不识字的哥老会手中,一些人权欲熏心,为所欲为。对此,张奚若十分不满和伤心,乃毅然辞去省参议之职,准备去武汉。

这时，井勿幕任陕北招讨使驻节三原，他对陕西局势也极为忿懑，于是托张奚若到武汉后与黄克强联系，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队来陕，驱除哥老会势力。张奚若毅然受命，遂翻越秦岭，取道汉江由水路去武汉。不料行至河南淅川县时，与当地清军遭遇而被逮捕，羁押在南阳狱中两月有余。后来适逢湖北襄阳革命军光复南阳，他才得以释放。

25年后，张奚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由武昌到上海，沿途所见，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感觉革命党人虽然富于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但是对于革命后如何治理国家就一筹莫展了。”^①不久，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窃国专权，压制革命党人，排挤孙中山，国事更加昏暗。他对辛亥革命“除了赶走满人，把君主政权换成共和政体外，革命徒有其表。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成都督，而中国没有更现代化一点。”^②在这种失望的情况下，他便决定去外国留学，探求新思想、新文化。经努力，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在准备出国前夕，张奚若在上海与杨景仁女士订婚。辛亥革命前，陕西知名人士杨西堂在上海结识了张奚若。杨看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血气方刚，锐意进取，努力学习近代科学知识，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乃将长女杨景仁许配与他（后来张奚若与杨景仁在英国完婚）。张奚若在其岳父、国会议员杨西堂的资助下，去美国留学。

憧憬西方民主

1913年7月，张奚若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出国前，因曾追随孙中山铁道协会活动，故原想学土木工程。但由于对

① ②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陕西文史资料》第3辑第210页

数学不感兴趣,尤其觉得中国封建制度虽已推翻,但封建思想仍牢牢统治着人们。他此时认为,国家若要富强,必须仿效西方民主制度,于是攻读政治学。胡适、金岳霖、徐志摩等都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1917年,张奚若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秋天,他去德国西部莱茵河畔的科隆,进修于科隆大学,以后又去法国。不久才又回到美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并于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

在海外,张奚若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写成两篇书评:评介巴克著《希腊政论——柏拉图及其前辈》和施达勒布拉著《国家社会》,他还写出学术论文:《社约论考》。以上3文均寄回国内发表,登载于1920年在北京出版的《政治学报》第1卷第2期上。他在《社约论考》中对“社约”(也称“民约”)的发展史及各派对于“社约”的观点和见解,作了翔实和准确的论述,向国内民众介绍与传播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1921年,张奚若再次赴法、意、德、英等国学习考察。从1917年至1925年初,他辗转于欧美各国,潜心于浩繁的西方民主人权思想的论著,广泛涉猎有关的科学文化,并且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行了实地和系统的研究,这为他尔后回国从事教学和进行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时,他确实憧憬于民族之复兴,国家之富强,向往中国也能建立一个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

这段时间,张奚若虽然身在海外,却非常关心祖国。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他在寄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大战四年,得此结果,亦云值得,吾等倾心民权者闻之快慰何似。且欧战一终,中国事亦得收场。旧国会恢复,段祺瑞下野,徐世昌

辞职,若能一一做到,岂非大快人心之事。”^①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1919年初,英法协约国代表,在法国举行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巴黎和会。会上,有人提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的特权,这一提议极大地激起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当时正在法国考察的张奚若,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开展的爱国活动,他们致电巴黎和会,呼吁和会主持正义,否定上述荒谬提案,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利益。

对西方民主政治由崇信到动摇

1925年初,在欧美各国长期学习和考察的张奚若终于回到祖国。开始,张奚若担任北京出版品交换局局长,1927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南下,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次年改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1928年兼任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

1929年8月,张奚若出任北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和尔后的西南联大,他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名著选读》、《柏拉图政治哲学》、《卢梭政治哲学》、《西洋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当时,他是国内政治学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以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而蜚名教坛。他在讲课中,语言生动,逻辑严密,体系完整,资料丰富,引人入胜。他不仅教书,而且注意育人。他关心每个学生的业务学习和思想品德。他谆谆教诲学生,学政治学决不是为了做官。

^① 张奚若:《致胡适的信》(1918年),《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7页。

他对学生说：要立志做一个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做一个正直的政治学者为中策；若两者都不成，就当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下策^①。他告诫学生说，决不要趋炎附势钻营求官。40年代曾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杜汝辑回忆说：“几十年后的今天，重温张先生的这些教导，犹感到他的言传身教，感人肺腑。”^②

在学术研究方面，二三十年代他发表了《自然法观念之演进》、《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等著作，介绍了“人权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意义，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等，在当时我国知识界的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把外国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时，张奚若强调要结合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例如他发表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就曾批判了“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两种错误倾向。他认为我们对待西方文化，不应盲从，只能吸收有益于我们的部分；又指出对待本民族文化，盲目保守，故步自封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现代化，应该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化工业；提倡各种学术和思想方法科学化等四个方面努力^③。这些见解时至今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就在张奚若回国的1925年，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上海工人、学生示威游行进行抗议，遭到英国巡捕的镇压，于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张奚若和全国人民一样义愤填膺，他写了《沪案筹款方法及其支配机关》一文，登载在《现代评论》杂志上。文章中的提议既表达了他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爱国热情，又反映了他临危不惧、深谋远虑的爱国思想。

① ② 杜汝辑：《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张奚若文集》第473页。

③ 张奚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1935年6月17日北平出版的《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

1927年,全国反帝斗争高涨,汉口、九江人民收回了英租界。接着,发生了英帝国主义炮轰杀害中国人民的南京事件,英、美、法、日、意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对此,张奚若针锋相对,及时发表了《英国人的头脑与此次出兵》、《南京事件与不平等条约》、《宁案与五国通牒》等多篇时论文章^①。在这些文章中,他一方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表示愤慨和谴责,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妥协退让,表示不满和失望。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国民政府对此次南京事件的外交手腕似乎很难令人满意。第一,无论此事起源如何,英美舰开炮总算不对,而至今未闻有此种抗议提出是一大错。第二,此事发生后,外人争向蒋介石要求保护。在此种情况下,蒋氏除一方完全担任保护责任外,同时又应向外国当局要求将南京及其他中国口岸所有之外国军舰一律抛出吴淞口,并声明以后非得中国同意不得无故驶入中国内河。”“而蒋氏个人及国民政府未闻有此种表示,岂非大憾!”^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逼热河,进攻长城诸口,华北岌岌可危。在这种形势下,张奚若心急如焚,主张坚决抗日,一再向南京政府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阻止日军南进。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省,清华大学举行教授临时会议,公推张奚若、冯友兰、燕树棠、萧遽、蒲薛风5人为电文起草委员,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电云:“热河失守,薄海震惊,考其致败之由,尤为痛心。”“只是热河”全省天险皆未设防,前敌指挥并不统一,后方运输一无筹划,统兵长官弃城先逃,致使敌人长驱直入,境若无人。”如此误国罪责,“决非惩办一二人即可了事”,“钧府诸公”,“亦应深自引咎,亟图挽回,否

① 三文皆载《张奚若文集》第261—264,268—271,276—279页

② 张奚若:《南京事件与不平等条约》,《张奚若文集》第271页

则人心一去,前途更不堪设想。”^① 他们爱国之心,崇正黜邪之志,跃然纸上。

1933年5月,日军得寸进尺,进攻冀东,夺取通州。然而,南京政府不仅不抵抗,反而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权益的《塘沽协定》,致使平津危机日甚一日。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严厉抨击,全面揭露,张奚若发表时评文章:《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文章指出:“不客气地说,塘沽以来的外交全盘皆错,无一是处。”^② 他分析了这种误国外交的“最大祸根一方面怕牺牲,另一方面是希望人家(指日本——引者)不为已甚。因为怕牺牲,你只希望人家不为已甚。又因人家实行传统的国策不为已甚,所以牺牲终极是免不了。”其后果就是“人家窥破你不愿牺牲,不敢抵抗的畏惧心理,要求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使你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结果把原来用小的牺牲可以解决的问题弄得经过大的牺牲还是无法解决。”他敦促南京政府应该“改弦更张,在奋斗中找出路。”^③

不久,“华北特殊化”局面不幸形成,张奚若极为痛心。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揭露冀察当局种种特殊自居的表现,向南京政府提出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命令二十九军开赴前线抗日杀敌的两项要求。他恳切敦促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坚决抗日,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表达出一切爱国者的心声。但是,由于他的文章揭露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问题上的“趸卖”方针和华北地方当局的“零售”计划,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南京国民政府日益恐慌,于是当局竟封闭了《独立评论》杂志。

① 《国立清华学校刊》第489期,1933年3月13日。

② 《张奚若文集》第281页。

③ 张奚若:《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张奚若文集》第283页。

张奚若回国之初,本来是满怀中国能走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的热望,希望南京国民政府能带领民众把中国建设为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社会状况和所发生一系列社会事件,使他大失所望。上述一系列帝国主义侵华事件及国民政府“自塘沽协定以来”“就是退让,就是屈辱,就是无止境的加重国难,永朝亡国灭种的方向进行”^①,使张奚若对蒋介石国民党失去信心,也使他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发生动摇。

反对国民党,追随共产党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至湖南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长沙临时联合大学,张奚若被推为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政治系主任。1938年秋季学校再迁昆明,临时联合大学改成西南联合大学,他仍任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同年底,他被师生推为西南联大教授会代表,参加西南联大全校性的工作。在西南联大的8年里,他一方面努力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1938年7月,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于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张奚若作为社会贤达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国民参政会召开之初,他本着“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出席议政,借以对国是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力砭时弊,对国民政府多次提出批评。他引用典故说:“布衣韦带之士,谈道义者多矣乎?”吾人应曰:“布衣韦带之士,谈道义者有斯人矣!”^② 1941年,鉴于国民党越益腐败和独

① 张奚若:《国事不容再马虎下去了》(1936年),《张奚若文集》第293页。

② 孙敦恒:《刚正不阿的张奚若师》,《民国春秋》1989年第5期。

裁,他的批评也就越益尖锐和激烈。这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他尖锐地批驳了孔祥熙在财政报告中为掩饰通货膨胀所设的遁词,话锋犀利,击中要害。主持参政会的蒋介石大为恼火,长时间按铃警告要他中止发言。蒋介石悻悻地说:“欢迎发表意见,但请注意态度,用语尖刻不好。”张奚若毫不畏惧,坚持把话讲完。由于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压制民主,实行独裁,于是张奚若和陕籍参议员李元鼎、茹欲立相约共同抵制,他随即返回昆明西南联大,以示抗议。张奚若回电说:“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他再也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

1943年冬天,国民党当局在西南联大昆北教室举行所谓“宪政问题”座谈会。张奚若出席并发表演讲,戳穿国民党当局空喊准备召开宪政的骗局,提醒大家不要上当。他在会上说:“如果真有诚意实行‘宪政’那就要结束‘训政’,就是说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把老百姓当阿斗,究竟何日才算‘训’好了呢?可以结束‘训政’呢?国民党当局明明是搞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偏要说那末多漂亮话,骗了这么多年还想骗多久?所谓‘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组织法》、《国民大会选举法》,都是一纸空文,根本不是准备实行的。”^①他的这些讲话将会议主持人气得目瞪口呆,打乱了主办人的阵脚,座谈会只好匆匆收场。“他的讲演,像一声惊雷打破了沉寂”的西南联大校园,“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渴求知识,追求进步的青年人,使他们明白,要认清这个政权的反动本质,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争,才能争取得民主。”^②

1944年冬天,西南联大政治系学生自治会在联大饭厅举行讲演会,题目是:论国是前途。张奚若应邀参加发表讲演。他分析了

① 王子光:《怀念刚直不阿的张奚若老师》,《张奚若文集》第494页。

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并预测抗战胜利后国内时局发展的趋势。他说,我们应当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但对国民政府不能抱幻想。他认为和平与民主只能从斗争中获得。他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口口声声说要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用三民主义来鱼肉人民。他揭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指出蒋介石表面上侈谈抗日,却在江南制造皖南事变,进攻新四军,同室操戈削弱抗日力量。蒋介石把胡宗南几十万军队放在关中,目的在于反共防共,就是不把这支部队用于抗日。抗战结束后,怎样才能获得避免内战获得和平呢?他指出:首要的就是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①。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饭厅爆满。虽然已是数九寒天,却有许多未能挤进饭厅的学生,站在门口、窗口、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听讲。会后,广大学生奔走相告,将他的讲话广泛流传到社会上去,人们对国民党的面目有了进一步认识,并明确了要反对国民党独裁就要投身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的道理。

抗日战争8年的经历和感受,使张奚若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抗日战争胜利,旧政协召开前夕,在昆明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张奚若抨击国民党说:“今天中国已病入膏肓,主要的原因是政权被一群极端反动、贪污、低能、专制的集团所把持,18年来的所作所为,真是黑尽良心”^②。因而他对国民党完全绝望了。

张奚若对国家,对中华民族却未绝望,永不绝望。他从群众耳口相传里,在一些进步报刊的弦外之音中,在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

^① 《张奚若文集》第17页。

^② 张国华:《我所知道的张奚若先生》,《张奚若文集》第487页。

员给他介绍的材料和文件中,得知祖国的北方还有另一个廉洁的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一支人民的抗日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队,他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张奚若阅读了《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倍加赞赏,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积极赞同。当他得知延安报纸在一篇社论中说“像张奚若这样的人,也站到人民一边来了”^①时,高兴地向夫人杨景仁说:“共产党也说我站在人民一边了。”

这些深刻的经历和感受使张奚若反复思考。他感到国民党已经反动腐朽,中国要前进,要有光明的前途,只有依靠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后期起,他就和活跃在中国民主政坛的吴晗、闻一多等人一起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在争取进步和民主的事业中,和青年学生一起努力奋斗。张奚若成为国统区大后方进步青年学生景仰的八大名教授之一。闻一多在遇难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八教授颂》第一章《政治家》,写的就是张奚若^②。

摒弃第三条道路,选择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支持下,抢夺胜利果实,企图使中国仍然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中国引向黑暗;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把中国引向

^① 《张奚若文集》第16页。

^② 沈叔平:《启蒙思想家张奚若》,《张奚若文集》第476页。

光明。因而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爱国的正义感,促使张奚若毅然作出抉择: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张奚若联合西南联大钱端升等11人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国是提出三条建议,其中第一点就是:“废除一人独揽作风”^[1]。这就表达了从那时起张奚若就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改革的强烈愿望。

1945年12月,云南省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昆明4位教师学生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广大学生和社会人上义愤填膺。西南联大和昆明各大中学校决定罢课抗议。张奚若和西南联大教授会旗帜鲜明地发表宣言,坚决支持学生的罢课行动;并要求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当局严惩凶手,妥善处理受害者及抚恤其家属,否则决不复课。

这年年末,在酝酿提名参加旧政协人选时,民主同盟和中共一致推荐张奚若为社会贤达人士代表。但是,国民党当局深知张奚若的一贯为人和表现,一口咬定他是国民党员,不予同意。事实上,张奚若只是在历史上曾参加过同盟会,民国年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在美国留学前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为了揭穿国民党当局的卑劣骗局,张奚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这个声明,既有力地回击和嘲弄了国民党当局别有用心的伎俩,又显示了他的铮铮铁骨。

1946年旧政协召开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之请,在西南联大草坪发表讲演,题目是:《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

[1] 孙敦恒:《刚正不阿的张奚若师》

这次演讲历时两个多小时,听讲学生达六七千人。在讲演正式开始前,他在会上大声说:“如果我有机会碰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就是请他滚蛋。”^① 听众哄场大笑,热烈鼓掌。他接着说:“在中国现在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非常反动的专制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他提出“医治”这个病症的办法,就是“废除党治”、“蒋介石先生下野”、“组织联合政府”、“惩办反动分子”、“召开制宪会议,制定宪法”^② 等。综观张奚若的讲演,表明他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他的讲演立即传遍中国,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

由于张奚若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指责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受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恰逢西南联大在抗日胜利后宣布解散,清华大学师生要复校回北平,在好心朋友的劝告下,张奚若全家悄悄提前离昆明取道上海,于1946年9月回到北平。

1946年12月,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案件,北平大中学生举行罢课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张奚若对此义愤填膺,在一次座谈会上厉声说:“这不能孤立地看,这是一连串事件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可!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③ 他又正词严地与爱国青年学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这年年底,蒋介石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愈演愈烈,国统区的爱国

^① 张国华:《我所知道的张奚若先生》,《北大清华联合报》第2期,1948年10月11日。

^② 《张奚若文集》第17—18页。

^③ 《燕京新闻》第13卷第8期,1947年1月6日。

民主运动也像江河的怒涛，汹涌澎湃。张奚若自然成为国统区进步青年授业解惑的良师益友。他每逢讲课或有学生来家访问，必然牵涉到当时人们关心的话题：内战。在谈到内战的性质时，他说：“我认为今天这个战争是一个富有理想的要改革现实社会的政党与一个完全失去理想的、要保持既得利益的政党的战争。有理想的政党为了实现其理想，自然不得不排出拦路的障碍；操有政权的政党，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不得不用各种方法来压迫和消灭新兴政治集团的力量。”“社会到现阶段时，有理想的新兴势力，自然要取旧的统治集团而代之，而旧的统治集团也一定作最后挣扎，因此就发生了新与旧的战争。”^①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使他丢掉原来向往中国效法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幻想，而以全部精力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这就是他不断进步的动力。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向学生说过，他所以支持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②。

1948年6月的一天，当一份拒领美国救济粮的大学教授联合声明送到张奚若手中时，他看到声明上写的是：“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救济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配给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张奚若毫不迟疑地在这个声明上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接着签名的还有吴晗、朱自清等^③。

^① 张奚若：《人民怎样渡过内战难关》，《民主半月刊》第4期，1947年3月1日。

^② 《张奚若文集》第20页。

人^①。这种爱国行动,毛泽东称赞为:“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四年间,张奚若不知疲倦地战斗在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上。他凭借知识分子的特长,对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口诛笔伐,成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一员无畏的战士。1948年春,他满怀信心地断言:“中国目前的革命必然成功,这是惟一的出路。”^③他认为那种对革命绝望和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者企图在国共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是犯了不愿真正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④这表明张奚若自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第三条道路,并且认为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有光明灿烂的前途。这时,张奚若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为新中国诞生而欢呼

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古城北平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时,张奚若虽然已是花甲老人,但是在政治上他却焕发了青春,在他的生活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为了同美帝国主义妄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作斗争,1949年4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应国际妇联主席戈登夫人的邀请,中国人民组成了由郭沫若任团长出席世界

① 《百十师长严正声明》,《清华旬刊》第11期,1948年6月24日。

②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96页。

③ 张国华:《我所知道的张奚若先生》,《北大清华联合报》第2期,1948年10月11日。

④ 张奚若:《不要辜负了时代》,《清华旬刊》第6期,1948年4月3日。

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国解放区),张奚若为代表团成员。出国前,他广泛收集了反映华北解放区各高校师生员工在经历8年抗日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妄图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材料。归来后,他向师生传达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精神,加强了广大师生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

1949年5月,清华大学成立了由21名教职员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叶企孙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周培源、钱伟长、吴晗、费孝通5人任校委会常委,张奚若为办好人民的清华大学而努力工作。

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建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管华北解放区各省市所属高等学校、学术、图书和文物机构。董必武任主任,张奚若和周扬任副主任。张奚若联合许德珩、马寅初等常委向中共组织建议,接管帝国主义在华北开办的教会学校。这个建议当即被采纳。他还协助董必武对华北解放区各高校进行初步民主改革,建立校务委员会、确立高校必修课程,开设马列主义政治课程等。这些作法、经验对以后新解放区的高等教育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着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奚若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参加。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预备会议上,他被选为由毛泽东任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个由21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领导新政协的召开,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参与研究制定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方案等。在讨论国歌方案时,他力陈己见,认为居安不能忘危,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为新中国诞生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张奚若殚思极虑,竭尽忠诚。

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张奚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发表感想说:“现在军事成功了,就要开始政治上的建设,要把中古的中国变成现代化的中国,要把农业的中国变成工业的中国,把贫穷的中国变成富强的中国,在最后一块地方解放后,就要开始伟大的建设工作,就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就要先协商先筹备。”“现在虽然还是新政协筹备会,但是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虚心地与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共商国是的精神。”^① 他看到孙中山终生奔走为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现,感到无限欣慰。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各界代表662人出席参加,张奚若作为无党派人士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被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他和全体委员一起参加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和国旗、国歌、国徽和纪元的讨论和制订工作。

9月30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等56人组成这个委员会,张奚若在会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这一天,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亿万人民同庆新中国的诞生。

^① 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为人民教育、外交事业而呕心沥血

1952年11月至1958年初,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教育部部长。

在他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政(国)务院领导下,张奚若继续实行对旧中国原有学校进行接管和改造。从1952年至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教育部对全国私立中学1412所、私立小学8925所全部接管改为公立中小学;同时教育部还组织其所属的学校,清除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影响,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制定和调整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编写和出版各种教科书;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需要,积极发展各类学校特别是发展中等师范和高等师范学校,以便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师资。张奚若为我国50年代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张奚若在北京选区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出席了这次会议,尔后,他还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8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决定教育部与高教部合并,由杨秀峰出任合并成立的教育部部长,张奚若调任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任职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积极组织了我国与友好国家和地区间教科文卫组织和团体、个人之间双向相互访问交流表演展览以及互派专家学者交换留学生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既学习了外国的

进步文化,丰富我国精神文明;又向海外介绍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扩大了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增进了我国和五大洲的文化交往和友好往来,密切了相互友谊,对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张奚若作了《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报告,总结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经验,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

早在1949年12月15日,周恩来总理根据多渠道进行外交活动,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了解新中国,我国外交界和有关方面成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周恩来被推选为荣誉会长,张奚若被推选为会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至逝世)。在张奚若担任会长期间,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国和世界各国和地区间民间团体、组织和知名人士之间友好往来,加深了中外之间的了解,密切了关系,增进了友谊。特别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张奚若任会长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日本各民间团体、组织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之间的中日相互友好往来活动频繁。张奚若曾亲自会见1955年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为首的日本宪法联合会访华团,1957年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一、第二次访华团,1962年以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团等等,在会见这些访华团成员时,张奚若坦率、诚恳地与他们交谈协商。经过会谈,中日双方都对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取得一致的看法,并进行了许多协调工作。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也曾多次派出民间代表团、访问团访问日本。中日两国双向的民间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外交活动,互相访问与交往,以及他们所作的许多工作,为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张奚若为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奚若平易近人，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他从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写私人信件，国务院给他配备专用小汽车，他不允许子女和亲属乘坐。虽然他已年逾古稀，每次送别探望他的亲友和工作人员时，他总是从所住的三楼送至楼下门口，殷殷惜别。他对同学、乡亲极为思念关怀。一次，他无意中从亲友的来信中得知他少年时代一位同学王治体弱多病，他便立即给这位老同学去信，寄去食品，嘱咐他加强营养，保重身体。1958年，张奚若以全国人大代表身分回陕西视察工作，得悉少年时代在朝邑念书时曾给他做过饭的老大娘仍然健在。公务完毕后，他备了一份厚礼赶回故乡看望。老大娘见到他时，十分激动，为他当了高级干部仍然没有忘记贫贱时的亲友故旧而流下眼泪。

张奚若一生担任教授、部长，著作甚丰。除前叙述在解放前他写的学术著作、时评、政论等文章外，建国后他的重要报告和文章有：《和平与战争的关键——我对斯大林答复报界的理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亚非会议的意义、成就和影响》、《关于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的方针》、《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奚若是周恩来总理开列名单并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应予保护的重点对象之一。这时他已是耄耋之年，体弱多病。以后病势逐渐沉重，乃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周恩来亲往医院探望慰问。张奚若以自己亲身的体会，对周恩来非常敬佩，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亲友说：“周总理真是我们的国宝。”张奚若所患疾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于1973年7月18日病逝，终年84岁。

7月23日举行张奚若追悼会，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廖承志致悼词。悼词说：“二十多年来，张奚若先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他热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拥护中国共产党,努力贯彻和执行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努力从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人民外交活动,不辞劳苦,鞠躬尽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①

(黄中岩)

本文资料来源:

1. 孙敦恒、徐心坦,文学必选编:《张奚若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
2. 刘桂生:《忠诚为国,毕生奋斗——纪念张奚若先生》,1989 年 12 月 14 日《人民日报》
3. 廖承志:《在张奚若先生追悼会上的悼词》,1973 年 7 月 24 日《人民日报》
4. 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陕西文史资料》第 3 辑
5. 张奚若:《关于高等师范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的方针》(1954 年 2 月),《新华月报》总 52 期
6. 张奚若:《发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59 年 4 月),《新华半月刊》总 157 期
7. 《张奚若和浅沼稻次郎发表共同声明》(1957 年 4 月 22 日于北京),1957 年 4 月 23 日《光明日报》
8. 张奚若:《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独立评论》第 229 号,1936 年 11 月 29 日
9. 张奚若:《人民怎样渡过内战难关》,《民主半月刊》第 4 期,1947 年 3 月 1 日
10. 孙敦恒:《刚正不阿的张奚若老师》,《民国春秋》1989 年第 5 期
11. 杜汝辑:《怀念尊敬的张奚若老师》,《张奚若文集》第 472—475 页

^① 1973 年 7 月 24 日《人民日报》

12. 张国华:《我所知道的张奚若先生》,《北大清华联合报》第2期,1948年10月11日。

13. 张国华:《我所知道的张奚若先生》,《张奚若文集》第484—488页(张国华是张奚若的学生,1948年曾写过介绍张奚若事迹的文章,1989年在纪念张奚若诞生100周年时,清华大学出版社又约他写有关怀念文章,张国华文章用同名发表,收入《张奚若文集》,但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此外,在撰写过程中还查阅了有关档案、图书资料;访问了张奚若的亲属、生前友好和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杨景仪、张文英、杨行简、井绍文、井彰文、刘依仁、李伯循、费孝通、钱伟长、陈岱荪、楚图南、钱端升、李赋宁、唐得源等。

李 鼎 铭

(1881—1947)

李鼎铭，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早年在陕西米脂、榆林等地兴办学校和行医。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1年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同年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政会上提出“精兵简政”提案，被中共采纳，并成为抗战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

一。1947年12月病逝

寒窗八载 从教十年

李鼎铭，生于公元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八月初六）。其父李鸿基，粗识字，在家务农，早年去世；母亲杜氏，主持家务，1929年去世。李鼎铭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二弟早死，三弟在家务农经商。他家有土地20余垧，生活并不宽裕。

李鼎铭10岁时，寄居其舅父杜斗垣（前清举人）家就读。寒窗八载，刻苦钻研，读遍经史子集。1903年，赴绥德应考，取为廪生，以后便在家乡教书。辛亥革命时，他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身体力行，在社会上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兴办学堂。1913年，他在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产，创办了米脂县第

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榆林中学，担任国语、数学教员。1918年返乡，与当地群众在姚镇创办国民高等小学，担任校长。在教学中主张给学生讲些科学知识，治学严谨，他从事教育十余年，成绩卓著，甚得当地群众赞许。

医道有术 公正为人

1923年，李鼎铭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等职。1926年因病返里，便专心钻研医学，他广泛阅读各种医药书刊，对于中医中药的掌握和使用，较为精通，随后成为米脂县一位人所共知的名医。在这期间，他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他同情群众疾苦，在为贫苦农民看病时，收费较少，甚至不收费，而对那些权贵阶层，则收高费。

李鼎铭平日热心公益，乐于助人。对于群众有事情请他帮忙，他都从不推辞，乐于为大家排忧解难。他主持正义，不畏强暴。当地群众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下一个专门敲诈老百姓的所谓剧团发生冲突，打死了该剧团一名坏头目，反动军阀扬言要用武力镇压。李鼎铭挺身而出，站在群众一边，奔赴榆林找井岳秀进行交涉，终于使事态平息。他还为维护本乡群众某些利益，仗义执言。

邻村有一户占地上千垧的大地主，每年带着大队骡马到桃镇收租逼债，耀武扬威。李鼎铭对于这些地主豪绅强收硬逼和官府借端加重群众的苛捐杂税，极抱不平。他凭借群众的支持，与之据理力争，并且警告这个地主说：以后再不许这样行事！1930年后，李鼎铭住米脂县城，开业行医，在这期间，尽管他经济拮据，但多次拒绝了杨家沟一户大地主要他去做总管家的邀请。他说：“宁叫肚里挨饥饿，不叫脸上抹灰尘，穷也要穷得有骨气。”人们称道，李先

生一不贪财，二不要官，为人公正，刚直不阿。因此，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和声望日高。

弃旧图新 参政救国

1931年到1935年，陕北社会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李鼎铭的思想也经历了一次剧烈变迁。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更加发展壮大，开展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经过多次武装起义，建立了陕甘和陕北根据地。尽管当时米脂县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李鼎铭的学生中就有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

1934年，米脂县县长高仲廉和反动军官孙绍山，猖狂地进行反共活动，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逮捕与杀害，有些同志的家被敌人查抄。这期间，国民党在陕北大搞肃反，镇压革命，李鼎铭被任命担任米东区肃反委员会主任。敌人利用他的威望，威逼利诱共产党人进行所谓“自首”，“规劝”他过去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脱离革命，以达到破坏我党组织的目的。这件事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从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的声威大振。共产党为国家民族争取独立与和平，为广大劳动人民谋求翻身解放的政治主张，影响所及，无不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这对李鼎铭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时，由于他的学生郭洪涛、艾楚南、张汉武等对他进行的教育和争

取,以及他的儿子李力果^①早年参加革命的影响,使他的思想有了较快的转变。他在给被国民党逮捕关在监牢里的儿子李力果的信中写到:“自古有为之士,往往能为人所不为之事,建人所不能建之功”,须在“困苦艰难中磨炼其精神,增长其志气,启发其知识”,“置荣辱于度外”,则在“铁窗之下非唯不足以困乏其身体,反可以修养心性”,“如果有志上进”,“自当有重见天日之时”^②。显然,这些话是带有鼓励其儿子的革命意志和坚持斗争之意的。1936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方努力,把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包括李力果在内的革命同志营救了出来,这一事实对于李鼎铭更是一次深刻教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大大促进了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这一形势的新发展,使李鼎铭逐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内战政策,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进步的革命政党。从此,他改变了过去对共产党的怀疑态度,从内心里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绪和正义感,并且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他常说:“共产党为人民办事,将来一定胜利,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将来必然失败。”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一大进步。在这期间,李鼎铭担任了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任,为群众办了一些有益的事。

1941年,陕甘宁边区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

^① 李力果是李鼎铭的二儿子,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唐山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在北京病故。

^② 申长犹回忆材料(1979年3月)。

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实行三三制,开展普选运动。三三制政策规定,边区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一切政权和民意机关的人员分配上,必须是共产党员占1/3;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其目的是照顾一切抗日的阶级,特别是中间阶级的利益,以便团结一切抗日的人们,实行民主合作,共同为抗战救国奋斗。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是年冬在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是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参议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说,指出:“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毛泽东还批评一部分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也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力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他说:“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共产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人士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①。

李鼎铭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演说,内心非常激动,受到深刻的教育,并且感到特别兴奋和鼓舞。他觉得毛主席的话,说得这样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5页。

彻，真叫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确实是真心诚意，感人肺腑。

这次参议会选举结束后，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年近花甲的李鼎铭，拄着手杖，缓慢地走向主席台，从容不迫地发表就职演说。他在作了自我介绍之后，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他说：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很惭愧。但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向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劝告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道路前进。他说，中国今日强敌逼境，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就是团结二字，我想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很愿意大公无私地做到精诚团结的，我们从他宣布的政策、纲领与“三三制”，就可以看得出来。共产党居 1/3，其他居 2/3，大家果能开诚相见，自然就团结了。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的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事^①。

李鼎铭这篇热情洋溢的演说，充分说明一个事实，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危急之秋，他秉着爱国主义精神，毅然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团结抗战的正确道路，表现了他对民主参政的一片热忱，抗战救国，壮心不已。正如后来谢觉哉所赞扬的那样：茹旧念新，自来俊杰识时务；知微见著，毕竟聪明属老成^②。

李鼎铭自参加边区政府工作以后，勇于负责，敢于大胆提出建

^① 1941年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1948年2月28日《群众日报》。

设性意见,对于抗战救国和加强边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和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参加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对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共同抗战建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精兵简政 远见卓识

1941年,我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最艰苦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加上边区地广人稀,民力、物力、财力都很有有限,而军政机构人员相当庞大,财政经济困难更为突出,使我们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这种矛盾和困难,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坚持,抗日根据地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实际上成为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如何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是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广大参议员群策群力,共商国事,各抒己见,献计献策,并就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方面提出了大量提案和建议。李鼎铭在这次会议上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先后提出了好几条提案,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但是,对于精兵简政的议案,在酝酿过程中,就有一些议员不赞同,甚至有人奉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提案,认为一来参议会不一定通过,二来共产党不一定接受。李鼎铭目睹当时边区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同时又想到毛泽东在参议会开幕式上的演说,要求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党内外民主合作,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响亮号召,从而增强了信心和勇气。因此,他主动同姬伯雄等

几位参议员商量，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原文如下：

提案：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①

这一提案提出后，果然反应很大。一些参议员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实行精兵简

①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第7—8页。

政,是否合宜,值得怀疑。但是,大会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多数参议员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具有远见卓识,是适时中肯的。在表决时得到参议员 165 票的多数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边区政府根据参议会的决议,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成立了编整委员会,具体组织精兵简政的实施。

对于精兵简政这一提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重视。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仔细地翻阅了参议会的每一本提案,并且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尤其对于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他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明确指出: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以后又陆续多次作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和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也多次发表重要社论。这样,精兵简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从此,深入贯彻精兵简政,就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包括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普遍地实行起来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实行了精兵简政,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具体说来,就是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对度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对于李鼎铭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精兵简政提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民主合作 肝胆相照

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以后,专心致力于边区政务,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三制政策。1942年1月,他经绥德返米脂,在绥米各界人士上的欢迎大会上,向干部、群众热情赞扬边区五一施政纲领的精神,说明共产党实行三三制政策的好处,党与非党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意义。他在绥德师范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致词说:我在边区参议会上听到毛主席的演讲,说中国社会是两头尖中间大的梭形社会,中间像个大肚子,三三制就是要和“大肚”团结。我也是个“大肚”阶层的人。共产党人和其他阶层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采取旁观态度,现在全世界的公敌是法西斯,所以大家都要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共同的敌人^①。这里说的“大肚”,实际就是指中间阶层人士,说明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是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救国。

李鼎铭在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期间,尽职尽责,与我党合作无间。当时他虽然年迈体衰,但精神焕发,充满信心,并且好学不辍。他读过《资本论》、《列宁选集》及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每日还必读《解放日报》。他曾说,我找到几本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的世界上,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②。有的同志关心地劝他好好休息一会儿,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花那么多功夫去看书呢?他却感慨地说:知识太重

① 1942年1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李鼎铭就职演说,1941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

要了,中国人民过去就是吃了缺少知识的亏。在延安的许多同志对李鼎铭这种在工作上学习上的认真态度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无不十分钦佩。

李鼎铭真诚地拥护中共的整风运动,并且直言不讳,热情帮助党整风。李鼎铭对工作素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而著称。他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不只是赞扬,也敢于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有一次,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要讨论通过一个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这次会议由李鼎铭主持,但具体内容工作人员事先没有很好同他商量研究。他说,你们叫我当副主席,但“你们党上”决定的事情我不知道,开会时事先又不告诉我什么内容,只来个条子叫我主持会议,把我当摆设,这样我还不如辞职回家行医为好。林伯渠、李维汉等虚心听取并诚恳接受了李鼎铭的这些批评意见,开诚布公地作了自我批评,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特别注意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改进工作中的缺点。自此以后,党与非党民主人士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李鼎铭不再讲“你们党上”如何如何,而是说“我们党上”了^①。

1942年,李鼎铭在纪念五一节的文章中说: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本着整顿三风的精神,来进一步研究中国民族的传统,各阶层的共同性,使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民族的特点而普遍地深入到广大人民中去。如此,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才更有把握。1942年7月,他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60,但已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从共产党此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是切切实实与党外人士合作,对

① 李维汉:《回忆林伯渠同志》,1980年5月30日《光明日报》。

② 1942年5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此,我更深信无疑^①。

1943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邀请中外人士举行座谈会,李鼎铭盛赞党的整风运动。他说,我是党外人士,我觉得国共两党是大党,但无党派人数占多数。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秋后又开高干会,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如只守党内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彻底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②。李鼎铭的这些意见,是诚恳的,善意的。

李鼎铭同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人的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融洽。陕北著名绅士李健侯,根据他自己多年积累的有关李自成的史料,撰写了一部章回小说——《永昌演义》。当时他把这部书稿交李鼎铭转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过后,高兴地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永昌演义》前数年多为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在对李健侯“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表示敬意之后,又以商量的口吻指出了这部书“只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的缺点。毛泽东还强调了农民运动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建议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部书加以改造^③。后来由于李健侯去世,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而李鼎铭对于毛泽东给他的这封信,却是非常重视和珍惜的,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家里,现在已成为当年毛泽东同李鼎铭建立密切关系的历史见证,毛泽东的书信手迹,也成为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① 1942年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1943年2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0页。

李鼎铭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十分注重研究医学。在延安时期,他不仅忙碌地操劳边区政府工作,同时也从未放弃继续钻研医术,并经常给中央和边区的一些领导同志看病。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患的关节痛复发,吃了不少西药仍未见效。李鼎铭得知后,来到杨家岭给毛泽东看病探脉,说只要吃3服中药就会好转。那时卫生处有的同志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给毛泽东用中药。毛泽东说:还是试试看。果然,吃了中药后把病治好了。所以,后来毛泽东有病时常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处方。有时候李鼎铭还用按摩的方法结合起来治疗,效果都很好。在给毛泽东治病的时候,他们还彼此讨论中药性能,治疗的道理,战胜疾病的方法。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自此之后,毛泽东常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并称赞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支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实行中西医结合。还介绍李鼎铭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人看病。在毛泽东的提倡下,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医协会、中医保健站。李鼎铭不仅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而且于1945年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时,被推举担任会长。他在大会上发表热情的讲话,号召医务工作者打破过去成见,亲密团结,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争取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1946年4月,李鼎铭在向记者发表政见谈到医务工作的问题时,强调指出,对边区人民的疾病死亡要设法救治,要普遍发展卫生事业,实行中西医结合,大家站在治病救人的立场上,以期达到人财

两旺的目的^①。1946年5月12日,为纪念国际护士节,李鼎铭欣然题词:“更进一步完成伟大的救人事业,减少群众疾病死亡”^②。

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十分重视医务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倡导中西医相结合,对边区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变了各级领导机关及干部的工作和思想作风,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改善,出现了合作共事,团结无间的新局面。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人,经常与党外人士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使他们很受感动。当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在延安发起成立怀安诗社时,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得知,也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进来,并相互赠诗共勉。在李鼎铭先生65岁寿诞时,谢觉哉赋诗相庆,题为《赴李老鼎铭生日宴》,诗云:

俯仰无惭一点元,
荣期修证溯渊源。
乐山乐水清如此,
名相名医道自尊。
得自天才成大寿,
善为治不在多言。
傲霜菊对须眉古,
百万边氓为负喧。^③

① 1946年4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1946年5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 《谢老诗选》第41页。

爱国典范 名留青史

李鼎铭坚持爱国民主的正确立场,对于全国政局的发展十分关心。每当时局逆转或胜利,他都要发表文章或谈话。1943年,当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他义愤填膺地指出:“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①。严正地痛斥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同年,他还发表了《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一文,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挑拨离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

李鼎铭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满腔热情拥护人民军队。他特别关心军政、军民关系,经常鼓励军民双方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各种活动,号召群众积极做好支前工作。1944年,当他看到边区部队在生产节约上取得巨大成绩时,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千年来,国家养的兵,都是穿老百姓的,吃老百姓的,唯独我们的八路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进行生产,自给自足,并且帮助人民春耕夏锄秋收,这是天下少有的^②。他曾经热情赞扬八路军说:这样的军队,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要尽心尽力拥护八路军,争做拥军的模范。当朱德60大寿的时候,李鼎铭亲笔题写“为亿万人寿”,表明他对朱老总的崇敬与爱戴之情。边区部队为了表彰李鼎铭拥军优抗的模范事迹,同时也表明八路军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给李鼎铭赠送了一面“民主典范”的光荣匾。

^① 1943年7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 1944年1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企图发动全面内战,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严重关头。李鼎铭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一边,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政策。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举行三届一次参议会,李鼎铭作了题为《边区人民的伟大胜利》的选举工作报告,斥责蒋介石指友为敌,发动内战,欺骗国统区人民参加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卑劣行径,号召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在这次参议会上,李鼎铭连选连任,继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47年3月,党中央为了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主动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时,李鼎铭虽然年老体衰,仍与群众同艰共苦,随边区政府辗转迁移,带病坚持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政策。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李鼎铭极表赞同。他说:“共产党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审查干部和党员,这两项政策伟大极了,有了这两项政策,它将保证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然胜利成功”。简短数言,完全表明了李鼎铭始终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并且坚信革命必然成功。这也成为李鼎铭在生命垂危之际留下的最后遗言。

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7年,贡献颇多。1947年12月11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驻地绥德县义合镇,突发脑出血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边区政府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有边区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及干部、群众约一千余人。中共

① 1947年12月18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中央,毛泽东主席,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部门及其他各解放区均送了挽联挽词,表示哀悼。中共中央挽词说:“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他的功绩,将永志不忘”毛泽东的挽词说:“李鼎铭先生与其他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哀悼之意”^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李鼎铭家乡群众的要求,决定把李鼎铭生前创办的桃镇小学,命名为桃镇鼎铭小学,同时决定在米脂县城竖碑,以资纪念。现在米脂县城面对无定河畔,树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上面镌刻着林伯渠题写的“爱国典范”四个大字,碑的背面记述了李鼎铭先生的生平事迹。

(李敬谦 熊宇良)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文件。
2. 《李鼎铭介绍》,1941年11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① 1948年2月28日《群众日报》。

3. 米脂县李鼎铭纪念碑上镌刻的李鼎铭生平事略

4. 艾楚南、郭洪涛、刘景范、张汉武、常黎夫、姬伯雄、王迪昌、艾维奇、高汉章、常德华、张玉明、田登宽、申长楮及亲属李嗣兰、王仲逸、李雪亭、李雪梅、李长直等回忆和笔者访问记录。

孔从洲

(1906—1991)

孔从洲，原名祥瀛，从周，字郁文。陕西省西安市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1938年参加抗战，1946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河南巩县率部起义。历任国民联军炮兵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炮兵营长、团长，陕西警备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第四集团军独立四十六旅旅长，新编三十五师师长、五十五师师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二野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高级炮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军委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6月7日逝世。

—

孔从洲，原名祥瀛，从周，字郁文。1906年10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镇上桥梓口村一户农民家庭。祖父孔庆禄，祖母宋氏，生二子繁杰、繁衍。伯父孔繁杰早逝，留一子，祥和。父亲

孔繁衍与母亲张巧云生两男一女，胞兄祥瑞、一个姐姐及祥瀛三人。祥瀛最小，又聪颖，曾随外祖父上私塾，外祖父将其名改为从周，字郁文，出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语。父亲勤俭忠厚，母亲贤慧善良，孔从洲耳濡目染，从小就养成了诚恳正直的品格和吃苦耐劳的作风。

孔从洲7岁始求学，先后就读本村国民小学、蓝田水磨村私塾、长安第一高小和国立中学。由于他刻苦用功，国文、算术、常识等课有明显地长进，曾获得奖励。正当孔从洲求学顺利进展之时，其父与一姓陈的地主为一块地的产权打了3年官司。其父说：“争气不养家，养家不争气”，官司虽赢，自己也被搞得精疲力竭，几乎倾家荡产。加之军阀混战，兄孔祥瑞遭拉差，伤了脚，家境每况愈下，孔从洲求学道路被迫中断。

1924年4月，17岁的孔从洲因仰慕杨虎城将军，决心报考杨部安边教导队。他只身一人从西安至安边，徒步千余里，山山水水，受尽折磨，几乎丧命。他常以“不到安边心不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来激励自己。孔从洲到安边时已误了考期，且衣衫褴褛，疥疮满身，但因其决心大、学习优，在孙蔚如、段象武等人的关照下，补考通过，终被录取。

安边军事教导队是杨虎城接受共产党人魏野畴的建议，举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队长是孙蔚如，排长有段象武、赵寿山、刘光甫等人。孔从洲在教导队前后8个月，从军事到政治，从课堂学习到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受到了严格的系统的培训教育，并获取了优异成绩。

1924年，杨虎城部编入国民军，杨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翌年初杨部南下关中，发动了驱逐北洋军阀麻振武、吴新田的战役，连连取胜。当时孔从洲任班长和炮兵排长。5月，他约伴会见

了魏野畴达两个多小时。魏野畴关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一席谈话，拨开了孔从洲的心扉，使他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7月，杨虎城在耀县开办三民军官学校，魏野畴任政治部长，刘含初、吕佑乾、赵葆华等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孔从洲参加了学校的培训，政治思想、军事技术、战术水平有了明显地提高。

1926年4月，杨虎城部进驻西安，开始了坚守西安战役。孔从洲从炮兵排长到炮兵连长，运用灵活机动、隐蔽突然的战术，先后率部打掉了军阀刘镇华部韩森寨、午门村、大雁塔的观察所和指挥部。杨虎城十分器重他，亲切地称其为“娃连长”。坚守西安战役前后达8个月，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

西安解围后，孔从洲随军东出潼关，参加了北伐。在征讨军阀张宗昌、诸玉璞、张敬尧的激战中，他率炮兵连打翻敌铁甲列车，实施层层拦阻射击，以榴霰弹杀伤大批敌人，大显了炮兵神威。

1927年，孔从洲曾先后聆听共产党人刘伯坚的讲话，多次接受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的教育，并先后向他二人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于斗争的需要，党组织让他暂留党外，以便工作的开展。孔从洲虽然没有履行入党的组织手续，但他一直与党的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始终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1928年2月，杨虎城部40多名中共党员被叛徒出卖而暴露身份，孔从洲奉孙蔚如之命，将他们护送到安全地区。

1929年9月，孔从洲任炮兵营长。1930年1月，杨虎城部升格为十七路军并回师关中，孔从洲任炮兵团长。其间，他用自己的积蓄在家乡创办竞进小学、雾庄小学，还率部参加泾惠渠兴建、西兰公路整修、蒲水河堤抢险等工程，赢得了民众的赞扬。

1933年4月，孔从洲奉命至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因一黄埔

生诬陷杨虎城十七路军，他怒不可遏，用板凳砸其脸部，引起一场风波。

1936年，孔从洲升任陕西警备二旅旅长。12月7日，他在新城西安绥靖公署受到杨虎城单独召见。根据杨的旨意，他立即布置了在七八两日进行两次夜间演习。要求：一、演习部队必须摸清各地区中央军警宪特的实力和具体分布情况；二、摸清中央军警宪特各驻地的地形及控制这些地区所需要的兵力；三、部队行动要肃静；四、严守机密。演习针对性强，带有预习的性质，又作得十分逼真，因此达到了预定的目标。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宴请随蒋介石来陕的军政大员，孔从洲参加了晚宴后，又忽受杨虎城的召见。杨一见面就问孔：“这几天演习得怎么样？街道情况都弄清楚了吗？”孔回答：“完全清楚了，演习还顺利，没出什么乱子，没有暴露意图。”说完从皮包里拿出一张西安城郊地图交给了杨。杨仔细查看，见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有中央军警宪特的位置，布置的兵力，连声说：“好！好！很好！”随后坐在沙发上静思。突然杨抬起头对孔严肃地挑明今晚十七路军与东北军联手兵谏，并问：“你的意见怎样？”孔从洲思想上已有准备，故异常兴奋地回答：“坚决执行主任的指示，一切听从主任的命令！”杨又问：“叫你去捉蒋介石，敢吗？”孔坚定地回答：“敢！什么时候去，决不含糊！”杨缓和语气说：“好！好！我是打个比方，并不是叫你去捉！你的任务是西安城防，担子是很重的。”随后孔从洲与应召而来的赵寿山、孙蔚如和杨虎城一起研究行动计划。12日凌晨4时，孔从洲作为城防司令，根据杨虎城的指示，命令司令部打出规定的红、绿色信号弹，开始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孔从洲指挥警备二旅和炮兵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漂亮地解除了城内敌人的武装，前后不过3个小时。天亮后，他又奉杨虎城之命，率一营兵力驱车赶到蓝田油

坊,阻截蒋介石从临潼翻山南逃。后得知蒋已被捉,方回西安。13日夜,杨虎城召集十七路军主要干部会议,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一事,孔从洲发言强调在有保证、有条件的前提下放蒋的主张,顺应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趋势。事变后,他又受命与红军副参谋长左权商定西安城防计划,负责中共代表团的护卫,前后50天,竭诚合作,尽职尽责。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警卫团长孙铭九等以“请客”为名,逼迫孔从洲在《反对和平宣言》上签字,孔当场严辞拒绝,并感到态势严重,遂假借腹泻解手溜出孙家,直奔新城绥署向杨虎城报告并采取相应的保卫措施。同时打电话请孙蔚如速来绥署。孙刚到新城绥署,就得知一卡车全副武装的东北军士兵开到了孙蔚如公馆,因孙离去扑空。一场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终得避免。然而随后不久刺杀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惨案终于发生。

“二二”事件后,杨虎城愤然离开西安移居三原东里堡。临近春节,孔从洲接到杨虎城命令率一营兵力赶往东里堡,杨对孔说有人企图对他兵谏,叫他缴警卫营的械。孔从洲感到事关重大,建议采取换防形式,效果为好,得到了杨的采纳。避免了可能在十七路军内部的一场公开分裂。

同年6月,孔从洲专程赴沪送杨虎城出国。杨与孔彻夜长谈,从十七路军的发展到与中共的合作,无所不及。二人都激动异常,感情竟然不能控制,以致热泪盈眶,相对唏嘘。

1937年初夏,警备二旅驻防泾阳。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贺龙等人从云阳去西安,遇泾河上涨受阻,被孔从洲邀请至旅部小住3日,热情款待,接谈融洽,如同一家。

二

1937年6月,孔从洲第二次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磨拳擦掌,心情激昂,立即联名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日。不久他返回部队,于1938年初率警备二旅开赴朝邑,保卫河防,并乘日寇立足未稳,一举夺回河道要塞大庆关。6月,警备二旅奉命准备东渡黄河,孔从洲率全旅官兵在朝邑县城东渡誓师大会宣誓:“我为中华生,我为中华死,坚信抗日必胜,誓死抗战到底。我不杀敌,敌必杀我。我要自救,必先杀敌,凡我官兵,共同勉之。”随后一鼓作气飞渡黄河,占领山西永济。8月,日寇牛岛师团一部3000余人,在10多架飞机,3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陆空协同,反扑永济。孔旅顽强阻击,战斗异常激烈,经过8昼夜的浴血奋战,炸毁敌坦克六七辆,歼敌1000余人,永济安然无恙。

永济战役后,原三十八军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团,不久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下辖三十三军(军长赵寿山),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孔从洲陕西警备二旅改编为独立四十六旅,隶属三十八军,随即参加了著名的中条山保卫战。

1939年1月,日寇以5000兵力分路发起进攻。孔从洲在张村地区率部反击,收复了原有阵地,并击落敌机1架,生俘敌飞行员山田青和古本辛2人。

1939年3月29日,敌牛岛师团6000人,陆空配合,再次猛烈进攻我方阵地。在当地牺盟会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孔从洲率部重创来犯之敌,坚守了自己的阵地。此战结束后,为了争取主动,他派一营兵力深入敌后在万泉、安邑、运城等地打游击战,破坏敌公路,袭击敌火车站、飞机场,前后达一月之久,有力地配合了中条

山保卫战。

1939年6月6日,日军二十师团,三十七师团一部共3万余人,在38架飞机、两个炮兵联队的配合下,倾巢出动,发动了对中条山空前的全面进攻。因敌军来势凶猛、火力密集,我三十八军、九十六军阵地被迫隔开,造成九十六军军部、一一七师、独立四十七旅、独立四十六旅数万人陷于平陆旧城一带的谷地,形势十分危急。孔从洲审时度势,向李兴中建议并率部向敌北方空虚地区突围。孔旅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出其不意插入敌后,歼灭日寇两个炮兵中队,缴获山炮16门,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主力突围和反攻。日寇在此役中,伤亡惨重,仅在运城追悼士官以上阵亡者骨灰即达1700余罐。遂被迫退出中条山。

1940年4月14日,日军二十师团及三十七师团一部近3万人,再次以空军、炮兵配合,进攻我中条山腹地,此役规模仅次于1939年6月之役。孔从洲采取正面阻击,侧翼袭击敌后方腹地的战术,率部与敌激战半个月。仅正面主阵地,即与日寇反复争夺8次之多,敌终不支,再次失败退出。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电示第四集团军策应,孔从洲受命派部在晋南一带出击,破坏敌铁路、公路交通、炸敌桥梁,有力地配合了百团大战的胜利开展。

中条山保卫战坚持了两年三个月,孔从洲独立四十六旅所在的第四集团军前后粉碎了日寇11次扫荡,歼敌2万有余。使敌畏中条山喻其为盲肠炎,此数年虽为敌焰方张之期,但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当时的战区长官卫立煌也称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甚至蒋介石也不得不通电嘉奖,称第四集团军与敌血战,迭挫凶锋,良堪嘉许。

中条山保卫战期间,正值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1939年冬,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孔从洲派秘书共产党员何寓础立即通知平陆县的中共党员牺盟会员共200多人速到旅部集中。孔给他们发放路费,更换军装,派部队护送他们转移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并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工委书记是蒙定军。赵寿山向孔从洲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孔积极支持配合,独立四十六旅随即也建立了党的组织,由李慕愚等负责。在党组织的推动下,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开展,成立了“铁血”剧团,大演抗战节目,教唱革命歌曲。何寓础受孔从洲指示写出《爱老百姓歌》、《独立第四十六旅旅歌》。同时还成立了战地军官训练班,孔从洲亲自兼任班长,何寓础讲授政治,李慕愚等讲授游击战术,对排以上的干部统一进行轮训,使部队的政治素质、战斗力有了明显地提高。

第四集团军固守中条山,战功卓著,人所尽知。然而国民党顽固派惧怕这支部队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反诬该军“赤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奉命移防到黄河南岸郑州、洛阳之间。此时独立四十六旅改编为新编第三十五师,进驻巩县、汜水地区,孔从洲任师长。1941年1月,孔从洲命李慕愚率特务大队,北渡黄河潜入豫北地区,开展游击战,策动万名伪军反正,并于12月发动“一夜大战”,消灭日军千余人,俘敌指挥官11名,破坏敌铁路数十段,炸毁敌沁河大桥,威震豫北。

1941年10月,日军2万人渡河南犯,占领郑州。新三十五师与三十八军各部火速迎击西犯之敌,在广武、荥阳地区与日军血战。双方反复冲杀肉搏,战斗至白热化。11月,日寇不支被迫放弃郑州,退守黄河铁桥和霸王城一带。新三十五师、十七师奉命对

敌进行围封。孔从洲与新三十五师广大官兵一起，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组织夜袭，固守阵地，形成我在汉王城敌在霸王城的长期对峙达两年有余。

1943年1月，孔从洲被蒋介石召赴重庆。一见面，蒋介石就劈头盖脑地问：“黄河铁桥是你们丧失的吧？”孔从洲当即回答：“失了阵地应该军法从事，但黄河铁桥不是我丢失的。我接防的时候，黄河铁桥已经失守了。”蒋蛮横无理步步紧逼：“就是你们失的嘛！你还强辩什么！”孔镇定自若毫不退让：“黄河桥不是我师失的。交接时国防部派人去了，有监交的。请委员长查一查。”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一个小小的师长居然不好叫他下台，于是不顾体面地说：“我不管，我不管，就是你们失的。你不要说了，就是你们失的。”但他自知理屈，对孔从洲又无可奈何，遂转变口气说：“好！你坐下。”询问了新三十五师的一些情况，并表示可以给孔从洲补充一些装备。第二天，蒋介石又派车接孔从洲吃饭，宋美龄作陪。蒋介石采用打拉结合，恩威并用的手段，本想使孔从洲对他俯首贴耳，效忠卖命，然而适得其反，孔从洲中从又进一步了解了蒋的虚弱本质。

1943年11月，新三十五师奉命随三十八军移防巩县、偃师整训。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中原战役。孔从洲指挥新三十五师在巩县冷沟寨连续击退敌6次进攻，随后又在陈村西坡与口寇千人敢死队展开了整整一昼夜的肉搏战，最终将敌击退。正当新三十五师浴血奋战的时候，其右翼汤恩伯部却一触即溃，致使日军得以长驱西进，造成第四集团军腹背受敌。危急时刻，孔从洲受命掩护战区长官部撤退，之后才可后撤。在该师向洛宁转移途中，于麦城与敌打了个遭遇战，大获全胜。随后移驻崇阳镇一带构筑阵地，至此中原战役结束。当时日本广播电台说：“在远东运动会上，任何人都跑不过日本人，但在中原会战中，我们却跑不过汤恩伯。惟有

孙(蔚如)兵团节节抗击,阻碍我们前进。”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一文指出:“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

1946年8月,日本投降。孔从洲率五十五师(新三十五师改编)进驻郑州,兼郑洛警备司令。任职期间,惩治日伪犯罪活动,整顿社会治安,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扬。

三

孔从洲所在的第四集团军,抗战八年,战果辉煌,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对此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和打击。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惧怕第四集团军最终会站到共产党、中国人民一边,终于向这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部队捅出了凶狠的一刀。

1944年2月,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被调往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三十八军军长由蒋介石黄埔嫡亲将领张耀明继任。因形势严峻,中共三十八军工委被迫转移,并指定三十八军内部工作由孔从洲负责。赵寿山离开三十八军时也同孙蔚如商定,将三十八军实际交孔从洲掌握。他对孔说:“十七路军就剩这点部队了,……迫不得已时,就打起红旗,坚决干。我走后,这副担子就落到你的肩上了,望你勉力为之。”他也曾给共产党员团长刘威诚说:“蒋介石调我另任,这是对我们部队开的第一刀,开第二刀的不是孙蔚如总司令就是你们这些师、团长……到时候,要见机行动,拉开三十八军,拥护孔从洲,坚决地干。”

张耀明到任后,果然摆出了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扬言要大抓共产党,搞得部队人心惶惶。面对张耀明的嚣张气焰,孔从洲几次

当众讲话,严正声明:三十八军里没有共产党,都是抗日爱国军人,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倒退。这对稳定三十八军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思想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孔从洲甚至当面向张耀明敲明:“三十八军的广大官兵,大都是咱陕西人,大家也知道你是临潼人,家住在哪里别人都是清楚的。希望你能注意一点,再不要把大家搞得太紧张了,否则怕后果不好,甚至搞得祖坟也不得安宁!”话中有话,弦外有音,张耀明色厉内荏,反动气焰一度有所收敛。孔从洲此后还采取各种办法,解救了中共三十八军前方工委书记营长梁励生,安排共产党员崔治堂、尤继贤等任团长、副团长,保护和巩固了三十八军的革命力量。1945年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政策已露端倪,张耀明的倒行逆施也随之变本加厉。鉴于形势的复杂,孔从洲急速派人到西安找到蒙定军,请转告党中央派人来,以加强对三十八军的统一领导。蒙定军亦感事态严重,随即派人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2月,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派周仲英、张西鼎2人来到三十八军十七师驻地洛宁,传达了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毛泽东说:三十八军这个部队早就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那里早就有党的组织,三十八军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军内组织一直是按照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还指示在二十八军要搞好思想教育,健全领导,团结部队,坚持敌后抗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真也有统战政策,稳定部队的重要指示。

1945年6月,孙蔚如被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六战区是陈诚的老底,一切以陈诚唯命是从。原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继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但九十六军番号被取消,其一百七十七师等部并入了三十八军,与十七师、五十五师均受制于张耀明。第四集团军实则空有虚名,李兴中从原握一军实权的军长变成了空头司令。

这样,蒋介石以明升暗调的阴谋手段先后架空了赵、孙、李3人,使杨虎城的3个主要干部大权旁落。蒋介石排斥异己,公报私仇。打击削弱原十七路军的恶毒阴谋昭然若揭。胡宗南、张耀明也如法炮制,在三十八军开始实行大清洗、大换血,这支部队的命运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945年7月,刘威诚等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率十七师于河南洛宁起义,然后转入豫西、晋冀鲁豫解放区。十七师起义后,孔从洲曾多次向中共中央请示五十五师起义,1946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也3次电示,总体内容:一、值此停战之后,三十八军举行起义不甚妥善。二、除最暴露不能立足干部离队外,其余尽量保存作长期打算,团结内部,进行反分化反瓦解的斗争。三、如一切已准备就绪,不起义就有重大损失,则迅即拉至冀鲁豫去。

1946年4月,五十五师被整编为五十五旅,孔从洲改任整编三十八师(原三十八军)副师长,军权被夺,形势极为险恶。孔从洲派乔阶平再次到解放区,请求起义。刘伯承、邓小平亦紧急向中共中央报告请示。4月29日,中央电示刘、邓,同意孔从洲原五十五师立即起义。邓小平接见了乔阶平,并就起义作了详尽具体地部署。乔阶平带着中共中央及邓小平的指示赶回河南巩县五十五师驻地,向孔从洲作了书面报告。1946年5月15日,孔从洲率原五十五师官兵于巩县光荣起义,同时发表了反蒋起义的通电。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已有准备,形势发生了变化,起义部队遭受挫折,经过千难万险,孔从洲终于转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见。周恩来在这之前已通过地下党组织把孔从洲的家属安全转移到解放区。

1946年9月,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邯郸成立,孔从洲任军长,隶属晋冀鲁豫解放军。孔从洲与副军长刘威诚发表就职

通电，追述原十七路军的斗争历史，指出与共产党团结合作是该军的光明道路，表明该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信心。毛泽东亲自致电嘉勉：“祝你们胜利地参加了人民军队大家庭！”朱德、刘伯承、邓小平也分别发电勉励祝贺。对此，毛泽东以后高度评价：“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也就是在同年9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孔从洲为中共正式党员，并由党中央直接履行组织手续。

1947年8月，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大转折中，孔从洲随陈谢大军率部南渡黄河一举成功。他兴奋异常，当即咏诗一首：“勒马在中条，目睹黄水滔。敌人畏天险，我渡如鸿毛。”随后他又率部穿越陇海线，挺进豫西，挥师陕南，参加开辟豫陕鄂根据地战略壮举。豫西军区成立时，他任副司令员。1948年10月，郑州解放，他任郑州警备司令员。期间，他托人带5万元中州币转交李兴中，支持李的反内战独裁及策反活动。淮海战役胜利后，他派十七路军老部下，共产党员李少棠前往武汉，通过原第四集团军高参，时任白崇禧武汉“剿总”高参的王道生，搜集到武汉市的所需情报，为渡江作战作了充分地准备。

1948年底，孔从洲写信并派曹士泉前往长沙，说服原孙蔚如警卫团长，时任二三二师师长张镜白起义。张表示起义的事坚决照办，到适当时机马上行动。1949年8月，这个师终于参加了长沙起义，光荣地回到了人民大家庭的怀抱。

1949年2月，孔从洲调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参加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军事接管委员会副主任。8月，进军大西南，一路翻越崇山峻岭，克服艰难险阻于12月进驻重庆。孔从洲兼管起义部队的改造和军事接管。

四

新中国成立后,孔从洲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等职。在军区工作期间,他指挥领导所部参加剿匪、征粮、修建成渝铁路,主持炮兵整风、训练扩编和入朝参战等各项工作。为炮兵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院校、研究院及主管科研装备工作期间,为发展炮兵教育科研,他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重视人才,爱护人才,积极筹建,周密组织,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在他的主持下,新 85 高炮、新 40 火箭筒、双管 37 高射炮、302 反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均研制成功。

孔从洲在五六十年代,曾多次与毛泽东会见。其中一次是在 1959 年 8 月,被邀赴毛泽东中南海住处作客,为次子孔令华与毛泽东长女李敏完婚。在几次的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平易近人。从杨虎城到魏野畴,从西安围城到西安事变,从十七路军的历史到三十八军的新生,从院校教育到国防科研,从家庭生活到个人爱好,无所不谈,无所不论。孔从洲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深感敬佩;毛泽东也充分肯定孔从洲的革命经历,工作成绩,称其为“老实人”,受到大家的信任和爱戴。

“文化大革命”中,孔从洲亦不能幸免,曾被审查,靠边站,挨批斗。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他针对电子战在中东战争的突出作用和我军炮兵电子装备的落后局面,不顾张春桥的干扰于 1975 年 6 月向毛泽东写信,建议组建我军电子对抗领导小组和相应的专门机构,仅两天毛泽东即批示:“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

商议几次为盼”。叶剑英与孔从洲经过详尽周密的讨论研究，于12月向毛泽东写了《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两日后指示：“很好，退叶剑英同志。”电子对抗研制工作从此开始。

为了使“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尽早平反，孔从洲曾多次写信给党中央、毛泽东。特别是对杨虎城三十八军的性质澄清和政策落实，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就此事他本人和委托秘书代写的书信和材料达1492件。

孔从洲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孔从洲晚年不顾年迈体衰，抱病撰写了30万字的回忆录，为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党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海湾战争期间，他已病重，仍给军委领导写信，提出加强我军现代化的建议。1991年6月7日，孔从洲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6月2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了向孔从洲遗体告别的隆重仪式，以缅怀悼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孔从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怀念。他的革命业绩将永久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苏志纬）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孔从洲：《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2. 梁星亮等主编：《陕西近现代名人录》第3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3. 《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 4.《丹心素裹》第2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 5.《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
- 6.《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 7.《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 8.《西安文史资料》第4辑(内部发行),1983年6月第1版。

阎红彦

(1909—1967)

阎红彦，又名侯雁，陕西子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红三十军军长，警备第一旅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1967年1月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一

阎红彦，1909年9月13日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阎厚基，母亲周氏，终岁劳碌，省吃俭用，维持着艰难的生活。

阎红彦9岁那年，父亲送他到附近米粮山私塾读书。由于家庭经济困窘，交不起学费，艰难地维持了半年，便辍学回家，到砖瓦窑帮哥哥烧砖做瓦。

1920年，11岁的阎红彦经人介绍，到离家数十里的关庙坪，帮当地军阀王保民的岳父揽羊放牛，带小孩，做家务。有一天由于放

牧疲惫，失手将主人的小孩摔倒在地，挨了一顿毒打。他一气之下，出走长城脚下的神木、府谷一带，靠打短工度日。

1924年，陕北久旱不雨，赤地千里，饥民成群结队，奔走他乡。阎红彦一家的生活，也陷入绝境。恰在这时，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招兵，他便赶去报名。当时只有13岁，且只读过半年书的阎红彦，虽然不符合“年龄要在十八岁左右、有一定文化”的招兵条件，但招兵的人见他身躯高大结实，要求入伍迫切，遂破格录取。开始他在李象九连队当号兵，不久调连部给李象九当勤务兵。

李象九1924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训练内容和生活制度均与一般旧军队不同，每天除两小时的军事训练外，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还可以公开阅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革命书刊。一批进步青年如雷恩钧、史唯然等先后通过李子洲、谢子长的关系到该连任班、排长和训练工作，党在连队里秘密发展了不少党员。

阎红彦刚入伍时，只是为了谋求生活出路。在连队革命气氛的熏陶下，他追求进步，表现积极，1925年4月，在宜川集义镇由李象九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①。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胜利占领陕西，石谦团改编为国民军第十一旅，李象九升任第一营营长，谢子长任第十二连连长，部队驻防清涧。在我党的工作下，石旅几个营、连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先后发展了100多名官兵入党。阎红彦参加了连队组织的演讲团和文明戏的演出，深入附近乡镇，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帮助组织农民协会，鼓动贫苦农民

^① 《阎红彦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团结起来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1927年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不久,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在榆林刺杀了同情革命的石谦旅长,并密谋解除李象九、谢子长两部的武装。这时,在石谦旅任中共党团书记的唐澍和任军支书记的白乐亭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李、谢部队不能坐等敌人消灭,应立即举行起义”^①的指示,同谢子长、李象九一起,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阎红彦时任唐澍的党内交通,每天奔走城乡,往返连队,转送文件,传达指示。唐澍对这个青年人十分关心,常给他讲解马克思主义道理,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鼓励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诚党的事业。在唐澍的帮助下,阎红彦的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1927年10月12日,党在陕北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武装暴动清涧起义爆发了。当晚,李象九集合部队,宣布起义。士兵臂戴红袖章,查封了大商号的银柜,打开了大商号的烟土库,并分头捕捉大绅商。阎红彦奉命带领一队人马,捉拿了县长张友之。

10月13日,部队挥师南下,20日占领宜川。

11月中旬,敌调集部队包围了宜川县城。由于力量悬殊,加之指挥失当,近千人的部队只有200余人突出重围,起义归于失败。阎红彦逃亡山西绛州,匿居张汉民家。

张汉民是共产党员,原为西北军杨虎城部下,自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后,他被遣送回家。阎红彦在张汉民家住了半年,其间为了筹措活动经费,曾拦截了杨虎城参谋长的一批烟土。为此,他受到严密侦稽,在绛州无法立足,只得又秘密返回陕北。到陕北后,

① 雷恩钧:《回忆清涧起义》(未刊稿),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他在清涧一带组织了一支十多人的小游击队,由于处境艰难,无法开展斗争,经党准许,他与雷恩钧重新出走山西。

1929年春,根据陕北特委关于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阎红彦被派往宜川、延长交界的后九殿山寨杨庚五^①部做兵运工作,失败后,潜回瓦窑堡。

二

1931年初,中共北方局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在山西省委领导下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和白锡林奉命东渡黄河,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当时正是蒋、阎、冯中原大战后,阎锡山隐身大连,山西政局动荡,财政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我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进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

2月,阎红彦来到太原,见到了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刘向阎分析了山西的形势,传达了省委关于在吕梁山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当时,在吕梁山区,有一些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他们是保护走私烟土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成员大部分是生活无着、铤而走险的无业游民。山西省委决定,首先把这些“土客”争取过来,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为此,派阎红彦和白锡林、拓克宽等到“土客”师治贵部担任班长。

师部有30多人枪,是当地“土客”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

^① 杨庚五,曾加入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失掉关系,后投降井岳秀,被驻延安的高双成师长杀害。

股,活动在孝义县西宋庄以及灵石、孝义、隰县三县交界的温泉一带。师治贵长期厮混江湖,打家劫舍,生活腐化,挥金如土。他虽然表示赞同革命,但其本质并未改变,很快就和党发生了原则分歧,收缴了阎红彦、白锡林的枪支,并强令其离开部队。经过斗争,师治贵归还了阎、白的枪支,不久,将部队解散,潜逃平遥。

阎红彦离开“土客”队伍后,到太原向刘天章汇报了详细情况。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改变部署,从冯玉祥的汾阳军官教导团和军阀高桂滋部抽调有作战经验的地下党员杨重远、吴岱峰等,从太原兵工厂抽调马佩勋等十多个工人党员,会同阎红彦、白锡林秘密潜赴吕梁山区,发动与武装当地的贫苦农民,重新开始组建游击队的活动。同时决定,建立游击队临时党支部,由杨重远任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委员,并在汾阳建立了联络站,以杨重远为主任。按照党的决定,阎红彦负责组织联络工作。他时而以国民党军官身分出现在太原,时而以富商大贾身分活动在汾阳,把省委筹集到的枪支子弹和调配来的人员,秘密护送至离石、中阳交界的九凤山。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有30多个革命者抵达山区,筹集到步马枪25支。

1931年4月下旬,游击队在孝义县娄底村(现名西泉村)举行成立大会。拓克宽主持大会,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公布了经省委批准的领导人员名单: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阎红彦兼任,第二中队中队长白锡林^①。“从此吕梁山上举起了第

^① ②吴岱峰等:《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0辑。

一面标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诞生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①。

敌驻永安镇的一个加强排,约四五十人,装备精良。由于长期拖欠军饷,士兵极为不满,经地下党秘密工作,准备起义。汾阳联络站要求派人策应。阎红彦偕同白锡林、胡廷俊等,化装潜入该镇,经过三天三夜紧张的工作和周密的部署,在王家池打退了追兵,胜利进入山区和游击队汇合。

5月,游击队转移到孝义县西宋庄,并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郭家庄和温泉等地为中心开展活动,初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狠狠打击农村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阎红彦率领部队先后惩处了中阳县后狮峪的郝守富和孝义县碾头村的武世功。消息传开,大快人心。反动派对此十分惊慌,太原、天津的报纸连连惊呼:“山西匪势猖獗”,“大好云山,几沦盗匪世界”^②。吕梁各县的反动政府也纷纷向省里告急,要求派兵“清剿”。在艰苦的反“清剿”斗争中,阎红彦曾率部主攻中阳县留誉镇,并指挥了孝义县储家塄和石楼县水头镇等战斗。他机智勇猛,临危不乱,击败了敌人,大长了游击队的声威。

1935年夏末,徐永昌接任山西省主席。不久,即调集百倍于我的重兵向游击队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敌人采取“四壁合围”、紧缩包围的策略,妄图把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中。游击队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周旋。但由于寡不敌众,被围困在老鸦掌一带极为狭小的山林中。战士们露宿山头,靠野菜和野果充饥,处境十分危险。

① 1931年8月8日、8月29日天津《民国日报》。

在这种情况下,队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紧急措施。有的人主张埋枪散伙,待机再起;有的人主张冲下山去和敌人硬拚;阎红彦认为应按照山西省委事前的指示,西渡黄河。他分析和比较各方面的情况,说服了大家,会议最后决定突围西进。当时,全队留下的只有30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每人身背两枝枪,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攀悬崖,登峭壁,艰难地向黄河边上转移,于9月3日到达石楼县辛关渡。由于敌人封锁渡口,大家只好隐蔽在高山顶上的乌龙庙里。入夜,阎红彦找到水手王怀安,并带领游击队员悄悄摸到河边,乘坐羊皮筏子,冲过了浊浪滚滚、奔腾咆哮的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

三

9月6日,部队行至绥德以西的南沟岔,在大雾弥漫中,与敌军六七人相遇。由于拓克宽、黄子文处置失当,以致让敌逃脱。为此,队员严重不满,一致要求开会,改换领导。经过民主选举,公推阎红彦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9月8日,部队到达安定县西区枣树坪,通过谢子长的哥哥谢德惠(地下党员)及共青团陕北特委负责人、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马文瑞曾派慕嘉绩向游击队送去油印机和蜡纸等宣传用品,并动员了马云泽、强龙光等当地一批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游击队。不久,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子平前来,指示游击队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很快由渡河时的30人扩大到近百人。

游击队在安定县得知谢子长不在陕北,于是决定西进寻找刘志丹。9月10日,在乌云翻滚、瓢泼大雨中,阎红彦指挥了平桥战

斗。首战告捷后，进抵保安县（今志丹县）境。经多方了解，获悉刘志丹在陇东一带活动。队委遂决定，暂不去陇东，首先沿安条岭北进，迎接红二十四军^①，在陕北开展革命斗争。

安条岭是插在保安和安塞中间的一座大山，沟险谷深，人烟稀少。游击队在北进途中，遭到驻保安之敌高玉亭部和民团 300 余人的南北夹击。根据侦察情况，阎红彦决定集中兵力，先消灭北路民团，然后再打击南路高玉亭部。战斗中，阎红彦身先士卒，勇猛果敢，带领游击队员冲锋陷阵，把高玉亭部和民团打得狼狽溃散。战斗胜利后，游击队士气高涨，声威大震。

9 月中旬，游击队进抵靖边沙漠地带。阎红彦一面派胡廷俊化装去神木、府谷一带探听红二十四军的消息；一面根据陕北高原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决定打土豪、缴马匹，组建骑兵。不久，胡廷俊带回了不幸的消息，红二十四军在榆林以北两岔河被井岳秀军包围，全军覆没，党员 70 余人，惨遭杀害。队委会重新讨论部队去向，决定重返安定一带。

9 月下旬，游击队挥师南下，沿途取得了寨儿山、营盘山战斗的胜利。这时，长期流窜在黄河两岸的“土客”杨琪、杨森、杨鼎和师储杰等先后主动要求与游击队联合行动。阎红彦和“土客”在山西曾有过一段交往，对“土客”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们出身贫苦，打仗勇敢，和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势不两立。但是，纪律松弛，抢劫成风，流寇习气十分严重。经队委会研究决定，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改造“土客”队伍，同意联合行动。但要求他们必须遵守以下三条：一、服从游击队队委会领导；二、不抢穷人的东西；三、不

^① 红二十四军是 1931 年 7 月，国民党驻山西平定县高桂滋部 1000 多人，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之下起义后成立的。万启贤任军长，苏亦雄任政委。在敌重兵围攻下，撤出山西，经雁北转移至陕北一带。

强奸妇女。他们表示完全接受。陕北特委先后派雷恩钧、白雪山、惠泽仁等到“土客”部担任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组成了执法队，由雷恩钧任队长，查处违反军纪的行为。

10月初，在阎红彦的指挥下，游击队与师储杰、杨琪等步骑300余人，翻越关道崂山，在一个拂晓时分，突袭敌驻玉家湾的一个加强骑兵排，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和马匹。接着，游击队乘胜进抵瓦窑堡城郊，对瓦窑堡发起进攻，一部曾突入城内，迫使敌退守米粮山，紧关寨门，死守待援。游击队撤出战斗，转移至延川永坪镇休整。

瓦窑堡战斗，震动了陕北，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敌人悬赏追捕的“匪首”。敌人捣毁了他家的窑洞，逮捕了他年老多病的父亲，兄嫂弟妹也被逼投奔亲友，流落异乡。阎红彦的父亲被关押期间，受尽了酷刑，直到1935年红军占领瓦窑堡，砸碎铁牢，他才得以重见天日。

10月下旬，驻延安之敌高双成旅，集中步骑兵600余人，在清平川岔口将游击队层层包围。阎红彦率部与敌苦战一天，当晚又出敌不意，胜利突围到安定县凉水湾。这时，县委转来特委指示，要游击队迅速避开敌人主力，转移陇东。于是，部队星夜向西疾进。途中与敌张廷芝部遭遇，先后在保安县野鸡岔和红柳沟展开激战。战斗中阎红彦被摔下深沟受伤。他忍痛攀山越岭，追赶部队，途经芦子沟，在刘志丹家住宿一夜，次日，由张明科带路，顺利返回游击队。

11月下旬，部队到达乔山中段陕甘交界的南梁地区时，打听到了刘志丹的消息，立即派马云泽前去迎接。在阎家砭驻地，阎红彦、杨重远等与刘志丹亲切相会，大家都十分高兴，阎红彦还把自

己一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①。

找到了刘志丹,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接着游击队派马云泽去平凉与负责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取得联系。不久,谢子长偕同省委交通高硕卿(即高岗)来到部队。根据省委指示,他们首先传达了成立陕甘红军的决定。接着成立了新的队委会(即游击队的党委会),谢子长为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为委员。随即召开了队委扩大会,总结晋西游击队的工作,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以南梁地区为中心,扩大红军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会后,游击队进驻新堡,进行整训。尔后,队委会抽调了10余人枪,新组建了一个支队,由阎红彦任队长,到乔山北段陕甘交界的曲子、环县、定边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阎红彦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粮,扩大武装。很短时间,部队发展到步骑100余人。

1932年1月初,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②。

这期间,阎红彦奉命到西安,除向省委汇报部队有关情况外,还同在杨虎城部担任警卫团团长的地下党员张汉民和副团长阎揆要、军械处处长史唯然等老相识取得了联系,为游击队筹措了一批枪支弹药。特别使大家感到兴奋和鼓舞的是,他带回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对部队的整顿和改

^① 阎红彦:《回忆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武装斗争》,载《星火燎原》第2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9辑。

^② 《阎红彦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造,对克服各种错误倾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

1932年2月12日,根据省委的指示,部队经过整顿,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兼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吴岱峰任第二大队大队长,白锡林任警卫队长。“从此,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①。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省委进军渭北各县,在关中平原建立苏区的指示,于2月13日拂晓进驻关中旬邑的职田镇,捣毁了反动的区公所,收缴民团的枪支,处决了唐碧武等8个大土豪,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2月15日,敌猛扑职田镇,次日,在阳坡头展开激战。阎红彦指挥突击队30余人,迂回侧袭,插入敌阵,猛打猛冲。敌指挥失控,顿呈散乱。我军乘势反击,毙俘敌300余名,缴枪300余支。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3月19日夜,游击队奔袭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战斗失利,部队进入四村原、湫头原。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遵照队委会的指示,在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地主政权,召开了四村原72村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正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着又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少先队和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

4月13日,我军再度袭击山河镇,仍未得手。20日,在地下党

^① 李振民等:《谢子长》,载《中共历史人物传》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243页。

组织的协助下，游击队由山河镇撤回，星夜兼程，直捣旬邑。阎红彦率一大队猛攻东城，吴岱峰率二大队直取西堡山寨，全歼守敌人300余人，一举解放旬邑城。

这时，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来到部队巡视工作。他不从省委要求游击队攻打城镇和平原地区这一“左”的错误指导方针上去总结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把责任全部推到指战员身上，指责谢子长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强令其离开游击队。接着，在旬邑马家堡，他把游击队改组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吴岱峰，前往西兰公路永寿、乾县、礼泉一带活动；五支队队长阎红彦，政委黄子文，参谋长杨重远，开赴三原新字区、武字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三原的新字区、武字区，大革命时期就有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阎红彦率部到这里后，在地方党的协助下，收缴了田家营、孙家坡民团的枪械，建立和发展了各种群众组织，游击队也很快得到了发展。

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根据当时的形势，队委会决定集中三、五支队，进军陕北，建立根据地。5月15日，在刘志丹指挥下，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部攻破马栏镇，歼灭陕北军阀岳岳秀部两个连及民团一部。17日，在乔山主峰凤凰山歼敌两个连之后，又乘胜攻入焦家坪和五里镇，一天之内，歼敌500余人，缴枪400余支。在五里镇镇压了土豪杨百万，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游击队也迅速扩大至1000余人。5月27日，部队进驻吉子峁。阎红彦正在组织群众开仓分粮，敌特务团尾追而至，向我发起进攻，事前混在分粮群众中的敌便衣队，从内策应，我军受到内外夹击，仓促撤出战斗，涉水抢渡洛河。恰在这时，天色突变，

暴雨倾盆，我军踏上洛河左岸时，河水陡涨，洪峰咆哮而下，把敌隔在对岸。我军遂得以安全地撤退至洛川交道原休整。队委会总结了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阎红彦对自己麻痹轻敌，防范不严作了检讨。

交道原休整后，5月31日，三、五支队分两路急行军进攻英旺镇。阎红彦率尖兵连逼近敌营，发出信号，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敌指挥部，全歼敌一个营。接着，攻打临真镇。队委会命令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时任三支队二大队政委）指挥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战斗开始后，阎红彦率部攻入镇内，二大队也占领了东山制高点。当敌组织力量反扑时，高岗带领10余人临阵脱逃，致使攻入镇内的我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七八十人，被迫撤出战斗。事后，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开除高岗党籍、军籍，总指挥部下令通缉，以正军法^①。

6月上旬，阎红彦根据队委会指示，率陕甘游击队少先队六七十人，深入黄龙山发动群众，筹款筹粮，配合主力，扩大政治影响。与此同时，游击队主力经宜川集义镇，进抵韩城上官庄。原拟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后因强敌袭击，难以立足，只好又横穿韩城、蒲城、白水、宜君等县，西撤至甘肃正宁县麻子掌，部队锐减至200余人。在讨论行动方向时，领导人中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乔山”的争执。有的认为渭北一带群众基础较好，主张把部队拉到三原新字区、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打游击。有的认为，三

^① 1955年4月5日阎红彦在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贺晋年：《回忆阎红彦二、三事》，载《山西文史资料》第23辑。

^② 3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在艾蒿洼战斗后，谢子长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并任命王有福为队长。

原一带是平原地区，离敌统治中心太近，游击队不易立足，主张北上乔山，那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域开阔，回旋余地大。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有人便提出，“愿意到北边的北边去，愿意到南边的南边去。”于是，部队各驻一个村子，准备分兵。正在这时，阎红彦从黄龙山赶回部队。争论的双方都派人来争取阎红彦。他明确地表示：“我哪边都不去。”并且说服双方，认识“南北分兵”的严重后果^①。最后，在梁掌堡召开的队委扩大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了阎红彦的意见，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一致推举阎红彦担任总指挥。接着，整顿了部队，刘志丹、吴岱峰率二大队深入照金一带活动，阎红彦率骑兵队、少先队战斗在盘客原一带。7月9日，驻甘肃合水县西华池的新编警备十一旅一团一连连长、共产党员高鹏飞率两个连举行起义，阎红彦亲自率部接应。陕北特委和三原党组织也及时地输送来一批党员和战士，游击队又发展壮大到700余人。

正当游击队得到恢复的时候，推行“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的领导”^②。7月23日，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良（亦名愚痴）接替李杰夫担任游击队政委。李良到职后，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修筑防御工事”，“坚守阵地”^③。他指责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等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在游击队占领只有六七户人家的五倾原以后，李良提出：“死守五倾原，不让敌人铁蹄踏进五倾原一寸土地。”限令20天之内分完土地，并命令游击队消灭

^① 1945年7月16日阎红彦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阎红彦：《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几个重要问题的事实经过》，未刊稿。

^② 《陕西省委关于愚痴同志巡视边区的决议》，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③ 陕西省委来件：《边区军事计划》，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附近敌人的强固据点,建立新的根据地。李良的错误受到了阎红彦等的抵制。李良便利用职权,把阎红彦等集中整训,强制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还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非法成立了“秘密队委会”,错误地认定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有反革命嫌疑,进行打击迫害^①。由于李良的错误指导,致使游击队在王朗坡、三甲原等地的三次战斗中接连失利,损失惨重。8月20日,部队在牵马原被敌冲散。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8月30日,省委重新派谢子长回游击队担任总指挥。谢子长到任后,会同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率部南下。9月12日,攻破照金,歼敌400余人,缴枪300余支,击毙富、铜、耀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副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民团大队长蔡子发,大大振奋了我军的士气。但9月26日攻打保安失利,接着又在墩儿梁、八卦寺一带遭敌袭击,10月中旬,几经辗转,被迫撤退到南梁附近人烟稀少的平正川、瓦子川梢林地带,住在破烂的窑洞里,缺粮缺穿,处境极为艰难。队委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部队情况,决定分散游击,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恢复战斗力。此后,阎红彦和杨重远率骑兵奔袭耀县照金地区。他们忽东忽西,神出鬼没,打上豪,截烟土,获得了很多现款、衣物和药品。不仅解决了游击队过冬的衣食困难,还拿出一部分现款送给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托他上缴陕北特委和上级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12月上旬,省委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命令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进行整编。这时,杜衡以中央特派员身分来到部队,并于12月22日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宣扬“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

^① 阎红彦:《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几个主要问题的事实经过》,未刊稿。

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犯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的错误；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并擅自决定给谢子长、阎红彦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后经中共上海中央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送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五

1933年初，阎红彦和谢子长到上海中央局，经过短期学习审查，被派往河北省委工作。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为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我党派出大批党员和干部到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部工作。4月，阎红彦和谢子长一道，受命到热河前线参加和改造“老北风八千岁”^①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支部队“成分非常坏”，阎红彦和谢子长无法在那里开展工作，很快又返回张家口。

5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北路军总指挥。为了对这支队伍进行“革命的改造”，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成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②，由柯庆施任书记，阎红彦是

^① “老北风八千岁”是当时一支抗日义勇军领导人的绰号。此语引自《阎红彦自传》，作者查询了多人，一直未弄清具体姓名。

^② 《阎红彦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③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张家口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前委成员之一。遵照前委的指示,阎红彦潜入孙殿英部组织兵暴。他会同在该部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刘振远(时任孙部副团长)等,经过周密的策划,7月下旬,打死了反动的敌团长,成功地举行了“包头兵变”,拉出一个团,进驻商都以北的武川。在这里,阎红彦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抽调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作为这支部队的骨干,由阎红彦任连长。

这时,蒋介石一面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秣;一面施展各种阴谋,从内部对抗日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8月初,冯玉祥被迫下野,抗日同盟军处境十分艰难。在这样情况下,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党影响下的部队约1万余人,于8月9日同前委一起撤至张北。阎红彦和刘振远奉调率部至张北,编入许权中(共产党员)的第十八师。不久,阎红彦的骑兵连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

8月27日,前委在张北县北部之二泉井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阎红彦提出“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汇合”^①。陈伯达当场指责阎红彦“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②。他主张我们党应当退出同盟军。阎红彦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气之下,退出会场。第二天,前委常委邹春生(后叛变)批评阎红彦,并要阎红彦检讨,阎红彦拒绝,不久,他被撤销职务,调司令部“休息”。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阎红彦潜至北平。11月,他奉命再度到孙殿英部做兵运工作,并任士兵委员会书记。这时,孙殿英受任

^① ②《阎红彦历史报告摘要》(1942年8月),原件存中国军事科学院档案馆。

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正在以“开发西北”为名，向宁夏进攻。士兵厌战，纷纷开小差逃跑。阎红彦同南汉宸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秘密进行暴动准备。他们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不开小差开大差”的口号，短期内掌握了官兵三千余人，并确定了暴动时间。由于黄河涨水，渡船缺乏，暴动未能如期举行。其后，宋哲元、庞炳勋、马鸿逵等，在蒋介石的暗中策划下，从东西两翼联合夹击孙殿英，加之孙一旅长倒戈投降，里应外合，一夜之间，孙部全军溃散。阎红彦在混乱中，组织一部分党员，拉出了数百人，退到磴口以东的沙漠里，“人困马乏，饿了几夭，不得出去”^①，最后，被宋哲元包围缴械，阎红彦只身逃出，经包头、北平到天津，向组织汇报了情况。随后被派往河北省委军委工作。

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受命后，他从上海出发，渡渤海湾，越辽宁、吉林、黑龙江，闯过几十道封锁线，经过千辛万苦，于10月份到达苏联莫斯科。

阎红彦在苏联，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为了尽快地恢复和我党中央的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地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特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带着秘电码回国。密电码由英文字母编排，阎红彦不懂英语。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废寝忘食，用极大的力气，背熟组编的电码。由于提前回国，阎红彦未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下

① 《阎红彦自传》，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旬,他和刘长胜从苏联起程,进入我国新疆后,又乔装富商,骑着骆驼,载运着毛毯和灯芯绒,经伊犁、迪化(乌鲁木齐)、兰州、宁夏,遥远到达北平。

这时,中央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北,阎红彦听到这一消息高兴极了,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935年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①。从此,我党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

六

1936年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渡河前,中央指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其任务是:警戒清涧、延川、延长一线黄河沿岸,保卫驻在瓦窑堡的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成立了水手工会,对船夫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后来,毛泽东回忆东征时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②

2月21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于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之后,亦从河口东渡,先后占领了义牒镇和隰县的午城;拆毁了沿河敌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大宁县城;并在石楼、永和、

① 《阎红彦历史报告摘要》(1942年8月)。

② 访问罗志敏谈话记录(1981年2月)。

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不久，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3月，红军抗日先锋队节节胜利，准备越同蒲路东出河北，直接对日作战，但蒋介石调集重兵伙同阎锡山部阻拦我军东进。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1936年5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布红军回师陕北。

红军回师西渡时，阎红彦率红三十军担任后卫，堵击敌人的尾追，掩护主力渡河。由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三交镇壮烈牺牲，中央决定调三十军政委蔡树藩接任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任命宋时轮为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改任三十军政委。当我军主力经石楼、永和由东向西转移至黄河岸边时，阎红彦和宋时轮奉命率红三十军离开黄河一线，由西向东插向吕梁山的隰县、大宁一带，迷惑和牵制敌人。

红三十军主力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敌分割包围。5月13日夜晚，部队转移到晋西南吉县平头关渡口，找到九只木船，准备渡河。但是，天刚亮，敌人就出动飞机轰炸，接着步兵也逼近我军阵地。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宋时轮说：“阎政委！你带着司令部、政治部先撤，我掩护。”阎说：“你才来，对这个部队还不太熟悉，还是我留下掩护。”宋说：“你不放心吗？！相信我，不会把你的部队丢掉的！”阎说：“这不是我的部队，这是党的部队。”宋时轮最后命令说：“你赶快走！”阎说：“好！好！我先走！”接着，宋时轮指挥二六三团一部与敌激战。阎红彦指挥主力胜利地渡过黄河，他自己却仍留在黄河东岸。当宋时轮带着阻击队撤到黄河边时，见阎红彦还站在那里。宋时轮拉住阎红彦的手激动地说：“阎政委！你怎么还呆

在这里?!”阎红彦说:“我在等你们!”^①

红军回师后,宋时轮奉调至红二十八军。阎红彦复任红三十军军长。

这时,蒋介石继续组织力量进攻红军。敌李生达、汤恩伯部进抵黄河东岸,准备渡河进犯陕甘宁根据地。5月18日夜,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来的“火急”电报,阎红彦指挥部队,渡过无定河,进抵宋家川,配合地方游击队,切断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船只,使河东之敌,不敢贸然西渡。

就在宋家川形势暂趋缓和的时候,党中央驻地瓦窑堡又遭国民党张云衢部的突然袭击。当时,我瓦窑堡只驻有少数警卫部队,力量比较单薄,中央命红三十军立即赶回增援。由于路途遥远,部队到达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正在向西转移。阎红彦立即指挥部队,坚决阻击进攻之敌,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其后,阎红彦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部署,率部进驻瓦窑堡和安定之间的十里铺,严防敌人的袭击。

8月下旬,阎红彦奉命率部开赴三边。在这里,他除指挥部队进行战斗外,还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年底,根据中央指示,和三边军阀张廷芝进行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通商往来”的协议。

双十二事变后,阎红彦至西安杨虎城部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2月,奉调返回部队,仍任三十军军长。

① 访问宋时轮谈话记录(1981年)

七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杜平任政委。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12月改称留守兵团）领导下，警三团驻守在河口、界首、高杰村一带，守备河口至枣林坪沿河渡口，阻止日军进攻，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任务。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侵占我陕甘宁边区5座县城，并准备进犯延安。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将王震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由华北前线调回陕北，接替警备三团的防线。警备三团、四团、炮兵团这时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杜平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南下驻防甘泉、富县一带，守卫着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1940年春天，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在反对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阎红彦奉命到洛川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经过军事打击和谈判斗争，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局势相对稳定。其后，阎红彦带职到马列学院和留守兵团军政研究班学习。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最初在中央党校一部军事队第十四支部学习，并任支部书记，后调第三支部（高干支部）学习，任支部生活和组织委员。先后同支部学习的有曹里怀、陈先瑞、王树声、贺晋年、陈锡联、杨勇、陈赓、薄一波等。阎红彦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件，联系实际，总结了自己十多年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1943年，他把学习心得，写成文章，发表在延安中央党校校刊上，受到毛泽

东的称赞^①。

1943年7月,在审干过程中,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阎红彦多次在支委会上说:“肃反工作绝不能有半点主观主义,我在苏联时,就听到苏联在肃反中出了不少问题。过去我们苏区的肃反教训也不少,我们陕北苏区的肃反,连刘志丹这样的同志都抓起来。如果不是毛主席和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们作事,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慎重。”^②在整风结论中,肯定了阎红彦在抢救运动和审查干部中“能把握党的方针和政策”^③。

整风运动期间的一天晚餐,高岗到中央党校来,要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红军游击队队委会委员,还说他在临真镇战斗中是被绑架而走,不是临阵逃脱。阎红彦当即指出:“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你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个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真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一套谎言,说战斗紧急时,部队叛变,你控制不住,被绑架而走。当时,我任游击队的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

① 访问阎红彦夫人王腾波谈话记录(1981年)。

② 访问贺晋年、张文舟谈话记录(1981年);《访问王定一谈话记录》(1981年)。

③ 《阎红彦同志一九四四年五月总结》,中央党校第十四支干会通过。

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①。两人争吵一夜，高岗倒打一耙，说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②。关于成立陕北师一事，是红军改编时，陕北军事干部（包括高岗）在一起的议论。大家说，一方面军有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有一二〇师，四方面军有一二九师，陕北红军也应编一个师。阎红彦曾将这些意见向肖劲光反映过，这完全是正常的，合乎组织手续的，并没有组织陕北师。高岗在整风中把这作为阎红彦的所谓“问题”提出来，完全是别有用心。

在整风期间，党对阎红彦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在创建陕北红军和开展陕甘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作风正派，没有拉扯情形”；“在团结中央干部和陕北干部的关系上，是起了好的作用”；“作事自信心强，坚决果敢，敢做敢为”。党实事求是地为阎红彦作了历史结论^③。在阎红彦历史结论上签名的有曹里怀、杨勇、王树声、陈先瑞、解方等。

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会后，他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望中央注意，并要求把他的记录存档^④。接着，他坦率地告诉高岗，希望他改正错误。高岗更加怀恨

① ② 以上引文见贺晋年：《阎红彦同志二三事》。阎红彦：《在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5日）。阎红彦：《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几个主要问题的事实经过》（未刊稿）。

③ 《阎红彦同志1944年5月总结》，中央党校十四支干会通过。

④ 《阎红彦在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上的发言》（1955年4月）。

在心,在7月份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指定人揭发斗争阎红彦,因为没有事实,会议开不下去。最后,康生出面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①。

此后不久,经中央批准,阎红彦调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

八

1945年9月,阎红彦到达太行山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当年11月的邯郸战役。不久,被任命为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6月,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月,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向开封至徐州的陇海路出击。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攻克碭山后,接着攻打民权,激战3天未克,我军伤亡很大。战斗结束后,阎红彦了解到许多干部和战士在抗战胜利后,产生了“解甲归田”的思想,对自卫战争缺乏精神准备。于是,他向纵队党委提出在部队开展整风的建议。经过这次思想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晋冀鲁豫野战军表扬了三纵的做法,并在全军加以推广。

9月初,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在六纵队围歼大洋湖之敌后,驻扎在天爷庙的敌师部直接暴露在我军面前。阎红彦亲率两个团,楔入敌人的心脏,发挥我军夜战的特点,攻破敌指挥部,生俘敌师长赵锡田。

1947年3月,阎红彦参加豫北反攻,历时两个月。5月,根据

^① 访问杨勇谈话记录(1982年2月)。

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三纵配合六纵，一举攻破汤阴，全歼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活捉纵队司令孙殿英。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7月15日，在六营集战斗取得胜利之后，三纵与二、六纵队一起，对困守在羊山集的敌人发起进攻。由于羊山集三面环水，背依羊山，敌人利用天然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居高临下，凭险固守，我军几次强攻未克。在这样情况下，阎红彦和陈锡联一道，冒着酷暑，穿着裤衩，踏着我方堑壕里没膝盖的混水，带着团以上干部，在前沿阵地仔细观察地形，重新选择突击方向，制定作战方案。7月27日，我军发起总攻，激战一昼夜，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活捉敌师长宋瑞珂。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大别山挺进。8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三纵队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不久，尾追我军的敌人23个旅，也先后压过淮河，进抵大别山区。三纵奉命从皖西回师和兄弟部队一道，于9月在商城以北的河凤集地区、以西的中铺地区和光山附近打击敌人。其后，陈锡联、阎红彦遵照刘、邓指示，率三纵队从豫东南的商城、固始向东突围，冒雨兼程，拖走了大别山北麓合围我军的国民党桂系第七师和四十八师两股敌人到皖西，并乘敌之合围态势尚未形成之时，于10月9、10两日，在皖西六安的张家店，全歼敌八十八师六十二旅，毙、伤、俘敌4000余人。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张家店战斗后，三纵队即进至长江北岸的望江地区。与此同时，其他兄弟部队也连克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等城镇，我军控制长江北岸达300余里，威震大江南北。

10月下旬，大别山进入深秋，寒气袭人，我十几万大军这时仍

然穿着单薄的衣裳。如何抓住胜利后的有利时机,尽快地解决过冬的棉衣,就成为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党中央曾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来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难于解决。刘、邓报请中央,决心自己设法克服困难。三纵领导开会研究,陈锡联问问红彦:“你能不能和资本家打个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个夹衣也好。”^① 阎红彦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做商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制作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不久,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陈锡联说:“穿衣是当时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仗打不好,站不住脚,没有棉衣,过不了冬。阎红彦为部队作了件大事。”

11月下旬,蒋介石纠集了33个旅,由白崇禧亲自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我军采取了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三纵队奉命与二、六纵队留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作战。1948年1月,为了拖散和疲惫敌人,陈锡联、阎红彦指挥三纵队,牵着敌黄伯韬和两广部队,围绕大别山进行了18昼夜的打圈子战斗。从皖西的金寨、六安开始,经舒城、桐城、岳西,湖北的英山、麻城,又回到皖西的六安一带。陈锡联说:“最艰苦的就是这18天,我们处境十分危险,天天夜行军,早上八九点钟住下,下午两三点钟开拔,后面打,前面走,有时一天走24小时,顾不得吃一顿饭。”

18天连续行军,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十分疲劳。为了鼓舞士气,阎红彦向部队作了《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陈锡联回忆说:“真没想到,阎红彦作了那样好的一个报告。它对增

^① 访问陈锡联谈话记录(1981年12月)

强部队斗志,提高斗争信心,的确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我留在大别山的部队,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剿,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九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为中原野战军。从此,我刘邓、陈粟和陈赓兵团三支大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展开了逐鹿中原的伟大斗争。

5月,陈锡联、阎红彦率三纵队转战到豫西。利用战役间隙,在宝丰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和三查,大大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宝丰整军后,我军第一次攻打郑州。刘邓电令,决不能让敌人渡过黄河向北逃跑。“阎红彦坚决执行上级的作战意图,亲自带领下级指挥员,仔细勘察地形,分析敌我势态,拟制战斗方案,并率领主攻部队,穷追猛打,同兄弟部队一道,把敌人歼灭在黄河以南。”接着攻打柘城,前线我军在阎红彦、刘昌义的指挥下,一鼓作气,破城而入,歼灭敌一个纵队,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

1948年11月6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第一阶段,三纵奉命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之敌。其后,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11月15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敌徐州与南京的联系,使我军完成了对徐州大包围的态势。毛泽东对这一战役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嘉许。

战役的第二阶段,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三纵和一纵,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陈锡联有段回忆,

生动地再现了阎红彦在 frontline 战斗的日日夜夜。他说：“最艰苦的一天是我们准备发动进攻，被敌人发觉，他们集中了4个整编师，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抢先进攻我们。打到后来，敌我分不开，敌人跟我们的部队混在一起了。我们组织进攻，敌人又反扑，牺牲很大，血流了一沟。我和阎红彦到前面去看，回来时半身都是血。我们在一辆被打烂的敌坦克下，挖个洞当指挥所，离敌人的工事很近，敌人枪上的刺刀看得清清楚楚。阎红彦爱跑进跑出，我对他说：‘你还看不见，敌人那么近！’他的胆子大，敌机投弹，他还要看看。危险的地方，你越是不让他去，他越是要去。打仗时，你不叫他上，他偏要上。我们在坦克下住了一周，有几次很危险，参谋都很担心。炊事员送来饭就吃，送不来就不吃，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晚上，把大衣一裹，就在坦克下睡觉。阎红彦他晚上不睡，守在电话旁，他白天睡。哪里战斗打得最艰苦，阎红彦就到哪里。有一次，他到前沿阵地七旅去视察，指挥战斗，敌人排子炮打来，警卫员机智地将他按倒在地，卫生员立即上担架，准备抬他，见他还活着，好端端的。阎红彦嘿嘿一笑说：‘还是我的命大！’”^① 12月15日，我军会攻敌最后据点双堆集。晚11时，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黄维被我三纵队七旅活捉。

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阎红彦由于操劳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②

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949年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

^① 访问陈锡联谈话记录(1981年12月)。

^② 访问王腾波谈话记录。

任。

1949年4月21日,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挥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三兵团从安庆一带突破长江防线。23日,南京解放。陈锡联、阎红彦率三兵团进驻芜湖地区,防止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进行向西南进军的准备工作。8月19日,刘、邓下达了《川黔作战基本命令》。三兵团9月初由芜湖出发,10月中旬,抵达湖南常德集结。

1949年11月1日,发起了进军川黔的战斗。三兵团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宋希濂的防线,进入川东,攻取彭水,强渡乌江,占领南川。11月底,解放重庆。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十

1949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当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军阀的长期统治,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在覆灭之前的疯狂破坏,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西南局和川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阎红彦主持行署工作,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进行了清匪、反霸、镇反、减租、退押、土改,使川东很快得到治理,出现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真是“雷霆风雨,三载奏功。”^①

1952年,四川合省以后,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副省

^① 张秀熟悼阎红彦诗。

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1956年9月，当选为“八大”候补中央委员。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当年秋天，阎红彦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水稻亩产3万多斤，便亲自到当地察看。原来所谓亩产3万多斤，是把若干亩已成熟的水稻，并栽在一块田里。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①。

1959年初夏，阎红彦带秘书和警卫班的六七个战士到乐至县，参加油菜试验田的收打。打完头遍，亩产达到260斤，比大面积产量高出一倍。他十分高兴地说：“再复打一遍菜籽，得出最后产量，开个会庆祝种试验田获得了高产，让《四川日报》发消息，登照片，推广种试验田的经验。”谁知有几个干部看见实产没有达到他们夸口的600斤，趁阎红彦吃中午饭的时机，偷偷往菜秆底下倒了几箩筐菜籽。阎红彦发现搞了鬼，十分生气，当场批评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在省委汇报会上严肃指出，一定要警惕这种不良作风的蔓延^②。

当年夏秋之际，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和解决那里群众发生的水肿病问题。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对此，阎红彦深感痛心。他找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解除大家的顾虑，要大家实事求是的反映情况。这样，事实真象很快就弄清楚了。阎红彦连

① ②四川省部分厅局长座谈会记录(1982年10月)。

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报请省委批准,调拨500万斤粮食给这个县安排群众生活。

1959年秋,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

1961年3月至5月,阎红彦响应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楚雄、大理、道宏、思茅等地区,系统地调查了人民公社的规模、公共食堂、工资制、山林管理、实物分配等问题。5月10日,他在弥渡县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即《阎红彦给毛主席的信》),对上述问题向党中央作了比较系统的汇报,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特别是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建议。5月16日,毛泽东对阎红彦的信作了批示:“阎红彦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①

不久,阎红彦根据云南的实际,提出坚决缩小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把边疆地区的人民公社调整为初级社或互助组。对居住分散的山区,他指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单家独户的经营,还明确规定了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强调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②,促进了云南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60年,在阎红彦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他说:“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保证边疆的

^① 《毛泽东同志转发阎红彦同志五月九日的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1961年5月16日)。

^② 《云南省委关于内地高山分散地区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补充规定》(1961年)。

稳定局面,以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斗争。”^①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更特别重视。在边疆工作会议上,他说:“民族干部问题,是个严重问题。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边疆,巩固边防,没有民族干部的生长,是不可设想的。”“从省到各级都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政、军,包括群众团体,都应该有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少数民族干部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衡量边疆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②。1965年至1966年初,云南边疆各地都陆续办起了各类学校、识字班、夜校等,以提高边疆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十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对林彪接二连三发表的讲话,阎红彦说:“我怎么都听不进去”^③。8月,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阎红彦在会上对西南局几个负责同志说:“我们应该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④9月以后,全国“大串联”,党组织瘫痪,地方党的负责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昆明和全国一样,陷于一片混乱之中。阎红彦十分愤慨,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是什么革命?!这是丑化革命,是丑化我们党!”^⑤

① 《阎红彦在省委讨论边疆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

② 《阎红彦在边疆会议上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讲话》(1966年1月)。

③ 访问云南省委郭超等谈话记录(1982年)。

④ 访问廖志高谈话记录(1982年)。

⑤ 访问云南省委郭超等谈话记录(1982年)。

10月9日至28日，閻紅彥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其間，閻澤群告訴他，江青在北航對紅衛兵講：“中央正在開會，她和毛主席占少數，很多人都反對毛主席，要準備上山打游擊。”閻紅彥緊鎖雙眉，豁地從沙發上站起來，憤慨地大聲說：“怎麼能講出這樣不負責任的話！我們跟毛主席幾十年，會反對毛主席？！會反對毛主席？！”閻澤群勸父親準備回去戴高帽子游街。閻紅彥坦然地說：“我怕什麼，無非下台當老百姓”；“但是，給共產黨的幹部戴高帽子，我就是不贊成。這是侮辱我們黨，糟踏我們黨！”^①

閻紅彥當時已年近60，又患高血壓、心臟病，在“橫掃”、“火燒”的聲浪中，他受到殘酷的迫害。批斗會一個接一個，白天晚上不能休息。有一天從早晨8時斗到晚上8時，沒有吃一點東西，沒有喝一口水。休息中間，一個不知名的小姑娘，偷偷給他送來一碗荷包蛋。他撫摸着孩子的頭，激動地說：“多好的人民”^②。

1967年1月，昆明造反派積極醞釀“奪權”。他們揚言：“哪里抓到閻紅彥，就地處決。”閻紅彥听了哈哈大笑說：“國民黨曾經懸賞要我的腦袋，我都不怕，現在我又不反革命，怕什麼！”這時，中央對閻紅彥的安全也十分關心。1月7日，葉劍英打電話詢問雲南軍區：“閻紅彥在什麼地方？身邊有哪些人？”要求雲南軍區確保閻紅彥的安全。當晚，閻紅彥和周興、王銀山等開會到12時，確定第二天召開書記處會議。8日凌晨，陳伯達給閻紅彥打電話，由於口音難懂，由汪東興復述，對閻紅彥橫加指責。閻紅彥幾次要回話，對方都不讓講。他氣憤地質問陳伯達：“‘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

^① 閻澤群：《這裡可真是個好地方啊》，載《時代的報告》（1982年2期）。

^② 訪問侯勤翰談話記錄（1982年）。

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①

1月8日5时左右,秘书走进阎红彦的住房,发现他已经辞别人世。

阎红彦死后,林彪一伙下令不准开追悼会。可是昆明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自发地为阎红彦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

1月12日,云南省委和军区几个负责同志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阎红彦逝世的情况。周恩来听后沉痛地说:“是啊!阎红彦是个好同志,他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啊!”^②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③党中央为阎红彦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历史本来面貌。彭真为阎红彦题词:“悼念坚强不屈、终身为革命奋斗不息的阎红彦同志。”李达将军题词:“阎红彦将军浩气长存。”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

1979年春,任白戈赋悼诗一首,表达了人们对阎红彦的深切怀念。诗曰:

① 访问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楨的谈话记录(1982年)。

② 访问郭超,王银山等谈话记录(1982年)。

③ 阎泽群:《这里可真是个好地方啊》。

闻君英名延水旁，
首次相晤在太行。
肝胆照人配明月，
性格爽朗若朝阳。
豪情壮志冲霄汉，
敦厚朴实非寻常。
少年深怀阶级恨，
早将青年献给党。
清涧暴动掌武装，
吕梁割据红旗扬。
横跨黄河闹革命，
开辟陕甘北战场。
百战不殆身未丧，
饮恨死于“四人帮”。
蜀中人民齐悼念，
云南大地亦悲伤；
下关苍山风雪漫，
大理洱海花月残。
而今沉冤得昭雪，
君当含笑九天上。

阎红彦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陕北劳动人民的心上，响彻在巴山蜀水、苍山洱海之间。

（毕 兴 周天德 贺安华 何盛明）

附记：本文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及其档案馆、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档案馆、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政协、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博物馆、山西省吕梁地区文化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档案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协、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军区及其档案馆、昆明军区及其档案馆等 积极支持，提供了历史资料。还访问了一批老同志，参考了老同志写的有关文章和回忆，这些老同志是：马文瑞、马云泽、吴岱峰、贺晋年、刘澜涛、阎揆要、李锦锋、高朗亭、崔田民、郭洪涛、赵苍壁、吴志渊、黄石山、孔原、李华生、王震、李达、杨勇、宋时轮、杜平、罗志敏、莫文骅、魏传统、陈锡联、钟汉华、郑国仲、明朗、何德庆、李漠、柯岗、廖志高、任白戈、张秀熟、沈兰芝、王定一、余述申、秦基伟、王银山、赵增益、孙雨亭以及阎红彦身边工作的人员和他战斗过地方的群众共 270 余人。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及其子女，也提供了有关资料。王腾波同志积极协助我们到山西、北京、陕西、云南、四川、南京、上海等地访问搜集资料。中国社科院四川分院王治林同志，四川日报记者陈焕仁同志也参加了部分采访。对以上单位和同志，谨致衷心的感谢。

张 达 志

(1911—1992)

张达志，原名锦瑞，陕西佳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红二十七军师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党委书记、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绥蒙军区政委和中共绥蒙区委书记、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等职，是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全国解放后，历任西北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委炮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2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

张达志，原名锦瑞，乳名德宏。1911年4月14日（农历辛亥年三月十六日）生于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店镇南孤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张文华，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刘氏为农家妇女，贤惠善良，生有四男二女，张达志居长。一家8口，靠30亩贫瘠山地度日。因生活困苦，他的二弟和四弟，都早年夭折。

张达志自幼聪颖，又是张家的长孙，长子，深得全家老少的钟

爱。他在幼年一直跟随祖父母生活,经常到邻居高志奎家听《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儿女英雄传》等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英雄豪杰的形象。张达志9岁开始读私塾,课本是《三字经》、《四书》、《五经》,还有国文、历史。他学习用功,凡读过的课文,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他尤其爱好国文,写的作文,内容充实,文理通顺,受到老师的称赞,常被拿来贴堂(展览)。

1924年,张达志13岁时考入葭县店镇高级小学读书。这个学校许多教员都是榆林中学的毕业生,他们思想进步,经常在一起开展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活动,揭露五卅惨案的真相,激发了张达志的爱国热情。

1926年8月,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杨明轩,来到葭县店镇,以店镇高级小学为中心,成立国民党县党部,讲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张达志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刘光显等人参加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军阀吴新田、刘镇华的斗争。

1927年春,张达志由祖父、舅父等人凑够7块白洋,赴绥德考入当时陕北革命的摇篮——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编入第八班。这年3月,张达志由乔鼎铭、高再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①,并担任共青团的组织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查封了绥德师范学校,张达志奉党团组织的指示,回到店镇乡南圪村,以冬书房为基地,以教学为掩护,向群众通俗地宣传革命道理,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28年春,张达志被党团组织派赴葭县王成家村、郭家圪塔村一带,利用小学教员的合法身分,从事革命活动。这两个村住有

① 《张达志同志生平》

90 多户人家,除 1 户地主,1 户豪绅外,其余都是贫苦农民。由于土地瘠薄,十年九灾,加上军阀官府和地主豪绅的盘剥,贫苦农民终年过着吃糠咽菜的日子,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张达志走村串户,深入贫苦农民家里,通俗讲解革命道理:“要想农民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他还编写革命《三字经》,在学校教唱革命歌曲,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王成家村、郭家圪劳村及附近村庄劳苦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张达志通过培养考察,先后在这里发展了 10 多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还建立了党、团支部。

1929 年 2 月,张达志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葭县特区区委书记组织委员^①。不久,中共陕北特委先后在绥德西川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和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派党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②。四、五月间,“特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大批同志到陕北、甘肃、宁夏等地驻军中从事兵运活动”^③;张达志等被派往神木国民党高志清部。由于当时客观条件不成熟,缺乏斗争经验,又有“左”的冒险主义思想影响,各地的兵暴未能成功,但它播下了革命火种,锻炼了一批干部,为创建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积累了经验。

1931 年底,张达志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从国民党军队回来,任中共葭县特区区委书记。通过两年的兵运活动,使他体会到,搞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招兵买马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从敌人手里夺来武器武装贫苦农民。从此,他领导的特区区委书记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深入农村建立农

^① 《张达志同志生平》。

^② 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版第 28 页。

会、互济会、少先队，动员群众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32年秋，陕北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中共在榆林国民党并岳秀军队里的秘密组织遭到破坏，许多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被逮捕，一夜之间就有几十名进步人士被杀害。当时正在榆林城里活动的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连夜跑了出来，经镇川、乌镇、店镇，辗转来到张达志家住了3天，由张达志带他到葭县木头峪巡视了中共特支工作。赵伯平走后不到一个月，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就转移到张达志的家乡——店镇南孤村。此时，张达志以南孤村石上冬书房教员的身分，一面领导中共葭县特区工作，一面负责中共陕北特委的联络接头。

为了陕北特委的安全，张达志对接头联络工作特别慎重。每当特委在他家召开会议，他总是让他父母亲在门外放哨；对组织上存放在他家里的文件、经费等，他们全家都格外小心，视如生命一样保护。中共陕北特委在南孤村活动4个月，各地党的负责同志与特委来往频繁，从未发生过意外事件，保证了特委机关的安全和工作的顺利开展。

1932年冬，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从神(木)府(谷)地区巡视归来向特委汇报，那里许多村寨有党、团组织，但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一些村庄的组织生活不健全，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要求，特委遂决定派张达志以特委特派员的身分前去帮助整顿^①。1933年农历正月初八，张达志化装成小商，首先来到神木的贾家沟，召开党团积极分子会议，补选党团支部书记，制定了党团

^① 张达志：《神府地区党团组织的整顿和游击战争的开发》，《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6期。

组织的生活制度和学习制度。以后又一个村一个村进行了整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党团区委，健全了领导核心。张达志反复强调党团组织只有开展活动，才能形成力量。他秘密组建了贫农会、儿童团、互教会，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抗粮抗税斗争。通过整顿，党团组织很快活跃起来，战斗力大大加强。以后又试图从民团、土豪那里夺枪，虽未成功，但积累了经验。同年5月，张达志回特委汇报工作后，特委决定派他赴葭县任中共县委书记。

1933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葭县高起家主持召开。张达志作为葭县县委书记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陕北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①，明确提出了全面发展陕北游击战争的新任务^②，这次会议上，张达志被选为中共陕北特委执委^③，负责农运工作。

会后不久，由于叛徒告密，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等6位同志被国民党军逮捕，惨遭杀害。在腥风血雨中，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常学恭等在葭县寨子沟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常学恭去天津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工作，其他同志分赴各地巡视，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革命斗争。1934年2月，张达志不顾个人安危，参与指挥了袭击木头峪民团的战斗，并协助组建了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

5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派张达志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工作。在崔洪运的接应下，张达志化装成商人，骑上毛驴经汾阳至太原，再坐火车到北平，而后赴天津和李华生接上头。3天后，张达志按约定时间到阎红彦的住地和北方代表孔原见了面，详细

① 《陕北特委工作报告》（1933年10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② 张达志：《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前后的一些情况》，《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3期。

汇报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后发展党、团组织，建立红军游击队，准备创造一个正规的红军师，扩大游击根据地，逐步把各苏区联成一片等情况。孔原听了张达志汇报后，对陕北特委工作很满意。随后，他在一本《红楼梦》里写了指示信交给张达志带回。6月底，张达志回到陕北特委时，各县纷纷组建红军游击队。7月8日，在安定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统一领导陕北各县红军游击队。8月，陕北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一起，粉碎了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部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二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甘边和陕北苏区不断扩大，各地游击队迅速发展。蒋介石坐卧不宁，飞赴太原和西安，动用了5个师和26个团共4万余人的兵力，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为了适应反“围剿”斗争的形势，1934年12月，在安定西区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①。红八十四师为掩护部队集结，完成反“围剿”准备，主动东进安定南沟岔，经数小时激战，消灭高桂滋部一个加强连，缴获步枪百余支，轻机枪3挺，以及大量弹药，拉开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序幕。

1935年1月，张达志等率领红八十四师转移到清涧阎王砭一带，派游击队去高杰村把敌人诱到伏击圈内，然后四面合击，又干脆利落地全残国民党军一个连，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争情绪。随

^① 《张达志同志生平》。

后,张达志等率部进击安定县(今子长县),途经贺家湾时,获知清涧有一股国民党军队正向延川护送军用物资的消息。张达志和杨琪命令部队埋伏在贺家湾四周。待那股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进了村子,杨琪、张达志立即下令攻击,不到两个小时,全歼该敌,缴获白洋两千多块及大批武器弹药。三战三捷,使刚成立的红八十四师坚定了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的必胜信心。

5月1日,红四十二师三团和义勇军在白庙岔与陕北红八十四师会合,并举行了万人联欢祝捷大会。这是红军在陕北第一次公开庆祝胜利。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赶来祝贺。刘志丹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勇敢战斗,争取在红五月把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5月3日,陕北红军进到王家湾一带休整,刘志丹宣布张达志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前敌总指挥部党委书记^①。随后,红军转移到绥德,准备拔掉国民党军队定仙塆之据点。刘志丹、张达志摸到据点附近观察地形,发现工事坚固,且居高临下,难攻易守,决定暂时放弃打定仙塆的计划,返回清涧攻打张家圪台之敌。这时,当地群众纷纷来到指挥部,要求红军一定消灭定仙塆的国民党军队再走。为了安定民心,当晚张达志向群众讲话说:“国民党军队在张家圪台设的据点,也是苏区的一个钉子,志丹同志早已派人侦察,掌握了敌情,决心拔掉这个钉子,打个胜仗来报答乡亲们的期望。”第二天拂晓,红军移师张家圪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群众异口同声地称赞说:“红军说一不二,说要打胜仗真的就打了个胜仗。”

^① 《张达志同志生平》。

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历时9个多月，红军转战400余公里，毙俘国民党军3000余人，连克6座县城，使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发展壮大，武器装备改善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1935年秋，蒋介石又调兵遣将，纠集10万人马，部署第三次“围剿”。9月26日，国民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这次“围剿”，以东北军为主力，以南线为主攻方向，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方针，妄图一举摧毁陕北苏区和西北红军。

正在这时，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转战来到陕北，受到陕北苏区党政机关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6日，张达志等率领西北红军回到永坪镇，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并将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团。军团下辖3个师：红二十五军编成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编成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编成八十一师。张达志被任命为八十一师政委。

根据红十五军团的部署，张达志和师长贺晋年率领红八十一师直插洛川河一带，然后命令二四三团和游击队包围甘泉县城，二四一团集结甘泉县西区吴家沟待命，以阻击延安增援之敌。10月1日，东北军师长何立中率领一一〇师从延安出发，增援甘泉县城守敌，途经劳山进入红军埋伏圈内。贺晋年、张达志命令部队发起突击，将增援之敌堵击在劳山沟内。战斗中，张达志组织政工人员，进行火线宣传鼓动，指战员不怕牺牲，冲锋陷阵，经过3个小时浴血奋战，终于堵住国民党军队的通道，保证红军主力顺利合围，在黄昏之前，全歼国民党军一一〇师两个团和直属部队，俘敌

3700余人，师长何立中被击毙，缴获战马300多匹和大批武器装备。

劳山大捷后，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下，陕北进行一场错误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干部，张达志为此事感到愤愤不平。不久，他由八十一师调到七十八师任政委。上任两天即接到攻打榆林桥的命令。10月25日战斗打响后，张达志率领七十八师占领东山，向榆林桥正面进攻，国民党军队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仗打得很激烈。这时，贺晋年、李赤然率领八十一师加入战斗，从榆林桥北门发起攻击，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歼灭一个连，打开一个缺口。26日，军团发起总攻，张达志率部从东山发起冲锋，经过逐街逐屋的争夺战，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加强团，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余人，又打了一个漂亮仗。

正当部队浴血奋战，反“围剿”斗争进入决胜阶段，中共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中实行错误肃反，大批革命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下狱，遭受审讯拷打。张达志、贺晋年虽未入狱，但已被列入逮捕的名单，并在工作上被看做是不可信任的人。榆林桥战斗后，不让张达志带兵，将他从七十八师调到军团政治部任民运部长。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军长征来到陕北。毛泽东根据群众的反映，下达了“停止捕人”、“刀下留情”的指示，并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5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随后，将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干部释放出来，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当时，张达志在前方作战，对上述情况还不了解，对错误的肃反运动仍憋着一肚子气，并向党组织写信要求调动工作。过了两

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红十五军团找他谈话,他毫无顾虑地将“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以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耐心地开导他:“错误的肃反已经停止,中央派人把刘志丹等一大批好同志,全部从狱中放了出来,再不会错误的逮捕人了……”^①张达志听到中央及时纠正了错误的肃反,顿觉欢欣鼓舞。他激动地表示:“党中央来到陕北,挽救了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我一定要安心干好民运工作。”^②为了打好直罗镇战役,第二天,周恩来召集红十五军团民运部全体同志开会,要求做好支援战争的各项准备。张达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组织民运部的同志,分别深入农村,积极开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经过十多天努力,张村驿周围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群众组织也相继成立。直罗镇战役打响后,张达志和民运部的同志动员群众给部队烧开水,煮米汤,组织担架队,及时转运伤病员,胜利完成了支援战争的任务。

1936年2月,张达志随红十五军团渡黄河东征。他在沿途各县开展地方工作,筹备粮款,扩充新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5月,东征军返回陕北,张达志被选送到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6月1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不久,红军大学由瓦窑堡迁到保安(今志丹县)。当时,物资条件十分困难,荒滩就是操场,石洞就是课堂,石头就是凳子,膝盖就是课桌。张达志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开始了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运用大量实际材料,讲得

① 《张达志同志生平》。

② 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

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张达志听得入了神。他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决心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将军”。

西安事变后,陕北地方部队改编组建为陕北独立一师,任命白志文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①。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张达志向全师指战员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并加紧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当时,西北地区土匪十分嚣张,严重危害苏区安全。为了尽快消灭土匪,安定民心,张达志奉命率领独立一师赴甘泉、富县等地执行剿匪任务。

1937年4月下旬,张云逸、孔石泉等随周恩来去西安,途经甘泉县湫沿隘口地域时,被100多名土匪袭击。张达志、白志文闻讯后,即命令部队赶到出事地点,在兄弟部队的协助下,消灭了土匪,使周恩来等安全脱险。

在张达志、白志文的指挥下,独一师部队充分利用分片驻剿与集中围歼的方针,半年时间共消灭土匪800余人,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巩固了陕北苏区,也保证了咸(阳)榆(林)公路沿线的安全。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达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东地区委员会书记。1937年9月,边区党委决定撤销东、西地区两个党委时,张达志积极要求去抗日前线,投身血与火的斗争。经毛泽东批准,同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达志为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备第六团政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委。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同他谈了话，勉励他到前线英勇杀敌，学会打游击战。毛泽东还亲笔在麻纸上，给他开了委任状。张达志带领 10 余名干部，东渡黄河到达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分别同他谈话予以勉励。周恩来虽日理万机，但为同志们安全想得很周到。他见到张达志一行每人只有一个背包，穿得破破烂烂，便让办事处给他们每人发两块银元、一条毛毯、一套军装、一袋干粮。在太原停留期间，张达志得了疟疾，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让医生给他打了两针奎宁，很快病愈，使他甚为感动。

张达志一行赶到神池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见到早已仰慕的贺龙师长。在赴神池的路上，张达志也染上了疥疮，每天要擦药，还得用火烤，行军难以骑马。贺龙得知后，特地派了一副担架，把他送到雁北警备第六团。张达志到雁北后，遵照贺龙、关向应的指示，不畏环境艰苦，不顾疾病疲劳，克服重重困难，带领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 年 3 月，日军第二十六师团 2000 余人侵占山西保德后，又隔河炮击神府河防阵地，尔后在 10 多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妄图入侵陕北根据地。张达志指挥警六团沉着应战。当日本侵略军渡河至河中央时，他下令猛烈开火，并以机动兵力袭击日军的侧背，毙伤日伪军 140 余人，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迫使进犯神府河防之日军撤退。接着，日伪军又纠集数千人，由朔县出发，分两路侵占神池、宁武，张达志和孙超群团长率领警六团埋伏在马栏堡一带，当地驻军何柱国的 1 个骑兵团也配合作战。日伪军仗着人多武器好，一开始就用大炮机枪猛轰猛扫。孙超群、张达志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把日伪军放进埋伏圈，在距部队 100 米时，发起突然袭击，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日伪军狼嚎鬼叫，毙伤

200余人,其余仓皇逃入五寨县城。此后,张达志等指挥警备六团和游击队,对敌后交通线进行破袭,使入侵晋西北之日伪军补给困难。经过1个月战斗,警备六团配合主力部队共歼灭日伪军1500人,配合主力收复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①,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同年8月,张达志等奉命率警备六团,冲破日伪军封锁线,向绥南清水河、和林、凉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建立抗日根据地;还派出工作队在清水河、丰镇等地扩军建政。期间,他和孙超群指挥部队两次奔袭雁北,两次攻打厂汉营,歼灭伪蒙军骑兵部队200余人,配合李井泉支队安全北上大青山;10月8日,又夜袭平绥铁路以北的沙坝车站,掩护姚喆率领的七一五团一部,顺利与大青山骑兵支队主力会合。

1939年夏初,张达志等率领警备六团驻右玉西山一带。一天晚上,汉奸将部队在新店子宿营的消息报告了日伪军。次日五更时分,四五百名日军和300多伪蒙军,坐上10多辆汽车,包围了警备六团宿营地。东方鱼肚白,特务连哨兵发现有10多个伪军在团长、政委宿营的窑洞上架起了机枪和小炮,当即开枪射击。一营和特务连听到枪声,迅速投入战斗,双方火力甚猛。同团长、政委在一个窑洞住宿的两名警卫员也冲出窑洞,占领有利地形,朝日伪军英勇反击。这时,张达志和孙超群迅速将装衣物的小马搭往肩上一披,破窗而出,尔后跳出东墙,指挥部队边打边往东南方向转移,终于逃脱了险境。

1940年5月,张达志调大青山骑兵支队任政治部主任^②。到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② 《军事人物释文资料表·张达志简历》。

任后，他协助支队司令员姚喆破袭日军交通，袭击日军据点，开展反“清剿”斗争，巩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张达志很重视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之后，支队还派出一批干部组成绥东工作团，在绥东开辟根据地，到1941年，在丰镇、集宁、兴和、商都等县相继建立了区县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发展了数百人的游击队。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大青山各个地区抗日斗争的深入开展，整个大青山的骑兵发展到3500余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使大青山地区和晋西北联接起来，形成了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东部的通道，保证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对日军在内蒙古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于是，从1941年至1943年，日伪军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频繁残酷的“扫荡”，并且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一起进攻的所谓“总体战”。姚喆、张达志在地方党政机关、蒙汉群众和游击队的支持配合下，率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同日伪军进行了上百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日军为了对付八路军，修筑了许多碉堡式的据点，各据点之间又以公路相连，使骑兵支队很难在大青山腹地活动。张达志等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情况下，率领一支骑兵部队白天隐蔽，晚上行动，用避实击虚的战法同日伪军周旋，伺机打击、消灭分散之日伪军。1941年6月，姚喆到绥西指挥战斗。一天，张达志带领支队机关和直属分队来到小塔寺帮助群众收割莜麦草，侦察员前来报告：有股日军正朝小塔寺扑来。张达志立即命令特务连占领山梁有利地形担任阻击，二团三连从山梁侧面迂回到日军后面。战斗打响后，

日军受到前后夹击，慌忙向拐角铺溃逃。张达志指挥部队追击，毙俘日军20余名，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7月1日拂晓，张达志率领机关和直属分队进驻荞麦皮沟宿营。荞麦皮沟位于陶林县西南，是个1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这天正好是党的生日，部队设法买了点猪肉改善生活。张达志准备在午饭后给指战员讲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中午，部队正在吃饭，侦察员报告说，陶林县伪蒙军一个大队正向荞麦皮沟推进。张达志考虑情况紧急，饭未吃完，立即带领机关和分队指战员占领山头，迎击伪蒙军。伪蒙军发现了抗日部队，用重机枪猛烈扫射。张达南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后，命令一个分队抢占伪蒙军重机枪阵地，随后分路出击，打死打伤伪蒙军数十人，而后转移到另一个村子，开始吃早已做好的午饭。这时，又有一股日军乘汽车扑来，指战员一手握枪，一手拿饼，跑步奔山头占领有利地形。双方还未接火，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再加冰雹的袭击，日军火炮无法施威，只好乘着汽车溜走。战士们风趣地说：“老天爷也给我们帮忙！”

1942年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大青山骑兵支队改编为塞北军分区，姚喆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郭鹏为副司令员，张达志为副政委。这时，日军搜罗了所有驻绥远的伪蒙军，并从华北专门调来日军两个机械化旅团，共有3万余重兵，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极其残酷的大“扫荡”。面对强大残暴的日本侵略军，姚喆和张达志等人研究后，决定把八路军主力转移到绥南、雁北一线，以保存实力。按照这一部署，姚喆率少数部队利用绥西的有利地形，坚持同日伪军作战；张达志带领骑兵二团在绥中地区，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捕捉战机，打击日伪军，坚守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北大门，卡住了日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门户。

同年10月,日伪军兵分5路向绥中地区进攻,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张达志发挥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反复向指战员揭露日本侵略军残杀兄弟姐妹的罪行,激起干部战士满腔怒火。反“扫荡”斗争十分艰苦。张达志带领指战员在山沟里露营,渴了喝凉水,饿了吃野菜,指战员斗志高昂,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军。10月下旬,日伪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对骑兵二团和党政机关及游击队层层包围。为了保存实力,张达志选择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果断地带领骑兵二团突破重围,转移到归凉县蛮汉山地区,跳到外线打击敌人,在军事上争取主动。绥蒙行署、绥中行署和陶林、武川政府及所属游击队,在骑兵二团的配合下,也在一个夜晚从日伪军炮兵阵地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转移到三道营平顶山。翌日清晨,日军的骑兵、炮兵、装甲兵一起出动,以密集队形进山搜索,堵口截击,但抗日部队和党政机关早已无影无踪。游击战士高兴地唱道:“游击战士出奇兵,‘铁壁合围’一场空。”

经过这次激烈的反“扫荡”战斗,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锻炼得更加坚强了。1943年,张达志派出大批干部加强县大队和武工队,在各县委领导下,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使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得到逐步恢复。

1944年,张达志协助姚喆司令员,积极组织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民,向日军发起攻势作战,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他们采取武工队、民兵、游击队联防的方法,从四面八方围困日伪军据点,进行严密封锁和冷枪射击,同时在公路上打击日伪军交通运输,截断日伪军粮弹补给。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使根据地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姚喆、张达志赴延安出席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返回大青山，指挥骑兵部队发起全面反攻。在地方武装配合下，8月下旬先后攻占武川、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县城及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以东的旗下营、白塔等车站，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

日本投降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新组建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姚喆为绥蒙军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张达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①。1945年9月，高克林调雁门军区任政委，张达志升任绥蒙军区政委、中共绥蒙区委员会书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调集大量兵力到华北、东北，以“受降”为名，抢占城市和交通要道。

8月下旬开始，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队联合绥蒙伪军6万余人，进占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市，企图控制平绥线。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集结主要兵力，组织绥远战役。战役发起后，张达志率部配合晋绥部队主力，攻占凉城、陶林，歼灭国民党军步兵及整编骑兵第一旅各一部。下旬，又与晋绥兄弟部队一起在卓资山歼灭国民党军队5000余人。11月1日，张达志指挥骑兵部队，沿铁路线向包头前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连克兵亥州、察素齐、沙尔沁等地，歼灭国民党军5个骑兵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① 高克林等：《坚持奋战大青山》，1983年8月2日《人民日报》。

1946年7月,张达志率领部队参加了大同、集宁战役。

7月4日,大同外围作战开始,经过20多天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2000人左右。9月3日,傅作义集中三十五军3个师、整编第三军两个师和4个骑兵纵队共3万余人,以平绥路为轴线,分南、中、北三路向集宁进犯,先后占领卧龙山、南营房。这时晋绥军区部队赶到,国民党军队就地转入固守。11日,张达志率领骑兵旅,和兄弟部队一起向卧龙山、脑包山发起攻击,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师大部、第十七师一部共5000余人。但当时未能对已被打乱的国民党军队组织连续攻击。翌日,国民党军队乘隙调整部署,攻入集宁城内。16日,人民解放军撤出对大同的包围。

1947年7月,中共中央为统一、加强对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工作的领导,更有力地支援西北野战兵团作战,决定贺龙继续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8月,为了解决部队生活、物资困难,贺龙、习仲勋任命张达志为陕甘宁晋绥五省游击司令员。张达志带领绥蒙军区两个骑兵团,从大青山出发,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关中、晋南、陇东一带执行特殊任务,并掩护关中、陇东地区商业部门的同志开展工作,筹集资金。他四处奔忙,费尽心机,搞到了数以万计的经费,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联防军的表扬。

为了统一晋绥、陕甘宁两区领导,194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区合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联防军区”)。早在1947年12月,调任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随后,兼任警备第二旅旅长的张达志,冒着严寒,率领部队在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突袭强攻国民党保安部队,缴获一批武器装备;接着又在陕西和内蒙古接壤之神山,运用分进合击战术,生俘国民党保安队少将司令奇涌泉;后来,又全歼国民党榆林驻军二五六团,团长戴清丰被俘。

这是一次遭遇战,开始时对解放军不利。张达志及时调整部署,采取迂回包围战术,命令骑兵侦察连从右翼切断敌人退路,其他部队从正面发起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终于全歼该敌,部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接着,张达志奉命东渡黄河,率领警备第二旅参加晋中战役。7月,他率部队进驻原平一带,和晋绥六分区3个团组成临时指挥部,由孙超群、张达志指挥(孙超群后来调离),主要任务是切断忻州至太原的通道,而后分割歼灭忻州之国民党军队。一天,张达志从情报中获悉,忻州国民党4个团,翌日将全部撤退至太原。他立即召集各团指挥员开会部署,决定:何国海的三十五团集结在石岭北关,阻击敌人;李发应的四十一团在苏村南侧集结待命,协同三十五团歼灭敌先头部队;绥蒙军区刘吉甫团集结在向阳堡村截击敌后续部队,阻敌北逃忻州城,赵立业、杨昆山和马建勋、贺树槐带领四、六两个团集结于苏村附近的上佑村、下佑村,打击行进中的敌人主力;贺吉祥的四十团位于东村附近,由东向西出击,配合四、六团作战。方案定下后,各团按照张达志下达的“务必在第二天天亮之前到达集结位置”的命令,克服了风雨交加、道路泥泞等困难,一夜急行军六七十公里到达目的地,做好战斗准备。由于时间关系,有些部队未吃上饭就参加了战斗。当敌先头部队进至豆罗村一线地区,张达志指挥部队立即展开,按预定地域迅速进入进攻位置,一齐向行进中的国民党发起猛烈进攻,把敌人分割成数段,各个歼灭。贺吉祥率领四十团和第六团相继冲进小豆罗村,与敌人激战,歼灭了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九师及3个保安团共1万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质,受到徐向前、贺龙司令员的表扬。

1948年9月,张达志率领警备第二旅参加太原战役。10月,他奉命攻打有坚固设防、号称太原大门的凤阁梁。他首先组织

指挥员对国民党的防御阵地进行了全面周密的侦察,选择了突破口,制订了攻击计划,确定以四团主攻,六团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经过7昼夜拼搏,胜利完成了占领风阁梁的任务,为主力部队扫清了太原北线一大障碍。

初战获胜,徐向前下令攻打东山要塞。10月23日,张达志奉命率部接替第三旅,强攻得而复失的牛驼寨。牛驼寨有两个炮碉主阵地,被阎锡山改编的日军第十总队约1个团的兵力固守着。张达志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决定以四团为主攻,六团为第二梯队,25日发起总攻。那天,国民党守军在密集炮火及空军配合下,连续反扑,警二旅勇猛突击,付出了很大代价,仍没有攻上寨去。张达志发动指战员献计献策。根据许多人提出的不能光靠正面强攻的意见,他从六团二营挑选了一个善于攀登的排长,令他带领1个班从守军侧翼隐蔽攀登而上,实施突然袭击。当突击班出其不意地打乱了国民党守军的部署时,警备第二旅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乘机一举攻上牛驼寨。

太原解放后,张达志率领警备第二旅在清徐县休整,接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电令称,榆林国民党守军左协中有逃往包头、投靠董其武的迹象,令张达志警备第二旅迅速移师榆林,促使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早日起义。张达志率部轻装出发,日夜兼程,经汾阳、离石,冒雨赶到军渡,渡过黄河,于1949年5月中旬到达三岔湾后,连夜奔袭65公里,迂回到榆林城北的古城滩,截断国民党军队北逃之路,使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左协中打消了逃往包头的念头,同解放军谈判很快达成协议。6月1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部及所属第八十六师共4000余人,在军长左协中率领下宣布起义。榆林和平解放后,张达志任军管会第一副主任兼整编委员会主任,主管军事工作。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将国民党第二十

二军第八十六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师，左协中调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此前，1949年5月，张达志被任命为陕北军区司令员（未到职），不久又被任命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军长，因执行和平解放榆林任务而没到职。在榆林，他结识了1941年参加八路军的女战士严波（原名马秀珍），于同年6月举行了简单婚礼。结婚不久，张达志即奉第一野战军电令，前往参加兰州战役。当他风尘仆仆赶到西安时，贺龙司令员风趣地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刚好赶上打西北战场上最后一场恶仗，再晚一点，这台戏就没有你的份了。”贺龙又说：“打这最后一仗也是不能轻敌的，马步芳的尾巴今天还翘得相当高。总认为过去红军在河西吃过他的亏，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现在马步芳蹲在兰州，依靠着三面环山，中间夹着黄河的天险，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修的‘国防工事’，准备和胡宗南、马鸿逵三家来个里应外合，想把我们吞掉呢。”^①

张达志没有在西安停留，抱着急切的心情赶路，与四军供给部部长王国瑞结伴西行，赶到兰州附近的四军指挥所时，已是8月21日的深夜。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它北依黄河天堑，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马步芳为加强整个防御体系，在抗日战争时期筑成的永久性国防工事的基础上，又增设了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三大防御阵地，以他的“老本”八十二军3个精锐师（即一〇〇、二四八、一九〇师）分别把守。三大阵地中，沈家岭最为险要。马步芳扬言：“沈家岭是兰州大门上的一把锁，有沈家岭在，就有兰州在。”一野下达给第四军的任务，就是主攻沈家岭。

^① 《兰州战役》，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35页

8月21日,四军开始砸“锁”。但是,十一师以两个团的兵力“砸”了整整一天,“锁”子没有“打开”,还使部队受到相当大的伤亡。当天晚上,四军党委召开会议,分析白天攻击受挫的原因。深夜,张达志到达指挥所,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即参加了会议。他从大家的发言中,听出了攻击受挫原因是部队有轻敌思想。他按照贺龙的指示,向出席军党委会议的同志指出:在全国即将胜利的形势下,任何松懈战斗意志和轻敌思想都是错误的。大家从白天作战的现实中,也深深认识到:马步芳越接近灭亡,越要拼命挣扎。会议决定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克服轻敌思想,要求各级指挥员反复侦察地形,仔细研究进攻战术,并对各团任务也作了调整,由三十一团担任主攻。

8月25日是野司规定的总攻时间。这天拂晓,随着3颗红色信号弹升上高空,各军阵地上同时万炮齐发。兰州城东、南、西三面的山顶上,犹如天崩地裂。四军攻击的沈家岭,也一下完全被浓浓的硝烟所遮盖。不一会儿,便攻占了第一道堑壕的一、二、三号碉堡。马步芳的一九〇师集中兵力反扑。三十一团在三十二团和三十三团密切配合下,打退了守敌多次反扑,占领了第二道堑壕,并乘势向沈家岭的核心工事逼近。马步芳为了保住这把“锁”,不断从城里调来大批后备部队,不分队形,也无法统计次数,满山遍野的士兵,光着膀子,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横冲直撞。四军将士同仇敌忾,奋不顾身地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搏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张达志打电话询问阵地上的情况,王学礼坚定地表示:“请军长放心,只要还有一个人,沈家岭就一定能攻下来!”但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张达志和政委张仲良研究后,还是命令三十团增援,立即投入战斗。马步芳守军虽然连续组织几次反扑,然而气焰已大不如前了。四军每打退一次反扑,即乘胜出击,逐步向纵深发展。到下午5

时,沈家岭上马步芳守军大部已被歼灭,再也无力反扑了。黄昏来临,最后的攻击开始了。马步芳的增援部队,在督战队钢刀的威逼下,犹作困兽之斗。就在向马步芳军发起最后冲锋时,主攻团团长王学礼光荣牺牲。“为王团长报仇!”战士们怒火冲天,端起步枪、冲锋枪反击,很快攻占了沈家岭。战斗历时13个小时,马步芳守军一九〇师和先后增援的部队共约9000多人,被四军毙伤达3800余人。

在四军攻占沈家岭的同时,六军也攻下了营盘岭,六十五军攻下马家山。马步芳吹嘘的三大阵地,至此全部崩溃,马步芳、马继援先后仓皇逃回西宁。到8月26日上午10时许,一野三军部队越过黄河,占领北岸的制高点——白塔山,解放兰州的战役宣告结束。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从此回到人民的手中。事后,彭德怀在兰州“三爱堂”接见张达志时,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一来四军就打胜仗,好啊!我彭德怀向你祝贺!”^①

五

全国解放初期,张达志继续担任第四军军长。当时,国民党马步芳军的残余人员,在西北一些地区纠集土匪和反坏分子,烧杀抢劫,反对人民政府,梦想死灰复燃。为了巩固人民政权,确保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社会秩序,为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张达志奉命指挥部队执行肃清残余土匪,保卫胜利果实的任务。

1952年8月,张达志被任命为西北公安部长、西北军区公安

^① 《西北将军传》,轩辕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55页

部队司令员兼政委^①，为保卫西北社会安定、建立新的革命秩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53年1月，张达志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深造。1955年4月，重返西北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②，以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③。1955年9月，张达志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达志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58年，在美蒋及印度反动势力指使和达赖集团的煽动下，甘、青两省与川、藏毗连的藏族地区反动的上层分子，掀起了旨在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分裂祖国统一的武装叛乱。兰州军区部队在藏族人民的要求下，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正义的平叛斗争。期间，张达志为了加强对平叛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坐镇兰州统率各平叛部队协同作战，另一方面把各级指挥机构向前推进。他多次深入甘南和青海藏区检查指导工作，要求各部队贯彻以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特别强调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政治争取工作，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入进行群众工作。平叛部队普遍开展为藏族人民做好事的活动，得到了藏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平息叛乱后，又发动藏族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摧毁了反动封建阶级对藏族劳苦群众的压迫和统治，从而使广大藏族劳动人民获得自由和解放。

张达志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期间，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他认真执行毛泽东的建军路线，关心国防

① 《军事人物释文资料表·张达志简历》。

② 《西北将军传》，轩辕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55页。

③ 《张达志同志生平》。

施工和战备工作,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使部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他曾到青海骑兵部队蹲点调查,具体指导,并总结了“当骨干,最光荣”三字经,方法具体,通俗易懂,在《人民军队》刊登后,深受指战员欢迎。

张达志还积极主张在政治统帅下抓好部队和民兵的军事训练,要求指战员苦练杀敌本领,精通战术技术,开展“一专多能”、技术革新活动。1964年,部队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张达志深入基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经常强调说:“技术是硬功夫,什么时候都要练,盖叫天的武功就是练出来的。”要求部队切实贯彻郭兴福教学法,进一步提高训练质量。这年6月,兰州军区在天水举行比武大会,有6个分队和82名优秀教练员,分别进行了100多个项目的战术、技术专业表演,检阅了成绩,交流了经验,表彰了先进。他在比赛结束时的讲话,要求指战员做到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成绩好,把训练工作提到一个新水平。

张达志在工作中,一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他十分重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基层建设。他不仅要求军区机关干部下基层蹲点,为基层建设服务,而且他自己以身作则,带头下部队蹲点,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的足迹踏遍陕甘宁青4省区,连自然环境非常艰苦的玉树、果洛和唐古拉地区,也都去过了。每到连队,他不是先听汇报,而是下伙房、看猪圈、检查马厩,和战士促膝谈心。他经常深入骑兵部队传授军马的饲养管理经验,要求分槽饲养,专人看管,提前上槽,多刷多溜。哪个单位在军马管理、训练方面出了问题,他总是严加教育,从不含糊。

驻守大西北的部队,条件比较艰苦。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和基础设施,张达志号召广大指战员执行勤俭建军的方针,保持和发扬

延安精神,在不影响战备、训练的前提下,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动员部队种蔬菜、养猪羊,挖砌砂、采硫磺、开石棉。仅就1955年到1958年统计,兰州军区共生产各种蔬菜25000余吨,饲养猪、羊、牛9万多头,不仅改善了部队的物质生活,而且还支援国家、供应市场一部分,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布衣将军”,是大西北的军民送给张达志的雅号。平日,他生活俭朴,小米、土豆、酸菜是他最爱吃的食物,布衣、布鞋是他喜欢的穿戴。随着职务的不断变化,张达志普通一兵的本色始终没有变。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业余时间经常到俱乐部和指战员下象棋、打扑克,官兵同乐,在同指战员的接触中,听到了群众的呼声,了解了群众的疾苦,为基层办了不少实事。因为他身材削瘦,没有“首长体态”,所以节假日穿便服外出时,新来的哨兵常误把他当成老百姓,还出过笑话。张达志一生艰苦朴素,不图享受,清正廉洁,不谋私利。根据总部规定,各大军区首长可配一名炊事员。但他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在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15年时间内,有10年是他用自己的工资雇请炊事员的。他非常厌恶用公款请客。一次在军区党代会上,主管会务的同志给与会人员多加了个狗肉菜,他知道后,决定谁“拍板”谁出钱,特地给会议补交了170元。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任务,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1967年1月,张达志在“批倒”、“横扫”的声浪中,被扣上“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分子”、“贺龙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抄家、罚跪、戴高帽,受到无休止的批斗,白天不能工作,晚上不能休息。他对林彪、江青一伙这种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同年2月,奉中央军委命

令，兰州军区机关停止“四大”，进行整顿，加强机关部队正面教育，保持部队绝对稳定。事后，张达志以其共产党人的高尚风格，正确对待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从不打击报复，而是鼓励他们好好工作，赢得军区机关干部战士的信赖和爱戴。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张达志递补为中央委员。

1967年，遵照中共中央决定，张达志继续主持兰州军区工作，并负责全区部队的支左、支农和军管、军训。他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工作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当时，国防工程施工是战备工作的重点，为了加快国防工程建设的进度，保证施工的质量，他不顾戈壁滩的酷暑高温，连续几年盛夏季节到现场检查指导工作。他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亲自抓了支援刘家峡水电站大型建设工程，指示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石进元住在刘家峡工地组织领导，并派工兵干部帮助解决施工中的难点，经常听取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多次亲自到工地视察，从而保证了刘家峡水电站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建成发电。为此，受到国务院水电部领导的高度赞扬。

六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张达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11月12日，他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调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2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为炮兵党委第一书记。张达志到任后，根据中央军委批准的精简方案，对军委炮兵机关进行了整编，精简了机构，提高了效率。

1970年4月1日，军委成立炮兵技术学校。张达志注重在院

校训练和培养炮兵技术干部,加强炮兵科研工作。为了使炮兵干部正确认识核武器的杀伤破坏作用和掌握防护的方法,张达志还指示炮兵效应办公室,举办防原子图片展览,先后在军委炮兵机关和北京、沈阳军区炮兵部队展出 151 场,对炮兵干部战士进行防原子训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70 年冬,部队开展野营训练。张达志首次组织并率领军委炮兵领导机关进行野营拉练,历时 20 多天,行程 600 余公里,干部、战士既练了思想作风,又练了战术技术,使炮兵领导机关在走、打、吃、住等方面都得到锻炼。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张达志立即召开炮兵党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文件,揭发批判林彪及其一伙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罪行。在 11 月召开的炮兵党委扩大会议上,张达志要求与会人员联系炮兵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行。

1972 年,为了消除林彪破坏军事训练的严重后果,张达志根据军委指示精神,要求全军炮兵部队大办教导队,分期分批轮训基层干部,并将此作为整顿建设好炮兵部队的一项重要措施。到 1973 年底,炮兵部队共轮训 1.5 万余名干部,扭转了“干部不会教,战士不会练”的局面,使炮兵指战员的技术战术水平得到了较快的提高。

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全国人民高兴采烈,一片欢腾,张达志从内心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立即在炮兵机关和直属单位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彻底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炮兵建设上的流毒和影响。

张达志在军委炮兵工作期间,狠抓炮兵部队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为建设强大的炮兵作了不懈的努力,受到了炮兵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好评,得到了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的肯定。

1977年9月,张达志由于年高体弱,不再担任炮兵司令员职务。1978年3月,张达志参加中央党校学习。他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

1981年11月23日,全国政协召开五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增选张达志为全国政协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达志均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达志多次对亲属子女和战友说:“生命是有限的,事业将永远长存。只要生命不息,我就要为革命拉车不松劲。”^①张达志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一刻也没有忘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不顾年高体弱,多次风尘仆仆,深入革命老区和内蒙、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调查研究,接待和处理了大量群众来访、来信,及时写出调查材料,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88年7月,中央军委授予张达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以表彰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建立所作的贡献。

张达志步入老年以后,位退未敢忘忧国,仍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张达志遵照邓小平这一指示,力所能及地做着有益于人民的事。他很注意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和激励后人,调动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

^① 《西北将军传》第65页。

劳动积极性。他撰写的《忆贺龙》、《怀念刘志丹》、《姚喆奋战大青山》等 10 多篇革命回忆录，先后被《人民日报》和有关党史军史刊物选用。

1992 年 1 月 15 日，张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81 岁。

（李敏杰 谢德铭 张国华）

吕佑乾 (1896—1928)

吕佑乾，又名永坤。河北枣强人。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前往旬邑负责指导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旬邑区委书记。1928年5月，与许才升等领导发动了旬邑起义，不久，起义失败，因内奸出卖被捕，5月31日在旬邑张洪镇就义。

参加五四运动 进行爱国宣传

吕佑乾，河北省枣强县前王常村人，生于1896年2月26日，家庭早年富殷，后因捐税苛重和年景不佳而日益破产。吕佑乾1905年至1911年在家乡上小学，1912年至1916年在冀州中学上学。1916年至1923年先后在北京大学预科和本科政治系学习。

吕佑乾在北大学习期间，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传入中国，他满怀爱国热情投入时代的激流。五四运动中，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媚外政策，积极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6月上旬，吕佑乾与同学走上街头进行反帝爱国讲演，遭军阀政府逮捕。他对反动当局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义愤填膺，面对反动官吏和军警，高呼“惩办卖国贼！”。

“抵制日货!”“抗日救国万岁!”等口号,表现十分英勇。后经各方营救,吕佑乾等爱国学生被释放。五四运动后,吕佑乾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以新的姿态更加积极地投入斗争。

1919年暑假,吕佑乾回到自己的家乡枣强县,组织进步同学和教师在县城和集镇进行宣传讲演。他利用从北京带来的留声机,先放戏曲、音乐等唱片吸引群众,然后站在高处,用通俗的语言作专题讲演。其中有《五四学潮》、《关于世界大战后的政局》等,愤怒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俄国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情况。呼吁中国的民众学习俄国工人农民的办法,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强权势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国家。他的讲话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对群众产生了很大的感染力,在讲到“五七”国耻时,吕佑乾悲愤地流下了热泪,许多群众也随之共鸣而落泪。人们纷纷议论说:到底是读书人啊!懂得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爱国如爱家,讲得有理,听着入耳,真开人胸怀啊!同年秋,吕佑乾在北京大学参加了由邓中夏、黄日葵等同志发起成立的北大平民讲演团,经常深入北京市区和郊区向群众进行宣传。他作的《选择职业自由》等专题讲演,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礼教,旧思想,倡导民主与自由。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活动,曾记录在1920年5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记》上。

1923年6月上旬,吕佑乾毕业于北大政治系。为了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他组织了有10位毕业生参加的政治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沿津浦路南下,经天津、济南、南京市至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视察政治情况”。这次考察,使吕佑乾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也看到了即将由南方开始的

革命高潮的到来。

建立青年团 开展反帝斗争

1923年秋,经友人介绍,吕佑乾到陕西省渭南月任帮审。他目睹政府贪赃枉法,欺压人民的丑恶内幕,又鉴于帮审工作不便于开展革命活动,便于1924年夏,毅然辞职奔赴西安。先在陕西省立模范通俗讲演所任书记,后在省立一中、省立第一师范和私立新民中学等校任教。同年秋,由杨超雄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他和雷晋笙等人一起建立了西安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是年冬,吕佑乾任书记。他和雷晋笙等人一起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先后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入团。还建立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西北晨钟社和西北青年社,领导出版了《西北晨钟》旬刊。对于推动新文化运动,宣传革命理论,团结进步学生,起了积极作用。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我党建议,为召开国民会议离粤北上,消息传到陕西,吕佑乾与共产党员魏野畴、雷晋笙等,联合陕西各界于1925年1月发起成立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军阀段琪瑞为了破坏国民会议的召开,不顾全国舆论的谴责,在2月1日匆忙地召开了善后会议,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3月1日,陕西国民会议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吕佑乾等人在会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会议需要真正的国民起来组织。现在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由法制院所拟定,又需经善后会议议决施行,是名为国民会议,实则无异军阀官僚及政客之会议也”^①。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吕佑乾

① 原载1925年3月2日《新秦日报》。

担任陕西省追悼孙中山筹备会宣传股主任，在4月15日召开的西安各界五六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又被选为书记。他与魏野畴、张含辉在追悼会上的发言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热心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深知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现在革命未成功，孙先生死了！我们诚然哀痛，但更重要的是继续奋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吕佑乾和雷晋笙、崔孟博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组织群众在西安地区发动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利用《西北晨钟》、《通俗教育》、《新秦日报》等报刊，揭露帝国主义野蛮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翻印小册子、传单以及京、沪地区寄来的革命刊物，还编印了《雪耻》、《沸血》等刊物，宣传反帝雪耻。同时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发起组织陕西学生雪耻会、工界雪耻会、商界后援会。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和陕西各界雪耻会。吕佑乾亲自起草了《陕西各界对英日屠杀同胞雪耻会宣言》，宣言历述了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提出：“（一）严惩枪杀同胞之凶手；（二）英国政府向我国人民道歉；（三）英日政府赔偿损失与抚恤被伤之同胞”等。号召“全陕同胞起来实行罢市、罢工，以与日英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无令他人笑三秦之无人也！”^①

在吕佑乾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雪耻会还组织了两个宣传团，分东西两路到各县开展反帝宣传。并在西安市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市民大会，号召商界、工界捐款援助上海工人。他们还组织了五天盛大的募捐游艺大会，文艺界知名人士和进步师生几百人参加了演出，既募了一批救济款及时支援了上海罢工工人，又达到了教育群众的目的。

^① 原载1925年6月21日《新秦日报》。

军校任教官 奋力守西安

1925年夏末,杨虎城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在陕西耀县创办了三民军官学校,招收学生500多人。共产党员魏野畴任政治部主任。由于魏野畴推荐,杨虎城聘请吕佑乾任政治教官,在魏野畴未到职时,政治部的领导工作实际是由吕佑乾负责。他给学生讲帝国主义侵华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等。吕佑乾的理论水平较高,富有宣传组织才能,对学生的思想情况,了解深入细致,作风上平易近人,待人诚恳热情。进步师生都愿同他接近,吕佑乾向他们推荐《向导》、《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入门》等革命书刊,教育学生要树立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思想。他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要依靠群众,爱护群众。”吕佑乾爱憎分明,热爱人民,仇恨敌人。他领导进步师生同该校反动教官,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李中作斗争。李中公开贩卖:“绝对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的荒谬观点,吕佑乾针锋相对地指出:“服从命令只能是相对的,不能绝对服从,例如,命令你叛国,你能服从吗?命令你当土匪,抢劫人民,你能去参加吗?命令你反对革命,你能参加吗?军人对正确的命令必须服从,对反动的命令就不应该服从。”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学生,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对于防止反动军官利用军队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有重大意义的。1925年秋,经吴化之同志介绍,吕佑乾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直系军阀刘镇华率10万镇嵩军占领潼关,准备进攻西安、咸阳、三原等重要城市,妄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在中共西安地委的推动下,杨虎城命令吕佑乾和刘子清率领三民军官学校官兵100多人到西安参加守城斗争。出发前,吕佑乾向学生

作了动员,揭露军阀刘镇华祸陕的罪行,讲述了保卫西安的重大意义。为了沿途广泛开展保卫西安的政治宣传,组织了宣传队,吕佑乾兼任队长,在三原县城结合实际讲解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号召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精神枷锁,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6年4月,吕佑乾随三民军官学校军官队到达西安后,继续担任军官学校的教官,同时兼新民中学等校的教师,在党内任中共西安地委委员,又是国民党西安市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军阀刘镇华对西安久攻不克,遂改为久困长围,妄图迫使守城军队的正副司令李虎臣、杨虎城与之妥协投降。当时守城兵力薄弱,粮食极为短缺,武器弹药不足,市民饿死很多,人心惶恐不安。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我党积极动员西安军民奋力守城,为了加强领导和便于工作,中共西安地委征得李虎臣、杨虎城的同意,成立了西安人民解围委员会,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吕佑乾代表西安党团地委参加并担任了主要领导工作。他和共产党员刘含初(国民党省党部代表)、王芾南(省市学联代表)等同志一起,为坚守西安和西安解围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吕佑乾等同志派三民军官学校的军官队和学生,对全市市民进行思想动员工作,分片包干,深入宣传保卫西安城的重大意义,使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经受住了刘匪围困的严重考验。杨虎城得到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和有力支援,表示绝不与刘镇华言和。吕佑乾等积极支持和帮助省市学联举办西安暑期学校,出版《暑期学生》刊物。参加学习的学生达千余人,分社会科学系、文学系、数学系和自然科学系等进行学习。吕佑乾参加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讲授唯物史观,社会进化史,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还结合当时西安的形势,讲述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用

革命思想武装学生，号召他们为坚守西安，保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教学方式除讲课外，还组织讨论和辩论，举办讲演会等。同时，成立宣传队，通过演话剧等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慰问守城军民。为了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吕佑乾和地委的其他负责人黄平万、吴化之、雷晋笙等一起举办党员训练班，亲自讲党课，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吕佑乾等同志还帮助李虎臣、杨虎城筹划军需民食，通过宣传动员，使存有粮食的居民献出粮食，节约用粮，还派人出城筹集粮食，使军民艰苦奋战而不溃散。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西安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冯玉祥、于右任率领的国民联军的援助，1926年11月底，终于赶走了军阀刘镇华，使被围8个月的西安古城，胜利解围。

投身教育事业 培养革命人才

1927年初，陕西革命形势开始走向新的高潮，培养革命人才成为迫切的任务。根据党的指示，吕佑乾任省立一中教务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省立一中是原省立一中和三中合并而成的。这所学校在当时是全省规模最大的中学，也是党的重点工作单位之一，雷晋笙为校长。吕佑乾和雷晋笙对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设备、师资等问题，作了周密的计划安排。整顿了组织，成立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学生会。不断壮大党团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参加革命活动。还亲自给学生作政治报告，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关心革命形势的发展，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在生活上，吕佑乾对学生非常关心，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常用自己的薪金帮助贫困的学生解决困难。由于吕佑乾和雷晋笙等同志通力合作，励精图强，把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受到各界人士的赞扬。同年3月9日，陕西《国

民日报》报导省立一中的新貌时说：“一、三中合并，委雷晋笙为该
校之长，整理诸务，力求刷新……教育主任吕佑乾与校长按日与
学生讲演，作政治报告，并由学生提出问题，互相讨论，……现已组织
该校学生会筹备会，闻即日成立云。”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反
共、反人民的屠杀政策，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极大愤慨。由吕佑乾、
师守命、刘光智等共产党员领导的国民党西安市党部，于4月27
日召开了讨蒋大会，历述蒋介石叛变革命镇压工农的罪行，指出西
北人民的革命责任。大会通过了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坚持
国民革命等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几年来，军事上的胜利，是由于
工农群众的参加和拥护而取得的。蒋介石屠杀工人，破坏民众组
织，实为分化革命势力。”“本党使命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封建余孽
军阀。而蒋介石竟然勾结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妥协。”“现在中央
（指武汉国民党中央——编者注）毅然决定开除蒋介石之党籍，解
除其职权，实为正当之处置，我们表示一致拥护。”^①决议案还强
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革命惟一正确的方针，必
须继续坚持。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
北京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消息传来，西安群众无
比愤怒。5月17日，在吕佑乾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西安市党部、
省党部和中共陕甘区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宣传队，宣传李大钊
等人的革命事迹。同时，向党员散发了黑纱和革命书籍《国民革命
与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概论》等，以表示对先烈的哀悼，坚定党
员的革命意志。西安各界群众连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宣传李大钊

^① 原载1927年4月27日陕西《国民日报》。

的光辉业绩,揭露蒋介石、张作霖新老军阀的反革命罪行。

1927年7月1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西安市教职员联合会、西安市学生联合会合办的暑期讲习会举行开幕式。到会300余人。吕佑乾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讲演。指出:“讲习会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处所。去年西安办理暑期学校能于闭幕后振作精神,以解西安之围。今年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作最后挣扎时期,我们要使中国于最短期间内完成国民革命,是暑期讲习会要担负的使命。”^①

领导旬邑起义 壮烈牺牲

1927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豫、陕进行“清党”反共。白色恐怖笼罩西安。工会、农会被解散,党团组织受到摧残,吕佑乾因系外省人,难以在西安继续进行革命活动。陕西省委遂派他前往蓝田县任党的特支负责人,后又派往渭南任特支负责人。吕佑乾整顿了蓝田、渭南的党组织,教育党员坚信革命必胜。后又被党派赴华阴,在领导农运中,不幸被捕,经党组织和友人营救获释。

1927年9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通过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农民斗争、军事运动等决议案,强调加强军事和农运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党必须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领导农民暴动。

是年冬,吕佑乾作为省委特派员,在王炳南同志的协助下,前往旬邑县负责指导党的地下工作,不久任中共旬邑区委书记,吕凤岐、蒲玉阶任委员。他化装成卖笔墨的“笔客”,来往于城乡各学校

① 原载1927年7月2日陕西《国民日报》。

之间,同党员谈话,发展党组织,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暴动。吕佑乾特别注意学校工作,热情接待师生,对付不起笔墨钱的穷苦学生,他无偿供给。经过一段时间,各学校都熟悉了这位“笔客”,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讲义气、作风正派、待人诚恳的人。县城宝塔高级小学校的师生,把他当作良师益友,常和他进行交谈。在吕佑乾的指导下,旬邑的党团组织得到很快恢复与发展。到1928年春,旬邑起义前夕,清水原的郝村、北区底庙和县城附近之蒲家堡等村庄都建立了支部,发展了一大批农民党员。宝塔小学更富有战斗性,学生崔维峻、崔廷儒、马志超等10多人入了党。全县党团员发展到近百人,为旬邑起义准备了骨干力量。

旬邑地处山区,经济文化落后,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尤残酷,农民生活极端贫困。1927年秋到1928年春,灾情严重,很多农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加之甘肃军阀黄得贵、韩有录所部进驻旬邑,拉夫拉差,搜刮民财。反动县长庞天籛日夜派人到各乡逼粮逼款,将大批缴不起粮款的农民关进监狱,使旬邑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吕佑乾为首的中共旬邑区委领导农民抗粮抗款,在县城张贴反庞标语,并向当时省政府和彬乾行署告状,揭露庞的罪行。1928年春还为西安《中山日报》撰写文章,反映庞天籛统治下旬邑人民的悲惨生活。庞天籛对此十分恼恨,下令逮捕共产党员王廷壁、王日省、王子健等,严刑拷打,并阴谋杀害吕佑乾。群众的革命怒火难抑,农民暴动一触即发。反动当局慑于广大群众的威力,为了缓和群众的强烈不满情绪,不得不下令撤掉人民恨之入骨的县长庞天籛。

在这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吕佑乾和许才升等根据省委关于在关中各地举行武装暴动配合渭华起义的指示,决定以区委为核心,积极发动农民群众以“交农”形式举行武装暴动。1928

年5月6日(古历三月十七日)晚,吕佑乾、许才升等在郝村药王庙召集郝村、班村、庄合、碗间等村数百名贫苦农民,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恶霸地主!”“打倒冯玉祥,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处决了大地主程茂育。起义农民扛着锄头、铁锹、杈把、梭镖在吕佑乾、许才升等率领下向县城进发。途经吕家村时,收了大地主吕善堂的财物。沿途参加起义的农民群众越来越多。

行至赵村,吕佑乾、许才升主持召开起义骨干分子会议,研究了攻城计划。当起义队伍到达清水原畔时,按照预先约定的信号,在原畔点起了一堆篝火,城内做内应的同志当即砸开东门铁锁,起义队伍在5月7日黎明前浩浩荡荡地进了城。先占领了粮秣处,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反动的县政府官员大都闻风而逃。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了县政府,杀掉了县政府反动官员吴杰丞、傅春山等,解除了警察武装,救出了被捕的王廷壁等同志和群众。反动县长李克宣从后门逃跑,后被抓到处决。起义队伍在县城集会讲演,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宣传革命道理,安定群众情绪。

5月8日,吕佑乾和吕凤岐、王浪波等,指挥部分起义队伍维持城内秩序,其余的起义队伍由许才升等率领去清水原、郝村进行整顿。同时,召集县城附近十多副铁匠担子,在郝村、赵家村修造刀、矛等武器。起义队伍经过整训后,又回到城里改编为红军渭北支队。为了建立人民政权,巩固起义成果,吕佑乾、许才升主持召开了党的区委会议,决定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①和县农民协会及各县农民协会。任命许才升为政府主席兼县农民协会主席;程永盛为支队总指挥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吕凤岐、程百印、蒲玉阶、王日省、程国柱、王浪波、程雨顺分别担任政府秘书长、土

^① 一说是旬邑县临时苏维埃第七政府,是由省委统一安排。

地分配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宣传委员、革命裁判委员会的委员长。红军渭北支队下辖3个连。苏维埃政府设在城关宝塔小学内，门口挂着用红布制作的镰刀斧头红旗。两旁写着“要有阶级觉悟性，勿作时代落后者”的对联。

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许才升等率领一个连部队向北区进发，经过太峪、底庙、职田进驻张家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革命影响。留在县城的两个连由吕佑乾、吕凤岐等指挥，防守县城，并分头到土桥、张洪镇等地惩办土豪劣绅，开展革命宣传。

旬邑县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彬乾行署的恐慌不安。行署长官刘必达委任李焕章代理旬邑县长，纠集民团准备围攻起义队伍。同时，散布谣言，威吓群众，声称：“杀官劫狱要偿命，并且抄家灭亲”。还暗中收买混进农民赤卫队担任负责人的原反动巡警刘兴汉和叛变分子郭金科、程振西等。吕佑乾等领导人对此缺乏警惕，加之在政策上有些过左，杀人不当，特别是杀了刚上任不久的县长李克宣，致不少群众思想动摇，不告而别。

5月30日拂晓，已暗中通敌的刘兴汉、郭金科、程振西等人，煽动落后的群众叛乱。他们先进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宝塔小学，将吕佑乾、吕凤岐、王浪波、王廷壁、程永盛、程国柱等负责人逮捕并刺伤。两连武装大部分被叛变分子所掌握。他们又派人逮捕了许才升。

敌人准备将吕佑乾、许才升等起义领导人押送彬乾行署请功领赏。5月31日当吕佑乾、许才升等从宝塔小学走出时，被摧残得满身是血，一步一个血迹。但他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并高呼革命口号：“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我们的仇是有人报的！”行至张洪镇时，反动县长李焕章及恶霸地主王光贤

带领反动武装由彬县赶到。吕佑乾义正词严地提出：“你们没有资格处理我们，把我们送到西安去！”李焕章、王光贤害怕送往西安途中吕佑乾、许才升等逃跑，当即将吕佑乾等人就地杀害。吕佑乾同志英勇牺牲时，年仅 32 岁。

吕佑乾等虽然牺牲了。但在旬邑播下的革命火种永远不会熄灭，保留下来的党员、革命群众有些后来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红军。那些杀害烈士的刽子手，也先后被革命人民处决了。

吕佑乾等领导的旬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表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它一度摧毁了反动县政权，建立了红军和西北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为后来党领导陕西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旬邑起义在西北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马志超 张守宪 董建中）

附记：本文在写作中访问了吕佑乾的亲属吕洵、李超、吴永新、吕真、吕宗耀、吕文贞、任进宝同志以及熟悉吕佑乾的高克林、张申府、罗章龙、吴化之、王炳南、王超北、米哲沉、蒙定军、关中哲、韩俊生、陈云樵、杜松寿、王芾南、陈之敬、梁俊琪、孟浩、曹志麟、苏幼民、彭淑贞、方向知、刘依仁、王圣域、张文化、任致中、李天笃等同志。参阅了 1959 年省委党校、省民政厅、旬邑县民政局编写的《吕佑乾事略》。省档案馆、省图书馆、枣强县民政局以及王云、雷友声、吕夷、张振德、步智周、毛洪镇、王汝珍、张荷甫等同志提供了宝贵资料。谨致谢意。

焦 维 炽

(1910—1932)

焦维炽，字罔亭，曾用名焦仲明、赵仪三。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共青团延安地委书记，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陕北团特委书记，团省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秘书长等职务。1932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陕西省蒲城县。

—

焦维炽，1910年3月19日生于安定县（今子长县）焦家河一个农民家庭里，父亲焦文明务农兼营店铺。1917年，焦维炽上本村私塾。1922年春，焦维炽到安定县立高小上学，秋冬又转到延川县立田家川国民小学校就读。1923年，在田家川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陕北榆林中学。

焦维炽在学生时代，勤奋好学，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不畏强暴，敢于反抗斗争。

1918年12月23日傍晚，一伙土匪来焦维炽家抢劫。大门外几声枪响之后，4个土匪闯进院内高喊：“要钱送命，要命出钱。”说着便要吊打焦的父亲，焦母吓得直哭。焦维炽看见4个土匪，3个

拿着棍子，一个拿的象是自己玩耍的木枪，他就悄悄溜出大门，一看，土匪放的是纸炮，碎纸片散落满地。于是，他边跑边喊：“土匪抢我家来了，他们不拿枪，只拿棍子，快来活捉土匪！”乡亲们听见喊声，有的拿上棍子，有的扛上铁锹，立刻聚起 50 多人，包围了土匪。这 4 个土匪一看跑不了了，只得求饶说：“父老乡亲高抬贵手，放我们走吧！今后再不干这丧门败俗的丢人事了！”焦文明认识其中的一个后生的确是穷人，就让乡亲们让开路，放他们走了。大家夸奖说：“天恩真行，要不是他呐喊，我们还以为是送灶神放炮，土匪驴儿的们就得逞了。”

1922 年 12 月 25 日，焦维炽正在场里看书。他的伯父来说：“来了个收税的，给辛苦费还不走，赖在家里一天了，硬要收蒸烧酒税。我家今年就没蒸酒。”焦维炽说：“我去看看他。”他问收税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还把回话记在纸上。又问：“有公函吗？人家没蒸酒、为什么要收酒税？”收税的阎生玉这才认出问话的是田家川国民小学出名的优秀学生。他害怕被告状吃官司，便软着说：“我与焦掌柜的闲聊何必当真呢？”“那快要过年了你不走，赖下干啥？”阎生玉见焦维炽问话的态度很严肃，慌说：“我就是回老家佳县过年，歇息歇息就走，就走。”焦维炽教训他：“再借口坑害老百姓，非把你告到衙门不可！”阎生玉点头称是，当即背上行李就溜了。

二

在榆中焦维炽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受到了老师魏野畴、李子洲的赞扬。他把自己读过的进步书刊、报纸寄给母校杨其敏老师。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文学研究会”、“社

会科学研究会”、“学生自治会”的活动。在学校出版的“榆中”刊物上发表文章,揭露批判井岳秀创办“醒狮”刊物的反动性。他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下乡宣传,曾步行到内蒙古等地传播革命道理。在同学中,他的年龄最小,个头不高,但他足智多谋,能说会辩,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钢炮”。

1925年春,共产党员李子洲、团特支书记王懋廷率领绥师20多名学生到榆中以赛球为名,秘密发展团员。焦维炽被吸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10月,焦维炽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团组织派他到省立延安四中学习、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过四中学生会主席,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他和呼延震东、易厚庵、陈俞廷、李玉图等研究决定,在延安城内租了义和店的10多间平房,建立了平民学校,办起了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他们利用这些地方作为活动阵地,组织党内、团内的同志开会研究问题;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介绍《中国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进步报刊杂志;领导学生成立了“各学科学习讨论会”、“辩论会”、“演讲会”、“文娱汇演会”;排演“孔雀东南飞”等剧目,深受群众欢迎。还组织学生宣传队,利用节、假日,向市民和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吸收师生中和社会上的先进分子加入党、团组织。延安团地委成立时,焦维炽任团地委书记。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渐深入,仅延安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就有基督教、天主教、福音堂、青年会等教堂,受骗入教的人很多,活动很猖狂。传教士和教徒们星期日在教堂礼拜,星期六成群结队上街宣传上帝造人,命由天定,麻痹人们的思想意识,磨灭人们的革命斗志,因而引起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不满。焦维炽领导党、团员和学生与教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星期六,教徒们上

街的时候，学生们也上街，和他们面对面的辩论，揭发和批判上帝造人的谬论，驳得传教士们哑口无言。以后，传教士不敢上街宣传了。星期日，学生们就冲进教堂，给作礼拜的受骗人宣传，弄得传教士和教徒们很恼火。有个合阳人，名字叫屈钱，在延安城内开中药铺，信教后，成了教会的打手，纠集教徒和学生械斗。焦维炽就把他当成活靶子，领上学生，拉上屈钱，到街上游行示众，开大会批斗，编出“洋人胡求闹，屈钱跟上跑；洋人要滚蛋，屈钱要倒灶。”歌谣，揭露屈钱和洋人勾结的丑恶行径，使他的威风扫地。教会只得求反动军阀井岳秀帮忙，井岳秀下命令，不准学生到教堂“捣乱”，也不准传教士上街宣传。但学生还是照样上街宣传，砸了教堂的牌子，传教士吓得跑到城外，许多教徒纷纷退出了教会。这次反帝的“非基运动”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焦维炽还参与筹建了延安农民协会。他派农会主席到省上开代表大会，派农运干部到安定等地学习农运经验，组织学生宣传工作队，办农民夜校，和贫苦农民一起斗争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在延安的东、西、南、北各区成立了农协分会，县上成立了总会。农协成立后，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租、抗税、抗粮、抗债斗争。

1927年夏天，白色恐怖笼罩陕北，焦维炽赴西安汇报工作。9月底，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当选为团省委委员。10月，他以团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去陕北巡视工作。他首先恢复了绥德和榆林2个团县委，建立了组织生活，对团员坚持进行革命思想教育。11月，在榆林县建立了陕北团特委，他任书记。他还和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杜衡（后叛变）一起，相继恢复、筹建了延安、延长、清涧、绥德、米脂、榆林、神木、府谷8个县委，安定和镇川2个区委，保安和三边2个支部，安塞也建立了通讯站。

1928年2月,焦维炽在绥德苗家坪(今子洲县)附近的南丰寨古庙里,参加了陕北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当选为特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为了贯彻会议制定的“领导党、团,发动群众,逐步掀起革命高潮”的任务和“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方针,他不辞劳苦,到各地检查指导,帮助开展工作。

1928年9月,焦维炽到米脂县参加陕北特委召开的第二次代表会议,检查总结特委第一次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各地代表陆续到达米脂,一个小县城陌生人突然增加,引起地主豪绅们的警觉和恐慌,他们传说共产党要在米脂搞暴动,要求县政府采取措施。县长柴正清慌了手脚,立即派出警察四处侦探。焦维炽发觉了敌人的行动,建议杜衡立即转移驻地,改变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但杜衡麻痹轻敌,固执己见,迟迟不动。9月28日早晨,焦维炽和杜衡、团特委委员贾拓夫、榆林县委书记李文芳等人遭到敌人逮捕。焦维炽在狱中时刻惦记着党的工作,秘密传出指示,将陕北特委和团特委机关分别转移到清涧县折家坪和子洲县老君殿,任命先获出狱的贾拓夫同志代理团特委书记。让狱外的同志积极筹备,召开了第二次党、团代表会议。

井岳秀把焦维炽当成重要的政治犯,妄图从他身上下手,一网打尽陕北党、团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把焦维炽从米脂押解到榆林,进行审讯。从陕北镇守使公署法庭到监狱有很长的一段路,每次提审,道路两旁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面对狰狞的敌人,身带铁镣的焦维炽挺胸昂首,旁若无人。法庭内摆满了勾板子、拜花轿、压杠夹杠、竹钉子等刑具,焦维炽面对刑具和法官,镇定自若,对答如流。虽经多次审讯,敌人一无所获。一次,他从法庭回到狱中,囚室内多了一个人,一看原来是刘善忠。刘善忠告诉焦维炽,自己是叛徒出卖被捕的。他们两个是延安四中的老同学,老战友,狱中

相逢,感慨万端。他们身陷囹圄,互相关照,患难与共,共同勉励:“铁牢可坐穿,壮志不能变。革命胜利后,共话狱中难。”他们研究对付敌人的策略和办法。一个装成审判官,一个装成犯人,研究出各种答辩审判官的言词。审判官也不得不承认:“铁嘴犯人,真不好审呀!”最后,只得以“查无属共实据,释放出狱。”临出狱时,焦维炽写了一首《吟别》:

人走囚室留,知斗不知愁。

黑夜冷星光,迢迢路迹长。

表达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

三

1929年春,焦维炽赴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后,被留在团省委工作,先后任团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秘书长等职。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第五次扩大会议选他为省委委员,先后任省委秘书长,秘书科主任,还兼管西安市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到陕西关中、甘肃、宁夏等地搞兵运工作,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出了贡献。

1932年春,焦维炽和谢子长到甘肃驻军警备第三旅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他们到达部队后,经过策划和组织,先后两次领导了靖远起义,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但由于经验不足,有的同志轻敌,遭敌突然袭击,起义部队被打散,主要领导人张东蛟牺牲,杜鸿范负伤,起义失败了。谢子长和焦维炽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7月,他被省委派往渭北巡视工作,在去澄城途经蒲城县永丰镇时,正值该地党组织筹划发动民团暴动。焦维炽积极参加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由于敌情变化,出了叛徒,暴动失

败,焦维炽不幸遭敌逮捕。国民党反动派得知他是共产党陕西省委的重要领导人后,妄图从他口里得到情报。对他用尽金钱收买、封官许愿、威逼利诱等各种诡计,但都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向反动派宣言道:“你们怎么也动摇不了我,我早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我们的人民。你们在我身上得到的只能是对你们反动本质的暴露!”在狱中,他向士兵狱卒宣传革命道理,他领导难友进行斗争,把监狱、法庭作为战场,向反动派进行不屈的斗争,敌人害怕焦维炽继续揭露他们的滔天罪行,竟毫无人性地割了他的舌头,剜了他的眼睛,拔掉了他的浓眉,残酷地杀害了他。

“虽体解吾犹未变,岂余心之可惩?”1949年4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子长县政府在烈士的家乡为烈士立碑以表纪念。贾拓夫为他写了:“万恶魔刀下捐躯,民主幸福的安息”的碑文。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又在西安市南郊烈士陵园,为他立了纪念碑。

(王志厚)

王兆卿

(1908—1933)

王兆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神木南区建党和组织武装斗争的先驱,大革命失败后奉派到宁夏、内蒙古、山西、甘肃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参与组织靖远兵变,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于1933年8月在陕西省米脂县十里铺无定河畔英勇牺牲。

王兆卿,字子禄,乳名考试,1908年3月24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沙峁王家后孤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王万德,勤劳、刚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积极拥护支持革命,对敌斗争坚贞不屈”^①;母亲是一位勤俭贤淑、善理家务的农村妇女。王兆卿儿时体弱多病,习务农耕体力不支,父母节衣缩食,把他送到10公里外盘塘镇上的一所私塾读书。塾师精通中医,一边教王兆卿读“四书”、“五经”,一边为他治病。王兆卿聪敏好学,成绩很好,身体也渐渐强健。

1922年春,王兆卿考入神木县高等小学。从偏僻山乡来到县城,王兆卿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他除用功学习各业课程外,还阅读

^① 李文芳:《回忆王兆卿烈士在小学的生活》(1981年6月30日),未刊。

了陕西旅京学生创办的进步刊物《共进》半月刊，加入了进步社团组织共进社。在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下，王兆卿立志要“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献身革命，奋斗一生。”^①

1924年冬，王兆卿在神木高小毕业，翌年春又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绥德师范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陕北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校长李子洲是中国共产党西北地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学校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书刊在师生中广为流传。在李子洲的教育影响下，王兆卿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余时间阅读了《向导》、《中国青年》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等大量革命书刊，政治思想进步很快，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入学不久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②。

王兆卿是绥德师范学生会的农运委员，经常带领同学们到绥德县附近农村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地主豪绅。假期回乡，他在王家后孤村办起了平民学校，给自己的年轻伙伴讲解《农民千字文》；还用说故事的形式，教育农民兄弟认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和“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1926年农历正月十四，王兆卿邀集在榆林中学上学的几位同学赶到沙峁镇，利用四乡农民前来参加元宵古会的机会，向农民进行宣传。王兆卿站在戏台上，在历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盘剥、欺压劳苦大众的罪行之后，说：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工农劳苦大众要不受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

^① 李文芳：《回忆王兆卿烈士在小学的生活》（1981年6月30日），未刊。

^② 《中共历史人物传》第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83页。

绅剥削与奴役,就必须起来同这些吃人恶魔作坚决的斗争。这一个寒假,王兆卿还与同学们到正在举办骡马交易会的菜园沟宣传演讲;还携带《农村调查表》,深入到王家圪等村进行社会调查^①。这些活动,促进了神木南区农民运动的发展,王家圪等村很快创办了农民协会;也加深了王兆卿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

春季开学不久,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1926年3月30日,由陕北青年社、绥德师范学生会等发起的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屠杀爱国同胞的市民大会在绥德县城召开。王兆卿参加了这一活动,并于4月3日写了《绥德市民大会纪实》^②一文,详细报道了各界民众对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的愤怒情绪和大会通过的各项议案,受到师生们的热情赞扬。

1926年9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为执行“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在绥远五原誓师,分路向宁夏、甘肃、陕西进军。冯部一部途经绥德时,部队的中共组织负责人钱清泉到绥德师范,动员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国民军联军。王兆卿在蓬勃发展的大革命浪潮鼓舞下,毅然投笔从戎,随军进入甘肃兰州、天水。在兰州,他在宣侠父、钱清泉等的领导下,参与组织建立了中共外围组织甘肃青年社,1927年2月,被正式任命为国民军联军第十三路军政治处少校书记官^③。不久,部队移驻西安,王兆卿调任国民党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部书记官。这时,他与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过从甚密。史可轩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军事人才,

① 王兆卿:《我寒假的工作》,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② 王兆卿:《绥德市民大会纪实》(1926年4月3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③ 第十三路军总司令部给王兆卿的委任状(1927年2月1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曾任郑州警备司令、国民军联军警备师长。王兆卿在同史的接触中,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

大革命失败后,王兆卿奉中共组织指示离开西安,几经辗转,返回家乡。经中共神木组织活动,为他谋了个神木南区教育委员的职业。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反革命势力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王兆卿坚信黑暗终将过去,共产主义必胜。他在战友温吉甫的扇子上题诗言志:“铁链束缚全地球,重屋压迫世人愁。马列主义行天下,人民解放获自由。”^①怀着这种信念,他以“教育委员”的公开身分,在神木南区各学校宣传鼓动,号召大家奋起同反革命势力作拼死斗争。他比喻说,“我们的学校是一个造炸弹的工厂”,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就像一颗颗炸弹投向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土豪、地主,炸得他们永不安宁^②。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段时间,王兆卿还十分重视中共在农民中的工作。他曾向到南区检查工作的中共神木县委书记杨和春建议:在革命低潮时期,应吸收坚决要求革命的贫雇农入党,增加党的新生力量,改善党的领导核心^③。经上级批准,王兆卿先后介绍贾怀光、贾怀德等加入中共,建立了神木县南区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贾家沟小组。在他的努力下,王家圪等村庄还恢复和建立了农民协会、抗捐减租会和雇工工会等革命群众组织。

1928年春,王兆卿受中共上级组织委派,到宁夏冯玉祥旧部齐子俊部的留守处作兵运工作,旋又转赴绥远准喀尔旗齐子俊的

^① 转引自刘长健:《麟州风暴》,未刊,原件存中共神木县委党史研究室。

^② 王思惠:《忆王兆卿的一次讲演》,陕西《革命英烈》1983年第2期

^③ 杨和春:《回忆王兆卿同志》(1981年7月7日),未刊。

司令部任书记官。后因齐部“清党”，王兆卿再次返回家乡。同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在他的组织下，神木南区第一个中共支部——贾家沟支部建立。此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壮大党的队伍、发展党的组织上，于1929年相继在王家圪、王家庄、刘家坡、沙崩、彩林、盘塘、杨家沟、贺家川一带，发展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建立了六七个中共支部，并成立了中共神木南乡区委。1930年1月，王兆卿奉中共陕北特委指派，与毕维舟一起在王家圪召开会议，贯彻特委关于继续发展组织、开展地下斗争的指示。会后，各地积极开展工作，很快使党员发展到200多人，党支部增加一倍以上，王兆卿被誉为神木南区建党和组织武装斗争的先驱。

1930年春，王兆卿被中共组织派往山西搞兵运工作。初到太原的一天，他因所住的榆林会馆突遭国民党军警包围搜查而被捕。由于他沉着机警，加上当局未掌握任何证据，第二天即被释放。按照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到驻防平定县的国民党军高桂滋部策动起义。经过一段工作，高部有两个团已被中共地下组织掌握。正在积极筹划起义之时，王兆卿的活动被高部两个军官发现，刘天章遂令他离开平定。1931年7月4日，起义成功举行，1100多人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四军，开赴河北阜平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9月，因遭军阀诱骗，红二十四军受到严重损失。中共山西省委决定余部经晋西北转往陕北开展游击战争，派王兆卿立即回神木，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做好接应工作。

王兆卿受命后返回神木，在王家后圪自己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两路寻找红二十四军战友。当他带领的一路赶到府谷县境时，得悉西渡黄河的红二十四军余部已在府谷县清水河、黄甫一带被敌打散。他冒险营救出几位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带回神木南区。在中共神木区委领导下，由这些同志和十几名地方党员

组成特务队,开始了神(木)府(谷)地区的工农武装斗争^①。

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王兆卿到驻靖远的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搞兵运工作。这时,中共党员孙作宾刚刚被甘肃省宣慰使孙蔚如任命为警三旅的中校参谋主任。王兆卿找到孙作宾,在向孙介绍了该旅副旅长、中共教导队特别支部书记张东皎,副官长、中共军官支部书记李罕言,排长、中共士兵支部书记石子健等的中共组织关系后,传达省委指示说:这里党的力量是雄厚的,省委要你们积极创造条件,策动兵变。孙作宾后来回忆说:“王在布置任务的同时,曾多次给我们讲:现在国际上是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世界;国内是两个政权——蒋介石政权和我们党建立的苏区(中华苏维埃)政权对峙的局面,斗争是很激烈的;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在旧军队中的兵运工作要以秘密策划、组织发动兵暴为主要方式,以建立工农红军或工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迎接革命高潮”^②。中共警三旅组织,在王兆卿的参加下,曾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研究贯彻省委指示精神,“在全旅组织发动兵暴”^③问题。5月5日,在西北红军著名领导人谢子长等的领导下发动了靖远兵变,在水泉堡成立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下辖3个支队,有人枪100余。这时,王兆卿奉谢子长派遣,赴宁夏海原策动沈毅民(中共党员)的炮兵起义,因沈

① 刘北垣在陕西省榆林地区纪念王兆卿等六烈士座谈会上的发言(1983年8月3日),未刊。

② 孙作宾:《回忆靖远兵暴》,《甘肃党史资料》第172—174页;访问孙作宾记录(1981年12月5日,1986年5月7日)。

③ 孙作宾:《回忆靖远兵暴》;访问孙作宾记录(1981年12月5日,1986年5月7日)。

毅民已投靠了警三旅旅长王自元,使兵变归于失败。

秋末,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人派王兆卿回陕北同中共陕北特委联系,动员年轻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红军游击队。任务完成后,王兆卿带上自己的弟弟王兆相和中共神木组织派去参军的同志一起归队。途经安定县瓦窑堡,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马文瑞交给王兆卿一项特殊任务: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为中共陕北特委筹集的一批经费已送到瓦窑堡,要他先把这批经费送往特委机关。王兆卿欣然接受,当即和与他同行的他的一个堂兄带上经费东返^①。他们晓行夜宿,走到米脂县班家沟村过无定河时,他的那个堂兄起了歹意,用石头将他打昏推入河中,把经费抢走了。

王兆卿苏醒过来,先后在米脂县姜家兴庄姜好兴、佳县乌龙铺张书信和南孤村张达志家里养伤。伤愈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他不再去陕甘游击队,留在特委,任特委执委、军委书记^②,赴神(木)府(谷)巡视党、团工作。王兆卿在神府巡视了一个多月,看到各地党、团组织发展很快,有骨干470余人,特别是他参与建立的中共神木南区组织,党、团已遍及多数村庄,已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多次斗争;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一些村庄的党、团组织不健全,无法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1932年底,王兆卿返回特委机关,向代理书记马明方汇报了巡视情况,建议派人去整顿神府党、团组织,并着手建立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特委采纳了王兆卿的建议,派张达志以特委特派员身分,去整顿神木党、团组织。

^① ^②马文瑞:《王兆卿同志在陕北特委工作及牺牲情况》(1973年12月11日);《回忆无定河畔六烈士》,陕西《革命英烈》1983年第2期。

1933年4月,为解决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归属问题赴中共河北省委请示汇报工作的崔逢运、鲁学曾返回陕北,带回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对陕北工作的指示。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孤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上述指示,决定加紧开辟3个游击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王兆卿参加了扩大会议,并根据他巡视神府、米脂、佳县等地的情况,就如何贯彻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指示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作了发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王兆卿继续当选执委^①,仍任军委书记。

特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特委执委毕维舟被任命为驻安定的游击队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王兆卿作为军委书记,与毕维舟一起去安定整顿第一支队,同行的还有到第一支队为特委提取活动经费的高禄孝。7月30日,王兆卿等行至米脂县镇川堡(现属榆林市),住在中共米脂区委书记崔明道家里。次日凌晨,十四五名国民党军官兵闯入崔家,将王兆卿、毕维舟、崔明道和高禄孝逮捕。“这次破坏原因是叛徒告密”。叛徒董佩义系国民党军驻米脂连队的录事,他向连长李子宜报告了米脂一些中共党员的住址和中共陕北特委马明方、马文瑞等领导人正在姜家兴庄的情报,李子宜派兵于7月30日晚先在米脂县城逮捕了中共党员高寿和王品肖;又连夜到镇川堡逮捕了王兆卿等4人;接着,7月31日,再赶到姜家兴庄。群众看到国民党军进村及时作了通报,马明方等始得脱险。

王兆卿等被押往米脂县城,先关在国民党军连部,后转押于米脂县政府看守所。由于董佩义的出卖,国民党当局知道王兆卿、毕

^① 中共陕北特委给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工作报告(1933年10月20日),《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13期。

维舟等“是共产党的陕北组织者”，便对他们严刑拷打，要他们交出陕北中共组织和党员名单。王兆卿等坚强不屈，大义凛然地对审讯他们的国民党官员说：“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背叛共产党办不到！”

王兆卿等被捕后，中共组织和民主人士曾组织营救，但国民党当局提前下了毒手。8月3日（农历六月十二），国民党军以解押绥德团部为名，将王兆卿等6人押至米脂城南十里铺官家湾，枪杀在无定河畔，这便是震动陕北大地的无定河畔六烈士。王兆卿牺牲时，年仅25岁。

（王益民）

蒲克敏

(1903—1939)

蒲克敏，字志政，又子政。陕西蒲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1931年在杨虎城资助下赴英国留学。1933年5月任杨虎城部政治教官。卢沟桥事变后任《西北文化日报》战地记者、晋南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政治教官。1939年10月在宜川遇难。

一

蒲克敏，又名子政，陕西省蒲城县原任乡南蒲村人。生于1903年12月15日，家中世代务农。1910年前后，在荆姚镇北寺私塾读书4年。1915年至1919年，在蒲城高小读书；毕业后，考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在校期间，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历经9次考试，8次名列前茅。

当时的三原，是陕西靖国军的根据地，是渭北各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远在1924年下半年，这里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渭北特别支部和学生联合会，1926年初又建立了党的组织——渭北特支。蒲克敏在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鼓励下，踊跃

地投入了革命洪流。

1923年下半年,他同严树森、亢维格、王之鼎等同学组织了青年共进社。1925年初,蒲克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与三原特支的领导。在三原团组织领导下,不管是渭北学联举行群众大会,还是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军阀,蒲克敏既是精干的组织者,又是无私无畏的斗士。

二

1925年上半年,团组织派蒲克敏到上海大学递送三原团组织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交恽代英后,就被留在上海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大学的名誉校长是于右任。李达、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在该校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学生多系各地选送的进步知识青年。蒲克敏在学习期间,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成为当时学校中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和坚定沉着的革命者。

1925年,上海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蒲克敏心含国家大耻,胸怀民族大恨,和同学们一起,迎着英帝国主义巡捕的刺刀、棍棒、皮鞭、水龙,冲上南京路,闯进租界区,揭露帝国主义者残杀中国人民、强占中国领土、践踏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散发“誓雪国耻”、“收回租界”、“驱逐帝国主义出境”、“还我主权、兴我中华”的革命传单。在这场斗争中,有的人倒在血泊里,有的人鳞伤遍体。蒲克敏、党伯弧、曹志麟等20余名同学被捕。在帝国主义主持的会审时,党领导的中国济难会和上海学联,为被捕同学聘请爱国律师,进行辩护,蒲克敏和其他被捕同学理直气壮地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迫使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得不将被捕同学全部释

放。

蒲克敏在对敌斗争中，不仅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同时又是一位才思敏捷脚踏实地的宣传活动骨干。1925年下半年，他在上海大学先后介绍曹志麟、王圣域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了陕西同乡会；创办了进步刊物《新群》半月刊；编写、出版了《唯物史观者论中国之乱源——封建军阀》一书。

1926年春，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蒲克敏离开上海大学，同王圣域等3人去北京，住蒲城会馆，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援助豢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公然派军舰两艘，闯进大沽口，炮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出于民族义愤，忿然还击。日寇便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七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向北京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并限于48小时以内答复。

消息传来，北京各界群众无不愤慨。3月18日，蒲克敏投身于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的学生、工人游行队伍，向帝国主义示威，向北京执政府请愿。要求“撤销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出境！”当天下午，示威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地涌到执政府东辕门和铁狮子胡同。谁料，卖国求荣的段祺瑞，却下了毒手，指示其卫队，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队伍开枪射击，还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被打死的47人，受伤150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年仅23岁的蒲克敏，在这次惨案中也受了伤。

三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钊为首的

中共北方区委转入地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蒲克敏回到陕西，在三原北城甲种工业学校任教。他和三原的爱国学生一道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26年秋到1927年冬，蒲克敏到了渭南固市渭阳中学，先后当教员、教导主任。曾任该校地下党的组织、宣传委员、支部书记。他利用公开身分组织学生开展业余读书会、讲演会、辩论会；学习《共产党宣言》、《剩余价值》、《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浅说》和《孙文学说》等等，不遗余力地扩建党团组织，先后吸收陈志亮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还开设了党员训练班，耐心地给党员讲《共产党宣言》、讲党史、讲党的秘密工作策略等。大大地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认清了自己责任的重大和光荣。

1926年10月初，北伐军胜利占领了武汉，蒲克敏在10月10日国庆节娱乐晚会上，用双簧形式，宣传了北伐军的胜利消息。同时，为了策应冯玉祥军队解西安之围，动摇当地反动派之军心，经过领导研究，宣布学校解散，指示部分进步学生到蒲城、富平一带工作。蒲克敏等人趁热打铁，在距渭南不远的龙兴高小（渭河北岸）一带活动，吸收尹清璋、雷俊杰等加入共产党。并且计划推倒区长贾子厚，准备选任尹清璋为区长，为开展革命活动建立据点。

1926年春，固市为军阀刘镇华部麻老九（麻振武）军所占。11月28日西安解围后，固市定名为五一县，渭阳中学也复了课。不几天，冯玉祥的五军方振武部到了固市，麻部投降。蒲克敏等协助国民联军召开农民、学生代表和市民大会，指示渭阳中学的刘建侯率领群众，在街头示威游行，赶走了麻振武委派的反动县长孙抚臣。12月份，蒲克敏等人组织成立农民讲习会，召集渭北全体小学教师参加，宣传党的基本纲领和革命道理，启发农民革命。讲课的人除蒲克敏外还有徐振化、韩仲范和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

来的李秀实。在讲习期间,印发了农民协会会员登记表,对会员进行了登记审查。

蒲克敏诲人不倦。如有个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一文时,一天内就6次提出问题请教,蒲克敏都是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给这位学员一次又一次地解释。

这次讲习会,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农运的领导,培训了一批农运骨干,为党团组织的壮大,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

1926年,蒲克敏和王韵清俩人介绍在蒲城西区第二高小(荆姚小学)任教的万志宁,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成立了蒲城县第一个地下党的组织——荆姚党支部。万志宁任支部书记,直接受渭阳中学党组织领导。荆姚地区的农民协会组织,也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百人。党支部和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曾向兴镇驻军任志阳旅长集体“缴农”;抗粮、抗捐、抗税,和反动政权展开激烈的斗争。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共陕西省委派蒲克敏到蒲城主持召集有关同志研究成立了蒲城县委。曹受祉任县委书记,工菊人负责团县委工作。在蒲克敏和中共蒲城县委的努力下,自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其中以荆姚支部人数最多。

五

1927年冬,蒲克敏被党组织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后

又奉命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1928年年底，身带“六大”决议和中央给陕西省委工作指示返回省委。1929年1月，在富平美原小学出席了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六大”决议和中央的工作指示。

1929年1、2月间，党、团省委组织，先后遭敌破坏。蒲克敏、李子洲、徐梦周等10余人被捕。

在控制森严，动辄遭辱的监狱中，蒲克敏、李子洲等人领导狱中同志，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敌人严刑拷打、财禄利诱面前，蒲克敏等，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30年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11月杨虎城率部入关，赶走刘郁芬，进驻西安，释放了政治犯，蒲克敏、潘自力、徐梦周等10余人相继出狱。

六

1931年春，蒲克敏、原政庭、亢心哉（维恪）、潘自力等人，被杨虎城资送到外国留学。

蒲克敏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1931年底经何国同（又名何松亭）等人介绍，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任中国语言组书记，联合留英中国学生成立反帝大同盟支会，在伦敦中国工人区从事工运，出版《中国工人周刊》。不久，潘自力从法国到了英国。1932年冬至1933年初，蒲克敏、原政庭、何国同、潘自力4人由英共资送到苏联高加索、南斯拉夫等地参观学习，后经波兰、柏林、瑞士、威尼斯回国，1933年5月中旬抵达上海。

七

蒲克敏等4人到上海后各找组织关系。蒲克敏和潘自力9、10月间回到西安，杨虎城任命蒲克敏为西安绥靖公署少校秘书兼杨部政治教官。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蒲克敏以参议名义代表杨虎城去联络北方军事实力人物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反蒋抗日。全面抗战开始后，蒲克敏任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的战地记者。1938年冬赴晋南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政治教官。1939年，中条山抗日将领孙蔚如、赵寿山等派其高级军官段象武赴宜川秋林，与阎锡山会商抗日策略。蒲克敏应友人王菊人函召，前往协助段象武，10月11日由秋林返官亭途经宜川，遇到敌机狂轰滥炸，罹难。时年36岁。

蒲克敏烈上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情操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蒲城县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办公室)

巩 德 芳

(1909—1947)

巩德芳,字三勳。陕西商县(今商州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商洛工委委员、商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1946年鄂豫陕边军区成立,任二分区司令员。1947年3月因病逝世。

巩德芳,1909年5月29日生于商县巩家湾(现属丹凤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伯父巩怀福,勤劳善良,终生务农。父亲巩怀让当过地方的乡约,是一个忠厚仗义、称贤乡里的淳朴农民。堂哥巩德彦(他伯父的独生子)、弟弟巩德胜都是年青时就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员。

巩德芳的少年时代,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国内军阀割据,局势动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地处陕西东南的商州山区,地主武装各霸一方。他们为了争夺地盘,经常残杀、奸淫掳掠,加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本来就很穷的山区人民更跌进

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切，在巩德芳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从小就养成同情劳动人民，疾恶如仇的性格。他常和本村少年一起，手持木制的小刀、小长矛，口中喊着：“杀坏蛋，保中华，为民除害！”

1920年，11岁的巩德芳开始在大峪寺小学读书，翌年转入巩家湾小学读完初小。1924年考入两岭村朝阳高小。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校长周伯干是一个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关心国事，经常给学生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清朝政府政治腐败，人民如何奋起斗争的历史；讲五四运动的背景、经过和意义。从而使巩德芳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在这里，巩德芳阅读了《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和屈原、文天祥、李自成等历史人物故事。这些英雄的形象和动人事迹给年幼的巩德芳以强烈的感染和鼓舞。

为了寻出路，从1928年起，他丢下耕牛犁耙庄稼地，出远门担盐开阔眼界，参加过红枪会；后来又投军到地方武装之中，先后在张云山、张元亮、谢效廉等地方武装头目的手下当过护兵、常备队分队长、副队长等职。近十年的颠沛飘游和旧行伍生活，使他目睹了旧军队的腐败和欺压人民的本质，感到失望、痛苦。

1932年到1935年，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后转战商洛，领导当地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年青的巩德芳看到了光明，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强烈地感受到，只有跟上这样的军队，才有出息，才有光明的前途。但此时尚无直接的引路人，巩德芳对党和红军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任商棣仙联保处常备队副队长的巩德芳，对祖国的锦绣山河被日寇践踏、蹂躏，蒋介石反动卖国政府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无比愤慨。但他爱国有心,救国无门,中国向何处去?救国的道路在哪里?他还找不出一个理想的答案。就在这彷徨苦闷之时,中共陕西省委派王伯栋回乡担任商洛工委书记,使巩德芳遇到了良师益友。从王伯栋那儿,他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建立起革命武装,才能抗日救国,消灭反革命武装。巩德芳仿佛在黑夜中摸索而突见阳光,心情十分激动。他积极投入王伯栋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挑起了组织地下武装的重担。1938年4月,他经王连成和王伯栋介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正当商县茶房、商镇、龙驹寨一带抗日活动热火朝天的时候,心怀鬼胎的专员温良儒派人暗杀了王伯栋同志。恶霸地主、商棣仙联保处常备队队长谢效廉也开始清理内部,排挤中共地下党员,监视巩德芳等人的行动。面对白色恐怖,巩德芳等同志根据地下党负责武装工作的雷振杰同志的嘱咐,于1939年7月4日亲自组织地下党员和革命进步青年,处决了顽固分子谢效廉,率领近百人,在高山插起了一杆抗日人民武装的战旗。

国民党反动派想方设法要扼杀这支初创的革命武装,巩德芳机警灵活地同敌人展开了斗争。龙驹寨保安大队长冯林生派商棣仙联保副主任李景蟾找巩德芳劝降,说:“交出武器,啥事都了。要干就要听政府的统一指挥。”巩德芳指出:“群众拿起武器抗日有什么错,你们反共不抗日,谁听你们指挥!”当李景蟾用武力威胁时,巩德芳干掉了这个坏蛋。冯林生又密令老君乡乡长张仰之以商讨抗日大计为名,图谋扣留巩德芳。巩德芳明知这是圈套,但为表明抗日诚意,就带警卫员前去赴约。酒席桌上,张仰之满口的联防剿共,一句不提共同抗日,巩德芳针锋相对,说得张仰之闭口无言。当张仰之离席调兵遣将时,巩德芳不告而辞,在枪林弹雨中杀出罗

网。

顽固派接二连三的阴谋,使巩德芳意识到,不搬掉冯林生这块顽石,我们这支武装就难存在,地下党的工作也无法开展。1940年7月22日,在商县地下党县委领导下,巩德芳组织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二三百人,乘冯林生由商县开会返回龙驹寨途中,在茶房以东的四房岭进行了截击。当场击毙了保安大队长冯林生,击溃了他所带的3个中队,缴枪五六十支。鼓舞了群众斗志。

7月,专员温良儒调动国民党一个正规营,配合伪保安团疯狂地搜捕巩德芳和他领导的游击队骨干。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巩德芳有时把游击队员分散到外地“避风”,当形势稍有缓和时,又把队伍集中起来,同敌人进行斗争。一天,巩德芳和薛兴军率20多人在老君沟与敌遭遇,被大于我十多倍的敌人把游击队冲散,一部分被围困在米家寨。米家寨是座孤山,三面通路,一面悬崖。敌人凭着人多势众,把通向山上的三条小路堵得水泄不通,游击队连续两次突围都没有成功。黄昏时候敌人从三面向山上扑来,敌前沿指挥刘兆玉一个劲地叫嚷:“捉住巩德芳加官领赏。”薛兴军举起三八大盖,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其他同志也一枪一个,打得敌人抱头鼠窜。趁这个机会,游击队员从后山的悬崖上攀小树而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秋天,巩德芳赴陕甘宁边区的马栏向省委汇报商洛武装斗争的情况,经省委同意,巩德芳化名张玺,潜至河南淅川的荆紫关去做地方军阀别廷芳部的统战工作。

二

1942年秋,国民党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商县地下党组织由于

叛徒告密而遭到破坏,大批革命同志被捕,环境更加恶化。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巩德芳接省委指示,收集游击队散员回到陕甘宁边区的马栏整训。当时正赶上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省委便拨出5万边币,5石小米,20多条被子,组织商洛去的30多个同志开办了“德记骡马店”(以巩德芳的名字命名的)。省委派王杰同志任支部书记,巩德芳任支部副书记兼经理,薛兴军任副经理。巩德芳和大家一起打窑安家,开荒生产,发展副业,经营骡马店。两三年间,达到了丰衣足食,超额完成了上缴粮的任务。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对干部的迫切需要,1944年冬,省委决定,德记骡马店和临潼、麟游等地的同类单位合并为训练队。不久又扩编为教导团,下辖4个队,巩德芳被任命为第二队队长。

在马栏,巩德芳结合整风学习,认真总结了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组织大家认真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多方面关心每个同志的成长与进步。刘兆英等对敌斗争英勇,对革命忠诚,巩德芳就利用各种机会向他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培养他们入党;田申荣、巩全林没有文化,巩德芳就把有文化的同志组织起来,开展一帮二,一帮三,看谁学得快活动,帮助不少同志摘掉了文盲帽子,提高了政治觉悟。为商洛游击队培养出一大批武装斗争的骨干。

1945年冬,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巩德芳受省委派遣,返回商洛,与早期从马栏返商的蔡兴运、田申荣等一起,发动群众,发展武装,不到一个月功夫就组织起一百多人的游击队。他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出发,组织群众大力开展抗租、抗粮、抗债、抗税、抗丁活动。在敌人抓丁最厉害的时候,警告抓丁的反动乡保长,使其

不敢为非作歹。有时发现敌人半夜三更来抓丁,游击队就突然袭击,把群众营救出来。哪个乡公所的匪徒逼得群众喘不过气,游击队就狠狠揍他一顿。保安队到乡下抢粮,游击队就中途袭击,帮助群众夺回粮食。游击队处处保护群众利益,群众就很快靠向游击队。当巩德芳率领游击队打敌人据点时,许多群众给游击队带路、探消息、送情报;有的还拿上土枪、梭镖参加战斗。

巩德芳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善于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社会关系和联络形式,壮大革命力量。他同一些开明绅士建立秘密联系,使其暗地为游击队送情报,开路条,筹粮款,送武器弹药;对国民党保甲人员,他针对着不同地区、不同对象,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使进步的靠近我们,中间的不打我们,反动的害怕我们。

对于反对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巩德芳千方百计的予以争取。1945年冬,为了团结和收编丹江以南的竹林关、龙山一带张奎、谭道鹏两股地方武装,他就顶风冒雪,赶到丹南的瓦房沟与张奎面谈。张奎向巩德芳诉说了自己的苦难遭遇和目前处境。巩德芳说:“一切坏根子都在蒋介石政府和其反动军队那里。不说别的,单是烧杀抢掠就害苦了老百姓。”张奎听了这话,气呼呼地说:“谭道鹏的父亲也是国民党杀害的。”巩德芳进一步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打倒国民党给穷人报仇。”张奎长叹一声说:“不瞒你说,我不是没有这个心,就是心单力薄,斗不过他们。”巩德芳把话接过来:“现在我们团结起来,力量不是就大了吗?你加上我,再加上谭道鹏,几股力量扭在一起和国民党干。”张奎满口赞同,他怀着火热的心找到谭道鹏,讲述了他同巩德芳见面的情况,于是,这两支地方武装,就参加了巩德芳所领导的游击队,以后成为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丹江以南活动的两支劲旅。

1946年4月,成立了中共商洛工委和商洛武装指挥部,王力

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巩德芳、薛兴军任工委委员和指挥部正、副指挥。游击队编为三个大队，有六七百人。游击区已扩大到北起蟒岭，南至赵川、龙山，东到豫陕交界，西北至北宽坪板桥的广阔领域。

在军事斗争中，巩德芳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机智灵活、以少胜多，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开始一段时间，他带领游击队主要是袭击敌乡保武装，瓦解国民党统治基础。对不妨碍我游击队活动的、有统战关系的不打，没有统战关系且很反动的，不管是远是近，有取胜机会就去打。象洛南县的灵官庙，是我游击队活动经常过往的地方，几任乡长都很反动，游击队多次袭击、拔掉了钉子。对敌正规军、地方保安团，看情况能吃掉就吃掉，吃不掉就走。一次，游击队在洛南上庄坪整顿纪律，敌洛南保安团向我扑来。为了吃掉这块送上门来的肉，巩德芳、王力、薛兴军等领导人各带一部分兵力，分路占领有利地形，互相配合，不到一个小时，就击溃了敌保安团，团长王骊仙也差点当了俘虏。

1946年4月，敌商县保安团出动500余人，围剿我游击队。德芳率领队伍在丹江南北与敌兜圈子，敌进我退，敌打我藏，敌驻我扰，弄得敌人像一头疯牛一样到处乱窜。一天，敌人出动了300多人从流岭下来追击我们，德芳把队伍埋伏在江庙附近的夹沟两边，布成一个口袋阵。不一会儿，敌人陆续进入埋伏圈，巩德芳一声号令：“打，狠狠地打！”暴风雨般的子弹和手榴弹落在敌群，打得敌人哭爹喊娘，尸体遍地。这一仗，歼敌近二百，缴获了大量的武器，此后敌人再也不敢追赶游击队了。

三

1946年7月，李先念等率领的中原解放军主力突围进入商洛

后,巩德芳、王力同志全力做好接应工作,使突围到商洛的主力部队如鱼得水。巩德芳在苗沟许家庄亲自召开了有地下党员、地下工作者、游击队家属共280多人的会议,要大家想办法解决部队的吃饭、穿衣和伤病员的安置问题。他给靠近我们的绅士写信,要他们出面讲话,叫地方保甲给部队筹集粮款和衣物。把伤病员安排在隐蔽、可靠的群众家里,管吃管住,热情照看。到了冬天,部队棉衣成了大问题,他又动员群众进城赶集买布和棉花,用草木灰一染,白天裁,夜间缝,赶入冬以前把做好的棉衣送给部队。

对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人的安全,巩德芳和刘庚特别重视。李先念带领的指挥所一进入商洛,就受到巩德芳派出的游击队的接应和保护。当时,郑位三身体不好,陈少敏有病,不便随军行动,只好住在群众家里。巩德芳对这些领导人的隐蔽地点,行动路线,食宿治病,护送人员等,都做了精心的挑选和安排,在两三个月内多次转移驻地。由于巩德芳和刘庚组织群众和部队严密掩护,使国民党搜剿部队处处扑空。一次当郑老、陈大姐将要转到商县麻街原国民党营长李世华(我地下党员)家时,巩德芳再三叮咛要绝对保证两位领导人的安全。没想到,第一天晚上就有人给麻街乡公所报告说:游击队把共军的两个很大很大的官接走了。得知后一查,原来是一个俘虏兵逃跑后透露的。当天就把这个家伙拉到山里收拾了。时隔不久,国民党第七绥靖公署主任谢甫山路过麻街时,在李世华家吃了一顿饭也毫无察觉。由于巩德芳等群众工作扎实,使几位领导人在商洛地区平安地度过了两三个月,又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去陕北。解放后,郑位三同志在谈到这段斗争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陕南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

巩德芳、王力等领导商洛游击队,用一片赤诚之心接应了中原主力部队;中原主力部队也全力支持游击队的发展,积极为游击

队训练骨干,抽调干部,补充武器。两支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并肩作战,从而使商洛游击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当年9月24日,在李先念亲自主持下,成立了豫鄂陕边区,中原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合编。汪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文建武任军区司令员,辖5个分区,巩德芳任二分区司令员,刘庚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夏世厚、薛兴军任副司令员;赖春风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秋宏任副政委。下辖3个游击支队、两个独立大队共3000余人。在丹江北、秦岭南,直到豫陕边境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吓得地方武装不敢轻举妄动。在巩德芳的指挥下,二十二支队曾主动北出秦岭破敌铁路,途中与敌保安三团打了一仗,歼敌一个营。二十一支队在洛南三要司箭杆岭与敌一个正规团遭遇,歼敌一个连。

1946年10月间,河南地方反动军阀别廷芳部一个团侵袭老林沟医院,企图杀伤游击队掩护的主力伤病员,巩德芳率领游击队与兄弟分区配合,对敌展开了猛烈的围歼,战斗了一天一夜,俘敌数百人。那一段在商洛境内,游击队与主力部队并肩作战57次。并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扩兵建政。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开辟了西至长安子午镇,南到湖北两郧,北至秦岭,东到河南卢氏、浙川的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四

1946年底,国民党9个正规旅和12个保安团围攻我商洛根据地,我中原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合编为野战支队转入外线作战。巩德芳和三分区政委王力奉命率少数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

巩德芳胸怀豁达,顾全大局,他临危受命,意志更加坚定,多次向组织交心说:“主力转移是高瞻远瞩的布局,是保存力量,迎接革

命新高潮的战略措施。共产党员就要服从革命需要，在困难面前决不回头。”他无私地把长期培育的游击队输送给主力部队，自己身边只留少数分队。

在敌重兵压境的形势下，巩德芳不畏强暴，视死如归。他看到敌人用刺刀逼着群众移民并村，到处泥门封窗，抢劫财物，水中投毒，粮中浇粪，以惨无人道的手段糟踏妇女、屠杀群众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满腔怒火。他冒着生命危险率领游击队昼伏夜击，在长坪公路和边缘山区一带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游击队联络中断，信息不通，他只好带着身边的几个同志进入深山隐蔽起来。由于转移频繁，有时几天见不到粮食，巩德芳的胃病复发了，大口大口地吐酸水，有时胃疼得坐卧不安。没有条件治疗，他只好压着胃部揉一揉。在敌人围剿紧张的时刻，同志们就把德芳隐蔽在许家沟许佐善家的红薯窖里，后来又转移到姜岭山梁的一个破窑洞里，最后转移到姜岭一个群众的楼上。这时他的胃病更严重了，咳嗽出来的痰常常带有血丝，行动已经很吃力了。

在这艰苦的日子里，他口头上常吊着一句话：“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的胜利一定要来到。”当他偶尔听到有人唉声叹气，总要挣扎着爬起来，说一说陈少敏在桐木沟对游击队的教诲：“你们龙山再硬的岩石都能长出冬夏长青的铁力木树，因为岩石上有缝，树根能扎下去；国民党统治再严，总有缝子，你们要扎下去，生根、开花、结果，战胜国民党。”鼓舞同志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在他病情恶化的时候，总是“黑”着脸对护理他的同志说：“游击队就是跑着打敌人，不能老守在我身边。”有时严肃地瞪一眼，促使同志们去战斗。

一天，巩德芳听说梁升元投敌了，他消瘦而蜡黄的脸上，展现出蔑视的笑意，松开牙关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梁升元跑了，游击队

没有垮。”“商洛一定要红起来!”时隔不久,巩德芳就溘然长逝了。商洛人民牢牢地记着这一天是:1947年3月22日。

巩德芳同志为商洛人民出生入死,战斗了十个春秋。在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叫缉拿巩德芳,都未如愿以偿。他病故后,万恶的敌人为了向其主子邀功领赏,惨无人道地将他的尸体挖出,在头上打了一枪,把鸡血洒在头部的弹孔上。然后铡下头颅,送往商县,悬挂于东城门外高牌楼上示众。为此,商县反动当局还为这伙欺骗他的奴才们披红戴花,弹冠相庆,演出了一场令人发指的丑剧。

巩德芳全家8口人,先后有6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堂哥巩德彦,1944年被敌人杀害;弟弟巩德胜在担任中共商县县委组织部长期间,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43年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母亲被活活气死。在此期间,敌人还多次抄了他的家,房屋被全部烧掉,东西被洗劫一空。巩德芳逝世后不久,残暴的敌人为了斩草除根,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突然闯进巩家,枪杀了他的父亲、伯父、妻子,他8岁的女儿由于藏在竹筐下才幸免于难。从此,巩德芳一家两门,就只剩下一个孤女了。这是商洛革命斗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商洛人民不会忘记自己的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门革命英烈

(陈效真)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二) /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4-05967-6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
列传—陕西省 IV. K820.8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546 号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ZHONGGONG SHAANXI LISHI RENWU ZHUAN

(第二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 插页 13.25 印张 293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24-05967-6/K·977

定价: 25.50 元



ZHONGGONGSHANXILISHIRENWUZHUAN

责任编辑 许发宏

封面设计 崔 凯

ISBN 7-224-05967-6



9 787224 059670 >

ISBN 7-224-05967-6/K · 977

定价：25.50元